

◎韩春梅 主编

兰州市城关区
历史文化丛书

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史办公室
兰州市城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张铎炎 著

古长城、烽燧、城垣，展示了民族争锋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文化；
神殿宝刹、道观城隍，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古今嬗变；古居旧宅、秦
砖汉瓦，显现了先民追求安居乐业理想愿望。



甘肃文化出版社

作者
简介

张铎炎，1969年12月生，笔名云青。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供职于市政行业，高级经济师。多年来，在《兰州晚报》《兰州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及有关兰州文史的文章多篇；在《兰州交通大学学报》发表《左宗棠对兰州教育的贡献及意义初探》，获甘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作品《兰州黄河铁桥百年赋》获甘肃省教育厅、省文明办和省语委“中华赞·陇原情2009诗词歌赋创作大赛”二等奖。长期参与省、市地方史志编写工作，与人合著《兰州市志·人物志》（2013年3月出版发行），任副主编；《兰州通志》编辑；《甘肃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编写班子成员。

宋拓淳化閣帖



兰州市城关区
历史文化丛书

◎韩春梅
主编

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史办公室
兰州市城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文博

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张铎炎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博精藏：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 张铎炎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2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90-1286-2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历史文物—介绍—兰州
②名胜古迹—介绍—兰州 IV. ①K872.421
②K928.70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7480号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张铎炎 | 著

责任编辑 | 周乾隆

封面设计 | 李中安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h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h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223千

印 张 | 19.25

插 页 | 16

版 次 |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2月第1次

印 数 | 1-3 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5490-12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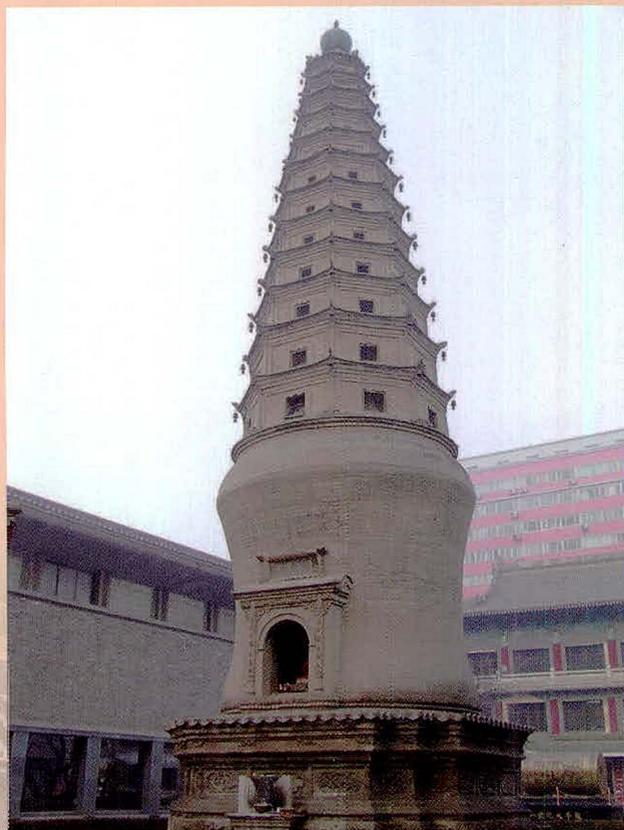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文博精藏

WEN BO JING CANG



白衣寺塔



兰州袖川门(俗称西稍门)

紙筋播兒寶蓋二對
圓銅鏡
兒微紅六一
巾緞細箇茶
箭爐幃
紅紅紅紅
金翠玲
刻立
事上每商辦
於燭逢義公
二一



重修后的西北大厦



明代凤林关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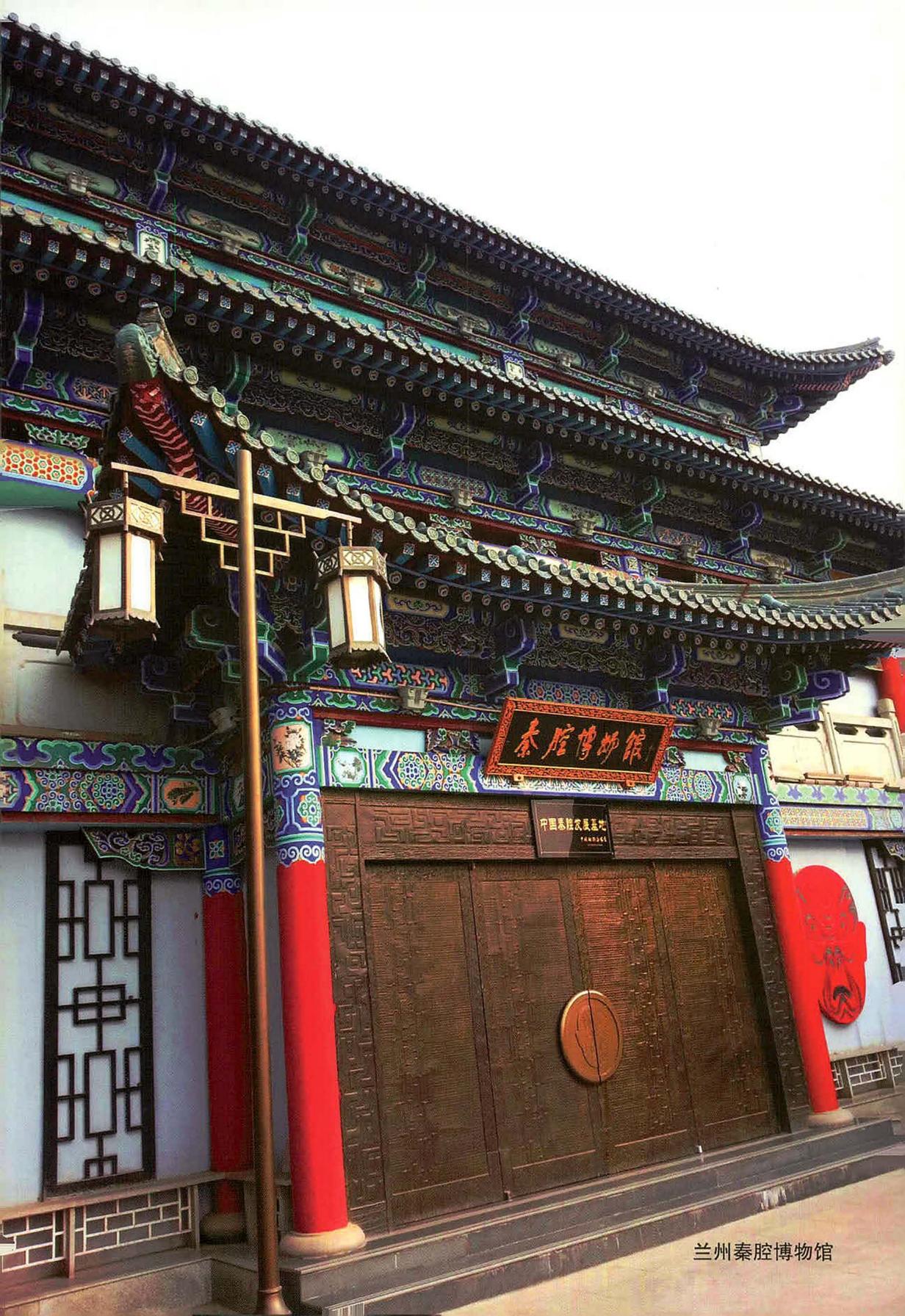


甘肃举院至公堂

光緒三年九月十九日首事人陳林嘉勳

廣地什東
鉄毯櫃庫
三一房

方相
寫一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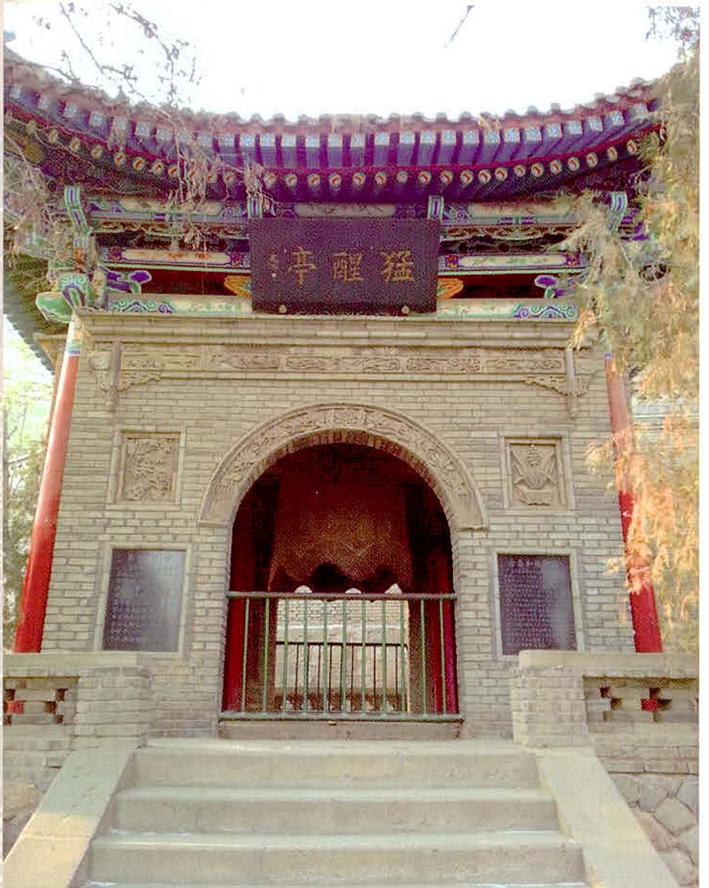
秦腔博物馆

中国秦腔发源地

兰州秦腔博物馆



谢觉哉的铜墨盒



五泉山猛醒亭

光緒三年九月十九日首事人
 什櫃一箇 錢糧櫃一箇 灶一箇
 地氈一箇 小圓棕氈四箇 一方寫字
 廣鉄三層壽字爐一座
 朱廷錫
 陳嘉勛
 林培坤
 高元吉

文博精藏

WEN BO JING CANG



黄河铁桥将军柱



中山桥

紙筋糖兒寶蓋二封

圓銅兒
光徹紅
十綴綉
筒爐幃

二箇茶大織紅紅紅
六條大織紅紅紅
一箇茶大織紅紅紅
紅金翠翠翠翠

公辦商每上晉
百子義逢燭事於
刻立

文博精藏

WEN BO JING CANG



永昌通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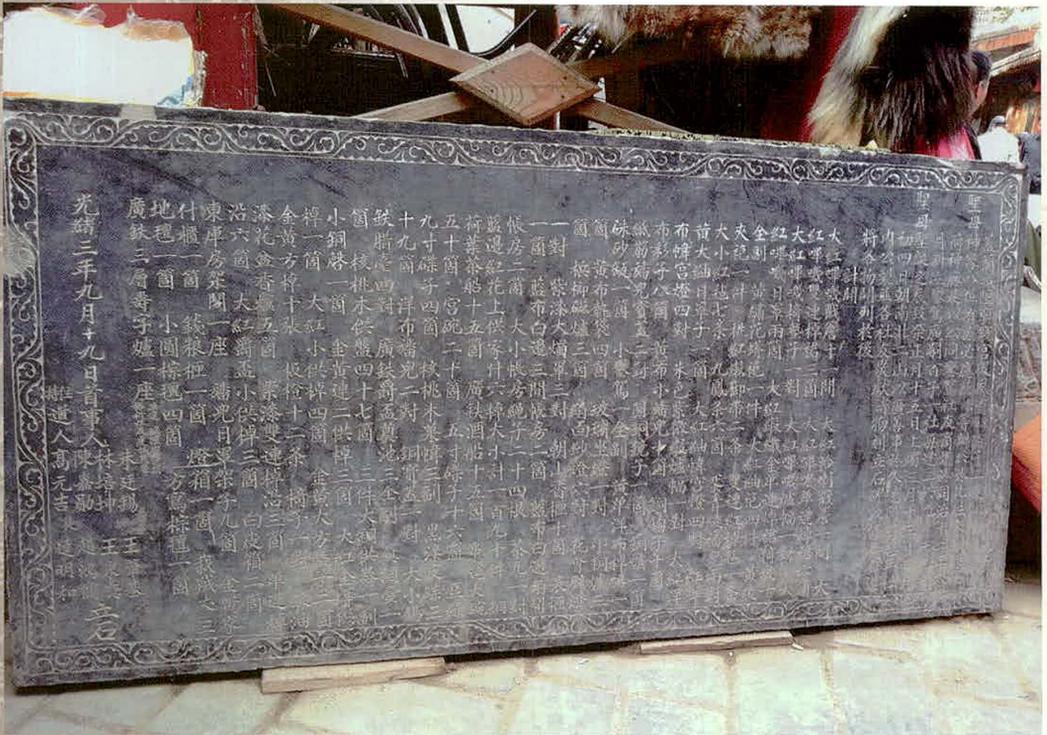
兰州府文庙大成殿

永昌通寶
蘭州府文廟大成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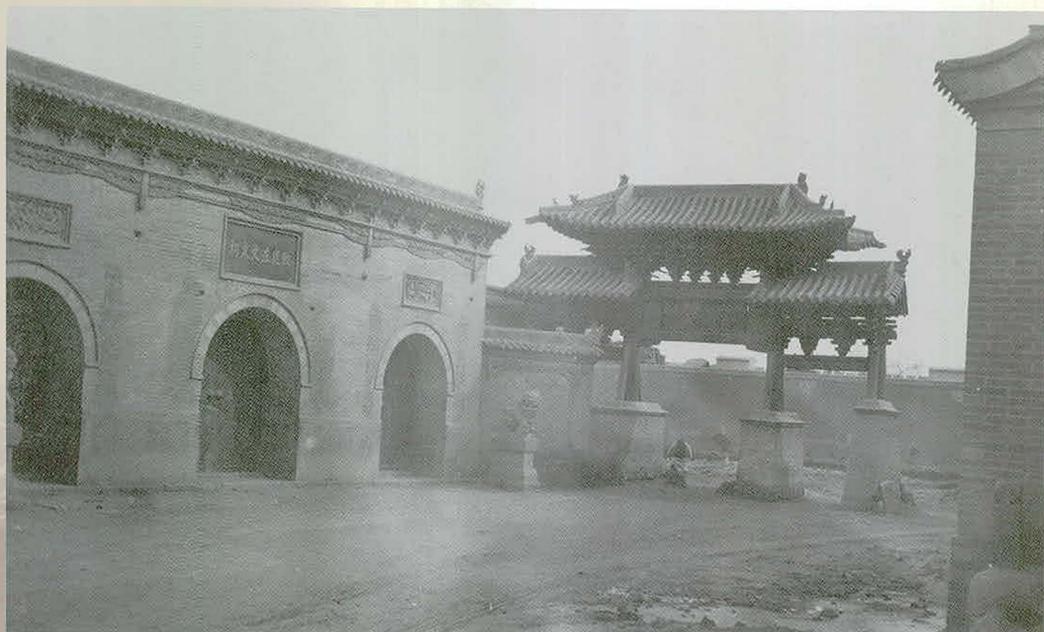
物事
刻立
香上
日居
社稷
人商
手辦
千言
百語



博德恩醫院牌匾



重修兰州府城隍庙碑



左公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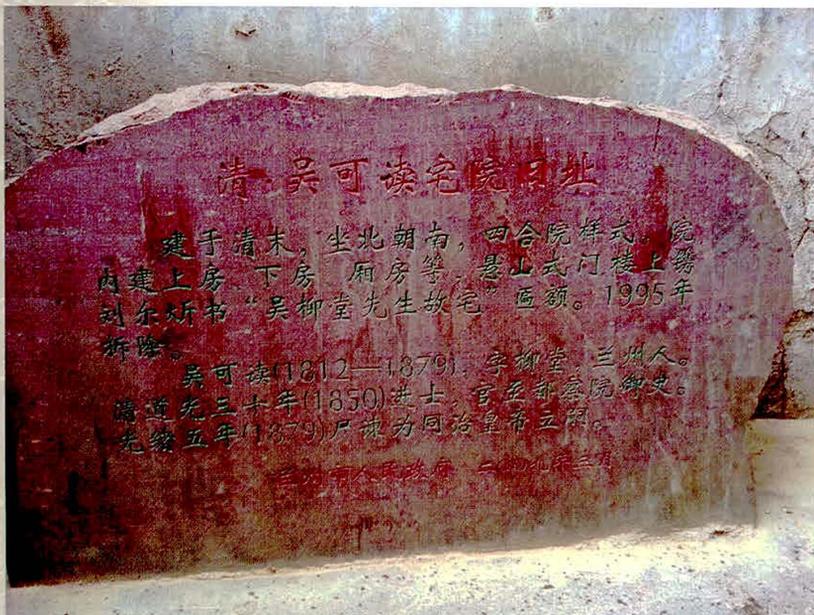


明肃王“王”字狮钮盥形炉

光緒三年九月十九日首事人
 推道人高元吉
 陳嘉勳
 林培坤
 朱廷錫
 東庫房架閣一座
 什櫃一箇
 錢糧櫃一箇
 燈箱一箇
 地氈一箇
 小圓棕氈四箇
 方寫字
 廣鉄三層壽字爐一座
 造送 鐵櫃出之類
 整新並及夏其美者



王保保城旧址



吴可读宅院旧址

光緒三年九月十九日首事人陳嘉勳
 什櫃一
 地氈一
 廣鉄三層壽字爐一座
 推道人高元吉
 林培坤
 未廷錫
 方寫

总 序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也是一个群体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气所在。

兰州市城关区是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交通、商贸中心区，位居黄河上游、兰州河谷盆地东部，位于我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藏、黄土、内蒙古三大高原交会处，居南北之中，扼东西要塞，座中四联，雄踞西北，古时就有“黄河九曲通佳气，西域咽喉在此间”的记载。承天地之恩泽，得黄河之浸润，这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滔滔黄河穿城而过，横贯东西，将城关区分为南、北两部分，白塔山雄踞岸北，皋兰山耸立城南，两山对峙，峰峦迭起，构成城关区的天然屏障，自古有“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之誉。

城关地区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在城关黄河两岸的阶地上已分布许多先民聚落。秦汉时期，兰州一直是汉族与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在今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设陇西郡榆中县之

后，尤其是隋开皇元年（581年）在皋兰山下设兰州以来，城关地区即为县、府、州、市治所在地，今天城关区的范围大抵就是隋唐以降兰州治所及近郊。到清代后，城关因地理、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均备受瞩目，曾经一度成为甘、宁、青、新的核心区域。民国时期，兰州市基本上在今城关区范围以内，而且兰州市、皋兰县曾同治于今城关区。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几经调整，于1955年正式设立城关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关区旧貌换新颜，变化翻天覆地，全省、全市中心城区的位置更加突出。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生活在城关地区的各族人民，以辛勤的劳动、聪明的才智创造了集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于一身的地域特色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形制多奇，色彩争艳，用工精细，堪称彩陶的精品，达到了中国彩陶文化发展的巅峰，成为兰州黄河文化的渊藪。秦汉以来，以城关区为中心的兰州曾凭借秦陇锁钥、东西咽喉、津渡四境、关通八方的区位优势，成为丝绸之路和元明清时期陕甘、甘新驿道上的商埠重镇，呈现了“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盛况。独特的地理区位，也使得城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居住着汉、回、满、藏、维吾尔等众多民族，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场所共存，演绎着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对抗与冲撞、渗透与融合、同化与变异的蔚然大观；黄河水车、太平鼓、羊皮筏子、秦腔、剪纸、刻葫芦等诸多民俗文化，保留着历史演进、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印迹，渲染出古朴凝重而又酣畅明快的城关民俗风情全景图。这里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有博学多才、操守严正的黄谏，为官清廉的理学家段坚，文武全才的彭泽，直谏御史吴可读，文坛泰斗张国常，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刘尔忻，首创黄河水车、倒挽河水灌溉农田的段续。这里还是西北工业和甘肃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发生最早之地。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创设制造局、织呢局，开创了兰州乃至西北工业的先河；清末新政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建成黄河第一铁桥，至今仍为兰州的标志。这一切，造就了城关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情怀和气度，城关文化因此表现出坚持坚守的从容、奋发进取的勇气和创新创造的活力。

历史孕育了文化，文化反映着历史。研究、总结和借鉴城关历史，传承、创新和发展城关文化，是历史托付我们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此，我们启动了《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工作，组织了一批学养和文笔俱佳的学者、作家，集思广益，通力合作，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求是的精神，科学把握，辩证取舍，选择了最能体现城关文化研究成果的12个方面，以《人物春秋》《土木之功》《街巷旧事》《太平鼓韵》《名札集束》《良风美俗》《工商辐辏》《千载芸香》《艺苑经典》《杏坛遗泽》《文博精藏》《金声玉振》等分册铺叙，通过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以及鲜活的掌故、口述，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了城关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西北重镇、历史名城。这12本书，就像12张精美的地方文化名片，内容琳琅满目，图片新鲜珍贵，材料真实可靠，语言浅显生动，融史料性、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有关城关历史文化形成、发展和内涵的诠释都将在这里找到答案。这套丛书，是迄今为止唯

——套既传承千年文明，又充满时代精神的城关历史文化百科全书，是城关历史上第一套全面展示全区历史风貌的通俗文化读物。

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承积蓄、创新发展的过程。纵观历史长河，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先贤前辈们创造了灿烂的城关文化，我们相信，当代城关人也一定能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以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推动全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出新的文明、新的辉煌！

引 言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金代词人邓千江的这首《望海潮·献张六太尉》以铿锵的诗句描写了水势如雷的黄河天堑、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惊心动魄的战后场面，将八九百年前古城兰州的雄姿赫然呈现于我们的面前，可以说这是兰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有力再现。

由秦汉而来，城关区作为中心区域承载并沉淀了兰州的绝大部分历史遗留。有过刀光剑影的拉锯鏖战，有过驼铃声声的贸易往来，也有过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两千多年的城市历史像一首雄浑激荡的乐曲，其中也不乏柔和曼妙的优美音符，令人心潮澎湃，心驰神往。

自明初肃王朱模迁兰后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兰州有了都市的风范。加之陕甘分治，总督迁兰，兰州成为西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作为中心的城关区，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如此悠久的历史，必有丰富的遗存——官衙、寺庙、道观、烽燧、城墙、关隘、墓葬。中国土木结构的建筑防火防水性能较差，使其留存

后世的几率本来就低，加上历史上“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破坏多有发生，兰州古建筑概莫能外。更有现当代城市建设中的让文物让路，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致使“龟玉毁于椟中”，所以兰州的许多文物古迹只是写在书本上的一段文字而已，良可叹矣。

如今，城市建设飞速发展，钢筋混凝土建成的高楼大厦林立，往往是千城一面，缺乏城市的独特品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同理，一座城市不仅仅要有大楼，更要有文化底蕴。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兰州提倡建设“文化兰州”，致力“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申报工作，对一些重要文物遗存如白塔寺、白衣寺、甘肃贡院、兰州府城隍庙等，有的提升保护等级，有的进行了修缮，对一些古迹旧址也进行了立碑标示。尽管还存在资金不足、管理滞后、保护乏力的瑕疵，但对于尽遭劫波的兰州文物古迹来说是亡羊之后的补牢之举，是大力发掘历史文化底蕴，试图留住城市历史文脉，提高城市文化品牌的有力举措。

《文博精藏》将城关区的文物古迹有重点地简述一番，目的在于让市民及热爱兰州、关心兰州的朋友们，对兰州尤其是城关区的过往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呼唤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当中来，为建设文化兰州添砖加瓦。当然，由于笔者的见识有限，对城关区的文物古迹的表述可能不够精准和全面，姑且算是抛砖引玉，为文物保护摇旗呐喊吧，还请专家多多指正。

目 录

命途多舛

- 兰州城关区文物的命运 (001)

瑰宝采撷

- 馆藏文物 (007)

彩陶华光

- 马家窑文化 (033)

古人生活再现

- 古墓葬 (041)

金汤余辉

- 兰州城池关隘 (047)

塔影神碑

- 白塔寺 (060)

天险康衢

- 镇远浮桥 (067)

默奠金汤

- 兰州府城隍庙 (074)

三绝杰作

- 庄严寺 (083)

古刹晨钟

- 唐代名寺普照寺 (091)

尊孔崇儒

- 兰州府文庙 (098)

国学之馆

- 皋兰县文庙 (106)

甘棠旧声

- 左公祠 (110)

巍巍一柱

- 嘉福寺木塔 (119)

百年洋医院

- 博德恩医院 (124)

红色记忆

-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135)

星月交辉

- 兰州西关清真大寺 (146)

欧美风格

- 山字石礼拜堂 (152)



书法奇珍

- 肃府本《淳化阁帖》刻石 (157)

都市古韵

- 明代古刹白衣寺 (166)

肃王旧邸

- 督署省政府 (174)

古建宝库

- 五泉山 (184)

甘肃近现代文化之“根”

- 甘肃贡院 (198)

百年钢构

- 中山桥 (208)

陇墨丛林

- 兰州碑林 (219)

商帮缩影

- 兰州的会馆 (227)

吕仙洞府

- 白云观 (236)

古城写照

- 金城揽胜图 (244)

攻坚之战

- 营盘岭遗址 (251)

外交产物

- 西北大厦 (259)

遗踪何处

- 兰州名人故居 (266)

可摘星辰

- 兰山三台阁 (275)

文物收藏

- 博物馆 (281)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297)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命途多舛

——
兰州城关区
文物的命运

兰州位于我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早在 1 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新石器时代是灿烂的马家窑文化重要的分布区域之一，是一个有着 2200 多年建置历史的内陆城市，又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城市。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秦朝设置行政建置以来，兰州逐步形成以汉文化为主，融合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兰州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存下来极为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兰州市的首善之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关区承载了兰州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文物古迹的命运是兰州市文物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

资料显示，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城关区共有文物保护单位和



城关区出土的彩陶

文物点 134 处。随着城市经济建设、市政改造的推进等多种客观因素，大部分已消失。后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复查文物点 47 处，新发现文物点 42 处，

老字号和工业遗产 6 处，共计 95 处，其中国家重点文保单位 1 处，省级文保单位 11 处、市级文保单位 8 处。至 2013 年，增加到 4 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兰州黄河铁桥、兰州府城隍庙、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旧址、五泉山建筑群，几乎占全市 9 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半。

兰州的文化遗存在历史上大面积损毁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空袭，如千年古刹普照寺被毁；第二次是城市建设初期的 20 世纪 50 年代，如兰州钟鼓楼等遭拆除；第三次是“文革”时期；第四次则是 21 世纪前后由于发展而导致的“文物让路”。

寺庙是不可移动文物，是文物保护单位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寺庙建筑是佛教被引进中国之产物，寺、塔、庙、观、庵等宗教建筑，不仅在形式上形成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庙宇文化，还成为信仰文化的主要场所。兰州在贞观元年（627 年）奉敕建嘉福寺。其后，随着兰州在丝绸之路上的突出地位及城市的发展，陆续兴建了普照寺、庄严寺等寺庙。唐代广德元年（763 年），“陇右尽陷吐蕃”。北宋元丰四年（1081 年）才收复兰州，传统的宗教场所、城隍等感化说教设施陆续兴建和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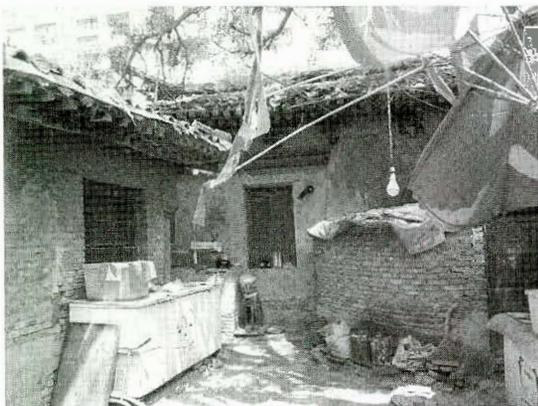
如东华观、隍庙、文庙等。明清之际，随着兰州在稳定边疆，特别是政治、军事地位的加强，改变了戍守垦边及农牧经济状况，手工业、商业得到发展，人口增加。为适应城市结构的这一变化，除了对旧有的感化设施进行修葺、补缮、重建外，还新修了一些寺院，如白塔禅院（位于白塔山）、白衣寺等 40 多座庙观。明初，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居民进入兰州，清真寺出现在兰州城。晚清天主教、基督教先后传入兰州，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也先后落户兰州。兰州的寺庙建筑形成多教并存的格局，有 70 多处庙宇，几乎都处于今城关区范围内。

历史上，兰州的庙宇房产往往被移作他用。清雍正七年（1729 年），甘肃巡抚许容在土地祠创办“新关社学”。至光绪年间，先后有十几处以庙产办学。民国年间，这些义学、社学大部分都过渡为城内外的国民学校。五四前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市区一些庙观多辟为文化、教育等公用或商业设施，如普照寺被辟为中山市场等。

抗日战争中日机的轰炸，使一些庙宇毁于战火或破坏严重，如普照寺、东华观、雷祖庙、马祖庙等。新中国成立后，在破除迷信的政策下，除了保留南北两山和市区内有影响的寺庙外，一些较小的庙宇多被企事业单位占用，或者辟为民居。“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庙宇的雕塑、壁画遭受严重破坏，尤以文庙为最。到 21 世纪初，大规模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使庙宇等古建筑所剩无几，像白衣寺等处于市中心的古建筑已是凤毛麟角。

然而即便侥幸保存下来的一些寺院，如广福寺等也面临着保护不力、资金乏力、任其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地处双城门的兰州市百货公

司经营部南侧的广福寺（俗称高壁寺）为陇上名刹，与白衣寺是兰州旧城仅存的两座明代佛寺。广福寺原为坐南朝北，山门上为戏楼，有清代兰州著名书画家唐琏所作对联：“今世观古人勿当作镜花水月，新声传旧事须认为暮鼓晨钟”，横批“神听和平”。寺内大殿两座，前殿奉关圣帝君，后殿为佛殿；大院内还有东西两边陪殿。新中国成立后该寺归属于兰州市百货公司，1984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从正宁路一



广福寺

小胡同可进入寺院，里面住着几户人家，只见殿宇烟熏火燎，墙体剥落，环境脏乱差，令人不忍直视。感叹千古名寺在躲过历次危难后，如今在四周高楼的威逼之下苟延残喘，摇摇欲

坠。地处黄金地段的广福寺，如果不是戴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帽子，早就被高楼取代了。

兰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金城”，拥有坚固高大的城墙。随着战争和商贸的需要，隋唐，兰州治所都在城关区，随着黄河的北向摆动与战争的需要，兰州城也向北展筑，历代均有修建加固。至清代，兰州城基本定型，城池格局有“关比城大”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加之城墙已不能抵御各种现代化的重武器，又因城墙的作用日渐微弱，在北京拆除城墙的带动下，兰州城墙也被拆



除。当时，有几十万人参与了拆墙。被誉为“金城汤池”的兰州，现在人们已经看不到昔日城池的雄姿了。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2005年6月，兰州市正式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调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等工作。2008年至2009年，对60多处已消失文物遗存点进行立碑，涵盖了兰州市军事、文化、经济、宗教、城建等诸多方面的古建筑。军事关隘有金城关、凤林关、玉垒关，文化古建有兰山书院、五泉书院等，宗教寺庙有金山寺、接引寺、普照寺，广武门、静安门等城门也列入其中，刘尔忻、彭泽、吴可读等兰州名人故居也进行了标示。这60多处已消失文物遗存点有50多处集中在城关区。

为消失的文化遗存立碑，旨在唤起城市的记忆。一则给已消失的历史文化一个存在的空间，二则人们可以通过所立石碑碑文进一步了解消失文化遗存的细节，缅怀、回顾黄河古都多姿多彩的一面，从而反映兰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消失的已经无法复原，出于无奈，只好用立碑来证明“我们曾有过这些”。

相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凋零，馆藏文物的情况要好得多。城关区内最主要的文物收藏场馆为兰州市博物馆，该馆藏品种类齐全，精品纷呈，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博单位。城关区还有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兰州彩陶博物馆、兰州黄河桥梁博物馆、兰州秦腔博物馆、甘肃钱币博物馆、甘肃地质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等数家博物馆，以及文物监管品市场和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的零散经营户等，都对地方文物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所藏文物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这些文物几乎都

是在兰州市陆续发现和收藏的，从实物方面反映出中国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揭示了兰州发展的历史轨迹，其中一些文物印证了兰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影响。

目前，文物保护还存在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头管理，古遗址、古建筑等文物资源保护力度薄弱，以及合理开发利用不够等问题。古长城、烽燧、城垣，展示了民族争锋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文化；神殿宝刹、道观城隍，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古今嬗变；古居旧宅、秦砖汉瓦，显现了先民追求安居乐业的理想愿望。如何提升文物保护自觉意识，克服短视与功利主义行为，更好地保护文物遗存和深度发掘人文资源，从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依旧是个任重道远的话题。



瑰宝采撷

—
馆藏文物

兰州市博物馆及各县区博物馆藏品总计 18000 多件，本文按地域及行政级别划分，所说馆藏文物以兰州市博物馆为主，也包括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等馆收藏的文物。由于文物众多，未可一一展示，本文按历史脉络采撷一二，用以窥其全貌。

赤鹿化石

为更新世中晚期化石。该化石头骨完整，鹿角完好，身体部分保留了颈椎、胸椎与胸骨，腰椎、尾椎及四肢骨不见。出土时，颈椎与胸椎呈扭曲状。化石长 155 厘米，其中颅骨长 40 厘米。头生双角，左角长 80.5 厘米，有 6 个分枝；右角长 80 厘米，有 5 个分枝。角为扁圆状，

主干稍向后斜，略向内弯。每一分枝尖端光滑，下部粗糙，角身布满皱纹。圆柱形角柄，平台状角盘，角盘周围生成许多珠状结节，俗称“珍珠盘”。头骨最宽处在眼眶部位，头骨顶脊清晰，额部平凹，眶上缘高出额部，泪窝长径大于眼窝长径。上颌骨前端呈铲状突出，鼻骨稍隆。下颌骨前端窄而圆，后端平整光滑，冠状突细窄而向后弯曲，颧骨稍凸，隅突并不明显，咬肌窝很浅。下颌骨与头骨之间以鳞骨相关节。牙齿完好无缺。有8颗门齿，6颗前臼齿，6颗臼齿。门齿切缘锐利，呈凿状；臼齿为新月形齿，齿冠高。

赤鹿属哺乳动物界、真鲁次纲、偶蹄类、反刍亚目、鹿科、马鹿亚属，是体型较大的食草类动物。1994年3月，皋兰县忠和乡邵家塘村农民宋宗维牧羊时在水阜乡长川村马圈沟壑发现了这具化石，由兰州市博物馆和皋兰县文化馆联合组队发掘，现藏兰州市博物馆。

石 磬

质地为青石质，磬体大致呈梯形，上部边缘有一穿孔，通体素面，音质纯正，音色清纯。榆中县连搭乡马家砭出土，属齐家文化石磬，现藏于兰州市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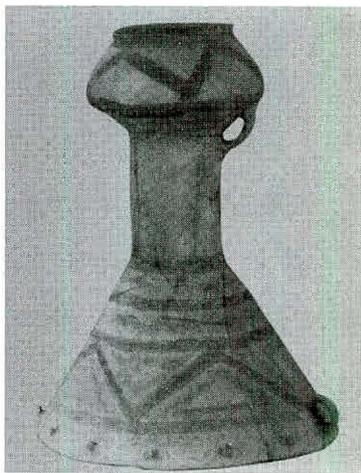
石磬简称“磬”，是中国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为“八音”中的“磬石”音。由石或玉制成，形有大有小，上面刻有花纹，并钻孔悬挂于架下，击打传声。它造型古朴，制作精美，是出现较早的打击乐器之一，历史非常悠久。在远古母系氏族社会，当时人们以渔猎为生，劳动之后敲击着石头，装扮成各种野兽的形象跳舞娱乐。这种敲击的石头就



被逐渐演变为打击乐器——磬，后来用于历代帝王、上层统治者的殿堂宴享、宇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中的乐队演奏，成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磬一般不单独使用，而是以组为单位进行演奏和组乐。兰州市博物馆藏的石磬虽只有一件，但就其时代而言，尚属较早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磬的起源及使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彩陶鼓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出土于永登县。该鼓在形制上修长，两头比例缩小，中腔部分与小头大部分之外表，以及口沿内部施以黑色宽条纹、斜旋纹和锯齿纹等彩陶纹饰，黑白分明，对比强烈，给人以庄重明快的感觉。其口可蒙皮革，叩击有声，为中国已知的较早的打击乐器之一。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彩陶鼓

半山彩陶鼓

征集于永登县乐山坪。该鼓为泥质红陶，表面打磨较光滑，整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小头的罐形口、中筒及大头的喇叭形口。鼓通长 32 厘米，两端口径分别为 9 厘米和 22.5 厘米。鼓的外表通体施彩，在罐形口沿内侧施垂弧纹，外部以菱形网格纹装饰；中筒部位饰以五组红色宽带纹及黑彩宽带锯齿纹；喇叭口外部主要以黑、红色间绘的富有动感



半山彩陶鼓

的锯齿漩涡纹装饰。鼓的同一侧于上下两端各置有一个半环耳，在喇叭口外沿的适当部位有等距离的六个倒钩，用来悬挂绳索及固定鼓面。在我国目前出土的陶鼓中，不论是造型还是表面的装饰图案，它都是最精美、最具代表性的。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漩涡锯齿纹双耳彩陶瓮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生活用品，高 30 厘米，口径 19 厘米，底径 13.5 厘米，兰州市城关区营盘岭出土。泥质橙黄陶，大口外侈，溜肩鼓腹，腹下有对称的半环耳，腹下内收，平底。口沿内侧饰连弧纹，肩、腹部饰主题图案锯齿漩涡纹，黑红相间，华丽鲜艳。该器物是半山类型早期彩陶中的精品之作。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漩涡锯齿纹双耳彩陶瓮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
胜览



内彩勾叶纹折沿盆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生活用品，高 10.7 厘米，口径 27.4 厘米，底径 10 厘米。敞口，平唇，卷沿，腹微向外鼓，腹下内收，平底。黑彩饰图案，构图简洁大方，主题突出，时代特征明显，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西周卷夔纹青铜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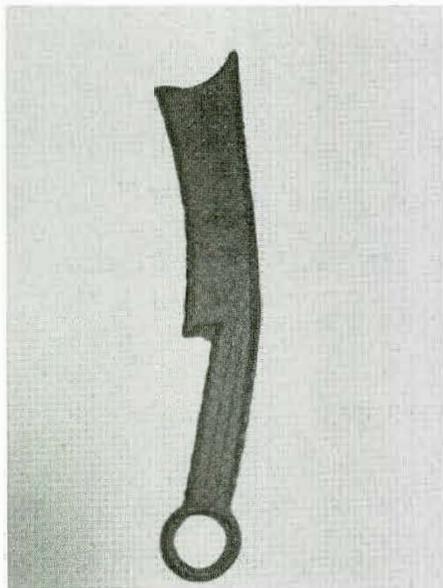
高 14.6 厘米，口径 18.5 厘米，底径 14.3 厘米。口沿外侈，微束颈，腹近似长方形，下有外撇的圈足，圈足较高。有兽首双耳，兽首下部至腹底处又有双珥。纹饰以两组卷体夔龙纹为主题纹饰，云雷纹衬底，主纹格外高起，有扉棱。圈足纹饰以云纹为底纹，以两组细长的夔纹为主纹。造型、纹饰十分精美。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西周卷夔纹青铜簋

齐法化刀币

长 7.6 厘米，宽 2.8 厘米，铜质。大体完整，有轻微残损。此钱面



齐法化刀币

文“齐法化”，背文“上”字体为战国时期齐国所铸货币。刀币由工具刀演变而来。齐国的刀币大样精美，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刀身外郭高出刀柄，有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齐之法化四种；另一类刀身、刀柄外郭高，有齐建邦长法化及齐法化两种。兰州市博物馆所藏的此枚属于后一类，收藏和研究价值较高。

简 牍

兰州作为甘肃省会所在地，拥有较多的简牍专业研究人员和简牍专业研究机构，在历次发掘工作结束后将所有新发现的简牍文物运到兰州，进行科学保护和收藏研究。目前，兰州地区收藏保存的古代简牍4.8万余枚。主要有，天水秦简460余枚，出土于战国晚期秦人墓葬。其中《日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部秦文化典籍；《志怪故事》一篇，比《搜神记》早500多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文学。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秦文化有重大价值，而且为研究先秦文化史和思想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甘谷、武威木简，670余枚，出土于汉晋古墓。甘谷《诏书》、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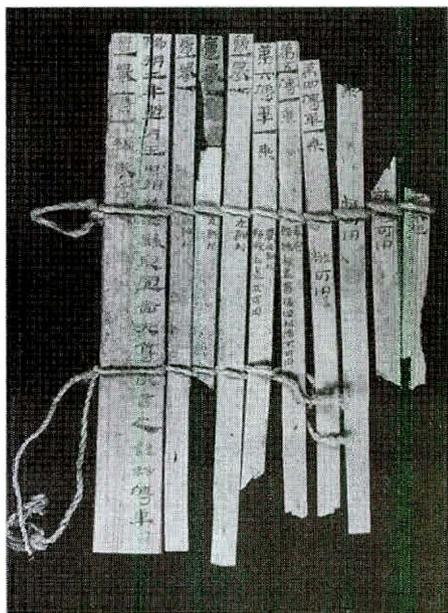


威《王杖诏书令》都是汉代政府的高级文件，代表当时政权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水平，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武威医简》是民间的临床方剂，代表当时的中医医疗水平，也



反映了西北地方病的情况，是完整的中医学史料。武威《礼仪》是一部经书，是当时社会人文教育的标准教科书，代表当时国家的教育水平，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较早、保存较好的古版图书。武威晋墓木牍，虽仅有4枚，却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前凉的文字资料，对研究前凉意义重大。

居延、敦煌、玉门花海汉简2.3万余枚，出土于河西汉代长城烽燧、城障遗址，不仅全面反映了两汉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御情况，也为研究两汉史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汉简

悬泉置汉简 2.5 万余枚，出土于汉代悬泉置驿站遗址，全面反映了邮驿建制和交通运营状况，记载着许多历史文献中有据可查的和失载的珍贵史料。

兰州地区收藏保存的这些简牍，大部分是原始的档案文书，为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和科技提供了最详尽、最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是文字文献，又是文物珍品，弥足珍贵。

佛教经卷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或“敦煌卷子”。它是指敦煌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宋初的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和印本。兰州地区藏敦煌写经共 200 件，分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等处。从内容上看均为佛经，且经、律、论三藏俱有，是有很高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的古代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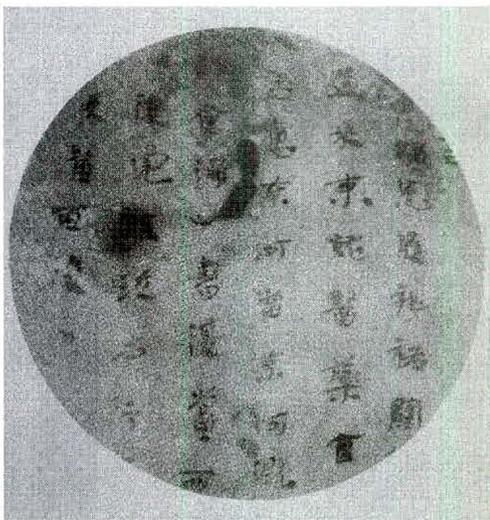


明刻《大藏经》

东汉墨迹纸

1987年9月，在城关区龙尾山伏龙坪东汉砖墓中发现，纸垫在铜镜之下，被剪成圆形的衬垫物，直径17.5厘米。三片纸中，其中一片已霉烂，另两片基本完好。一片霉烂多处，四分之一边缘破损，有墨迹60多字；一片带有霉斑，但较为完整，有墨书40余字，可辨识者有“妇悉履……奈何当奈何……”八字。所书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内容为信函。出土后呈白色，纸面薄厚均匀，柔软有韧性。据纤维结构显微分析，其中所用的原料为麻、草和树皮等植物纤维，强光透视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纸面较为光滑，似有二次加工的痕迹。这些记载基本与蔡伦造纸使用植物纤维的方法相同，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相符。专家认定，这三片东汉纸，很有可能就是“蔡伦纸”。

翻开我国的书法史，西汉及其以前留下书法的名家很少，从东汉开始，历朝历代的书法名家多了起来。这种历史现象说明便于人们用于书写的东汉纸，为书法的发展和名家字体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伏龙坪东汉墨迹纸是我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发现，是迄今发现的最早



东汉墨迹纸

的墨迹纸，对研究兰州历史沿革，特别是为研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同时，纸中的墨迹书体反映了东汉时期的书法艺术，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青釉四系罐

高 18 厘米，口径 7 厘米，底径 7.4 厘米。1983 年 6 月出土于城关区中山林。现藏兰州市博物馆。罐有四条桥形钮（有一钮残损），盘口，圆腹逐渐向底部内收倾斜，丰肩。釉色黄中略带绿，肩部压印旋纹两道。胎质略带红色，质地较为粗松。罐身有窑疵数处，施釉不到底。南北朝时期瓷器。

唐代海马葡萄镜

该镜保存完整，在同类器物中较为少见，十分珍贵。其造型为圆形，圆钮不钮座，座外斜立浇锯齿纹及双线高圈，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主题突出，近钮处高浮雕出海马葡萄纹，环钮同向奔驰于葡萄枝蔓间，周边及中部各饰凸棱一周，饰宝相花。外区缠枝葡萄同向奔驰疾飞，葡萄枝叶果实缠绕。镜缘饰两周锯齿纹带。直径 15.3 厘米，边厚 0.75 厘米，重 710 克，铜质。

有关专家认为铜镜上的海马形象是受了汉代天马神话传说的影响，清代人因铜镜上的兽似马非马，故称之为“海兽”。海兽葡萄镜主要流行于唐代的武则天时期，多为圆形，少量呈方形、菱形，兽钮，主题



纹饰大多分内外二区，由瑞兽禽鸟和葡萄枝蔓组成，柔长的枝条、舒展的花叶、丰硕的果实与生动活泼的瑞兽、纷飞的禽鸟构成一幅幅妙趣横生的画面，而且由于采用浮雕技法，画面高低起伏，立体感极强。

兰州市博物馆藏镜是见于著录的为数不多的早期葡萄镜之一，有关专家推定其确切年代应在初唐。其珍贵之处在于既保留了早期瑞兽镜的构图特征，又带有葡萄纹样的早期形制，这种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使其成为研究瑞兽镜向花鸟镜嬗变兴替的实物样本，具有较高的价值。

堆 塑 瓶

宋代青瓷。堆塑瓶瓶体修长，通高 76 厘米，外施青白釉。结构上由瓶身和盖两部分组成。瓶身盘口部位堆塑有四系及荷叶装饰，细长的颈部从上到下依次堆塑有日、月、龙、虎、龟、蛇、鸟、鸡、犬及十二站佣。腹部微鼓，素面。撇口圈足。凸玄纹塔形盖顶部塑一展翅欲飞状仙鹤。兰州市博物馆藏。

老子骑牛铜像

高 58 厘米。由底座、牛与老子像三部分组成。底座为四足方形，上立一头健硕的牛，牛佩有轡头，略回顾状。老子端坐于牛背上，身着宽袖



老子骑牛铜像

大袍，腰系带，着布鞋，左手扶膝，右手牵缰绳；身体侧斜，腹略鼓，腰直挺，衣摆自然下搭于足面，衣纹起伏自然流畅，动感十足。老子面容瘦削，棱角分明，头顶无发，脑后长发披及肩部，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鼻子高挺，嘴角似带微笑。人和牛是整体铸造，然后与四足焊接在一起，造像简洁生动传神，富有个性，是存世不多的道教造像珍品。宋代作品，兰州市博物馆藏。

僧帽铜执壶

西夏生活用品，高 33.3 厘米，口径 18.8 厘米，底径 12 厘米。铜质，口呈僧帽状，粗长颈，折肩，圆腹，圈足。自口沿至肩部有一方流，手柄宽大，置于口沿至腹部。器形浑厚敦实，是西夏文物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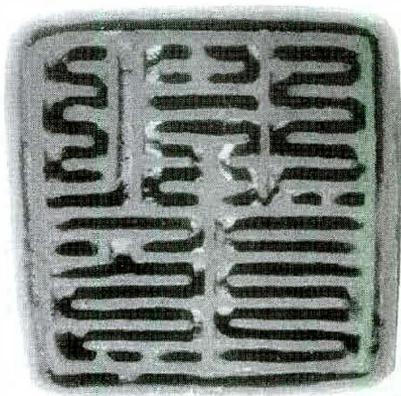
“首领”铜印

铜印的印文是典型的西夏文字，是借鉴汉文印章，用来表示身份、地位、权力、等级的象征。这种印直到 20 世纪初西夏文字破解，才被国学大师罗振玉根据背款上的文字，确定为西夏官印。后研究者将铜印印面上的文字翻译出来，为西夏军队中军事首领印章。自此，陆续而世的百余枚这类印章全被称为“首领”印。

兰州市博物馆馆藏的铜印，长 5.5 厘米，宽 5.5 厘米，厚 1.1 厘米。为方形印面，阳文、环钮。书体为西夏文叠篆“首领”二字，仿照唐宋印中通用的九叠篆法。印章背面的柱钮上刻有表示方向的西夏文“上”



字，印背两侧阴刻有年款和人名，印文的点划屈曲折叠、深厚凝重，双边，整体布局采用汉印的“满白法”。从这枚印的出土地及字义判断，当属于宋夏对峙时，西夏国君授予地方部落酋长的凭信物。1987年，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皋兰县石洞乡收购。据交售农民说，印是扩建家里时在后院墙基内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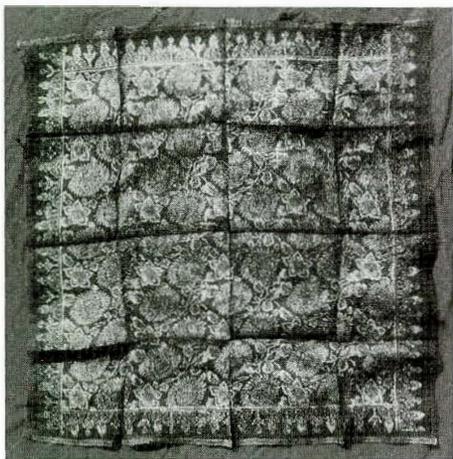
“首领”铜印

元代磁州窑白地褐花纹瓷盆

高 12.7 厘米，口径 23 厘米，底径 6.6 厘米。该器为生活用，胎较厚，圆唇，束颈，腹向外鼓，腹下内收，平底。器形较规整，器内通施褐釉，并附着三块大小不等的窑疵；器外侧自口沿至底施白釉，以褐色绘圈旋纹及折枝葵纹。虽然制作略显粗糙，但确系元代磁州窑少见之器物，非常珍贵。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元代铜塔

高 33 厘米，为藏传佛教的小铜塔。此塔底部为仰覆莲与覆钵组成，中部为十三相轮，有伞盖，伞盖上饰莲瓣和垂珠，垂珠镶绿松石。塔刹为莲蕾，其上有日月，日月两侧有巾帛。造型极为精细华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兰州市博物馆藏。



印金花包袱

印金花包袱

明代皇家所用之物，长方形，长 48 厘米，宽 55 厘米，上印牡丹蝴蝶金花图案，做工精致，印染水平极高，代表了明代印染技术的发展水平，是研究明代印染工艺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1987 年 8 月维修

白衣寺塔时，在塔刹出土。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白瓷人物造像

白瓷人物造像为 1986 年 2 月维修白衣寺塔时发现，是由以烧制白瓷而著称的福建德化官窑所烧造。造像高为 13.7 厘米，由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组成，身着典型的明代服饰。其中较大的人物呈坐姿，身材伟岸，面部神情雍容大度，头戴软翅朝冠，身着长袍，衣袖宽阔，大腹便便，腰间系有玉带，左手隐没于衣袖之中，自然垂放，右手执玉如意，手部的刻画细腻自然，纹理清晰简洁，左脚见履，右脚则隐没于袍底。较小的人物是一长髯老者，神态安详，面带微笑，双手环抱一书卷，且皆隐于衣袖之中。大的为地位相对较高，小的则为其侍者，位高者虽年轻但塑造较大，老者虽年长却因职位低而塑造较小，由此可见证古代的等级制度。造像的烧制年代应为明代中晚期，是德化窑瓷雕中的上品。

造像通体施象牙白釉，晶莹剔透，其衣纹塑造流畅优美，疏密适度，姿态自然大方，面部表情栩栩如生，主次明确，配合完美，整体有宁静、雍容、大气之美，是德化窑较成熟的作品，无名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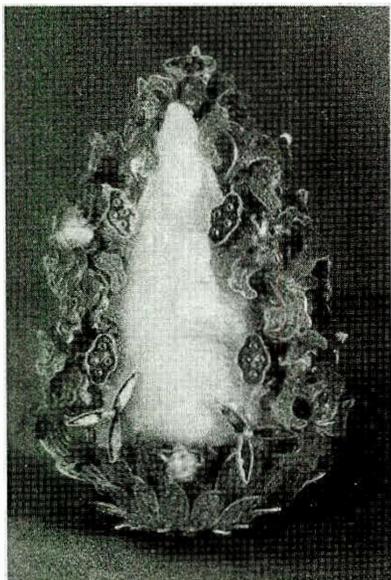


白瓷人物造像

从外观上看这件德化白瓷，胎质致密，釉色洁白，光滑如玉，给人以玲珑剔透之感，与同类出土造像相比，无论形态、面部、釉色等都属上乘。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肃王文化及明代瓷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2002年，这件德化窑白瓷造像被国家文物局和省博物馆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金螺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

白衣寺塔刹出土。高6.5厘米，重57.5克，簪首造像为送子观音坐像，白玉质，观音梳高发髻，面相长圆，小眼，长直鼻，小嘴，丰颊，身披长衣，宽袖及膝，体形较丰，双手托一小儿，小儿呈坐姿，身形极小，眉目清晰可见，双足赤裸，颇显稚嫩之气，与主体观音沉静慈穆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观音坐像下为细金丝编就的仰莲座，以三层仰莲



金螺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

瓣成形，莲瓣细瘦，时代特点明显。造像周围为把莲题材，均以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结成莲瓣，然后焊接成型。把莲为一莲叶、一莲花、一莲蓬组合而成，共为五把，繁密地覆于观音造像的周围。莲叶细长，向侧展卷，有缠枝意味；莲花瓣细长平展，花的轮廓有波状变化；莲蕊镶以珍珠和红宝石，珍珠光泽明润柔和，宝石纯净色红；莲蓬形如如意，面上有四个小圆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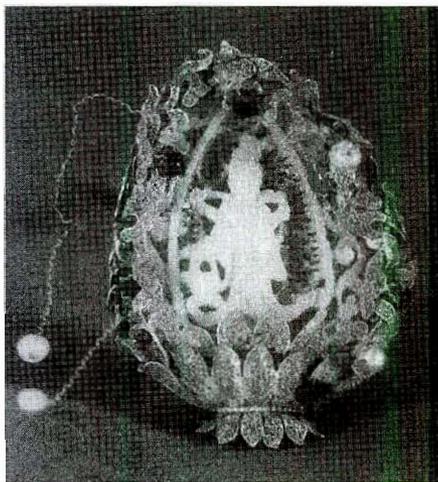
并施以蓝色珐琅彩。造像背后衬以细金丝编成回纹的网。网后连接银质簪挺，簪挺扁平状，中间起脊，正面篆刻铭文：“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背面篆刻铭文：“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金螺丝嵌宝石白玉鱼篮观音簪

白衣寺塔刹出土。高 6.5 厘米，重 36 克。簪首造像为鱼篮观音立像，白玉质，发髻高耸，面相长圆，双眼细小，长鼻小嘴，身着交领宽袖长衣，衣摆曳地，肩有飘起的披巾，披巾经臂而下并向外翻飞，右手提一篮，身形较纤薄。身后为有细密透雕镂孔的叶形白玉质背屏，边缘镂雕缠枝花卉纹，以简单的阴刻线条表现出造像面部和衣纹。下有束腰



仰覆莲座，莲座系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织成的莲瓣焊接而成，上有两层仰莲瓣，下有一层覆莲瓣，束腰部饰以联珠纹。观音像周围仍为细金丝编就的把莲题材，亦共五把莲。其把莲为一莲花，一莲叶的组合。莲蕊镶红色宝石。最为引人



金螺丝嵌宝石白玉鱼篮观音簪

注目的是在五把莲的莲花与莲叶之间，均匀地镶有用细金丝制成的短细弹簧，共四支，每支弹簧的另一端镶有一粒珍珠，珍珠动辄轻颤，极富美感。背屏后亦用细金丝编成回纹的网，以托住玉质造像。网后有银质簪挺，呈扁平状，中间起脊。正面篆刻铭文：“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背面篆刻铭文：“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明“王”字狮钮盃形炉

铜质，高 37 厘米。炉有四足，炉身为抹角方形，腹部饰以云纹为底的对鸟纹。对鸟身体扁长，二鸟之间填有“王”字，炉身两边为龙形捉



明“王”字狮钮盃形炉

手。炉有盖，制作极精。上作蹲状卷尾，仰首作吼状的狮子扣，下饰以蟠龙云海，极有气势，盖与炉身上下呼应，体现了肃王威严。炉还配有木座一架，座分两层，上雕栏杆曲廊，下为四足，极其珍贵。榆中县明肃王墓出土，兰州市博物馆藏。

永昌通宝

市博物馆藏 13 枚。钱径 2.3~3.6 厘米，穿径 0.5~0.7 厘米，铜质。



永昌通宝

铸于李自成天顺永昌元年（1644 年）。分小平及折五两种，小平钱版别多达 20 种。馆藏永昌通宝有二枚大钱，外郭阔，钱文真书，制作极精。其余为小平钱，钱文楷体，直读，外郭阔，周郭精整，铸工佳。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后，自行铸造的钱

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铜鎏金胜乐金刚

清代宗教用品，高 34 厘米，重 10.177 千克。造像主尊为四面十二臂，双腿立于单层覆莲台座上，每面三目，头戴五骷髅冠，腰围虎头裙，身佩挂五十八头项链，十二臂各持法物，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



左手持金刚铃，右手持金刚杵，双腿弓立。明妃双腿绕于主尊之腰间，双手持斧和碗，胯下有头骨饰，脚下踩两人。形象威严凶猛，为藏传佛教五大金刚之一。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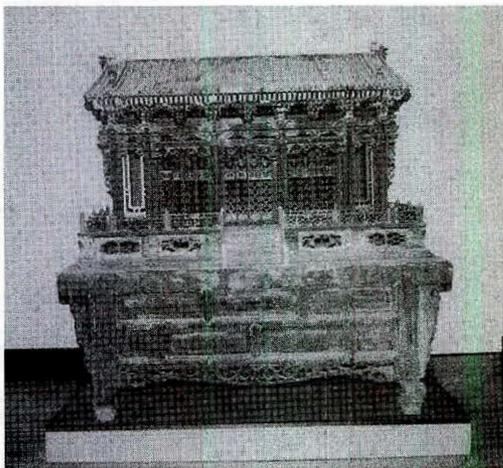


胜乐金刚

苏氏祖先堂

原在城关区拱星墩 80

号苏氏祠堂，为明清兰州样式建筑模型，系供苏氏祖先牌位的器物。摆放祖先堂的供桌长 2.15 米，宽 1.17 米。模型为古代高台建筑，整座建筑坐于须弥座高台上。明间筑台阶五级，拾级而上即登高台。建筑制式为五架梁悬山带出檐，面阔为破五间 2.1 米，进深 0.9 米，高 1.4 米。双坡筒瓦顶，明柱檐廊。台阶、须弥座均设栏板，平板枋上施七踩品字科斗拱九攒。额枋间饰荷叶隔架墩，柱间饰雀替。明间檐柱挂对联一副及横披一



苏氏祖先堂

块，可惜字已不辨。整座模型全木制作，精巧玲珑，特别是斗拱分件，完全仿真制作。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草书千字文长卷

明末朱识铉手书墨迹。此千字文长卷，一气呵成，气韵贯通，章法布局合理，结构线条流畅，字体意态豪纵，运笔圆润自然，用墨枯润老成，字里行间错落有致，线条把握有疏有密；动中见静，稳中见奇，起伏多变而心态平和，尚有唐、宋遗风。一级文物，兰州市博物馆藏。

文溯阁《四库全书》

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于九州台藏书馆。共 6144 函，36318 册，均为清内府写本，盛于特制的楠木书匣内。书册为软面包背装。其封面，经部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总目》《考证》用黄绢。纸张选用的是洁白坚韧的开化榜纸，工楷墨书，字体娟

秀，每册的首尾二页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文溯阁藏书所用的 115 个书架为楠木所制，馨香浓郁，持久不散。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清高宗弘历下诏访



九州台文溯阁



求、采集天下藏书。第二年正式设馆编纂，历经 10 年最终完成。编纂人员奉旨总共缮写成 7 部，分别藏于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可惜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国家内忧外患，《四库全书》命运多舛，屡遭劫难。

文溯阁建在盛京（现沈阳），溯取意“溯涧求本”，1782 年竣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俄罗斯军队出兵东北，占领沈阳，文溯阁门被打开，《四库全书》在无人保管状态下达二年之久，导致个别卷册流散。1914 年，袁世凯以“防备兵变”为由，下令将书运抵北京，弃置故宫保和殿达十年。1927 年年初，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这部《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文溯阁。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等重要文物被疏散到黑龙江省保管。1954 年 1 月，又重新运回沈阳。1966 年 10 月 13 日，文溯阁《四库全书》安全运达兰州土门墩车站，由兰州军区的 27 辆军用卡车秘密运抵距兰州市区 70 公里的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保藏。1971 年 6 月，又被秘密迁至距离兰州市区 60 多公里的甘草店专库。由于甘肃干燥适宜的气候条件，《四库全书》得以完好保护。

2005 年 7 月 8 日，建于兰州北山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正式开馆，投资 5000 多万元，占地 3.126 公顷，总建筑面积 5757 平方米。新建成的文溯阁其方位和建筑风格都承系了“古制古貌”，也是歇山式大屋顶建筑，外观颇具皇家气派，与北京文渊阁最为接近。一二层为展览厅、三楼存放《四库全书》影印本，副楼主要用于学术研究，而《四库全书》的真本则藏在专门设计的地下室内。



文溯阁《四库全书》（仿真本）

《四库全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伟大的图书集成，其规模亘古未有，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值得传世的所有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分类科学是四库编纂的最大特点之一，为后世集成图书的编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体现在其文物价值方面，而“四库”本身的实用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利用。

王了望行书轴

行书立轴，纸本，纵 118 厘米，横 56 厘米。现藏兰州市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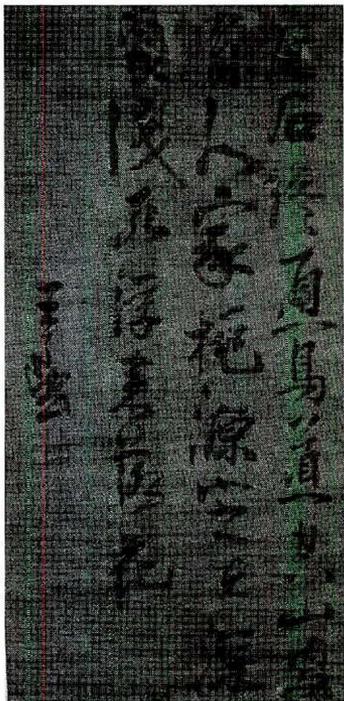
行书：“危石才通鸟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处，浅水浮来落花。王了望。”名下钤白文“王了望”印、朱文“陇友”印。

这是王了望的书法精品。作品大气磅礴，酹墨淋漓，豪放跌宕而不



失规矩。这种老练而流畅的笔墨，体现于字里行间，圆浑饱满而不飘滑，线的流动、节奏所达到的笔墨之趣之美，只有技巧与悟性均臻上流高手者方可能明其三昧，达成妙境。

王了望（1607—1686年），名家柱，字胜用，后改名予望、了望，字荷泽，别号绣头陀，巩昌府陇西人。幼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诗文俱佳；官至福建同安县知县，为政清廉，声名为县民颂扬。晚年告老返回故里，以淡泊的心境习字作文，所著有《风雅堂诗文集》《一笑册》《小山虫冷集》等。王了



王了望行书轴

望的书法上宗魏晋，兼容唐宋，并借鉴明代早期书法，加上他本人的学识修养，故而能在传统书法中得以创新。其笔法、墨法、章法达到一种新的境界，潇洒、灵动、凝重、自然朴拙。

唐琏《墨石图》

纸本，水墨指画，纵96厘米，横39厘米。兰州市博物馆藏。

在绿草如茵的土坡上，一巨石高耸，以行书落“道光癸未秋七月，栖云山人唐琏指画并题”单行款，下钤白文方印二，右上角钤朱文“松石斋”长条印。



唐琏《墨石图》

唐琏（1755—1839年），字汝器，号介亭，别号栖云山人，因其书屋名为松石斋，故又号松石老人，皋兰（今兰州市）人，清代陇上著名书画家。他精通诗、文、书、画、印、琴、医、道学等，集多种技艺于一身，尤擅书画和医学，为清代兰州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书画篆刻大家，著有《松石斋印谱》等，作品流传甚多。

唐琏的墨画和指墨画以山水、人物为主，兼及小品和其他种类。其特点为：以书入画，讲究线条，浓淡相间，枯润并施，虽以指画，但求通神，虚实有度，构图别致，气势雄伟，生动自然，禅味十足，款式干

练，铃印到位。其作品被列入国家规定的非出境品。

温虚舟《山水图》

纸本，设色，纵 95 厘米，横 40 厘米，兰州市博物馆藏。

右上方山石高耸，山壁陡峭，飞瀑自石间流出，一行大雁南飞。左下方石坡上，有草亭一间，周围有几株大树，但叶已尽落。落款：“虚舟戏墨”。无铃印。

温虚舟，名又新，号野园居士，皋兰县人，清嘉庆同治间在世。唐琏之弟子，清代甘肃著名书画家。擅长画山水、人物，其画具有浓厚的



乡土气息。其遍游兰州及附近名山胜水、田园阡陌，细心观察体味，精心镛裁，取黄土高原突兀群山、黄河谷地秀丽村舍融入画幅，使荒蛮与秀润融为一体。他多借助于指头画，以深浅浓淡的墨色、朴厚稚拙的线块表现纵横交错的沟壑山峦，烟雨山水取法米襄阳。满幅泼墨淋漓，烟云掩映，笔意井然。

银 鼎

为带盖圆鼎类，通高 65 厘米，口径 16.5 厘米，腹围 77 厘米，重 2700 克。由兽钮盖、双耳圆腹和三蹄足组成。盖呈垒形，内衬印圈与直口合缝。鼎身圆腹釜形，直口束颈，颈较一般鼎为长，双朝板耳从肩上向两侧伸出，腹下为曲形兽面三蹄足，足下各垫一圆球。鼎身两侧及盖顶各镶一小狮，形象生动活泼，增加了器物的生气。鼎身正面雕刻有铭文“起衰振靡”四字，为横排双钩隶体，字体遒劲，上下填三角形纹饰。背面雕刻寿星并衬托以松树、梅花为背景，象征吉祥。制作工艺上采用模压合成工艺，双耳三足为焊接，三狮为铆合。总体来看制作精巧细致。银鼎正面铭文两侧有小楷书款“宁夏省西北运动大会优胜纪念”，下款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题赠”。该银鼎为民国期间甘肃体育代表队出席西北运动会，足球赛获冠军争得的优胜纪念品。兰州市博物馆藏。

新中国成立前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收藏在省立民众教育馆（后改为兰州市教育馆）。“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馆所在地庄严寺被破坏，展品遭劫难，唯银鼎由驻馆内的东方红印刷厂（后为兰州晚报社印刷厂）保管，1981 年市文物管理处从晚报社接收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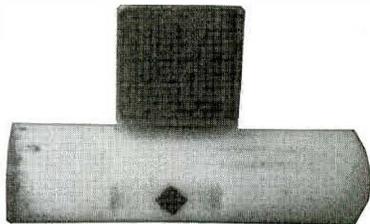
谢觉哉文物

皮箱，长 50 厘米，宽 29.4 厘米，高 13 厘米，谢觉哉生前使用。皮箱外表呈棕黑色，箱盖四周外侧和箱底外表均有压制花纹，箱内上下均系红绸带，内底部两端各有代扣皮带一条，箱底、箱盖之间各有皮拉带一条，用以连接箱底与箱盖。箱子正侧面外端两头各有暗锁一个，右侧的暗锁缺上扣，中部有一个皮提手，已断。箱子整体比较完整。还有墨盒、衣撑、印章均由其夫人王定国捐献。另有一张炕桌，木制，长方形，桌沿上部周饰雕刻图案，造型美观，为当地群众捐献。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纪念馆藏。

谢觉哉（1884—1971 年），原名谢觉斋，湖南省宁乡县人。1937 年 7 月 29 日由延安到兰州，与先期到兰的彭加伦一起创建了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至次年 9 月 5 日，在兰州不到 1 年的时间，谢觉哉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共的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营救和收容被俘和流散的红西路军干部战士，团结教育了兰州各阶层群众，提高了各族青年的觉悟，为甘肃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播下了革命种子，培植了革命力量。



谢觉哉的皮箱



谢觉哉的印章

彩陶华光

——马家窑文化

兰州地区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数万年前，兰州地区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在西固区陈坪乡深沟桥附近、榆中县耨坪乡、城关区长沟，均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出土石核器、刮削器、细石器，就是明证。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后，兰州地区的先民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属于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它可分为马家窑类型（前3100—前2700年）、半山类型（前2600—前2300年）、马厂类型（前2200—前2000年）。这三个类型是由早到晚发展起来的原始文化遗存，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其发展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

彩陶是史前文化的重要遗存，开创了人类发明创造的历史，以其精美的造型、绚丽的图案和实用性，映射出人类先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



变体飞鸟纹彩陶盆

活的追求，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瑰宝。彩陶是甘肃人的骄傲，也是兰州人的光荣。马家窑文化约从距今五千年延续到距今四千年，因最早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发现而得名。位于彩陶文化核心地区的兰州城关区，也出土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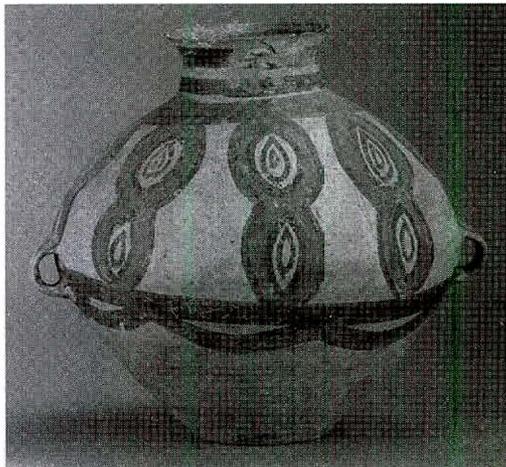
量可观的彩陶。那些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古人生活的信息，也将古人的审美方式带给了我们。用绚烂多姿来形容兰州出土的彩陶毫不为过。

兰州的彩陶大部分为马家窑文化类型。马家窑文化被学术界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彩陶是马家窑文化的最大特色。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西渐，其彩陶比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制陶技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彩陶赏心悦目，让人耳目一新。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造型有平底器和圈足器。器类有盆、钵、壶、瓶、豆、孟、瓮、缸、甑和大量的单耳、双耳罐等 30 多种，能够满足先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陶质可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以前者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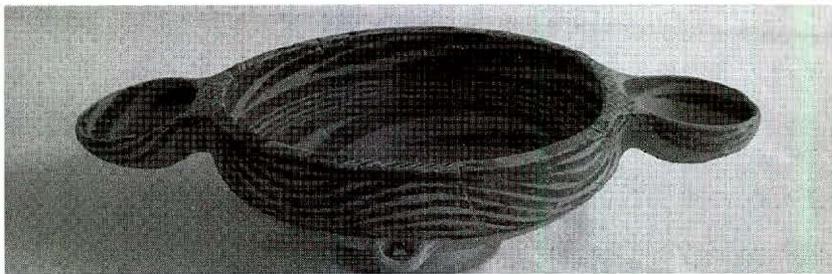


主。彩陶一般采用泥质红陶精心制作，造型精巧，构图华丽，数量众多。其中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以黑色为彩绘颜料，内彩比其他类型发达。主要器形有小平底钵、卷唇盆、侈口深腹双耳罐等。纹饰多为几何图案，常见的有平行条纹、波浪纹、垂弧纹、圆点纹、漩涡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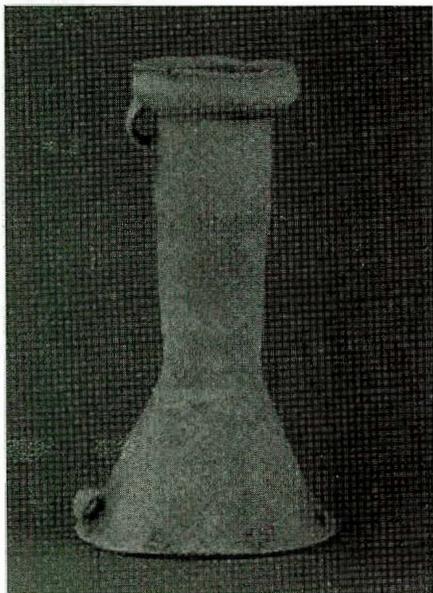


贝叶双耳彩陶罐

马家窑彩陶大部分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陶器的残片断口基本上呈现为橙黄色，非常漂亮。这类陶器外表打磨得非常细腻，可以看出4500年前，不仅人们开始有讲究地生活，而且陶器的生产也出现了专业分工。整个马家窑彩陶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从出土器形看，集中了盆、钵、碗、瓶、罐、壶等。陶器外部绘有草叶、漩涡、波浪、圆点等纹饰。同时，还有素陶出土，大多为罐、瓮、甑、砂锅等。



马家窑类型水波纹三联盆



红陶素面鼓

兰州出土的彩陶说明，早在五千年前，人类就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年人们在兰州境内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址，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从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些古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庄浪河、阿干河等河流附近的台地上。由此可见，远古时候，兰州地区沿河流的二级、三级台地上密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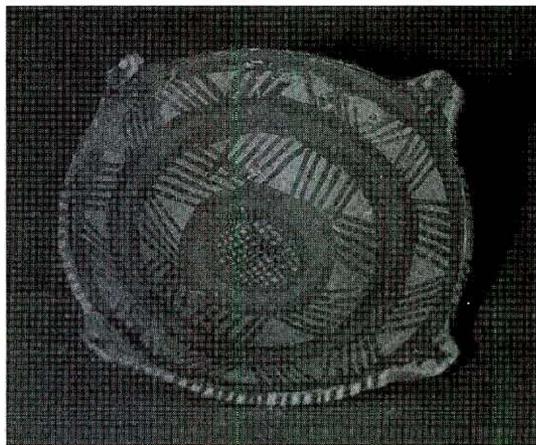
众多聚落。

城关区是兰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比较重要的分布区域之一，是兰州地区史前时期的代表性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裴文中、何乐夫、米泰恒等人先后来此考古调查。在市区黄河沿岸发现了包括城关区的中山林、高坪、徐家湾和四墩坪等十余处远古文化遗存，填补了本地区古人类分布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内考古学界的关注。1949 年以后，甘肃省文管会及兰州市博物馆配合工农业建设对全区文物及遗存进行深入调查，获取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远古人类发展史和纠正以往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编年的错误之处，提供了具体可信的实物依据。目前，城关区已发现的有王保城、白道沟坪、青白石、雁儿湾、中山林、徐家湾、大砂坪等处新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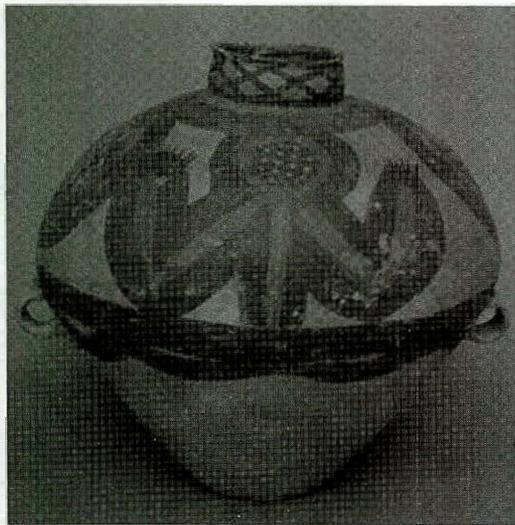
器时代文化遗址。其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好，是研究城关区乃至兰州地区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及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物证与依据。

白道沟坪遗址，位于城关区青白石乡白道沟坪上。白道沟坪遗址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存。距今约 4300—4000 年。它由园坪子、徐家坪和刘家坪三块台地组成。1956 年 3 月，修筑包兰铁路时发掘。总面积 35 万平方米。刘家坪是墓葬区，徐家坪为窑场区。在窑场区共清理陶窑 12 座。陶窑均为竖式结构，呈正方形，窑算上有 9 个火眼，三三成排，均匀整齐。窑室大小不一，大者长宽各 1 米。窑场分布情况为北边 4 座，中间 5 座，南边 2 座，东边 1 座。前 3 组陶窑南北一线排开，每组间同用 1 个灰坑。坑内堆放着烧过的红黄色土、木炭末、植物灰、炭釉子和破陶片等。窑场内有圆形备料坑 1 个，坑壁附有断续的红胶泥，周围地面上有许多红胶泥块及圆棒状红胶泥条、夹砂红泥块等，是储存陶土和制作陶器的地方。窑场中还出土研磨颜料的石磨盘和调色陶碟，陶碟中残存着彩绘陶器时的紫红色颜料。从中可知，陶坯成型晾干后，在这里施彩，然后置入窑内焙烧。经化验残存颜料化学成分与彩陶上使用的颜料基本一致。



白道沟坪遗址中发

内彩四系盖



神人纹双耳彩陶罐

现的制陶窑场，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全国亦属罕见。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制陶工艺史提供了具体完备的珍贵资料，也为研究当时人类社会在生产、分工、交换等方面的规模与程度提供了翔实可信的实物资料。

王保保城墓葬，1966

年9月由甘肃省博物馆清理发掘，属马家窑文化遗存，距今5100—4800年。出土有陶壶、陶罐、陶盆、陶钵、陶瓶等，分泥质彩陶和夹砂粗陶两类，共12件。墓中还发现绿松石球等物。出土的陶器，形制规整，制作精细，纹饰优美，色泽艳丽。其中编号为LBMI:2的敛口平底彩陶钵，高5.7厘米，口径14.5厘米。外腹部绘有6组弧线圆点纹，器内绘有同心圆点纹、弧线圆点纹和弧线三角纹，三组图案巧妙结合，每组图案之间填饰细密的网纹。颇似鱼眼的同心圆点纹，被绘饰在像是水花腾溅的弧线圆点纹一端，乍一看去，仿佛入网之鱼正惊奇探头，想凭借腾溅起来的浪花伺机逃出网外。这一优美画面，既是古代劳动人民生产活动的生动写照，也充分反映彩陶丰富的表现内涵，在我国同期彩陶图案中极为少见，堪称史前艺术品中的精华。

雁儿湾遗址，距今约5100—4800年，属马家窑文化。位于兰州城



东约 10 公里的一级台地上，北倚黄河，东接桑园峡，高出河面约 60 米左右。1950 年修建陇海铁路时发掘，总面积约 6000 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1 米，当时发掘范围很小，只清理出一个灰坑。灰坑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北大南小，最大直径 2.9 米，最小直径 1.6 米，深 1.9 米。坑内堆积为灰土、木炭末和黄土块，夹杂有大量的陶片、陶环、兽骨、石片、石器和少量的骨珠、骨戒指等小件装饰物。坑底有大小不等的椭圆形柱洞。出土的生产工具有农业用的 1 件石磅、2 件石刀和 1 件陶刀；打猎用的 2 件石球和 5 件细石器。红烧土和柱洞残迹，说明废为灰坑之前曾居住过人。该遗址出土的农耕工具少于渔猎工具，据分析认为，当时农耕经济相对落后，渔猎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的补充手段，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

营盘岭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半山文化遗址。营盘岭遗址位于营盘岭坐标架周围，南北长约 200 米，东西 300 米，面积约 60000 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50 厘米。距今约 4000 年。1985 年出土彩陶鼓腹罐、单耳罐和石器、石凿、石刀、凹槽形石器等多件。遗址破坏严重。



营盘岭出土彩陶

马家窑文化的村落，有一定的布局。人们的居住区、窑场和墓地是分开的，以白道沟坪遗址最为典型。人们的居民区在白道沟坪，在居住

区的偏东为窑场，西面是公共墓地，氏族成员死后则葬于公共墓地。白道沟坪公共墓地的墓坑距地表较浅，完全没有葬具，葬式头东脚西，背南面北，以单人侧身屈肢葬较为流行。尸骨上都用10厘米左右的树枝掩盖，随墓陶器多达十件，有的陶器内有谷物的朽灰和兽骨。兰州地区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们，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男性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已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说明他们的生产力逐步得到发展和提高，生活有所改善，因之氏族成员死后有较多的随葬品。

通过发掘兰州的古遗迹，人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大体状况。从遗址出土的聚落遗迹来看，原始居民们选择了面临黄河而又背风的地方作为居住地。氏族的聚落内，各种房屋的排列依然整齐有序，先民们已经有了原始的规划意识。那时，男女基本平等。人们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屋中，由于房屋比较低矮需要猫着腰才能进屋。屋中间有一个灶，靠墙的地方放置着各种彩陶做成的器皿，有些用来盛水，有些用来盛装收获的谷物，还有些则是特殊用途的器物。那时，兰州先民们正处在贫富分化的转折时期。兰州城关区白道沟坪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大型窑场遗址，证明先民们有着比较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当时人们能非常娴熟地制作出各种彩陶，这给原始先民的生活提供了极大帮助。



古人生活再现

——古墓葬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礼俗文化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丧葬礼俗。对死者进行安葬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史上一个普遍而永恒的文化现象。古墓葬泛指古代人类采取一定方式对死者进行埋葬的遗迹，包括墓穴、葬具、随葬器物和墓地。墓葬方式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和文明程度。古代墓葬制度、丧葬礼仪、墓葬结构、陪葬品的等级等，反映了中国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理念。比如，秦始皇生前是统领天下的皇帝，他活着时所拥有的一切，死后也要继续享用，他的陵墓就是这么设计的。结构复杂的秦始皇陵是仿照其生前的都城咸阳的居住和生活格局而设计建造的。墓室里还注满水银，象征江河湖海；墓顶镶着夜明珠，象征日月星辰。所以，古墓葬是探讨

不同时代、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埋葬习俗以及所属时代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实物资料。它对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结构、社会发展情况，对人们认识古人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和生产力技术水平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至2013年10月，兰州市共发现各类古墓葬67处，其中城关区作为兰州的中心区域，有王保保城马家窑墓葬、龙尾山根西汉墓、伏龙坪汉墓、中山林汉墓、东岗镇东汉墓、中山林金代雕砖墓、方家庄明墓、牟家庄太监墓等，现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王保保城墓葬

1966年9月，由甘肃省博物馆清理发掘。墓葬发掘于王保保城中，故得名。位于白塔山东约1公里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后山处，是首次发现的马家窑文化类型墓地，属马家窑文化遗存，距今5100—4800年。

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底部略呈圆形，未见棺木。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头东脚西。随葬品置于头部附近，有陶壶、陶罐、陶盆、陶钵、陶瓶等，分泥质彩陶和夹砂粗陶两类，共12件。墓中还发现绿松石球等物。

王保保城墓葬的发现为纠正安特生的马家窑、半山同期说，即“马家窑为住址，半山为葬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首次证明了马家窑时期居民不但有自己的住地，而且还有自己的墓地，并为重新建立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准确编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龙尾山根西汉墓

1982年11月发掘，墓为竖穴土坑木椁葬，棺椁距地表5米，坐北向南。墓坑长4.3米，宽2.4米。椁壁厚12厘米，椁内并列二棺，为夫妻合葬墓。墓中出土青铜器20件、陶器8件、漆器4件、货币9枚、石砚2方。其中铜方壶1件，方口，圆腹，两侧有耳，为二兽御环，通高36厘米，口径为9厘米，底径10厘米。编钟、铜鼎、铜盂等为缩微仿制铜器。

伏龙坪东汉墓

位于城关区伏龙坪北缘的山嘴上，属黄河南岸第三台地，高出市区约100米。1987年10月，伏龙坪煤场基建中发现一座东汉年间夫妻合葬砖室墓，兰州市博物馆随后清理发掘。

墓葬结构，墓坐北向南，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全长10.8米。墓室均用长40厘米、宽18厘米、厚5厘米的青灰砖和部分楔形砖砌筑。墓底距地表4.9米。因早年山体滑坡，墓道和封门砖已塌落，其形制、结构已无法得知。前室为穹隆顶式，平面为正方形；后室为单砖拱形券顶，平面为长方形；墓室底均为人字形铺地砖一层，后室高于前室约0.5米。后室有棺木两具，均为素面漆棺。西侧漆棺葬一成年男性；东侧随葬物品多为梳妆钗环之类，其中有连弧草叶纹铜镜一面，由两层墨书古纸包裹，即为兰州考古重大发现之东汉墨迹纸，所葬当为女性。

墓葬内随葬器物有木胎和夹苎胎两种漆器 9 件，铜釜、铜碗、铜壶等铜器 6 件，陶器 1 件，银饼、银钗等银器 5 件，东汉五铢及桓灵时期钱币等古钱币 2000 多枚，古纸 2 件，其他如梳子、化妆粉等共 12 种。

该墓出土遗物之多，在兰州地区为首次。墓室为前室穹隆顶、后室券顶的前后室墓的形制，在中原地区最早流行于王莽前后，一直沿用到东汉中期，传到兰州地区当在东汉晚期。根据出土钱币，推断该墓的下限年代应在汉灵帝中平二年（185 年）铸造“四出”五铢之前。

该墓的重要发现为出土的两张墨书古纸，它是中国现今发现最早、最大、最完整、文字最多的墨书古纸，也是继甘肃武威旱滩坡之后，古纸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我们研究古代造纸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山林金代砖雕墓

中山林金代砖雕墓位于城关区中山林西北民族大学校园内。1953 年发现，1954 年清理。墓有竖穴墓道，主室及左右耳室各一。墓门两侧门墩上有砖雕花卉。墓内积土中清理出白色小瓷碗、黑釉瓷盘、残铜器等，并有开元、元丰、元祐、宣和等钱印。

墓室各壁有砖雕花卉、鹿、马、人物以及门窗等，装饰富丽。其中，主室东壁刻有“孟宗哭竹”，一男子跪地双手掩面哭泣，山坡上竹生枝叶茂盛。西侧壁的八棱形柱间有榻扇门刻有“王祥卧冰”“闵子骞单衣奉亲”等二十四孝图。它们不仅是珍贵的艺术品，而且是研究当时人们崇尚孝道的实物资料。墓内一块砖上有墨书文字，为“明年八月太



原村，南京，临洮府，延安府，保安州”等字样。据推测“明”当为“明昌”年号，为金章宗完颜景的年号（1190—1196年）。由此推断为金代墓葬。

墓葬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场所，大量雕绘孝子事迹图，一方面反映了墓主人生活时代的精神文化面貌，另一方面表现了墓主人生前尽孝行道的生活，以及希冀后代子孙行孝积善以获福报的强烈愿望。“二十四孝”题材是甘肃宋金墓葬中的装饰主体，其孝道人物图表现形式主要为砖雕，这是此期墓葬最显著的特点。砖雕也是墓葬中最为堂皇富丽的装饰。这种装饰艺术的成就，再一次展现和继承了前代成熟的雕刻艺术技巧。除大量的素面砖雕外，还有砖雕彩绘的形式，人物服饰、面部及背景均着色彩绘，具有极强的装饰艺术效果。

方家庄明墓

方家庄明墓位于城关区方家庄，为明嘉靖时刘漳夫妇合葬砖室墓。1957年9月，甘肃省文管会对其进行清理。墓为券顶单室，分墓门、甬道、室门及墓室各部。墓门和室门均为拱形，各有封门砖。墓斜坡形，宽2.7米，墓门券用二侧竖、二平砖相间砌成。墓室门在墓北壁中部，墓室东西壁中部各有一小龕。室内有2个木槨，已被盗掘时破坏。女棺长1.9米，为素漆面。男棺长2.46米，绘有花卉等图案，色彩艳丽，棺内有大量木炭和锯末。二棺下有棺床。室内东、西、北三角有青、红、白3个天然石子。室南壁中有墓志铭1块。男棺内有残补服3块、木梳3段、银杯1个、铜带饰13件、摺扇1件及木篦等。木雕虎

头，直径 30 厘米，涂红、黑二彩。铜带饰有 4 件桃形，上有镂空及麒麟；其他饰有花果、花卉等。酒杯，银质，外包皮，口径 6 厘米，高 4.4 厘米。所有这些都表明墓主非同一般的身份。

刘漳（？—1540 年），字永济，兰州人。正德十二年（1517 年）丁丑科三甲七十七名，授户部主事，升四川按察使、山东左布政使，累官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所在有政绩。其《谒诸葛祠重有所感》：“清风千载谒茅庐，绿树深深听野乌。渭水有田当易魏，瞿塘列阵欲吞吴。英雄两汉谁高下？筹策三分定有无。天意不然人可奈，至今遗恨噫真儒。”《明史·何孟春传》《甘肃通志》《临洮府志》《皋兰县志》均有记载。

这些墓葬大体上代表了各个时期兰州墓葬的形制，并出土大量有时代特征的精美文物，准确地记录了兰州地区经济文化和丧葬礼俗的发展演变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为研究兰州历史及各民族的丧葬风俗、封建礼教、宗教信仰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是各民族在兰州繁衍生息并开发兰州的历史见证。



金汤 余辉

——兰州城池关隘

兰州在中国历史上是以军事要塞的概念出现在史书上的，有“金城汤池”的美誉，起着隔阂羌戎、屏障中原、襟带西域的作用。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兰州曾经的长城、城址、关隘失去了本来的作用，因而被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大量的文字记载和零星的遗迹来回顾兰州的过往与峥嵘。

从战国开始，长城被当作抵御外侵的屏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在历史上抵御匈奴、鞑靼等外族军事集团的侵略方面的确起过重要作用，因其工程规模浩大而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留存至今则成了珍贵的文化遗迹与遗产。兰州境内究竟有没有秦长城，至今尚无定论。汉代长城主要分布在永登境内。自明代中期起，蒙古族鞑靼部不时南下



1875年的兰州城袖川门（俗称西稍门）

侵扰兰州北境，为了保境安民，明廷在兰州黄河两岸修筑了一系列城堡。长城主要采取黄土夯筑，利用山险做天然屏障，挑挖堑

壕和设置水（木）栅等方式进行修筑。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王以旂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在兰州黄河南北两岸分筑一道边墙（明代称长城为边墙），从而改善了兰州的防御态势，使之真正成为“金城汤池”。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长城在兰州的某些地段便与城墙合二为一了。

兰州的黄河北岸长城，也叫作“河北边墙”。据兰州地方史料记载，这条线从盐场堡开始，经金城关、安宁堡等一路向西，最后进入天祝。在庙滩子向北的三级台阶地朝阳村一校东，前几年还有一段保存较完整的明边墙，全为土筑，底宽约3米，顶宽约2米，高约5米。这段边墙大致从王保保城开始向东，末梢是天然屏障悬崖，下有玉垒关与盐场堡的边墙相连。有人考证，河北边墙修筑于明代成化年间，修成在正德年间。

兰州黄河南岸的长城人们称之为“河南边墙”。分布在黄河南岸，西起临洮，经永靖等地，再过市区沿黄河南岸向东，直至靖远。今天，在兰州南关十字润城花园内还有一段残存的兰州内城的南城墙，断面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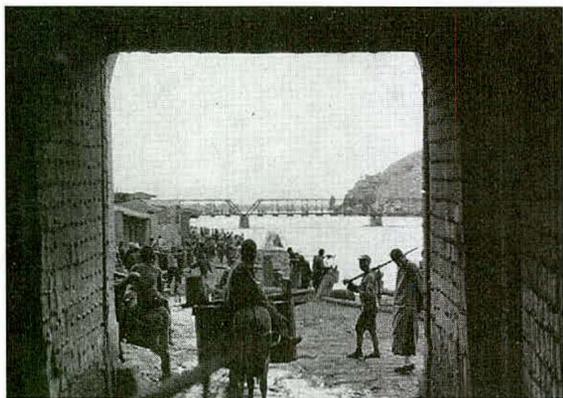
晰地展现了“城包砖”的特点，在繁华路段还能看见城池的影子，对于兰州来说着实不易；拱星墩干休所院内原有一段长城遗迹，拱星墩地名就是因当时修筑的空心墩台演变而来的，可惜遗迹已在楼房翻建时毁灭了。到了清朝，随着国家版图的重新统一，兰州由原来的边疆变为腹地，兰州境内的长城也彻底失去了原有的防守意义。



兰州城墙（润城花园内）

冷兵器时代，城池是保护一方安全的重要设施。兰州的城池从秦朝开始设置，随着军事的需要和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一步步扩展，至清代最后定型。为了消除匈奴人的威胁，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秦始皇令蒙恬率 30 万精兵，北击匈奴，占领“河南地”，次年在此最西端设立了榆中县。当时，榆中县城的位置在今天的城关区东岗镇一带，城并不大，也比较简陋，其主要目的是防备匈奴人。

西汉曾设金城，县治在兰州市西固城附近。后随着战争和商贸的需要，隋唐时期今天的城关区一带遂成为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心。隋开皇元年（581 年），隋朝设置兰州，最初设在子城（兰州城关区一带）。隋唐时兰州城只算个中等城池。根据河道的变迁，当时的兰州城在皋兰山边的可能性比较大。



水北门

北宋时，兰州是西夏、宋、金交战的前线，出于防守的需要，人们将修筑城池视作头等大事，不断进行整修与展筑。当时，兰州隋唐城仍然存在，东西六百余

步，南北三百余步。

元代兰州基本上属于内地，城市的防御体系逐渐淡化。而到明代，明政府长期同漠北的蒙古族处于战争状态，人们多次修筑兰州城。至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都指挥李进增筑承恩门外郭，自西北至东北，共九十九丈余，并辟城门九座：东关迎恩门，今东方红广场东口；



皋兰门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

古迹胜览



东北为广武门，在今秦安路与金昌路相交处；再往东北为天堑门，在今静宁路北口；南为拱兰门，在今旧酒泉路原兰州卷烟厂稍南；东南为通远门，在今静宁路与畅家巷西口相交处；西南为永康门，在今胜利饭店与市交通局之间；再往西南为靖安门，在今临夏路通下沟路口稍南；西为袖川门，在今临夏路西口清真寺西南侧；正北为天水门（俗称桥门）。城门上皆建城楼。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都指挥梁暄筑东郭外墙三百六十丈。

清代人们多次修筑兰州城。至同治元年（1862年），护陕甘总督恩麟为四内城门各增筑一座瓮城重门，加强和改善了对于内城的防守态势。至此清兰州城基本定型，内城周长六里二百步，外郭周长十八里一百二十三步。兰州城内城、外郭（关）门上均建有城（郭）门楼，其中以北城门楼建修年代最早，门内墙上嵌有“玉关锁钥”四字石匣一通。北、东、西三座城楼均高三层，纯木结构，雕梁画栋，飞檐兽脊，很是壮观。尤以南门楼最为雄伟，其建筑为三层，上有“万里金汤”四个大字，浑实厚重。

民国时，城市建设除部分城墙、城楼修葺补缮外，由于人口的增加，特别是为防空和城市建筑之需要，毁弃拆除了部分城墙、城楼，作为骨干道路的通道。1949年后，随着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兰州城墙被陆续拆除殆尽。至2005年，内城残存七处：东城壕、顺城巷、张掖路、武都路中学、绣河沿等地，合计约470米；外郭残存527米，分别在宣家巷、畅家巷、西关十字等六处，城墙结构为夯土构筑，外包青砖，夯层厚15~20厘米，墙高11米，基宽8米，顶宽6米。



鸟瞰兰州城池

在写兰州城关区城堡遗址时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保保。据《明史》之《太祖本纪》《扩廓帖木儿传》《徐达传》等载，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明将冯胜攻占兰州，

张温驻防。十二月，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自河西来，围攻兰州。洪武三年正月，徐达率军西征解围，直捣定西，王保保恐腹背受敌，遂驰往定西迎敌。在车道岭南沈儿峪两军遭遇，激战之下元军大败，王保保逃往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王保保当时在兰州城外修筑的城堡被称为王保保城，在城关区留存有两处遗址：一在黄河北朝阳村，一在黄河南东岗坡上，均为明洪武二年（1369年）筑。朝阳村王保保城南临

黄河，东临朝阳村，西依朝阳山，南北长约210米，东西长约370米，占地77700平方米，开东、南二门。此处居高临下，地势险要，确属易守难攻之要塞，是兰州地区的古战



王保保城遗址（黄河北）



场遗址之一。现在城墙已不存，前几年存东墙、北墙7处，高6米，宽4米，夯土层厚度10~20厘米，累计长度不足百米。夯土层清晰，城址依稀可辨。随着对原居民区的大面积改造，现在就连那些遗迹也很难寻觅了。东岗坡王保保城，位于城关区东岗镇古城坪，南距西兰公路1公里，北临黄河，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西望兰州一览无



王保保城遗址碑（黄河北）

遗。城为长方形，南北长180米，东西宽250米，东南有瓮城及城门。现残存东墙与南墙，墙高3米，基宽2米，顶宽0.5米。在城墙西侧立有石碑“王堡堡城故址”，可惜王保保名字写错了。这些见证着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与一个勃然兴起的政权之间博弈与争斗的历史。而王保保支撑危局，屡败屡战，力图挽元朝之既倒，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



王保保城城墙（东岗镇）



王保保城城墙（东岗镇）

神，也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为了保证城市的安全，防止敌军兵临城下造成直接冲击，明代在城市外围设置关城堡寨等防线，与长城共同构成坚固防线。明廷在兰州黄河北岸白塔山下烧盐沟口西修筑凤林关，一名东金城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重修。其东北为王保保城，背山面河，雄峻险要，是通往红水（今景泰）、宁夏的孔道关隘。玉垒关，即原庙滩子东城楼。北靠山崖，东与盐场堡明边墙西延部分相连，关楼因用块石砌成，故名玉垒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道黄云曾修葺。20世纪40年代，玉垒关与凤林关同年拆除，其遗迹今无存。而与这两关邻近的金城关因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本文予以重点介绍。



凤林关遗址

金城关是兰州城防军事设施之一。它是西北最有名的一座关城，既可控制黄河，也可盘查过往行人，是维系古金城安危的一把锁钥，“倚岩百丈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是其真实写照。

民间有“先有金城关，后有兰州城”的说法。据《读史方輿纪要》载：“金城关，州北二里，当黄河西北山要隘处，本汉置。”又《重修皋兰县志》载：“金城关汉置，隋有关官，唐因之，宋绍圣四年（1097年）重筑，明屡加修葺。”均说它建于汉代。而《元和郡县志》谓：





兰州的北城墙

“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津为关。”则说它是在隋开皇十八年由金城津改建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金城津初时关址在今西固沙井驿大桥附近，至北周武帝时，移至今兰州市黄河北岸中山铁桥西约1公里处的金山寺西山腰处。虽然志书所言不一，即使按隋朝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金城关北倚高山，南临大河，是沟通中原和西域的要道。山与河之间，仅容一辆车通过，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隋朝至今的一千四百多年中，金城关见证了北方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割据政权鏖战的刀光剑影，历代王朝分分合合、新旧交替时的交兵大战。到中原经商的西域商人，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为中央政府传递信息的使臣都从这里经过。玄奘、林则徐、左宗棠等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也都从此经过，留下了一段段感人佳话，写下了许多豪迈诗篇，为古老的金城关壮色。

北宋时兰州是北宋和西夏发生拉锯战的地区，宋王朝大规模展筑城池与修复金城关以拒西夏军。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宋朝发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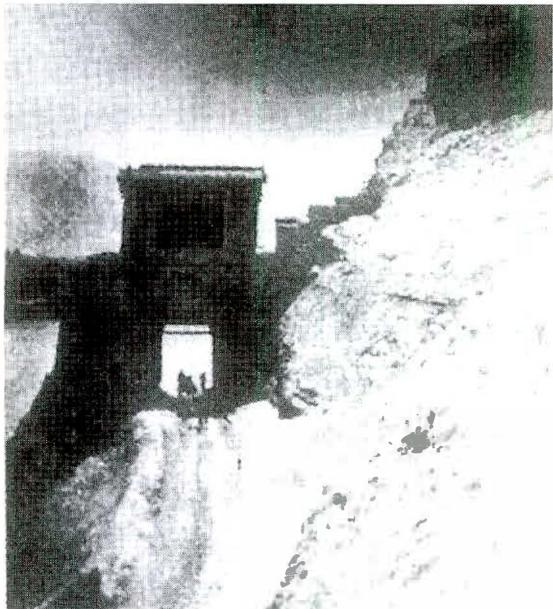
路大军进攻西夏；七月，诏李宪“相度置船筏于洮河上游，相机率兵东下”；八月，李宪率军越过马衔山，进占瓮谷寨、三角城，然后从夏官营取道桑园峡进攻兰州。九月初二，进占兰州。宋朝派李浩守兰州，同时开始大规模修筑兰州及其周边的城寨等军事防御设施。

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北宋和西夏在兰州发生大战，当时西夏动员80万人参战，并派兵持盾牌架云梯准备登城，这时城上箭如雨下，后来西夏军因粮草供应不上而撤退。在这个宋夏拉锯战的背景下，兰州成为两个政权争夺的战略要地与前沿。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为了防御西夏反攻，充分发挥黄河天险的作用，苗履建议修复金城关，并在黄河上架设浮桥。四月，兰州军事推官钟传趁着宋夏在灵平会战，于6天之内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修筑金城关，其目的是防守黄河渡口。

金城关在冷兵器时代对于兰州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历代都有修葺，其中在明代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重建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至次年，旧址在镇远浮桥北端。关城依白塔山而建，东西长200丈，并各置城门一座，门上建有戍楼。后来城垣颓废，戍楼倾坏，边备废弛。第二次是正统十年（1445年），明代学者黄谏在《金城关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重建的情况：正统九年（1444年）冬，朝廷发现蒙古瓦剌有窥伺明朝的动向与野心，命陕西右都御史陈镒巡视边防，整饬武备，选将练兵以防御瓦剌。陈镒到兰州察看地理，认为兰州是西陲重镇，必须派大臣镇守。奏闻朝廷后，调山东佥都司事李进守备兰州。李进到任后，立即筹划，劝工募力，进行重修。拓其城郭，甃以砖石，而戍楼睥睨依次而成。其外又广其地为瓮城，城内正北筑台高丈余，上建



真武殿。为了避免工事误农时扰民，特安排于正统十年八月开工至次年三月完成建设。第三次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到了万历二十三年，新上任的临巩兵备道副使张栋看到金城关“关门颓矮，仅数木覆其上”“遂谋以设险”，于是又重建。



金城关

这次重建的情况：“石伐之山，木取之税。甃台构基，直接河流。门上为注孔防火，山城为炮眼防攻。上为楼三楹，拟下石矢可百步，人不能近。”关城的防卫设施如此严密，足见它在当时依然是一个军事要塞。

雄险的金城关，可以凭关固守，使黄河以西、以北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望而却步。“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这些对联诗词，写出了人们对金城关的感受和兰州古代争战的历史。

金城关北原建有金山寺，其下至中山桥一段街衢，市民密居，商店、饭馆、茶馆，乃至学校、寺院鳞次栉比，亦称繁华昌盛之地，人们统称之为“金城关”。



金城关



金城关文化博览园

清朝时国家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在清王朝广袤的疆域中兰州成为陆都中心，其原来为拒外族入侵的边关战略要塞军事防御功能慢慢消退，当初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关隘、码头属性也随之发生改变。历经沧海桑田，金城关在清代后期逐渐圯废，至民国初期，所留遗迹无几。以前，从白塔山下沿河西行一侧是山崖，一侧是大河，道路狭窄。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拓修甘新公路时，对该路进行了整修。抗日战争爆发后，兰州成为大后方，是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运至兰州的重要通道。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保证军事物资运输，便加紧整修甘新公路，动员了很多人加宽路面，便于载重汽车运输物资。在修金城关段时因路窄汽车难以通过，故将金城关遗迹全部炸毁。千年古关就这样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如今，在金城关旧址上耸立起一片仿古建筑，便是金城关文化风情园，兰州春节文化庙会、黄河风情文化周、农民艺术节、社区艺术节、省市非遗保护宣传活动、兰洽会等节庆活动的主要文化展演都在这里举办。兰州秦腔博物馆、兰州彩陶博物馆、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黄河桥梁博物馆、文化生活体验馆等一系列文化展馆陆续建成，力图将千年兰州文化荟萃其中，使其成为兰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聚集地，诠释与彰显兰州悠久的文化及特有的人文个性。千载悠悠，物换星移，金城关演绎了一个千戈化玉帛的历史蜕变过程。

塔影神碑

——
白塔寺

白塔寺为明代所修。据《重修白塔寺记》载：“吾兰之河山北，原有白塔古刹遗址，正统戊辰间，太监刘公来镇于此，暇览其山，乃形盛之地，于是起梵宫，建僧居，永为金城之胜境。”由此可见，现存白塔寺，系明正统年间镇守甘肃的太监刘永成所建。刘公之后，经历岁久，殿宇废弛。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乡彦郑子敖登临此地，睹之不堪，与其友杜均铠等人号召官民合力出资，重修白塔寺。万历二十年（1592年），白塔寺再次重修，塔院内新增地藏菩萨殿，山下建玉泉阁，“取易地天泰之义也”。至明代末年，院内又增建悬楼三楹，塑文殊、观音和普贤神像。清康熙五十■年（1715年），甘肃巡抚绰奇登览胜概，延访民隐，见此地具枢纽之势，而其寺中却“廊庑不具，僧徒绝迹”，

于是在塔院西侧增建梵刹，在地藏菩萨殿之西，创建“救苦观音洞天”，又在白塔山东南侧建文昌宫、魁星阁及回廊道等，“为邦人士祈天永命祝祥降福之所”。其后，又在塔院“西南凤岭山建三官殿、云月寺及罗汉殿”，并以“慈恩”题寺额，但百姓仍呼之为“白塔寺”。清乾隆年间，文昌宫、魁星阁、观音洞及悬楼三楹等处又进行了维修，寺院规模逐渐发展壮大，演为兰州八景之一“白塔层峦”。

明代所修白塔，七级八面，高约17米，为不能登临的密檐式实心砖塔。塔基为正方形。塔身由不同形状的三个部分组成：下部为双层八角形束腰密檐；中间呈覆钵状；上部呈八角形锥体，计作密檐七层，每层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佛龛一个，内供佛像一尊，计28尊（现仅存一尊），每级每角均有翘起的砖刻小龙头，悬挂风铃，计56个，塔铃随风飘荡，声清音脆。塔刹呈宝瓶状，用绿色琉璃制成，上嵌琉璃花，并有青龙缠绕。塔的外表装饰如雪，故称白塔，通体洁白，挺拔秀丽。白塔既有喇嘛塔的特点，又有密檐塔的特点，二者结合和谐完美，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对我国佛教建筑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白塔建成后，几经强烈地震，毫无损伤，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建筑之科学精巧，智慧之高超绝伦。1963年2月，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人秦维岳有诗云：“北上环拥势嵯峨，塔影巍然最上坡。布地散金名宝刹，擎天一柱俯黄河。”描绘出了白塔雄姿。

白塔寺院内，南有悬岩阁楼，北有准提菩萨殿、地藏菩萨殿，东西两侧各有陪殿数间，陪殿各连小亭一座，四周建筑正好将白塔拱卫于寺院中央，整个寺院居高临下。登白塔山顶，可俯视兰州市容，白塔与黄

河上的铁桥构成雄浑壮丽的画面，成为兰州市的象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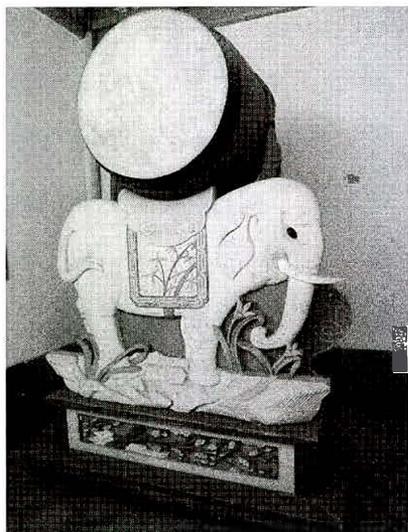
自明代以后，白塔山的寺庙殿宇逐渐增多，成为宗教圣地。这些寺庙依山势而造，或居黄土层，或居岩崖边，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可惜因年久失修，战争破坏，大部分倾圮颓废，目前仅剩一殿。

三星殿位于白塔寺东山巅，西邻云月寺。始建于明景泰初年（1456年），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住持僧张守遂会众重建。民国九年（1920年）冬，地震，殿宇多毁，次年由兰州本地义和店、乾元店、永福祥、正德店、仁义和诸同人集资重修。2003年，又翻建整修。清绰奇曾有联曰：“南极分辉，星散光芒通八表；西山竞秀，人来瞻拜祝三多。”殿内供福、禄、寿三星，“三多”为旧时祝颂之辞，“三”指福、寿、男子。殿门为一木牌坊，清代绰奇题额：正面“泽衍长康”，背面“同登觉路”。

在白塔山半山东侧，有一三楹的高大牌楼，堪称白塔山第一牌坊。牌坊阳面题额“凤林香袅”，阴面题额“秀英三台”，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皋兰举人李存中所题写。其意是：低头俯视，山脚寺庙青烟缭绕升腾，香气弥漫；抬头仰观，白塔熠熠生辉，与皋兰山三台阁相映成趣。寥寥八字，俯察仰观，前呼后应，道出了这座牌坊承上启下的微妙，实为一绝。

白塔寺中有“镇山三宝”：一为象皮鼓，二为青铜钟，三为紫荆树。象皮鼓架在西侧鼓亭中，正坐于木质浮雕彩绘白象之上，为20世纪80年代所制。兰州人喜欢鼓声。相传，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冯胜奉命攻打元军固守的兰州城，久攻不下。正逢元宵佳节，徐达就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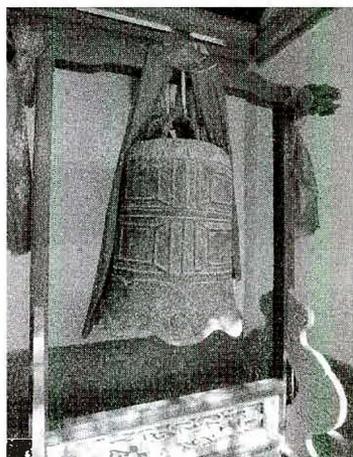


象皮鼓

士秘密制作三尺筒形长鼓，藏大量兵器在鼓中，让士兵假扮社火队混入城中，以大旗为号，里应外合，最终攻下兰州城。立了功的鼓被命名为“太平鼓”，就是今天兰州百姓钟爱的太平鼓。

青铜钟悬于东侧钟亭内。钟面铭文载：“康熙五十七年岁次戊戌孟冬月吉日敬铸洪钟一口于兰州。”重达 153.5 公斤，已有近三百年历史，

玲珑的造型和宏厚的发音，证实了兰州当年铸造业的发达。1939 年日军空袭兰州城时，钟声曾被当作空袭警报使用，悠长的钟声为众多苍生提供了护佑。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做过兰州大学上下课的报时钟。1966 年，铜钟曾被人盗卖，险遭碎毁厄运，所幸公园一位管理人员认真负责，经多方交涉后被追回。重新悬挂于白塔山的铜钟，只有重大节庆或法会时才会被敲响。



青铜钟

所谓紫荆树原生于禅院中，实则为“文冠果”，因为紫荆树产于南方，木质柔韧坚实，纹理美观，古来为斧钺类兵器之最佳柄材。有个关于紫荆树的传说，有田氏三兄弟决定分

家，所有财产都一分为三，包括庭前一丛紫荆树。紫荆性灵，闻之，一夜间便枝枯叶焦。三兄弟看到这种情景，十分震惊，大哥说，连紫荆都不愿骨肉分离，我们难道还不如草木吗？于是三兄弟感慨万千，决计不再分家，紫荆树立即转枯为荣。可惜白塔山上这株神奇的降龙木早已枯死。据说，先前白塔寺有一田姓和尚，每天走很远的路，下山提水浇木，后来田和尚离开了，这棵树就死了。

在白塔山的塔院里有一通用玻璃罩住的石碑，它是白塔山最有价值的文物“夏禹岫嵎碑”，也是白塔山上最为神秘的文物。此碑最初立在金山寺禹王庙前的六面亭内，金山寺故址就在白塔山西南端的半山腰，恰好和山麓的金城关为邻。传说当年大禹西巡积石，导河东流时，曾经到过这一带，所以古人特地将摹刻的岫嵎碑立于此处，自然有它特殊的用意。后因金山寺坍塌，岫嵎碑风雨莫蔽，为防止毁坏之虞，遂于1963年移至白塔山公园北高峰的牡丹亭。“文革”期间，此碑也是历经磨难，倒在地上无人过问。1980年，人们将它移到了白塔寺保护起来。

这通碑高3米，宽1米，刻有奇特的古篆字，字分9行，共77字。碑上的字，似篆非篆，似虫非虫，关于禹王碑字形属何种体，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蝌蚪文，有人认为是鸟虫书（篆书的变体，像鸟虫形），也有人认为是缪篆体（王莽时官定的六书之一），不一而足。总之字形十分怪异，真正的内容如何无人能识。事实上，这篇碑文既不同于甲骨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很难辨认。也有些人认为，它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比较接近，应属商周或商周以前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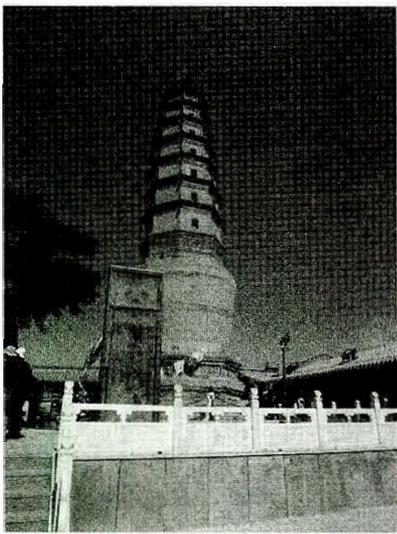
如今我们透过碑外面的玻璃罩，能够清楚地看到石碑上的文字。相



传这通碑所书的是“禹王岫嶙山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情。

最早的一通禹碑立在湖南衡山的岫嶙峰上，所以又称岫嶙碑。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何玖历经艰险，在岫嶙峰找到此碑，手摹其文，后刻成碑立于岳麓书院，遂传世。现在全国各地有十余处禹碑，据说都是由岳麓山禹碑复刻的。兰州的这通碑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酒泉侯建功摹刻的。至于兰州金山寺的碑摹自何处，志书和碑记都无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模本绝对不会是岳麓山的禹碑，因为岳麓山的禹碑，碑文共有77字，分9行排列，每行9字（最后一行不足此数）；而兰州金山寺的碑，碑文只有72字，比岳麓山禹碑少5个字，而碑文并无残损现象，从排列方式来看后者分为6行，每行13字（最后2行为7字），和岳麓山禹碑的排列方式也不相同。

明人吴道行的《禹碑辨》中说：“考《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五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文中关于禹登衡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一说古人多有记载。晋罗含《湘中记》：“岫嶙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徐灵期《南岳记》：“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酈道元的《水经注》、盛宏之的《荆州记》中也有记载。唐代韩愈为此登临岫嶙峰寻访禹碑，有《岫嶙山》诗曰：“岫嶙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但禹碑之事却不见诸史志。字形怪异，难以辨认，所以自明代公之于世以来，研究禹碑的学者不计其数。然而时至今日，岫嶙碑上的文字究竟属于何种形体，碑文的内容又是什么，依然是见仁见智。一般认为比较“文从字顺”的是明代杨慎的释文。



白塔及禹王碑

杨慎撰写的禹王碑释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哀，劳余神禊。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甯舞永奔。”但是也有人认为，杨慎的释读也只是一家之言。究竟写的什么内容还需要综合更多专家的研究成果。

虽然对岫嵎碑的真伪，学者们一直聚讼纷纭。但纵然它是附会史料的伪造之作，也已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将它竖立在全国各地，不只会让人们凭吊大禹治水的功绩，而且可以从中得到书法艺术的享受，因而仍不失为历史文物中的一件珍品。

1997年，曾对白塔下部结构加固和纠偏扶正，但未对地基进行加固。至2014年，白塔须弥座上的裂缝随处可见，塔身表面风化严重，塔体向东北方向倾斜246毫米，倾斜率15.51‰，需对白塔再次纠偏扶正。同年5月，兰州市白塔山管理处对白塔寺实施白塔扶正及加固工程，进行地基加固、纠偏扶正和基础锚固封闭施工。通过该项工程，以期这座凝聚了古代人民建筑艺术智慧的白塔永远屹立在白塔山之巅，铭记历史，肇创未来。



天险康衢

——镇远浮桥

古老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第二大河流。它从青海的高山峡谷奔腾呼啸而来，从窖地进入兰州腹地，穿城而过。黄河浩浩荡荡流过城关区，从白马浪到桑园峡，长达 14.5 公里。而这段河流的南部西段便是兰州城，一个历经战争洗礼与多民族文明交汇而最终发展为综合性大都市的城市。黄河在造福两岸人民的同时，也是阻隔南北交通的天堑。

兰州，位于皋兰山北麓，古称“金城”。这里“地居南北之中，为东西咽喉扼塞”。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成为济渡兵骑和商旅的要冲。

自古以来，黄河天险，水急浪漩船难行，渡河难上难。有民谣：“黄河害，黄河险，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自汉代开始，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用羊皮或牛皮囊吹气鼓胀后，用大小木椽制架，把皮胎半连在上面，浮在水上，由人划桨驾驶的工具，名叫“皮筏”。古代行军西域或商旅行人西去，都是靠木筏、皮筏或船只摆渡过黄河。

最大的牛皮筏子是用120只皮囊制成的，最大的羊皮筏子用600个皮囊，均能载重二三十吨。祖先创造的这种“黄河轻舟”，在历史上曾经为承载渡河与长短途水上运输做出了重大贡献，曾有“羊皮筏子赛军舰”的说法。但它的缺陷是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水而上。每到目的地后，筏子客都要或扛或运将其置于上游再开始运送之程。但是皮筏毕竟代替不了桥梁。历代征战中，大批军骑渡河及日常商旅和两岸民众的过往渡河，仍是一大难题。

据史料记载，公元5世纪，鲜卑族人，花费3年时间在流经枹罕（今临夏）的黄河上建起了一座“飞桥”，桥梁专家称之“伸臂木梁桥”。该桥没有桥墩，而是飞架于峡谷陡崖间，故称“飞桥”。但此桥屡建屡毁，于1099年毁于西夏。以至于400多年后明代诗人吴调元怀念飞桥写了这样的诗句：“山峰滔浪浪淘沙，两岸青山隔水涯；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并刻在河边大石头上。

桥成为两岸摇橹、撑篙、拉纤人的一种期盼。但世界上科技与文明发展的动机或者说动力往往来自战争的需要。兰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宋代尤甚，北宋与西夏的争夺战将兰州置于军事前沿，军士枕戈待旦，刁斗夜传，烽烟连绵。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在河州安乡城（今兰州附近）黄河渡口建浮桥。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年)，北宋收复兰州，修复金城关，并在关下设浮桥。不过，这期间的浮桥多是军用浮桥，军事需用过后，浮桥便被拆掉。镇远浮桥也是明朝初年济师所需的产物。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追击元朝残余势力，为过黄河派遣守御指挥佥事赵祥在城西七里许建造了浮桥。冯胜征西战争取得胜利后，浮桥遂拆。洪武八年（1375年），明廷又派遣卫国公邓愈率师平定河西，进一步巩固西北边陲。为了行军和给饷的便利，在城西约十里处（今十里店）造浮桥，称“镇远桥”。但因河流湍急，堤坝不甚牢固，未能持久。

洪武十七年（1384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带领下属到城北黄河察看，发现金城关下的黄河水流比较平缓，遂计划在金城关下改置浮桥，认为这里离城近而且容易守卫。他又询问城中父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在金城关下建置浮桥比较合适，同僚也表示赞同。于是，杨廉上报陕西都指挥使司（明时甘肃没有省级建置，而是隶属于陕西布政使司和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并获得允准。

是年夏六月，遂召集造桥民工和工匠，做移建浮桥的准备工作。至第二年春二月，“冰解斋戒”开工，在距金城关二百步即今铁桥处移建了浮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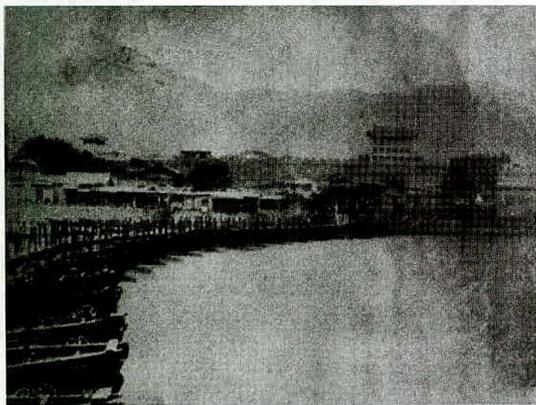
浮桥是串联25只船搭起来的。船的间距是1丈5尺，上流定石鳖（如锚），船上加板，两边设栏杆。桥南北两岸各立铁柱1根、木柱6根，用1根铁索、3根大绳缆住桥身。过桥如履平地。

据明人徐兰的《河桥记》记载，杨廉在黄河之上造大船28只，常

用 25 只，横亘河上，顺架木梁。其余 3 只备用，视夏季河水上涨的情况，酌情增补。每只船的上流各下碇石，以固定船身位置。每只船相距一丈五尺，需要架设梁木才能跨过，因此在船上加铺木板，在船桥两旁全部加设栏杆，以保证行人的安全。浮桥的主缆置于船的首尾，用木栓将铁缆即铁索固定在舟船隔板的锁孔上。铁缆的作用一方面是维系舟船，抵御水流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桥的船只船板均为木质，重量较轻，浮于水面，上下飘荡，人行其上动摇不定，也靠铁缆的重量镇压舟船，增进船的稳定性。镇远浮桥在舟船“绳索交加，一一牵缀而桥成”后，还要“压以巨缆”。此后 500 多年间，用以构筑浮桥的船数和用以固定浮桥的铁柱与木柱数有所变化。

明初浮桥建成时，桥之南离兰州城墙八十步处新筑小城一座，周围有数丈，中间设几道门盘问过往行人。小城上建楼，东西有几间是办公的地方。桥门西边又建了一座祠宇，以奉河神。桥北因山为城，延袤二百丈，东西置门，建楼其上，又建汉寿亭侯祠。后为了给外商提供方便，在城北镇远门外建

“万国梯航坊”。桥南有“中流盘石坊”，又曰“天下第一桥”。甘肃布政使梁章钜曾为黄河浮桥桥门撰写一副对联：“天险化康衢，直如海市楼中，现不住法；河



镇远浮桥



坝开画本，安得云梯关外，作如是观。”

清代刘于义在《河桥记》中说：镇远浮桥“平直如弦，随波高下，纵怒涛浊浪，奔雷卷雪，任其盘涡于船底，而上则人马通行，如履康庄坦道，制甚善也。”

镇远浮桥的建成，给两岸的民众及商旅往来提供了坦途，对兰州地区黄河南北两岸的交通与经济的交流，以及改善我国西北交通、巩固西北边防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交通的便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清朝时，黄河北岸便出现了许多酒楼，十分繁华。旅者坐在酒楼里，天窗临水，南望城郭，林树如画，风景怡人。为此，文人墨客甚至外国使节也加以称赞。明初的马文升言：“陕西之路可通甘、凉者，惟兰州浮桥一道，敌若据此桥，则河西隔绝，饷援难矣！”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四月，来自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的沙哈鲁王的使节走过兰州的浮桥，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这样描述的：四月抵哈喇穆棱河崖（黄河边），河之大，与鄂格速思河（阿姆河）相仿佛。有船桥可以渡河。桥以船23只连成。各船之铁链，粗如人之上腿，链系于两岸之铁柱上，柱粗如人身，深埋地中。清代诗人王光晟也赞美镇远浮桥“天下神桥此第一”，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也引用了此句来赞誉镇远浮桥。

然而，浮桥有季节性，每年11月黄河结冰前拆掉，行人车马从冰上通过，叫冰桥；到第二年春天冰融河开之后再把浮桥架起来。在冰桥初结和始融之时，常有冰裂造成人畜落水之虞。

据文字记载每年冬拆春建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年冰解时搭桥，需人数

百，或在岸，或在舟，或乘皮筏。巨绳系舟从上游缓放，舟系大筐四五个，在筐内盛满石子，等到舟飘到恰当的地方，立即把盛满石子的筐抛到水中，舟在河中稳定后，即刻用麻绳和铁缆交结，如此一一牵缀而桥成。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160年间曾6次重修浮桥，拆建与维修费用颇巨。

因镇远浮桥的两根铁柱是冯胜、邓愈两位大将军建造浮桥时监铸的，故称“将军柱”。杨廉改造浮桥时增加了两根。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一根铁柱被水冲入河中，由当时的总督布彦泰补铸了一根。后来，黄河铁桥建成，浮桥的4根铁柱被废弃，埋于岸边泥沙中。

据考证，将军柱是甘肃永靖王宣、王训二人所铸。王氏家族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白土坡王家大村，以征调行



将军柱

艺铸冶来兰州，铸造金城关黄河两岸的将军柱”，后移迁定居皋兰西半个川（今永靖县刘家峡黄河北岸依河蜿蜒而形成的太极川里）。在永靖县，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谚：“半个川的模子，山城的炉子。”意思就是半个川和山城的炉院家善于塑造模型，冶炼铸造。王氏迁半个川上古城定居，以农为主，兼作铸冶，繁衍子孙，手艺发达，传至于今。据永靖半个川王氏家谱记载：“我王宣、王训二始祖，





于洪武四年铸将军柱两支，又于洪武五年岁在壬子铸造一支，再于洪武九年岁在丙辰铸造一支。”永靖王氏家族用6年时间，为兰州黄河浮桥铸造过4支将军柱。王氏后裔中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祖先当年铸造将军柱的故事：铸造将军柱时，场地设在兰州黄河北，那里架设了48座铁炉，用来熔化生铁，第一次浇铸过程中发生事故，死了好几个人，铸造工程被迫停工，后来王氏经过分析总结之后，再次进行了测算，才又开始铸造，成功完成了将军柱的铸造。

1909年黄河铁桥建成后，铁柱被埋于河滩下。1953年在扩建黄河北岸道路时，挖出了埋于地下的两根铁柱。一根上可见“兰州卫指挥王镇临洮府通判□□”及“卫镇抚袁昶百户郡县□□……”等字的款识。可惜在1958年“大炼钢铁”中被毁。1958年，从河滩积沙中又挖出一根大铁柱，这根幸存的铁柱正是邓愈监铸的那一根。铁柱重约10吨，长5.8米，底部直径0.61米，座长1.2米，宽0.18米。铁柱上面铸有铭文：“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八月吉日总兵官卫国公建新柱于浮桥之南系铁缆一百二十丈”。将军柱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8月，省文物局认为其原是黄河铁桥构件，为便于分类，合并入兰州黄河铁桥，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评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将军柱成为历史的见证。这根历经六百年风雨、锈迹斑斑、写满沧桑的将军柱，像擎天柱一样屹立于中山桥南端东侧的河岸上，无声地讲述着“边徼之要津，千古之伟观”的往事。游客到此都要驻足观望，欣赏解读，通过它去触摸兰州的历史。

默奠金汤

——兰州府城隍庙

兰州府城隍庙，整个院落为长方形，占地十亩。院内殿堂巍峨，雕梁画栋，飞檐翘楚，红墙碧瓦，古树参天。今天走进城隍庙，呈现在我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府城隍庙内场景

们面前的是一个书画古董市场，古书字画，陶罐瓷器，珠宝玉石，令人目不暇接，是张掖路上的一道绮丽的风景。

我国古代每座城市都有城隍庙，庙内祭祀神祇被人们称为城隍爷。“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城壕以及护城河。他们认为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城隍，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神之一，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起着宣传教化、保护百姓的作用。城隍原属自然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它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由最原始的护城保民，到后来的祛灾除患，护佑善者、惩治恶者，再到督官慑民等职能，城隍已成了能保障人们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全能神祇了。道教至迟在唐代即奉祀城隍，它因袭民俗，视城隍为保护地方、主管当地水旱疾疫及阴司冥籍的神灵。

人们对城隍的祭祀非常隆重，常常和孔子、关公、佛祖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典”。城隍是最能体现汉民族祖先崇拜的一种文化符号。对于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周朝，当时每年除夕都要祭祀八种神，其中就有水（隍）和庸（城）。最早有记载的城隍是芜湖城隍，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祭祀城隍神的例规形成于南北朝时。随着城市经济日益发展，城隍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唐宋时城隍神信仰滋盛。宋代列为国家祀典。元代封之为佑圣王。明代以后，对城隍的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根据城市的大小不同，城隍庙有都城隍、县城隍和府城隍之别。一



一般而言，城隍庙大殿正中为城隍爷，两旁分别为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神祇。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对城隍爷极为推崇爱戴。他下旨京城和几个大城市的城隍爷的神职为王，职位为正一品。各府、州、县城隍爷的神职分别为公、侯、伯，从而与当地的官署衙门同等级别，使城隍庙兴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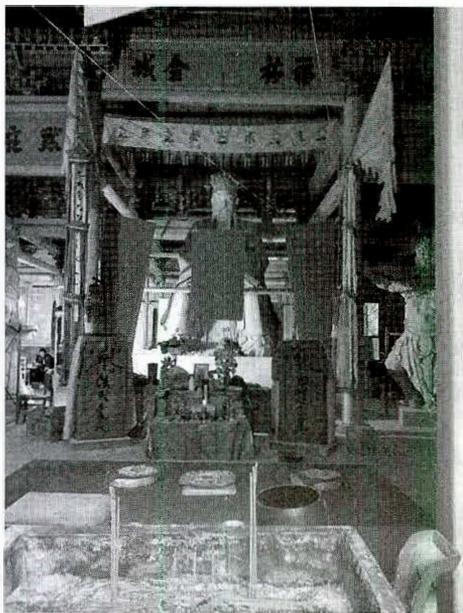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城隍不仅安坐宫殿护佑城市及子民，有时还会“亲自”登城阻敌。当年，西王萧朝贵率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军情紧急，巡抚张亮基督军上城的同时，还遣人到城隍庙将长沙的城隍爷抬上全城最高点天心阁上，并向全城通告：太平军是妖孽，现在城隍菩萨已经上城，和我们一块守城。有了城隍爷的亲临，清兵士气大振，拼死抵抗，打退了太平军。这恐怕是历史上城隍爷“护城”的最典型的事迹了。

城隍在明清以后，成为一个神的官职，而不是一尊神明。各地的城隍由不同的人出任，甚至是由当地的老百姓自行选出。因为城隍爷是人们心目中的阴间长官，所以很多地方的城隍爷常以殉国而死的忠烈士，或是符合儒家标准正直聪明的历史人物充任。希望他们的英灵能和生前一样护佑百姓，除暴安良。例如北京的城隍爷文天祥、杨椒山，杭州城隍爷周新，南宁、桂林的城隍爷苏缄，绍兴的城隍爷庞元，均是忠臣良将，对百姓宽厚仁慈。

兰州城隍是有名的历史人物——西汉大将军纪信。纪信（？—前204年），字成，四川巴郡阆中县扶龙村人。先从刘邦起兵，为部曲长。公元前204年四月，项羽派兵围攻荥阳城，月余，城内粮缺，朝不保夕，将士也精疲力竭，刘邦十分着急。五月，将军纪信见情况十分危

急，便对汉王说：“事急矣，臣请诳楚，王可以间出。”刘邦便乘机在张良、陈平、樊哙、夏侯婴等数十骑的保护下从西门逃往成皋。项羽本以为可以擒获刘邦，不想竟然上当，于是大怒，下令将纪信活活烧死。纪信死后，埋葬在荥阳城西孝义堡。刘邦得天下称帝后，念其救主功不可没，厚赏、敕封为忠烈侯，并赐黄袍，择上林苑自己打猎休息之地，修建大型庙堂，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又有民间传说，刘邦追封其为兰州城隍，享受一方烟火。由此，纪信是西安和兰州两大城市的守护神。

史料记载，兰州及附近的阿干镇、永泰堡、镇虏堡、安宁堡、西固城、红水堡、盐场堡、宽沟堡、一条城（青城）等许多地方都建有城隍庙。兰州府城隍庙是这些城隍庙中比较早的一座。兰州的城隍庙是北宋时修建的，具体年代有待考证。从宋代至今，多次对兰州府城隍庙进行整修。据《兰县重修城隍庙记》载：金明昌七年（1196年）、元至大元年（1308年）进行修复。明洪武十八年（1385



府城隍纪信塑像

年)，因年月久远，祠宇将圯，当时的兰州卫指挥杨廉，认为祭祀城隍是国家祭祀的常典，经过他的倡议与发起，庙宇修葺一新。经过56年，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守备都指挥李秉忠又进行了维修，并树碑以记之。其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也维修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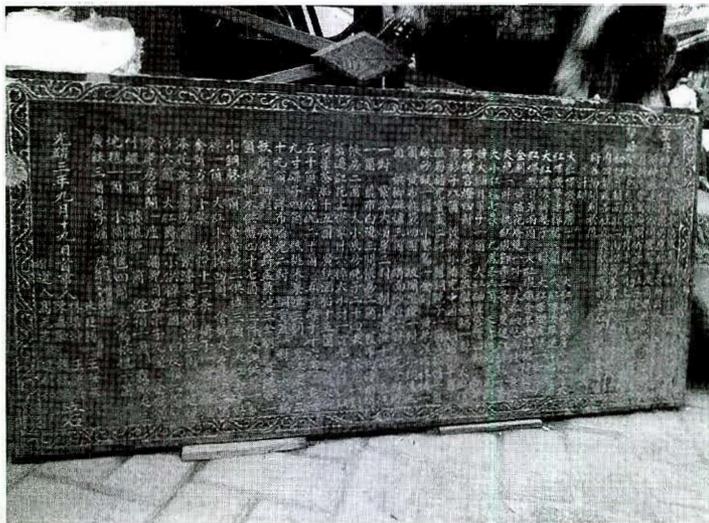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城隍庙失火，殿廊大部分被焚。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重新修葺，建起3座大殿，由5个院落组成，占地12亩。第三个院落除长廊绘有纪信捐躯救主的壁画外，东西设有兰州府六县城隍木主，遂更名“府城隍庙”。第二进原有献殿、戏楼和钟鼓楼。乾隆三十年（1765年），兰州城隍庙发生大火，主体建筑大部分被毁。两年后，人们对城隍庙进行了重修。城隍庙建筑是砖木结构，为“井”字形规划，重檐屋顶，斗拱出檐，上覆琉璃碧瓦，下置红漆巨柱，精美绝伦，整个建筑风格统一，高低错落有致，真可谓“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现在看到的城隍庙绝大部分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修建的。庙坐北朝南，最南为“忠烈侯”牌坊两楹，东西各建八角亭、树旗杆，两侧各为道院。坊北为戏楼，二层七楹，两旁有大门，悬有周汉所撰书匾联：匾额“你来了么？”联曰：“好大胆敢来见我；快回头莫去害人。”以这尊掌管城邑阴阳两间赏善罚恶的神祇向世人当头棒喝，要行善勿作恶。另有两联：“尔欺尔我岂欺尔；人负人天岂负人”“举念时明明白白勿忘了自己；到头处是是非非曾放过谁人”皆是劝诫莫做恶事。这在往昔充斥因果报应观念的社会中，确实对民众有一种扬善惩恶的教化作用。进大门为享殿五楹，两面有花圃、古槐、大陨石，东西两侧为钟鼓楼、山神



庙、土地庙、看楼。享殿北为正殿，殿前各建一座四明亭。两侧有陪殿、长廊。陪殿供奉兰州府六属（狄道州、河州、皋兰县、金县、渭源县、靖远县）城隍木主。东廊绘纪信荥阳逛楚捐躯救汉王壁画，以启迪民众做忠臣孝子；西廊画地狱锉、烧、舂、磨之惨状，以示神道设教之至意。正殿供奉城隍像，“冠皮弁，服赭袍”，俨然为帝王冠服，并悬有清乾隆时陕西韩城状元王杰撰书木匾，曰“默奠金汤”，以颂扬城隍在冥冥之中安定金城的功绩。正殿北为寝宫，正中为城隍夫妇坐像；像后为炕，帷帐华丽，被衾具备；像左右各立二侍女，奉盆、巾、镜、梳。宫院内种植花木，东为庆福亭，西为八卦亭。宫左右两侧为眼光、广嗣、痘疹、圣母殿。宫北为客堂。

俗话说“隍庙对着戏楼”，城隍庙酬神唱戏是应有之义。戏楼始建于乾隆三年（1738年），由省城官绅捐资重修，经两年建成。大门三



光绪重修城隍庙碑

间，为忠烈侯坊，戏楼位于四进院落的二门顶上，坐南向北，面对享殿，戏楼联：“演古今事迹忠自忠奸自奸做出来真是庐山面目；指天下迷途赏者赏罚者罚猛省处恍临屋漏神明。”戏楼高15米，四柱亭式木结构，重檐歇山，琉璃盖瓦。戏台高5米，台口宽9米，深9米，台沿四周嵌有矮木雕柱栏。上下场连接后台走廊，上场门楣刻“出将”二字，下场门楣刻“入相”二字。戏楼与东西两侧楼廊贯通，上廊设茶座，站在上下走廊中可以看戏。整个戏台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是最早戏曲演出的主要场所。民国时期，常有秦剧、蒲剧、京剧、豫剧和话剧等许多团体在此祭神演出或进行募捐义演活动。

虽然隍庙里神祇等级地位森然，地狱图惨不忍睹，但民众在烧香祈福、还愿卜卦之余，更多的是娱乐、购物、品小吃、看热闹。戏台上唱秦腔为城隍过生日，善社用生动的故事讲善事，要把戏的、说书的、卖当的，人圈圈围定的地方，总有人头攒动的百姓。随处摆有卖针头线脑的小百货摊，凉面、酿皮子等小吃摊，在香雾缭绕之中，生意颇为红火。陈赓雅在《西北视察记》中写道：“惟旧历五月，所谓城隍圣诞，各善社争相念经献戏，长达十余日之久。大殿千百烛光，不断熊熊燃烧，且民国已二十三年，犹高诵前清《康熙圣谕》，又未免迷信太甚。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都市如此大捧城隍，乡村更怕小鬼无疑！”足见当时酬神唱戏时规模之大与虔诚程度之深。

现在我们看到的城隍庙整体为一座四进庭院式建筑，按中轴线依次为牌坊、享殿、正殿、寝宫、客堂，牌楼由节园颜妃墓前的贞烈遗阼牌坊改建而成（属明代建筑），院内石狮一对，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



已有 900 多年历史的城隍庙，已不是往日人们烧香祈福、还愿卜卦之所。民国初年，利用城隍庙的一些殿廊，创办国货陈列馆，分艺术、毛织、农产、矿产等部，陈列甘肃名特产，以裁绒品及药材最有特色。民国八年（1919 年）林竞考察甘肃时在《蒙新甘宁考察记》中写道：“一月二十九日，阴，微雪，华氏二十九，午后散步过城隍庙，见庙内陈列顽石数块，色斑斓而质刚坚如玉，询系取诸黄河底者。”看来黄河石在那时已是城隍庙陈列与买卖的艺术品了。

1956 年，拆除神像，移肃王府烈妃祠“贞烈遗阡”牌坊为城隍庙门牌楼，改建城隍庙为兰州市第一工人俱乐部，也常有专业和业余剧团在此演出。“文革”时工会被撤销，城隍庙遂被一些文化单位瓜分，后虽然退回工会，但人员杂居给管理方带来了很大的难度。1984 年 11 月，由于电线老化产生火花，城隍庙发生重大火灾，钟楼以南建筑包括戏楼在内全部毁于大火，以北部分因消防人员抢救及时幸免于难。1993 年，被辟为甘肃省最大的古旧文物交易市场。1998 年，兰州市总工会多方集资 800 多万元，重建修葺城隍庙特别是钟楼以南的建筑，并以崭新的面貌向社会开放。

1985 年，城隍庙被省、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3 月，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对大殿进行修复，重塑城隍神像，城隍面南背北，门额曰“福祐金城”，香火缭绕，颇有旧时气象。

从最初的祭祀神庙到农业矿业产品交易市场，到现在的文化古玩市场，兰州城隍庙走过了一条漫漫长路。现在城隍庙交易市场拥有经营古玩的商户 100 多家。这个高楼包围下的大院，一天之内难得享受到阳光

的照射，显得尤为安静有序，各种陶器、铁器、玉器、铜炉、铜鼎、刀剑矛戈，以及从战国到民国的钱币，微雕葫芦、洮砚、字画、文房四宝、连环图、黄河奇石、邮票、根雕、紫砂壶等应有尽有，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古色古香的建筑、画卷、文人墨宝、黄灿灿的微雕葫芦，还有来这里“淘宝”的人们，逛隍庙是兰州一些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习惯，已无法割舍。

为了更好地保护城隍庙这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部门于2015年春节后清退了各类摊点，并于2015年8月待剩余商户合同期满后全部予以清退，以恢复原貌。

今天，我们走进位于张掖路的兰州府城隍庙，也能感受出一个城市的变迁和发展。



三绝杰作

——庄严寺

庄严寺本位于兰州市城关区旧城中心鼓楼西侧，相传为隋代金城校尉薛举宅，薛举称王后即为王宫。薛举，隋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其父薛汪，徙居兰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容貌魁梧，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大业十三年（617年），与其子仁果起兵，自称西秦霸王，年号秦兴。据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兵势甚锐，曾迫使李渊计议迁都以避其锋。可惜薛举猝亡，其子暴烈无谋，为李唐所灭，在历史上像流星一样划过。

唐代统治阶级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就曾利用佛教作为工具，待镇压了农民起义，统一全国后，令在“交兵之处”建立寺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这座西秦霸王的宅院于贞观年间被改作寺庙，取名庄严

寺。据存于该寺后殿内西侧墙壁前部的清道光三年（1823年）寺僧元智等《补修五佛殿记》碑记载，此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为“奉帑敕建”，就是唐王朝敕拨国库银两所建的。其时上距薛仁果降唐九年，时间大体相当。普照寺，嘉福寺也是同期修建的。元至元年间（1335—1340年）重修，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兰州都指挥刘瑛再修，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巡抚刘斗复修，三次重建才使庄严寺这座古寺得以保存至今。

全盛时的庄严寺规模宏大，殿堂众多。寺院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在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殿、五佛殿和后花园，东西两侧为钟楼、鼓楼、陪殿、跨院与僧舍。天王殿供奉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大雄殿供奉盘腿而坐的佛祖释迦牟尼及阿难、迦叶两位弟子，背面供奉观音菩萨；五佛殿供奉五方佛，即中央毗卢遮那佛（又称大日如来）、东方阿从佛（又称不动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

庄严寺以“书、画、塑”三绝著称，故又称“三绝寺”。书绝是寺内悬挂的“敕大庄严禅院”匾，匾额高约115厘米，宽约110厘米，竖排2行，每行3字，仅此6字，没有书者及年月等落款，镂刻在木牌上，四边雕纹饰。字体匀整，颇似鲁公间架结构，严密饱满，笔画厚重有力，端庄浑厚，笔锋遒劲，深得颜体精髓，远看尤为醒目庄重，据考为元代李浦光所书。李浦光，字玄晖，号雪庵，山西大同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元代大书法家，元朝皇宫匾额多为其所书。大名鼎鼎的李浦光能为庄严寺题写寺额，足见庄严寺在当时的规模与影响之大。



画绝是庄严寺内的观音壁画，相传为吴道子所绘。观音端庄慈祥，身披白衣，手中柳枝翠绿异常，据说是历久弥新。中殿墙面所绘十八罗汉、菩萨及佛教故事壁画，也为上乘之作，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据推断当为元代高手所绘。

塑绝说的是大殿内的佛像。大雄殿内法、报、应三世佛结跏趺坐于仰莲束腰宝座，头盘螺髻，顶饰珠宝，前额宽阔，两颊丰满，眼睛微闭，沉思状，比例匀称，神态生动传神。左右迦叶、阿难二弟子，一为大苦大难的苦行僧，胸部筋脉显现，逼真动人，显得老成稳健；一为面容俊美的少年僧侣，双手合十，神情自然，形象地诠释了迦叶、阿难佛家文化意蕴。三世佛旁边侍立的菩萨，头戴花冠，肩披缨珞，秀发披肩，袒露胸腹，飘带飞动，衣裙褶皱明晰，不管褶压多少层，均处理得颇有条理。这些佛像塑造得栩栩如生，尽显佛妙圣庄严之华相。

庄严寺大殿里面还珍藏着诸如蒲鼓、周鼎、周卣、周彝、汉方壶、宋瓷枕等许多珍贵文物，为其他佛寺所鲜见。

寺院内古木参天，各种花木争奇斗艳让人眼花缭乱。各殿均有陪殿，前后陪殿间有钟鼓楼，寺界广阔，屋宇呈对称布局，溥惠渠水引入寺院，故榆槐环殿，竹柏荫亭，花木掩映其间，曲径通幽，环境静谧。

庄严寺以其三绝著称于世，引得南来北往的游客慕名瞻拜游览，留下了诸多名人的足迹与墨宝。据推测，唐初，唐玄奘前往西天取经时，就曾经在庄严寺居住过，然后从今天黄河铁桥的地方过河西行。彭泽少年时曾在寺中励志苦读，后来高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成为一代名臣，并为庄严寺题“庄严正觉”匾额，其上款为“正德十三年岁次庚辰



庄严寺旧影

清和月吉旦”，下款“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彭泽题并书”。明朝因弹劾严嵩父子而名扬天下的兰州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邹应龙为寺院题“彼岸同登”匾额。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青少年时期也曾到庄严寺游览并题咏。1878年夏，13岁的谭嗣同跟随赴巩秦阶道任职的父亲来到甘肃。光绪十年（1884年）其父谭继洵任甘肃布政使，谭嗣同也多次来兰。他曾写过一首《兰州庄严寺》，在诗中是这样描述庄严寺的：“访僧入孤寺，一径苍苔深。寒磬秋花落，承尘破纸吟。潭光澄夕照，松翠下夜阴。不尽古时意，萧萧鸦满林。”

清宣统二年（1911年），同盟会员、《甘宁青史略》的作者慕寿祺与邓宗依托寺院僧舍，开办了阅报社，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1926年2月，薛笃弼任甘肃省长时，教育厅对庄严寺修葺整饬，筹办了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在馆内除了设有文物展览、图书阅览室、民众学校外，还开设一个可容纳200余人的露天电影放映场。这便是甘肃最早的官办电影放映场，以后这里也成了向市民进行抗日及科普宣传的地方。

1932年，甘肃创办了第一家私营影院——新民电影院，由甘肃知名实业家王佐卿与友人合股兴办。当时，一张票价值大洋0.6元，这相当于平民百姓好几天的饭钱，但是为了图个新鲜，人们依然趋之若鹜，盛况空前。为了确保安全，不得不请警察维持秩序。尽管新民电影院开业很红火，但由于受片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没有维持多久，不得不在1933年9月迁往他处，后于1935年10月关闭。当时的政府规定，男女不能同场看电影，白天设为男场，夜晚设为女场，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奇闻，其封闭与保守、开放和进步共存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新民影院迁出后，启文影院迁入，但因老板急于敛财竟然公开放映春宫电影，佛门净地居然有如此齷齪行径，在市民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获知后大怒，遂下令查封。另外，在庄严寺大殿前有戏楼，1948年以前常有戏班在此演出，为大众娱乐的场所之一。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驻庄严寺的单位不停变换，人们对寺院缺乏严格的管理，壁画塑像逐渐遭受损毁。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市文化馆占用，市秦剧团亦住此。寺院建筑渐被挪作他用，就连号称“三绝”的大殿也同样被挤占，堆放着道具、灯具、杂物，简直不可涉足，长期存在着保护不妥的问题。

虽然 1963 年庄严寺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三绝”仍难免被破坏的厄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在“文化大革命”横扫阶段，即被当作“四旧”和“牛鬼蛇神”受到批判。随着运动的升温，1967 年七八月间庄严寺遭到造反派的洗劫，一举捣毁了大殿内的所有文物。最惨的是塑像，被打得粉碎，匾额被拆除，全部扔进了垃圾堆，致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损失殆尽，享有盛誉的“三绝”今天在庄严寺内一件也看不到了。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固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也有长期以来对大殿保护的不重视，缺乏基本的文物保护常识，还与想将大殿挪作他用的短期行为有关。

当年的唐代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几经兴衰，仅有过殿、大殿和后殿等明清建筑保存至今，可以说它是兰州诸佛寺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座佛教寺院。1981 年重新审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5 年 11 月，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专家们对庄严寺的三座大殿进行了实地测绘、落样、拍照及录像等工作，拿出了具体的拆迁实施方案。这是最难的一次拆迁，大锤头、大铁锨根本用不上，一块砖一片瓦都是轻拆轻取，轻拿轻放，拆除木构件时先打上号，认真包装后再运输。对原构件上的油漆彩画，残留的颜色线条尽量保存，以恢复原来的油漆彩画效果。直到 1996 年 12 月底，庄严寺三座大殿才拆迁完毕。

庄严寺在测绘过程中发现的壁画，据敦煌研究院推断很有可能是在兰州地区并不多见的明代寺庙壁画，他们采用“分块剥取，回贴复原”方案对壁画进行异地保护。回贴复原前，专家们根据拼接记号和壁画上所有尚可看到的切割部位的画面内容，逐块拼接，直至达到所谓的“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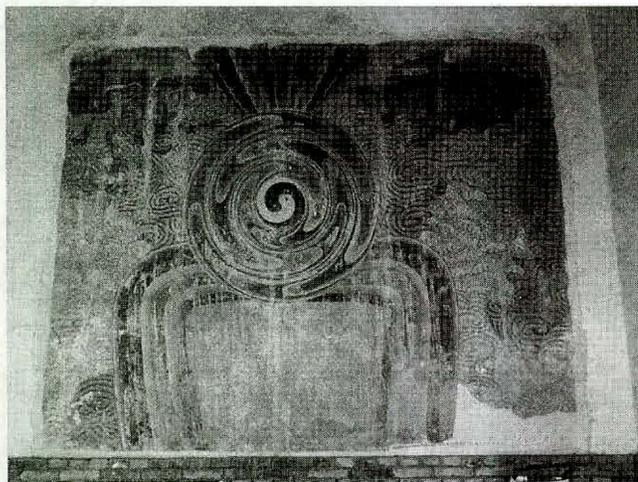
丝合缝”，使画面上的每个切割部位都能准确地并且是非常舒服地完全吻合。紧接着，采用先进技术，对起甲壁画、酥碱壁画进行了修复；对已脱落壁画，切割缝进行填补，并补色作旧处理。如今看到的庄严寺壁画，由于完善了复原后的整体效果，使新填补泥层同原壁画在基本色调上协调一致。壁画内容丰富，画工精美，是典型的时代建筑与绘画风格。2003年，历经多年的施工，庄严寺异地迁建才告完成。

如今，在五泉山二郎岗我们可以看到庄严寺，游人从大门进去，拾阶而上，依次是前、中、后殿，整个建筑居高临下，颇具气势，可以眺望市区风光。由于是迁建，从墙壁上看它是一座新修的建筑，而从柱子房梁门窗上看，则显得古香古色。

在兰州的众多寺院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庄严寺了，它以“三绝”而著称。多少名寺古刹被淹没在历史的风雨中，尤其是现代城市建设与扩张的需要，使得很多文物古迹被当作绊脚石而遭无情拆除，成为写在书本上、留在传说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庄



迁在五泉山的庄严寺



迁建在五泉山的
庄严寺壁画

严寺算是比较幸运的，在繁华路段没有立足之地时，被迫迁建五泉山公园内的二郎岗，得以延续它的历史，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古刹晨钟

——唐代名寺普照寺

受西方佛教东传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已有相当规模的佛寺。高僧法显也是经过兰州过黄河西行求法的。隋唐时期，兰州成为丝绸之路重镇之一，中西文化的交流更趋频繁。这一时期，兰州城区出现了大量佛寺，最著名的有三大寺院，其中之一就是普照寺，民众俗称“大佛寺”，被认为是“兰垣首屈一指的佛教寺院”。

普照寺又名大佛寺，故址在今兰园。据史书记载，为唐初敕建，历经宋、元、明、清数代重修、扩建，其规模已是兰州佛寺之首。普照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大雄殿、法轮殿、藏经楼、观音堂、灶君殿、钟鼓楼等。山门悬元人所书匾额“敕赐大普照寺”。各殿均有塑像，其中大雄殿三尊佛像，塑工极佳。明间后壁所绘

大悲观音佛像，计有 11 个头，42 只手臂，每只手各持法器一件，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大雄殿后为法轮殿，是一座具藏传佛教特征的佛殿，该殿建于元代。

普照寺法轮殿内有一嘛呢法轮，木质，高约 10 米，八面六层，每面每层各塑佛像一尊，计 48 尊，巨大法轮固定于大梁与地面间，即推即转。轮底有“明成化四年（1468 年）重造”题记。轮前有明肃宪王朱绅尧题写“法轮恒转”“雨花金界”八字轮额。轮旁有柱，柱上攀龙四条。法轮殿后为七楹藏经阁，阁内正中供奉文殊、观音、普贤三菩萨塑像，两侧分立药师、释迦牟尼、弥陀、韦驮等木雕佛像及铜接引佛，后壁绘千佛。阁内东、西壁各镶木橱 4 个，橱内存经书 6358 卷。木橱外面绘制菩萨立像 8 尊，高达丈余。其主体建筑多被绿色琉璃瓦覆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甚是宏伟。



普照寺大雄殿内的千手千眼菩萨

观音堂门口东侧的钟楼内悬铁钟，为金代泰和二年（1202 年）侍鉴郭镐监铸。钟高 9 尺，口径 6 尺，据钟铭记载重一万斤，张维称之为“兰州金石之存者，此其最为古也”。普照寺与众佛寺一样用晨钟暮鼓报时。晨先击钟，以鼓应之，晚先击鼓，以钟应之；破晓、黄昏时，各连



击三通，每通紧缓各 18 椎，三通计 108 声，可消除人间“一百零八种烦恼”。泰和铁钟雄浑深沉，青铜钟声清越悠扬，成为兰州八景之一的“古刹晨钟”景观。每逢会期，普照寺内钟磬相鸣，善男信女、游人香客纷至沓来，可谓人声鼎沸、人潮如织。庙会结束后，好多大人带着小孩在普照寺门口的小摊上总要买些糖葫芦、发卡之类的小东西，其乐融融，体现了社会的繁荣和谐，百姓的安居乐业。

民国十三年（1924 年），有人提议在佛寺里设市场，因当地绅士以保护古迹为由，反对未行，直到 1928 年改建前后，各种争端还相当激烈。兰州诗人杨巨川有感赋诗，态度中庸，其诗曰：“可怪檀越太偏心，纷纷毁誉徒晓舌……媚之恶之均多事，低眉怒目两无妨；瓔珞珠华选佛地，七宝灿烂本市场。”

民国十七年（1928 年），主政甘肃的刘郁芬欲将普照寺辟为中山市场，逼蓝方丈迁出，遭严词拒绝。蓝方丈，兰州七里河阿干铁冶人，自幼在榆中兴国寺出家，法号众诚，后转入兰州普照寺，为禅宗曹洞宗的传灯弟子，成为普照寺方丈后改法号为悟明上人，世称蓝和尚。刘郁芬见逼迁遭拒，便以委派蓝方丈为县长做交易，蓝坚辞不就，据理力争，终将大雄宝殿、药王殿、观音堂、藏经楼保全。蓝方丈还将辟作市场的殿宇壁画布遮泥抹加以保护。当时，除寺内主要殿宇外，其他都被改为铺面，经营百货、古玩、瓷器、杂货、铁器、小吃、茶园等。刘郁芬命令部下将普照寺大雄殿东西用长廊连接起来，将普照寺北出入口与大街相连，并将辕门广场上的摊贩们迁进普照寺。

在随后的十年间，这里成为兰州市区最繁华热闹的市场。市场里浮

摊多店铺少，贩卖的东西以日用百货较为齐全，而妇女们所需的尤其全备。兰州城里的摩登妇女，中山市场是必须到的，而外来游客也慕名前往。1936年，到西北视察教育的庄泽宣在日记中写道：“中山市场繁盛有如北平东安市场。”顾颉刚在兰州时，也曾到这里买皮衣并到“福华轩”吃高三酱肉，游大佛寺院。

民国二十年（1931年），蓝方丈在普照寺讲《北极玄机历法》，省内外名流听众颇多，其中有自四川来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吴对蓝方丈讲经评价颇高。

抗日战争期间，湖北著名高僧心道来兰州弘扬佛法，悟明方丈召请各界善众聆听心道法师所做的《佛教与抗战》的演讲。蓝方丈亦从佛法的角度上宣扬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反内战、反饥饿、众生平等、团结抗日的道理，听者日众，影响深广。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兰州秘密活动期间，常遭国民政府当局搜缉，像陈成义、张一悟等领导人都曾到普照寺请蓝方丈掩护，他总是设法藏匿。他说：“共产党舍己为人的精神与佛家法理相合，就是与其独自生，不若为众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23日12时22分，日机20架，从东北方侵入，中国空军当即迎击。日机轰炸唐代名刹普照寺（今兰园）、黄家园、东大街（今张掖路中央广场以东段）、学院街（今武都路、酒泉路至静宁路段）、贡元巷、黄河沿（儿童公园以南）、南关（今庆阳路安定门至南关十字段）、东城壕一带。投弹八九十枚，普照寺被多枚炸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蓝方丈让别人快走，自己则抱着“人在经存，



经亡人亡”的信念，高诵佛号走上藏经楼，以身殉经。在这次空袭中，藏经楼被炸毁，蓝方丈也倒在火光与血泊之中。11月27日，日机再次空袭，将普照寺夷为平地。

劫后，山门、观音堂幸存，继由蓝方丈的师弟王月庵（法号众恒）住持普照寺，收拣藏经残卷，抗战后在水家煦园修葺后送观音堂保存。观音堂门口东侧的普照寺钟楼被炸毁，泰和铁钟幸存于残垣瓦砾之中。原普照寺铜炉，宣德八年（1433年）造，高一尺，周一尺五寸，上铸宣德年号，共六字；普照寺铜铃，正统三年（1438年）造，铃共一串悬挂梁间，旧数十三，今存十一，高俱八寸，口宽各五寸，上铸正统年号，暨梵书二字；普照寺铜镡，弘治十年（1515年）敕造，高三尺余，直径尺余，有文曰：“大明弘治十年岁次丁巳五月上旬敕赐大普照寺住持僧修瀛等发心铸造，重六十五斤。”上述三件文物下落不明。

1942年，国民政府又修建了一个钟亭，将铁钟仍旧悬挂其中。时常有调皮的男孩子在钟亭附近玩耍，远远地向钟亭内的铁钟扔石子，每每这时，被击中的铁钟就会发出嗡嗡的巨响，经久不息，称之为“砸钟”。现悬挂五泉山公园猛醒亭中，供游人、善信观赏、敬拜。

民国三十年（1941年），兰州正式设市，首任市长蔡孟坚为增强抗战



保存于五泉山猛醒亭的泰和铁钟



实力，大规模进行市政建设，并下令将遗留在废墟中的木制大小佛像，不管已毁未毁，于深夜投入附近黄河。市政府发动市民拾砖、挑土、平地，在普照寺废墟上开辟了广场，建成兰园，作为兰州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内设篮球场、网球场，四周改建公共设施，如公共浴池、灭虱站、弹子房。普照寺山门遗址处改为大厅，做图书阅览室，山门左右各留一门。在兰园中央，建造了一座砖木结构、能容纳 500 人的大礼堂，命名为“抗建堂”，寓意为抗战建国之意。门口右院镶一铜牌，以示纪念。在观音堂西侧，抗建堂之东，南北走向盖一排招待所，命名为“思危斋”，张大千等人曾住过。还用就近的房屋改设了一所模范小学。

当时，兰园经常举办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各界群众、少年儿童聚会以及京剧票友的“快乐生力社”和其他文化体育活动。每逢周末、假日，这里都举办篮球比赛，看台上下，人山人海，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当时，除了大型田径运动会在红山根体育场进行外，兰园体育场成了平时体育专业人员和爱好者聚集的中心，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中发挥了十分有效的作用，成为兰州近代的体育中心。抗战结束后，兰园变成一个具有书卷格调的文娱活动场所。

1950 年，新中国成立后兰州第一个国营电影院——解放电影院在兰园建成。后来，甘肃省电影公司成立后，解放电影院迁入道升巷。1953 年，兰园球场增设灯光设备，成为兰州第一个全天候球场。

20 世纪 50 年代，兰园有拉洋片（又称看西湖景）、说书、茶馆、小人书摊、耍魔术、杂技、耍武术、气功、耍猴、打气枪的。小学生放寒暑假后，这里成为弹蛋儿（玻璃球）、玩洋画片、打猴儿、滚铁环、

碰斗鸡的集聚地，还有大型杂技表演——飞车走壁和小小的扁担戏，以及溜冰、挂车子等游戏。每当兰园放映电影的消息传出，附近的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兰园，学生娃娃们通常是约上三五个同学早早地带零食，搬上椅子、小板凳去占地方，美滋滋地看一个晚上的电影。放映时观众黑压压一片，十分热闹。放映的影片有《翠岗红旗》《陕北牧歌》《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等。

1963年10月，兰州市少年宫创立，是由近万名中小學生义务劳动一年，在兰园的旧址上兴建的。是当时兰州市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省市一些重大的篮球、排球、体操、象棋比赛常安排在兰园进行。“文革”时期中断，1982年恢复重建。多年来，少年宫着力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成为孩子的艺术殿堂和学习乐园。

普照寺在日寇的轰炸下轰然倒塌，泰和铁钟成为它的唯一遗存，诉说着古寺曾经的辉煌，还有中华民族那段遭受外侵的屈辱历史；而抗建堂、兰园、少年宫则在它的废墟上一脉相承地弘扬民族精神，发展体育文化，为已化为历史烟云的千年古寺续写着奋斗新篇。



1979年，兰州卷烟厂生产的泰和钟烟标

尊孔崇儒

— 兰州府文庙

孔子（前 551—前 479 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其政治主张时，生不逢时，到处碰壁，厄于蔡，困于陈，郁郁不得志。去世后被冠以种种尊号，由“公”而“王”，直至“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身后享有的地位和荣耀可谓无以复加。文庙即孔庙，是纪念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祭祀他的孔庙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远及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鲁哀公在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前 478 年），将他的“故所居堂”立为庙，“岁时奉祀”。这最早的孔庙，规模不过是“庙屋三间”，内藏孔子生前所用的“衣、冠、琴、书、车”之类。汉高祖刘邦“过鲁”时，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创了历代皇帝祭孔的先河。汉武帝刘彻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汉平帝元始元年（前 38 年）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此后历代王朝都尊称孔子为圣人。唐开元二十七年（729 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因而孔庙也称文宣王庙或宣王庙。此后，很多地方都将孔庙用作教育场所，学庙合一，因此也有称孔庙为“庙学”或“学庙”的，也有称为学宫的。元明以后孔庙通称为文庙。清代，外放的官员上任的第二天，就要到当地的州县学庙行香拜奠，每逢朔望也要到学庙去叩拜一番，以示尊崇文教。到了民国年间，很多地方还盛行祭孔。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期提倡和推崇下，孔庙的规模日益扩大，祭祀的规

先師孔子行教像

遠傳天地 道冠古今
剛達六經 聖筆萬世



孔子

格和仪式日渐提高和完善，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支柱。连非汉人立朝的统治者，也认同尊崇儒学，敬奉孔子，祭孔活动的规模、修建孔庙的工程，都要超过前代汉民族建立的政权。南北朝时的东魏是个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孝静帝不仅修葺了旧庙，还“雕塑圣容，旁立十子”。这样，孔庙的供奉就再也不是一个木制的神位，而是面目清晰的孔子塑像，十子的陪侍更突显孔子的中心地位。此后的金、元、清各朝，都多次修整孔庙，清雍正皇帝胤禛除了到文庙祭祀之外，还亲自督促孔庙的修葺工程。

对孔子的祭祀，除有家人和学生举行的家祭之外，还有皇帝规定的春秋两次大祭。大祭时的仪式非常隆重，都有歌舞伴随始终，歌以颂扬孔子功德为内容，为四言八句，配之以乐。每当大祭活动进行，信炮一响，庙门重重打开，礼赞高唱，乐舞齐起，香烟缭绕，烛光荧荧，行礼如仪，整个祭祀过程呈现出肃穆而虔诚的气氛。兰州府、县文庙按规制每年春秋两季定时举行祭孔典礼，以弘扬儒学，劝勉后世学子不忘先师教诲，勤奋向上。《改建兰州府文庙记》碑载，宣统三年（1911年）兰州翰林刘尔忻受陕甘总督升允、兰州道孙庭寿之托，耗费白银二万三千一百五十两，对兰州府文庙进行维修，增购豆、爵、笏等祭孔礼器，以利文庙教学和遵循礼制按时祭孔。每年都要在孔子的生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这天，举行盛大的集会活动。这一天对于旧时读书人犹如过节一般热闹。兰州府文庙举行的最后一次祭孔活动是在1948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主祭是由当时的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担任。

每朝每代的京师和地方各个州县都建有孔庙，属于官庙。明代有人



统计，当时中国境内的孔庙多达 1560 座；清代疆域更广阔，统治者提倡尊孔更卖力，孔庙数量肯定会比明代多。20 世纪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很多孔庙被损毁破坏，可是完整保留下来的孔庙仍有 300 多座。

兰州府文庙曾是甘肃境内最大的一座文庙，系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 年）知州姚谅创建，初为州学，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 年）改为县学。洪武八年，由知县黄镇重修。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兵备副使彭灿、靳州俊相继修复文庙。康熙六年（1667 年），巡抚刘斗补修文庙。乾隆三年（1738 年），临洮府迁至兰州，称兰州府，兰州降为皋兰县，并为府治所。乾隆四年（1739 年），兰州文庙升为兰州府文庙。

兰州府文庙的范围，东至曹家巷，西至绸铺街（今酒泉路北段），南至原兰州内城南墙根的文庙巷（在今世纪春天商场北侧），北至学院街（今武都路东端）。府文庙原建筑规模恢宏，是甘肃最大的一座古建筑，占地面积 2 万多平方米。大成殿是文庙的核心建筑，建于明代，为纯木结构七楹双檐古建筑，现为省级保护文物，坐落在文庙北侧，殿前楹柱上有兰州翰林刘尔忻所撰楹联：“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者；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大成殿正中供奉至圣先师孔子手持笏板的坐像，四配为：东，复圣颜子，述圣子思；西，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另东有十二哲：闵子骞、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朱子熹。大成殿前为戟门、棂星门、泮池，泮池上有功名桥，桥南是宫墙，桥与泮池间有一木质牌坊，上书



兰州府文庙大成殿

“青霄直上”四字。大成殿前左右立有康熙御制的平定逆漠碑、平定青海碑、平定准噶尔碑、平定回部碑四通。大成殿前、泮池后的一座三间小牌坊悬挂着“文庙”二字匾额。另有尊经阁，崇圣祠，敬一亭，明伦堂，典诗，立礼二斋，乡贤祠，名宦祠，节孝祠，乐台，献台，学宫等建筑，现皆不存。兰州府文庙自创建初，一直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据《兰州府志》记载：“明伦堂左为教授署，右为训导署，学生廩四十名每岁一贡。增四十名，岁考取文武生各二十名。”

值得一提的是，明肃府本《淳化阁帖》也曾长期藏于兰州府文庙尊经阁内。

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统一思想，在建筑规格上是有着严格规定的。即除了皇帝敕准外，任何地方官员不得从事添修或装饰。因此，在文庙的建筑艺术上，一般只有规模宏大的殿宇，而绝无雕刻彩绘的艺术品，以表示师道尊严、儒学崇高的意思。



孔子逝世后，他的学生曾子绘了一张孔子像供奉，以表示对老师的哀思，这就是最早的孔子像。以后各地雕、塑、绘的孔子像就是根据曾子所绘的像作为原始样板的。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极力尊孔崇儒，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下诏祭祀孔子改用木柱（牌位）。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令天下所有文庙除曲阜孔庙外，一律撤去塑像，全用木柱。只是兰州府文庙大成殿内供奉手持笏板的孔子坐像为何能保存下来，尚无从考证。这是自元朝以后全国除曲阜文庙外仅有的一座孔子塑像，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

1939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沦陷区难民流落兰州，兰州市政府为安置流亡难民，欲占用文庙内数十间空房。加上兰州市内多家中学迁建别处，造成一些学生失学。为保护文庙，发展教育，当时开展文化、慈善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兰州八社”中的全陇希社联络其他七社理事牵头，在兰州文庙内创办了私立兰州志果中学。“志果”是为了纪念清末兰州名流刘尔炘（字果斋）。学校董事会聘请的首任校长，是原兰州一中校友，时任甘肃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尊孔社理事长、留美矿业学博士、甘肃省教育厅厅长赵元贞。赵元贞除集中精力办好学校外，对文庙内大成殿等古建筑倍加保护，特意将孔子塑像保存在大成殿后改建的一小屋里。不许学生入大成殿内踏石阶、进碑亭和下泮池。为了扩建学校教室、运动场、学生宿舍等用地，赵元贞填平了泮池，拆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照壁及“文武官员至此下马”满汉文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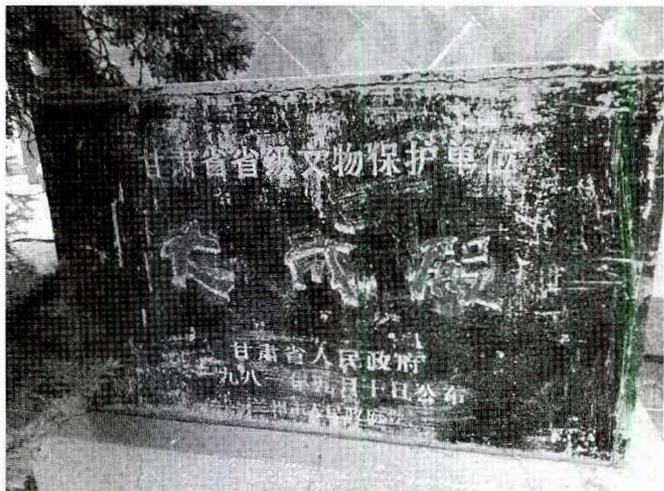
志果中学创办初期，来上学的学生，除了象征性地收两元报名费之外，从没收过高额学费，这是赵元贞办学初立的一条规矩。在他看来，

办学就是办学，不是经商，不能借办学来赚学生的钱。由于“八社”筹款困难，他慷慨解囊，将自家广武门附近的 52 间房屋捐出济急，后又把雁滩北面 100 多亩沙地献出作为学生实习务农之用，使学校在危难之时得以继续发展下去。随着学校的发展，志果中学不仅有了初中，还办了高中；不仅招了男生，而且打破校禁，招了女生，学生人数最多时达 1400 多人，成为陇上在校人数最多的私立学校。教室和经费一直困扰着赵元贞，作为一校之长，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学之艰难可想而知。为此曾两次接受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的资助用于学校建设，这成为“文革”时赵元贞遭受冲击的缘由。

1952 年，私立兰州兴文中学与私立兰州志果中学合并，更名为兰州建国中学。1953 年，学校由甘肃省文教厅接管，改私立为公办，更名为甘肃省兰州第二中学，后定名为“兰州市第二中学”。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1966 年 8 月 8 日，造反派将大成殿内的孔子塑像连同大成殿前的 4 块石碑、学校办公楼前的文庙碑全部推倒砸烂，并将孔像残骸和一些文物、古书等装车游街示众，最后将包括孔子像服装、祭孔乐器等在中央广场付之一炬。据说，孔子像被砸烂后，只在孔子像的胸腹部位发现了 7 枚圆形铜片和铁片，其他则一无所有。而发现的 7 枚圆形铜片和铁片后来也“下落不明”。至此，兰州府文庙，除七楹柱、檩、椽均已年久腐朽的大成殿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完整外，其余文物古迹均被毁无存。如果完整保存至今，兰州府文庙和“清四碑”毫无疑问能入选国家级保护文物。





兰州府文庙大成殿文物保护碑

1984年，由市文物管理处重新修缮大成殿，在大殿的顶棚内发现顺治至宣统年间皇帝题匾9块。

如今，文庙大成殿矗立在兰州二中校园内，古朴典雅，庄重肃穆，为这个学校增添了浓浓的传统文化底蕴与气氛。本来孔子就提倡“有教无类”，将当时贵族化的教育向平民逐步普及开来，他的教育思想影响极其深远。文庙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作为祭祀孔子的场所，二是作为府学、县学学堂，供本地学生读书之用，因此将文庙改作学校也是应有之义，只是可惜了那些在浩劫中灭失的珍贵文物，暴殄天物、焚琴煮鹤，令人扼腕叹息。

国学之馆

——皋兰县文庙

皋兰县文庙旧址位于今张掖路中段南侧延寿巷，清康熙时为靖逆侯张勇旧宅，乾隆五年（1740年）甘肃巡抚元展成改建为皋兰县文庙。按地形和已有建筑布局，以大成殿、教谕署、训导署、尊经阁为两翼，而奎星阁无地可建，便以旧城之通远门为奎星阁，此为全国文庙之罕见形制。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皋兰县知县康基渊等在皋兰文庙倡导设立兴文社，以捐银发商生利，以利息为皋兰县士子乡试、会试旅费。皋兰县文庙与兰州府文庙一样，按规制每年春秋两季定时举行祭孔典礼，以弘扬儒学，劝勉后世学子不忘先师教诲，勤奋向上。

在兰州近代文化事业，尤其是在五泉山的建设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刘尔忻也曾主持修复过皋兰县文庙。据刘尔忻于宣统三年（1911年）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三月撰《重修皋兰县文庙记》载，为了修治学宫，热心地方公益者成立修学社，并推刘尔忻主社事。当时学宫已颓败，但社中所得租赋每年不过几十两，没有大量的资金是完不成修复工作的。刘尔忻在碑文中深情地说他每沿着宫墙走过，看到学宫破败的样子，心里就感到愧疚，但又没有办法。后来光绪皇帝下诏“以大祀祀先师”“各直省府厅县文庙通覆以黄瓦”。于是连续两任陕甘总督升允、毛庆蕃先后拨付帑银五千四百余两，县文庙得以重修。刘尔忻认为：“倘世之一乡一邑者皆凜凜乎诗、书、礼、乐、易象、春秋之传，则四海九州内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庶几可以收一道同风之效，而异端邪说不致惑世误民乎！”对文庙普及教育及传统礼仪教化的意义与作用作了高度概括与颂扬。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皋兰县文庙为延寿巷幼儿园等占用，残存的建筑有过厅、尊经阁、大成殿等。大成殿木构绘青绿云子彩画，吻兽到滴水、瓦当，均施龙纹，甚是珍贵；崇圣祠，青瓦屋面，西番莲雕花屋脊，带箭正吻，垂兽、脊兽极具兰州特色；西门的明伦堂为硬山加卷棚勾连搭屋面，青瓦铺设；明伦堂厅堂后壁镶嵌有多块清、民国时碑，被居民用泥抹平，为世人鲜知；总建筑面积约950平方米，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是兰州市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古建筑之一。1984年，兰州市政府将皋兰县文庙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因城市建设，皋兰文庙在原地已经不可能得以保护的情况下进行易地迁建，重建于九州台南麓。异地迁建后改为兰州国学馆，占地十余亩，建筑面积1500余平方米，按文庙建筑通制，沿中轴线依次布设棂星门、泮池、戟门、明伦堂、大成殿、尊经阁、崇圣祠，雕梁



大成殿

画栋，金碧辉煌。四周环以宫墙，以示崇高。西宫墙北端建文昌门，里侧嵌文庙古碑；东宫墙侧壁建“孔子圣迹图”碑廊，以表彰孔子；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建礼乐亭和曲廊；东礼乐亭旁树根深蒂固石、状元石，东庑内存麒麟石。殿堂亭庑具备，戟门棂星辉映，左右绿山环抱，南面揽城瞰河，尽占北山风水，犹如蓬莱飞至，已成黄河风情线上点睛一胜景。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较原有的皋兰文庙，兰州国学馆内增添了包括周公、老子、孟子、庄子等中国古代的国学代表人物雕像，新添有汇集历代名篇精粹国学经典碑墙，其中有从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中挑选精粹修建的“易经精选”碑墙，镌刻有对后世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道德



棂星门

经》碑墙，镌刻有集中体现孔子思想的《论语》碑墙，以及王羲之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的《祭侄稿》，三皇五帝文化碑



墙，“四维八德”碑，《富春山居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经典绘画石刻石雕，可谓“群贤毕至”，包罗万象。



尊经阁

对于皋兰县文庙迁建并“扩容”，反对与否定

者众，认为新址太偏、太高、太远，人迹罕至；完全是另起炉灶新建，钢筋水泥，满山“新文物”；增添了老子等许多先贤塑像，三教九流，显得不伦不类，成为大杂烩；文庙地处两种山基（黄土层和岩石层）的交界处，地基极易下陷。赞成者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学院建筑系博士生导师路秉杰教授称赞说：“从位置、朝向、布局、结构等方面来看，皋兰文庙作为古建筑群保存得还是相当完整的。”赞同也好，反对也罢，皋兰县文庙迁建已成事实，并且从改名兰州国学馆来看，其用意就是改变了文庙的独有元素，而扩大为国学范畴。一些人以为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皋兰县文庙改为国学馆是与《文物法》相悖的。也许多年以后，人们来到此处，将不知文庙概念而只知国学馆了。

甘棠旧声

——左公祠

左公祠，即左文襄公祠，是晚清时期祭祀著名爱国将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地方。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也是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一生经历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民反清斗争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清政府为表彰其收复新疆的杰出功勋，封他为太傅，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令在左宗棠出生地湖南、湘阴、长沙及他立过功的兰州、南京、福州等地建祠。光绪十二年（1886年），甘肃遵敕在兰州府文庙东侧建成左文襄公祠，老百姓口头上称“左公祠”。那时的兰州城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左公祠在兰州内城南大城门里面，具体位

置在今兰州二中东面的曹家厅路西，坐北向南。

20 世纪初期，澳大利亚人莫理循自北京取道洛阳、西安，经过兰州考察河西、新疆，拍摄了大量照片，留下了清末西北社会、名胜、生态环境的影像资料，而左文襄公祠，今天也只存在于莫理循 1910 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邓明据照片分析，左公祠的东侧为四楹三间牌坊，为斗拱歇山顶，进牌坊右拐是大门，为青砖券门三座，均有题额，为砖雕仿斗拱硬山顶，进大门是正堂，正堂之后是戏楼和祠堂的主体建筑卧龙阁。因左宗棠曾自比诸葛亮，时人称其为“今亮”，故主体建筑名卧龙阁。

左文襄公祠建成后，其部下缅怀左宗棠事迹，多有题联。在收复和保卫新疆中立有历史功绩，曾任甘肃西宁道、新疆巡抚的左宗棠部将刘锦棠题左公祠：“神武訖氏

羌，公曾生入、我亦生还，
十载轨前尘，综维新文物声明，
弥想见元戎经略；大名垂宇宙，
牙纛非荣、圭裳非贵，九边崇祀事，
愿终古日星河岳，长护持丞相祠堂。”

由把总从军湖北，积功至游击，赐号直勇巴图鲁，曾任陕西提督的雷正綰题左公祠：“元老抒壮猷，看氛



左宗棠

扫越江、波澄闽海、尘清关陇、望著燕云，威名遍西朔东南，岂数中兴有召虎；儒生怀伟略，忆檄飞湘幕、版入戎疆、气慑邻封、忠宣枢禁，勋业震华夷中外，允堪自命为卧龙。”

以进士累官至山西布政使，后权甘肃的李廷萧题左公祠：“经济足匡时，筹楚饷、克杭城、平粤寇、底定关陇回疆，尽瘁江闽，先幕后官，遍历艰苦成铁汉；诗书能报国，精天文、熟地理、详水利、谙练吏才兵略，兼通洋务，出将入相，不求温饱是真儒。”

左公祠风格古雅、气势宏大，是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种重要表征。在独特的祠堂建筑文化形式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宗族制度、伦理道德及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方面的许多特点与个性。除每年的春秋祭祀之外，由于左公祠整个建筑独特而气势非凡，更多时候是当时甘肃官绅宴请交际及招待外宾之所。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于1908年1月29日从新疆进入兰州，3月17日离开。在兰州的40多天中，每天记日记的马达汉在后来他出版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记录了政府大员在左公祠宴请外宾的事。那张为众人所熟知的陕甘总督升允宴请马达汉等人的照片就拍于左公祠。

1908年，陕甘总督升允宴请马达汉、天主教传教士万·迪克、比利时人在兰州参与新政建设人员林阿德等。马达汉在日记中写道：“在城堡南门附近，一座为纪念以往一位著名的陕甘总督左宫保而建的庙宇内，摆放了一张欧式长桌，桌旁围坐着主宾18人。宴会厅美丽地装饰着地毯和灯笼，两排廊柱支撑着天花板，半圆形的后墙上开着大窗户，靠前



有一个半圆形的高台，台上放了几张矮小的茶几，在茶几之间是一排铺着红色垫子和狼皮的座椅，接着是相对铺红垫子的直背靠椅，一直延续到门口。靠门口的一堵墙边有一个舞台，舞台上装饰着幕布、灯笼和地毯。”马达汉在日记中记载，当时道台以上的全体官员都出席了宴会。“除了升允，当时甘肃按察使陈灿、劝业道彭英甲等都在场。宴请的菜肴主要是西餐。西餐是由当时在甘肃矿物学堂化学教习的比利时人贺尔慈的厨师烹饪的，喝的洋酒是由林阿德提供的，林阿德当时是比利时参赞兼翻译。”升允向外宾介绍了自己出使俄国的见闻，还介绍了甘肃实行新政的情况，宴会整整持续了五个小时。



升允在左公祠宴请马达汉

进入民国，左公祠成了全省政治团体举行会议之所，甘肃的政党大本营，一个激励大众激进的场所。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中国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总部派国会临时议员周之翰来兰州，联络甘肃同盟会会员并组建国民党甘肃支部。周之翰与同盟会会员



左公祠

甘州王之佐、镇原慕寿祺等，选左公祠为办公地点，筹集经费开始工作。随后，派人分赴平凉、宁夏、秦州、巩昌、西宁、甘州、肃州等地宣传国民党宗旨。各地组织分部和办事处，积极筹备选举事宜，并由各分部选派代表于10月底统一到兰州开会。

随着各地代表均来到兰州，一切就绪。11月28日，在左公祠召开成立大会。省城各界来宾及全省党员代表一千多人与会，推慕寿祺为临时主席。三百多名党员经过投票，选举马安良为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王之佐、慕寿祺、孙鸿年为正副评议长，邓宗为政事部主任干事，王辅政为财政部主任干事，许季梅为调查部主任干事，柴桂芬为交际部主任干事，金翼乾等二十人分任各部干事。由此，国民党甘肃支部成立。

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11月8日，蔡锷病逝。兰州在左公祠设灵堂，悬挂挽联悼念两位推翻帝制的斗士。其中蔡大愚以甘肃回民劝学所名义所献的挽联写道：“星落半球暗，天荒两柱摧。”对于二人的逝世表达了极大的哀痛，同时对他们的功勋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甘肃人民的积极响应。1920年5月7日，省立一中、第一师范、华英女子中学和西湖小学师生在曹家厅左公祠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日”集会，在街头巷尾进行爱国宣传。

史料记载：“凡公宴演剧，率假坐于此（左公祠卧龙阁）”。张广建督甘时，任人唯亲，尤其是安徽老乡不论贤愚一律委以重任。当时会馆建设方兴未艾，1915年，张广建变卖清代衙署，在兰州做官的安徽、江苏人购买左营署后将其改建为会馆，兴建的皖江会馆规模宏大，设有剧场，高层人士趋之若鹜，随即成为省城官绅公宴喜庆的场所。盛极一时的左公祠因此在张广建督甘后期逐渐衰微。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留美博士赵元贞在兰州八社的支持下，为了纪念刘尔炘，成立志果中学，先后将兰州府文庙的乡贤祠、名宦祠、节孝祠、崇圣祠、尊经阁以及左公祠辟为学校。12月，日本飞机百架来袭兰州，房屋毁损甚多，左公祠亦残。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甘肃省府又重新修葺左公祠，并于祠内附设私立文襄中心学校培养人才，偏建季高（左宗棠字）纪念堂。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撰于民国三十一年12月的《重建左文襄公祠碑记》，碑为楷书，共13行，满行31字；碑宽0.88米，高1.87米，厚0.15米。碑原立甘肃贡院（今兰大二院内），现存于兰州市博物馆，上部文字全部剥蚀，据薛仰敬碑文大意为：此次维修与建设纪念堂，一方面便于春秋祭祀及人们拜谒瞻仰；另一方面也用于湖南子弟集会，使后辈在寻迹前辈芳踪中得到激励。



同年，李烛尘考察甘青新时在《西北历程》中写道：“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一日，曾去左文襄公祠瞻仰一次。前年祠被敌机投弹，毁去不少，现一部分改为学校，一部分做成大礼堂，内可演戏。而左公遗像尚立于最后之破屋中，对之无限感触……而祠宇衰败至此，数典忘祖，是亦后人之耻也。”看来当时的维修重在实用，而淡化了对左宗棠纪念的原意，所以李烛尘有此一叹。

坊间曾流传，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尚在世之时，以省城官绅为代表的兰州百姓就给左宗棠建了生祠，地点在五泉山清晖阁（今清虚府），第二年轻宗棠进驻兰州督署后，认为这样做不妥，随后，他将生祠改为泉神雹神祠，以祭祀惠泽生民的泉神和肆虐庄稼的雹神。

另外，为了纪念左宗棠，兰州还建有湘阴祠，位于城关区临夏路兰大二院西北角，属清代建筑，又名报国祠。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砖木结构，面阔五间，悬山顶，于20世纪中期拆除。后在原址上建昆仑堂，但在20世纪末也被拆除，原址现为兰大二院职工住宅楼。

左宗棠病逝噩耗传至陇上时，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至亲，说明他在陇上民众心中的地位很高，受到非常高的尊崇。为了纪念他，将兰州城的西关大街命名为宗棠路，将兰州城的西稍城门命名为宗棠门。还有抗战时期将新辟的城南公路（今白银路）命名左公东西路。其中今天兰州的旧大路原为一条旧驿道，系旧兰州城区过境道路之一段。清同治年间，左宗棠向新疆用兵时，整修了陕、甘、新驿道，此路亦被整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纪念左宗棠，该路被命名为左公东路。

左宗棠以兰州为大本营光复新疆，并在督甘期间（1869—1880年）

做了大量的工作，兴办书院、义学，创办贡院，并在兰州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织呢局，将洋务思想带进了兰州，由此培养了一批人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这个往日风气闭塞、死气沉沉的边陲古城，闪现出一缕近代工业文明的光华，并在全国最早迈入近代工业文明的殿堂。“提江南江北数千里扫荡之师，靖陇上烽烟，修明礼乐；愿关内关外亿万户弦歌之士，学湘中豪杰，旋转乾坤。”兰州翰林刘尔炘书于五泉山清虚府的这一副楹联，可谓是对左宗棠在西北功勋的高度凝练。

杨昌浚《恭颂左公西行甘棠》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中的“甘棠”典出《诗经·召南》，周朝的召公经常到民间访贫问苦，有时候干脆就在甘棠树下现场办公，从此后人把那些心系百姓、惠民亲政的官员称为甘棠。

兰州自清顺治年间起，建有多座祭祀有功德官员的祠堂，以左公祠名气为最。据载，这样的祠堂有十余所，如祭祀顺治时山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的孟公祠，祭祀康熙时兰州卫指挥张丕猷的张公祠以及甘肃巡抚齐世武的齐公祠，祭祀乾隆时武英殿大学士阿桂的阿公祠等。时至今日，这些祠堂早已消失殆尽，没有留下一片瓦砾，如果没有莫理循 1910 年拍摄的那张老照片，简直就无可稽考了。

政声人去后，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祠堂作为崇拜先祖与崇拜神灵的产物，是英灵栖息的殿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而祠堂文化是一种相当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它既蕴含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像左公祠这样的由官方或民间为国家和地方名人建立的纪念性祠堂，不设神主龛、神主牌，也不修族

谱，仅为弘扬历史名人的功绩、品德、气节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远非一般宗祠可比。

虽然百年间，连同左公祠在内的数座祠堂在兰州踪迹皆无，但消失的是“形”，留下来的是“神”。一如左公祠，没了祠堂，但有“人气”。近年来，人们开始正视近代史以及历史人物，评价渐趋公正，不再以“封建”的名义一棍子将人打死，尤其是左宗棠这样一个在晚清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将兰州带入近代工业文明的门槛，他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对兰州、甘肃乃至西北地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致力于西北地区的建设及其探索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巍巍一柱

——嘉福寺木塔

嘉福寺原名宝塔寺，俗称木塔寺，是兰州建造最早、最有名望的佛塔，位于兰州内城西北隅（今木塔巷至永昌路北段之间）。说起嘉福寺木塔就得提起 1500 年前的一位高昌国王麴文泰，他祖籍兰州榆中，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年），麴文泰继承王位，与当时中原唐王朝大力修好，并大量进贡珍宝。贞观四年（630 年），麴文泰亲自到长安觐见唐太宗，受到唐太宗厚待。麴氏高昌与唐王朝的关系此时达到最佳状态。文泰非常重视高昌佛教的推行，自己也虔诚无比。他在朝见唐太宗后，归国途中经过金城（兰州）时，将唐太宗赏赐的千两金银尽数捐给金城宝塔寺，修建了木塔，表示对家乡的怀念。但据《兰州市志·文物志》载，“据学者王素考证：嘉福寺木塔是贞观八年（634 年）高昌国所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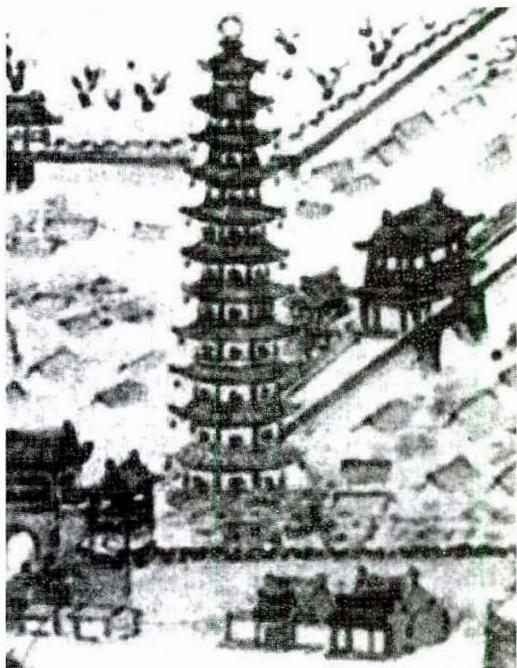
使者于贞观九年（635年）返国时，以麴文泰名义建造的。”两者稍有差异。虽然后来高昌王国的自保与唐王朝的统一大业相左，而最终被侯君集所率唐军所灭，终结了麴氏高昌国传承10代、历经139年的江山，但木塔却作为金城的一大景点经过屡次维修或重建而延续后世。当时宝塔寺“庄严瑰玮，为时首称”。

到了宋代，由于战乱不断，宝塔寺遭到破坏，“荒基寒础，过者惜之”。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重修，赐名嘉福寺。明代永乐时期重建。宣德六年（1431年），有个叫法海的和尚看到寺庙凋敝十分伤怀，欲修复但是苦于没有资金，肃王听说后对其大加赞赏，并动用府库钱币，命承奉田荣负责规划设计、购买材料、召集人工进行修复工程。田荣自己也慷慨捐助，金额达总经费的三分之一。还有典膳黄朝宗等人也捐资相助。于是善男信女争相出钱出力，加入到修复工程中来。不久，寺庙“法界廓如，爽垲平旷，俨然天造地设，以开梵王之故居也”。又经过几年的修建，建成三世尊正殿、左尊胜殿、右准提殿，以及药师、斗母、文殊、普贤四殿，左右廊庑，并派神涌和尚远赴京师印造了《大藏经》，建毗卢阁以藏。并考图按址，重建宝塔于正殿之后，建成十三层宝塔，周围建护殿。此时，整个寺院“诸天有像，千佛有图”“彩绘辉煌，金碧灿烂，虽化成梵天不过是也”。

成化三年（1467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肃王捐资续修，成为古代宽敞壮丽的有名的寺院。木塔建筑制式为十三层楼阁式，高50余米，高入云霄，塔身呈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层缩小，该塔每层每面均雕佛像及以民间传说为内容的图画，塔刹为宝珠形，生铁铸成，



直径约 1.7 米，上铸“宝塔建于唐贞观九年”9 个字。塔内各层均设楼梯，登塔者可螺旋登至顶层塔室，塔室直径约 3 米，周围设平座栏杆，登临者可凭栏远眺。木塔四周建有殿阁，正南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左面为尊圣殿，右面为准提殿。再南为山门。木塔正北为毗卢阁，再北为药师殿、斗母殿、



木塔寺

文殊殿、普贤殿。清代陈如稷《创建金城嘉福禅林宝塔毗卢阁并左右楼诸处碑记》说，木塔“高可百余尺，下周二十丈，上约八十围”。塔身“珠缨四覆，玉贝鬘通，铃语风闻，神光夜彻”。木塔规模可与我国现存最高木塔——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媲美。

清康熙年间，嘉福寺木塔毁于火灾。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经地方文武大员慷慨乐施，并有性宽和尚持钵云游，东至渭水，西抵敦煌，跋山涉水，所化布施一镗一铢尽数用于木塔的修建上，巡抚叶穆济在原址上重新建了一座木塔。虽规模较原来小，但木塔“巍巍一柱，八面玲珑，上应乾天，前迎巽位；千峰环拱，九曲滢洄，有裨益于风气山川，实非纤细”。道光十三年（1833 年）总督杨遇春再修。魏椿

(1804—1899年)，字寿卿，狄道州（今临洮县）人，五泉书院肄业，曾任平番县训导，旅居兰州50多年，他有首诗《秋日登木塔》：“浮图影倒水中央，坐赏千林木叶黄。老去登高身愈健，秋来览胜兴偏狂。山枫树树飞红雨，径菊枝枝傲白霜。惟爱皋兰风景好，河清再看出荣光。”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秋日登木塔看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美丽风景，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这座木塔又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焚为灰烬，这个在维修与毁灭中中断断续续存在了1200多年的嘉福寺木塔就此名存实亡，塔下九楹殿宇也易为民居。

清末，兰州秦腔名艺人耿忠义年少丧父，十三四岁时便挑起全家生活重担，做裁缝、木匠、油漆匠等临时艺徒。因当时有钱人家死了人，便安寄灵柩于木塔寺（今木塔巷北头），耿忠义随漆匠师傅日夜为棺材刷漆。后弃职逃跑，找到父亲的艺徒、时为秦腔名角的来喜子（人称麻旦子）学戏，终成秦腔名角。

嘉福寺因悠久的历史 and 曾经的辉煌而名声远播，是南来北往的游客到兰州后寻访的古迹之一。民国初年，还常有庙会在木塔寺戏楼演出。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8日，陈万里游嘉福寺时看到的是“此时仅存瓦砾之外形矣”。

薛笃弼为甘肃省省长，为甘肃、兰州人民办了不少好事，被人们誉为“甘肃的一个好省长”。他曾在木塔寺（今甘肃省军区干休所）设立了公共体育场、乒乓球室、秋千、浪桥等设施，供市民体育活动。

今天在亚欧商厦的东侧还有一条小巷道名木塔巷，是一条极其普通的



小街巷，嘉福寺及木塔在这里已毫无踪迹，木塔只是个名字而已。时代在发展，我们在不断前进中扬弃了很多东西，但是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不能丢，否则何以继往开来，何以再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丛书

WENHUA CONGSHU

百年洋医院

博德恩医院

白塔山公园东侧不远处，便是依山而建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在该院的家属楼、住院部以及高层住宅楼等高大的建筑丛中，有一幢建筑风格独特的两层砖木小楼，在一些乌黑而高大的槐树掩映下显得古朴厚重。它便是 100 年前，由苏格兰人金品三利用英国传教士博德恩的捐款所创建的博德恩医院。2013 年 4 月，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将旧址公布为城关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医院创建者金品三（George E.King，1887—1927 年），苏格兰人，为第二代宣教士，出生于中国，十五岁立志投身宣教。1914 年 2 月，金品三抵兰州定居。是年，受英国内地会派遣和大工商家博德恩临终嘱托，携博德恩所捐数万元巨款，负责筹建博德恩医院。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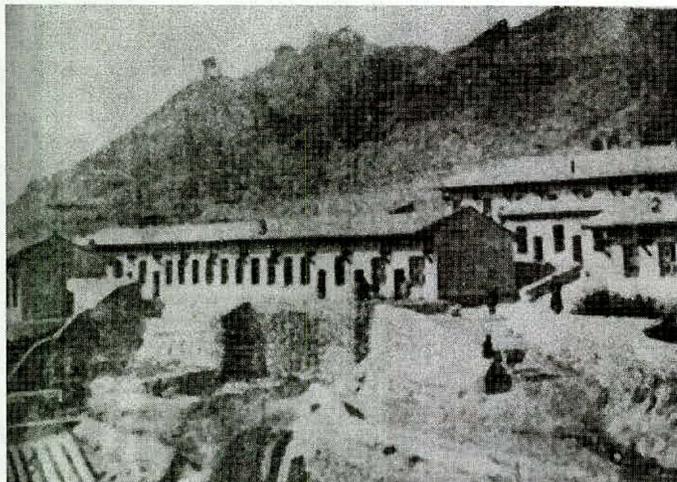


而出资者博德恩 (William Borden, 1887—1913 年), 出生于芝加哥, 富家子弟。耶鲁大学毕业后, 申请加入内地会, 立志服务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民。不料 1913 年 4 月初突然罹患脑膜炎病逝于开罗, 年仅 25 岁。其母悲伤之余, 深知儿子对中国回族有未了心愿, 于是遵从博德恩遗愿, 捐巨款给内地会, 在兰州设立一所以服务回族为主的医院, 遂选中与博德恩同年的金品三负责筹建。

清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基督教内地会曾派休伊特医生与替雷迪来兰创办医疗事业。当时的兰州以及西北诸地为数不少的穆斯林、藏民和汉民基本上只看中医, 西医几乎没有, 医药相当贫乏。1885 年, 在兰州五泉山首建内地会福音堂, 又在其基础上设立兰州基督教会, 博德恩医院的前身英籍教士贝理特创建的西药房就设在福音堂内, 后来教会迁到山字石, 药房改为诊疗所, 来所就医者日多, 已显拥挤。金品三抵兰后, 向兰州地方当局申请建院地址与开办手续, 经当局批准后, 购得市区黄河以北靖远路 (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址) 一片荒山, 占地 48.45 亩, 投资约 8 万元, 开始了医院建设工作。



博德恩



博德恩医院
住院部旧影

1918年4月，医院完成全部建筑工程。医院大门上悬挂一面很大的金字牌匾，上书“博德恩医院”。4月9日，博德恩逝世五周年，医院中央大楼由督军张广建正式揭幕启用，高层官员均出席。兴建医院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服务回民，故市内十三间清真寺均接到邀请，也都派代表带贺礼出席。金品三后来逐一回访这些清真寺，均获热情款待。

医院有供手术和化验用的三幢两层相连的主楼，100多间砖木结构病房，是一所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兼有的西医院；设备相当完善，有门诊室、手术室、化验室、药房，男病床80张、女病床40张，医生住宅、护士住宅，以及一些专供穆斯林使用的设备。建院之初，住院部分男、女医院二部，按当时习俗，另开大门。男女病房均有专廊可通手术室。还特别设立了穆斯林病房，并在西端建立了麻风病院。它是当时甘肃省境内唯一的西式医院，也是兰州规模最大的内外科俱全的医



院。为纪念捐资人的善行，该医院在开创时定名为博德恩福音医院，后改称福音医院，一般群众则称它为河北医院。它的建成为兰州现代化医院的建设与发展开了先河。

民国八年（1919年）2月14日，考察蒙、新、甘、宁的林竞“早骑马出北门，过黄河铁桥，循北山麓东行，至庙滩。有福音医院，规模宏大，为甘省唯一之新式治疗所。楼房数座，占地甚多，而地价所费闻仅三百金，可谓廉矣”。由督军亲自揭幕到地价之廉，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政府对福音医院建设的支持。

在院长金品三的努力、带动与培养下，医院的医疗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1914年2月，金品三抵达兰州时只从山西平阳善胜医院带了一位学生刘萃赉做他的助手。当年5月，澳洲悉尼人妇产科护士夏裕恭抵达兰州，不久与金品三结婚。1915年6月1日，金品三在妻子的协助下，开始诊疗所的工作，当时协助他们的中国同工中刘萃赉是基督徒。



博德恩医院旧址



门诊病人由每天 15 人增加到 41 人，另外还有留医的病人 13 位。在创建医院时急需医护人员，金品三于是向挚友高金城发出邀请。1915 年年底，高金城医生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河南省远道而来，在博德恩医院就职，帮助整个医院的工作，成为金品三不可多得的助手。接着，25 岁的来自英国伦敦的巴尔德医生也加入到医生队伍中来，一同协助发展医院。当时院内的医生及护理人员多来自英、美、澳、德等国家。在医疗技术上，可以剖腹摘除肿瘤，这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也不多见。他们不仅驻守医院，并且常常外出治病救人。

1916 年 10 月，应甘肃省省长之请，巴尔德医生南下合作，遏止了一场类似肺炎症状的流行病，赢得了当地官民的爱戴。高金城医生从兰州西行，进入今青海省西宁市和贵德县，一路上医治了许多百姓。金品三医生则于 1916 年 2 月带着吴宝瑛和另一名习医学生，在秦州医治了 600 多个病人，做了 40 多台手术。回程的路上经过秦州的西北部，在一小镇马营医治了 500 多个病人。晚上在旅店住宿碰到小偷，金品三医生因捉小偷被刺受伤，立即赶回兰州救治。镇上居民闻讯，为感谢他治病救人之恩，有近 200 人前来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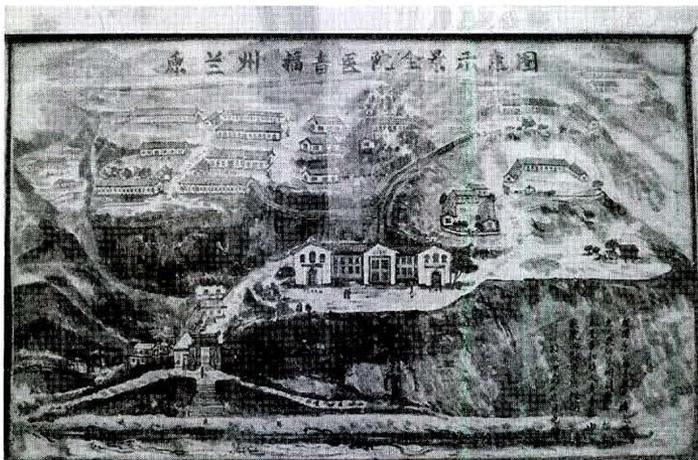
由于医院十分体恤民情，在当地群众及穆斯林、藏民患者中均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英文版的《亿万华民》中曾记载：“在甘肃省会兰州，金医生成功地拯救了一位回民官员之子，以致远近的回民都因此对我们产生好感。这位来自中国的父亲，还在医院陪伴他儿子的时候，翻阅了大半本《圣经》。”

随着医院的发展，金品三开始着手培训医护人员。医院开办了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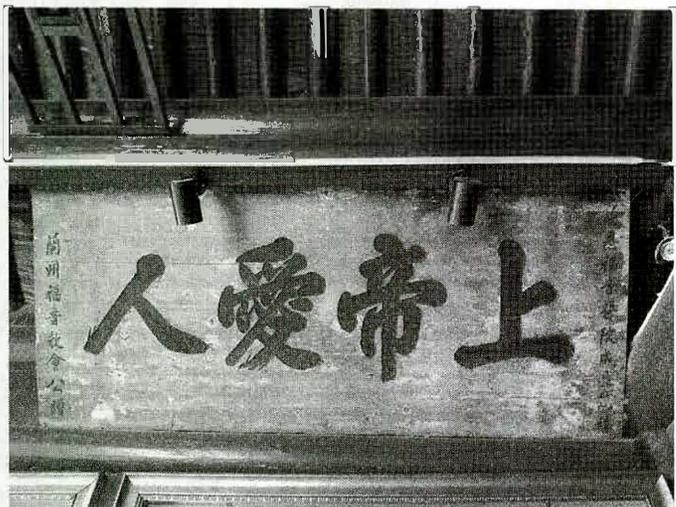
制的医学班和护士班，培养了许多医生和护士。首次招收了12名医学生，每天上生理学、解剖学6小时，其余时间用来实习。1919年圣诞节，第一届共有9位医学生毕业，其中吴宝瑛医生留在医院协助发展院务，另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的邵德福医生，毕业后回家乡建立了一所医院。1923年年初，第二届14名接受训练的医学生毕业，除了3名是甘肃人，其余都来自其他省，吴宝瑛的弟弟吴宝琇也在其中。同年，应官绅父老的要求和捐助，他们在兰州市中心增设了一间诊疗所，以方便居民不用过河就医。

1926年1月，美国医生安乐欢来到兰州，使医院的医疗队伍更加壮大，全院120张病床全都住满。有一年竟来了50多位藏族病人。安乐欢医生和医院其他的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每两个月轮流被派往河州医院治病，帮助了当地许多的百姓。

博德恩医院设立后，经历许多天灾人祸，但医护人员都能持守医疗



博德恩医院示意图



博德恩医院牌匾

传道立场，尽力助人。1920年12月16日晚，海原发生8.6级的大地震，兰州虽非震中所在，但也有不少伤亡，实时博德恩医院成为救灾中心，全体医护人员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灾工作，赢得各界赞誉。

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中静宁县灾情严重。12月28日，巴乐德医生接到静宁县县长周廷元的亲笔函，请他前去救伤。巴乐德医生认识这位忠厚爱民的县官，立刻前往抢救，但跋涉六天才到。临时医院是一个大帐篷，设在县府的天阶中，借用没有被震坏的公立图书馆作为裹伤站和施药室。县长叫人到各处敲锣通知伤者前来就医，巴乐德医生独力主持，十分吃力，救治了很多人。

1927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为保护外侨，欧、美等国领事馆下令全面撤侨。安乐欢医生自告奋勇，决定独自留下来与全部中国员工合力看守医院，并且尽个人所能承担一切院务。北伐战争后，中国政局暂时安定下来。1928年，博德恩医院的吴林德医生回兰，同来的还有英



国戴乐仁医生夫妇，他们和安乐欢医生年纪相仿，在医疗工作上，彼此帮助，合作无间。当年，甘肃经历一场大饥荒，医生们义不容辞地投入赈灾工作中，医院里也是人满为患。安乐欢医生终日忙于管理医院、治病救人，最终因为工作繁重使他的体力和健康严重透支，同年4月病倒在工作中。1929年5月8日，安乐欢医生离世，年仅33岁。

20世纪20年代，甘肃西部麻风病人甚多。但时至1923年，麻风病院只收治两个病人。后来病人渐多，内地会与一个服务麻风病人的差会合作，于1926年建成服务大楼，收容汉族、回族、藏族等民族的麻风病人38人。

与忘我工作的巴乐德医生、鞠躬尽瘁的安乐欢医生一样，在医院就职的医生们舍生忘死，治病救人，有的甚至参与革命，营救红军战士，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诗篇。

高金城（1886—1938年），河南襄城人，由于家境贫寒，他勤奋苦读，不到七年就已完成所有医学科目的考试，1911年，正式进入医院做实习医生。1915年年底，高金城医生到博德恩医院就职。后受共产党的委托，帮助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王定国、徐世淑等200多人。1938年2月2日，高金城被军阀马步芳部下杀害。1952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

吴宝瑛，秦州人。1915年，博德恩医院录取的首届医学生，1919年考取从医执照，成为正式医生，留院服务，此后成为博德恩医院的主治医生之一，负责医院重要行政管理工作，妻子任护士长。两年后金品三给他的评语是“真挚、务实、能干的行政主任，是技术高超的外科医

生”。1927年秋，吴医生夫妇返秦州探亲，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医院，并在市中心开设一家诊疗所。1930年5月6日，秦州城被叛军攻破，吴医生惨遭杀害，年仅33岁。

而那位为了医院的创建与发展呕心沥血的金品三也在救助别人时，英勇献身。1927年，中国爆发大规模排外风潮，外国领事频频催促撤侨，甘肃境内宣教士徒步或乘骡车到兰州会合。据《兰州市志·民族宗教志》载，金品三携带筹建医院时向甘肃督军陆洪涛募捐5000银圆换来的金银等物品与一行人乘8只羊皮筏子，沿黄河直下。6月5日，金品三在协助搁浅筏子重新漂流后，不幸被急流卷去，终年46岁。金品三携妻与儿女在兰州乃至甘肃服务达14年。其母留在中国继续服务，直到1945年离华。

由于金品三去世，院务主持者意见分歧，并且似乎与开办人的宗旨不相符合，在医院里工作的好多华人包括高金城先后退出，医院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度停办。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博德恩医院得到进一步发展，是该医院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当时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的英国人侯文辅，医院有外国医师10余人，护理人员10余人，病床近100张，还从国外新引进放射器械，同时将河南开封福音医院的部分药械及医护人员补充到该院，使医院设备及医疗队伍建设日臻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院外籍人员可以自由回国，医院委托给兰州基督教会托管。1951年，由兰州市人民政府接管，命名为“兰州市人民医院”。“文革”期间医院撤销。1970年，在原址上成立了兰州



市传染病医院。1978年，更名为“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现已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医疗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逐年提高的融医疗、教学、科研、急救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2006年，黄锡培弟兄的新书《舍命的爱》讲述了金品三医生、美籍的安乐欢医生，以及高金城、吴宝瑛两位中国医生的事迹，突显出博德恩、金品三及其投资修建的基督教医院在内地会医疗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虽然历经百年沧桑巨变，如今的博德恩医院主楼尚在。旧址占地面积1030平方米，建筑面积686.3平方米，该楼整体为砖木双层结构，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五檩硬山双坡顶，平面呈E形。二层后正中依山势接一走廊，为六檩暗券，面阔一间，进深三间；青瓦覆顶，正脊上为缠枝莲纹饰，有脊兽。走廊现被辟为“博德恩纪念医院”纪念场所，里面两侧墙上挂着当年的照片——展示医院的捐资者博德恩、创建者金品三的照片及医院的旧貌与治疗图片，悬挂“上帝爱人”“济世活人”两幅牌匾。

一层为砖结构，两侧突出部分向南各开一拱形青砖门（已被封堵），周围开现代式样门窗。二层东西两侧各开圆形窗3扇，两侧突出部分南墙各开拱形窗3扇，中央开现代式门窗12扇。有赖于多次维修，勾勒清晰的灰色砖墙、中式圆窗、排水的弧形瓦当，依然独具风貌。该建筑对研究兰州地区明清风格古建筑有一定的价值。目前，市二院将其用于办公与存放资料。

在小楼的东侧竖有一通用玻璃罩着的石碑——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品

三先生纪念碑，书写有生前友好及甘肃省各县绅商士庶 40 多人名字；碑的背面记述了金品三的生平事迹，整个碑身有两处贯通裂纹，似是破裂后重新黏合，字体有多处残缺，难以通读，末有“以泣永矢，弗谖者也”“附记之，以告来者”“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立，前法部主事皋兰卢应麟拜书”。该碑伤痕累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博德恩医院的百年沧桑。

一百多年前，一群黄头发高鼻梁的洋医生，怀着“济世活人”的思想来到兰州，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及先进的医术，与中国同事一道，用仁心仁术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他们胸怀博大、医德崇高、不分国界与种族、舍身救助一群素不相识的外国人，种种善举与历历往事，感人至深，深刻诠释了悬壶济世的医德和仁术，为今天的医生树立了楷模。



红色记忆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又称兰州“八办”，是八路军及中共高级领导人驻兰州的办公遗址。为营救当时被俘和流落的西路军将士，周恩来提出在兰州设立红军联络处。1937年5月，彭加伦和张文彬来到兰州，租用南滩街54号（今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700号）一座木质门窗、青砖房脊的普通的旧式四合院，开始进行前期联络工作，由于是非公开的红军办事机构，故对外称作“彭公馆”。8月25日，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不久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彭加伦任处长。由于隔壁院子还住着一个国民党官员，处长彭加伦感觉受到监视，1938年2月迁入孝友街32号（今酒泉路314号）。新址有大小十来间空房子，还有一座破旧的二层小楼，独门独院比较宽



谢觉哉（前排左三）与八办工作人员及文化界人士合影

敞方便。到 1943 年 11 月撤销，八办总共运行了六年零三个月。

“八办”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派驻兰州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是共产党领导甘肃抗日救亡、进行后方发动、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基地，也是中苏国际交通线上的中转站。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的领导下，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营救被俘流落的红西路军将士，接待党的过往人员，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战前线，转运苏联援华物资，指导中共甘肃工委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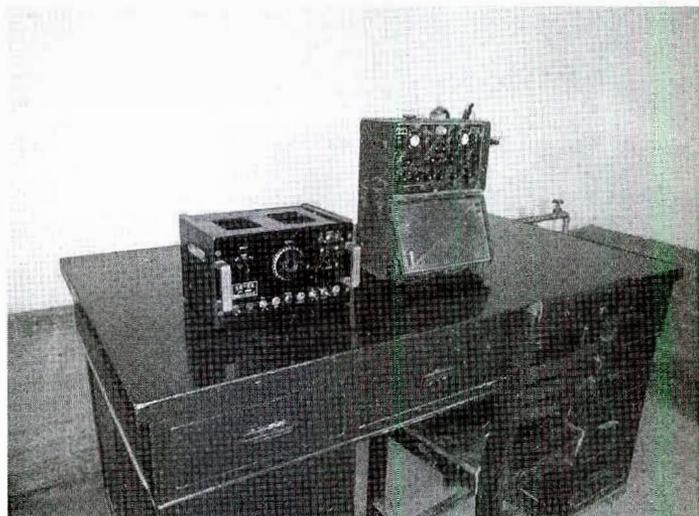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新修的八办纪念馆大门



当年使用的电台

工作，被周恩来亲切地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伍修权也曾说：“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看起来是一个被包围着的孤立据点，实际上却是我党我军在西北白区一盏闪亮的红色明灯。”

1937年7月29日下午4时，谢觉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兰州。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谢觉哉的同乡旧友，他亲派顾问到机场迎接谢觉哉，并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席间，兰州省府要人及各界人士，对这位共产党的代表极感兴趣，纷纷提问，谢觉哉趁机向他们谈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通过与贺耀组的畅叙旧谊，分歧逐渐减少，为“八办”在兰使命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兰州离中苏边境较近，当时新疆的盛世才表现倾向革命，许多同志从延安取道新疆去苏联，往返都要经过这里。1939年夏到1940年春，

周恩来去苏联治病时途经兰州，和邓颖超、孙维世都住在这里。在这里先后住过的还有王稼祥、刘英、任弼时、李先念、程世才、蔡畅、邓发、萧三、陈郁、李天佑、杨至成、谭守述等。1937年12月，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时也曾住在这里。这里还接待过胡志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

1937年8月1日，谢觉哉到兰州的第三天，就与彭加伦、朱良才到兰州城外的五泉山，会晤高金城医生，商讨营救西路军战士。高金城回到张掖后以福音医院为掩护，派人以下乡看病为名，寻访流散红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被营救，辗转兰州，回到了延安。但高金城的行动被发现而遭马部韩起功杀害。“八办”在营救西路军战士的行动中，找到了1000多名散落在张掖、被迫做苦力的西路军战士。西路军连长蔡光波用米汤写成密信，要求办事处设法营救关押在



学生运动场景

张掖监狱的 8 名西路军干部。谢觉哉电请朱德、彭德怀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名义请求蒋介石下令放人，将 8 名西路军干部营救出来。1937 年年底，马步芳将被俘的 1500 名西路军战士编成“新兵团”，准备交给驻河南的卫立煌，谢觉哉和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联手将他们解救



谢觉哉

出来送到延安。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还承担了援助物资转送的任务。1937 年冬到 1938 年夏，滕代远及盛世才的副官从新疆运来的 12 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高自力带来的 10 车皮衣和军火，都由这里送到边区。

“八办”宣传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输送进步人士到延安。据统计，经八办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以及青训班学习的甘肃青年共约 300 人，其中有邓宝珊的女儿邓友梅、进步人士杜汉三的女儿杜国英，还有甘肃省参议、进步人士杨干丞推荐的青年军人刘顺安等 5 人。他们在延安学习后，都参加了革命斗争，其中有的上了抗日前线，有的留在边区工作，还有不少人被派回甘肃各地从事地下斗争。经

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党的领导骨干，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7年10月25日至26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举行了有谢觉哉、彭加伦参加的地方党的会议，成立了中共兰州工委。由孙作宾、郑重远、吴鸿宾、刘日修、刘杰等5人组成，孙作宾任书记，郑重远负责组织工作，吴鸿宾负责宣传和回民工作，刘日修负责青年工作，刘杰负责妇女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兰州地区、在甘肃的活动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八办”不遗余力地建设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甘肃国民党当局顽固腐旧势力思想渐渐开化，贺耀组表示不再阻挠民众运动，兰州的政治空气宽松了许多。在“八办”的指导下创建了大批进步团体，甘肃青年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伊斯兰学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甘肃省妇女慰劳会、

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战团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它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支援前线，使兰州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谢觉哉用过的铜墨盒（一级革命文物）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八办”和工委提出了“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工作方针，积极利用报刊开展宣传工作，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鼓励和赞扬抗日爱国行动。到1938年年初，兰州的救亡刊物达十几种之多。随着国内大片土地被日寇攻占、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一些内地出版机关和编辑人员、文化进步人士转到后方兰州，使得甘肃期刊发



彭加伦

展得汹涌热烈，《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回声》《老百姓》《甘院学生》《热血》《抗敌》《苦干》《现代评论》《民众通讯》等抗战刊物各有特色。

谢觉哉在《西北青年》先后发表了《苟安即是自杀》《一九三八年——中华民族复兴年》《争取继续抗战胜利》《三民主义与救国》等文章，集中宣传、阐述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青年人指明了抗日的方向，被认为是“荒芜高原上的一朵鲜花”。从1937年8月到1938年秋天一年时间里，谢觉哉用佳金、无奇、焕南、敦大等笔名写了60多篇宣传抗日的文章。

《妇女旬刊》是贺耀组夫人倪斐君发起组织的“妇女慰劳会”在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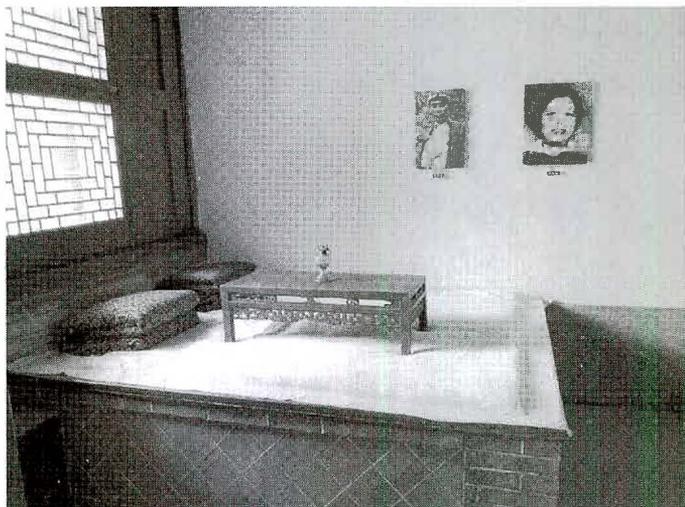
八办内景

事处的指导下创办的，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和全民抗战的思想。共产党在外地的进步报刊，如《群众》周刊、《新华日报》《全民抗战》《妇女生活》等也在兰州公开出售。

“八办”领导下开展的各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但同时所面临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险的。据“八办”房东的儿子王宗尧回忆，当局对“八办”的监视一刻也没有放松。每逢延安来人，国民党当局就如临大敌，警察会接二连三来他们家“查户口”，以此打探来人身份。他记得，林彪头一天晚上住进办事处，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追上门“查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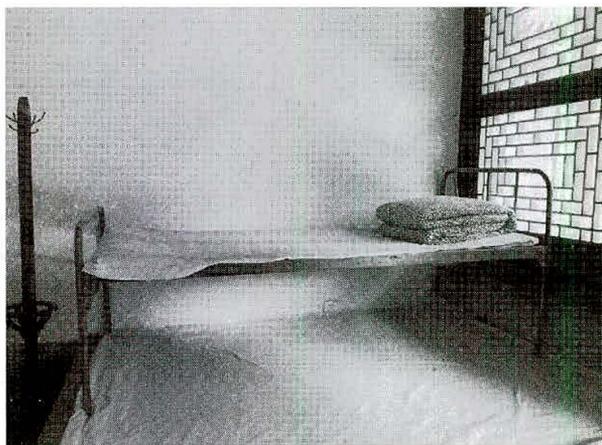
1937年12月，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解散进步团体，查禁进步书刊，谢觉哉领导办事处进行了严正的交涉。1938年夏，伍修权接替彭加伦任办事处主任。同年秋天，谢觉哉回到延安。谷正伦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从1939年开始，“八办”





周恩来夫妇
住过的房间

处境日益恶化。1941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伍修权和办事处大部分人员撤离兰州，返回延安。“八办”只留下副官、译电员、通信员等5人工作，由赵芝瑞负责，在恶劣环境中继续战斗，指导甘肃特别是兰州地区地下党开展工作。1943年8月，国民党又一次掀起全国性的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八办”的工作环境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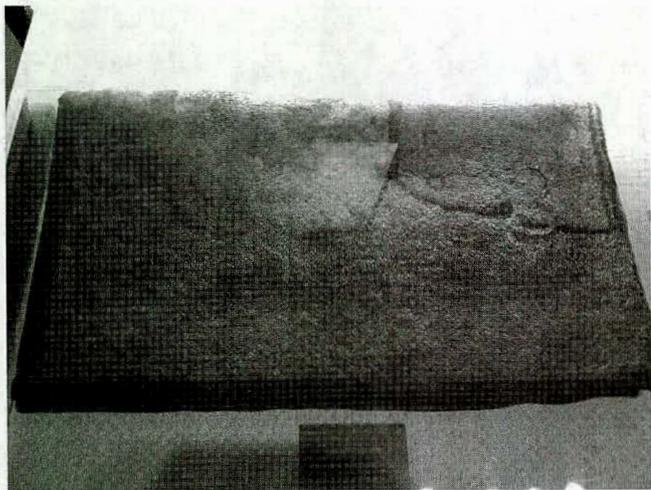


伍修权用过的铁床
(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险恶。11月8日，奉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留守人员全部撤回延安，光荣地完成了在抗战时期的艰巨使命。

1963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在互助巷2号的旧址上筹建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并于1981年1月正式开放。设有原状陈列、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甘肃抗战、兰州空战和红西路军事迹展4个展览。馆内共有革命文物150余件，照片170余幅，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2005年，被列为国家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2010年6月，开始对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建筑依照修旧如旧、还原历史的原则进行拆除重建，至2011年10月18日，完成封闭维修。维修依照20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维持其清末民初的仿古建筑风格，恢复重建了原始院落中的18间房屋，还原、重现当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原貌。新展馆整体由两部分组成，南面是旧式的四合院，大门朝西，



丛德滋的毛毯

并在酒泉路上。北面则是一座两层的现代化展览馆，门口有一座大型的八路军浮雕。整体建筑面积达 2893 平方米，并开辟出地下展厅。展览采用实物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手段，再现当年革命前辈生活过的痕迹。展馆设两个基本展览，分别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甘肃抗日救亡展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原状陈列展，共有历史图片 500 余张，历史文物百余件，伍修权用过的勃朗宁手枪、因营救西路军战士而壮烈牺牲的高金城曾使用的名片、丛德滋烈士用过的毛毯、抗日流血纪念章等一批珍贵文物也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新馆继续向市民免费开放，年设计接待能力 50 万人次。

2013 年 5 月，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星月交辉

——兰州西关清真大寺

兰州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市，也是一座古老历史与现代文明水乳交融的城市，除了汉族，回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达十万多人。作为全民信教的回族，一般来说，哪里有回民聚居，哪里就有清真寺，他们以清真寺为中心，围寺而居，兰州的回民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大多聚居在庙滩子、小西湖等处，从事商业、屠宰、牛奶及皮毛业、运输业等各方面的工作，为城市的发展默默奉献。据统计，1958年，兰州的清真寺多达34座，拱北有14座。“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真寺遭到空前的浩劫，除个别县（区）保留清真寺移作他用外，兰州的清真寺基本上被拆毁。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落实政策，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以及教众的集资募捐，各县（区）的清真寺陆续建成，各具风格。现在经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过批准开放的清真寺有 80 多座，拱北有十几处，城关区最多，这些清真寺的建筑因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规模有大有小，其建筑风格也各具特色。

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匆忙奔走的人流车流、嘈杂熙攘的街道商场，循着高耸入云的唤醒楼，在城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西关十字，便能很轻松地找到西关清真大寺。白色门楣上烫金题写的“兰州西关清真大寺”几个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唤醒楼、圣洁宏伟的圆形穹顶礼拜大殿和南北呼应的三层配楼，犹如众星捧月，显示出伊斯兰建筑特有的神韵，充溢着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气息。

西关清真寺是兰州本地最大和最有名气的清真寺，最初的兴建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穆斯林的商业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穆斯林使臣、商旅、兵士以及传教者的往来驻足，不仅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和风格迥异的伊斯兰文化，同时，也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带到了这座古道重镇。明洪武年间，往来其间的穆斯林客商便出资兴建了当时被称为“客寺”的西关礼拜寺。后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雍正七年（1729 年）及以后的多次修葺扩建，遂成“大礼拜寺”，这便是西关清真大寺的前身。清末，在今城关区范围内，有西关清真寺、桥门寺、绣河沿寺、南关寺、新关寺、新关尕寺、贡院背后寺、平番寺。

当时的西关礼拜寺是一组气势恢宏的中国宫殿式建筑群，屹立在袖川门内西关街，进出三院，占地 7.5 亩，由重檐飞翘的牌楼式寺门、独具特色的蓝琉璃瓦照壁、镶嵌“河州砖雕”的二门、小巧玲珑的月牙桥、四层六檐木结构的“唤醒楼”、可容千人礼拜的歇山顶礼拜大殿以

及简洁明快的穿廊、古拙质朴的三眼井等组成。礼拜大殿显要处悬挂历代名人所题匾额，殿顶布绿色琉璃瓦，屋脊竖铜制宝瓶 3 个。整个建筑布局合理，主次分明，错落有致，飞檐高翘，雕梁画栋，掩映于古槐翠荫之间。据《甘青宁史略》卷十五记载：“省城回教礼拜寺有五，惟西关规模弘敞。上盖琉璃瓦，与殿廷无异。”由此可见，当时的西关礼拜寺确实是规模庞大，享誉金城。再加上当时礼拜寺周围商铺林立、客商云集，甚至有四五百户穆斯林在此聚居，所以，每逢节日庆典，信众如织，沐浴礼拜，赞主敬圣，场面蔚为壮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兰州较早的六座清真寺之一，西关礼拜寺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20 世纪 50 年代兰州城区规划时，准备迁移西关寺，但周恩来总理特批予以保留，将马路改为单行道，分两道行车解决。遗憾的是，西关清真寺在“文革”中还是与其他兰州清真古寺一同遭受厄运，全被拆毁。

昔日的礼拜寺早已被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民族宗教政策，1983 年国务院宗教局主要领导来兰会同省、市有关方面与穆斯林商定，采取国家拨款、群众捐资的办法，在原址重建西关清真大寺，建成后向国内外穆斯林开放。重建工程从 1986 年开始，历时两年先期完成了圆形礼拜大殿一期工程，并于 1990 年投入使用。1996 年管委会再次筹集资金，进行唤醒楼、配楼、地下停车场等第二期附属设施建设，但因工程质量及资金短缺问题而中途停工。2000 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与伊玛目的发动下，成立了修建委员会，广大穆斯林慷慨解囊，并争取到世界伊斯兰发展银行的资助，修建委员会与工程建





西关清真大寺

设人员通力合作，终于在 2002 年秋季完成了二期工程建设。

新建的兰州西关清真大寺造型新颖独特，庄重素雅，在国内清真寺中独具一格。大寺总建筑面积达 1 万平方米，门楼为阿拉伯式的拱形门洞，四座直冲云霄的球形穹顶唤醒楼，高达 56 米，与礼拜大殿遥相呼应，与三层配楼融为一体，蕴含着希望祖国 56 个民族大团结的深刻寓意。大寺南北两侧的配楼设有干净整洁的沐浴室。礼拜大殿为仿制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风格，高 37 米，内设四层，底层高 3.9 米，设办公室、讲经堂等，上部三层为礼拜大殿，可容 3000 多人，跑马廊平面内设藏经室、休息室等。大殿平面呈圆形，进入大殿后，殿内朝向正对“克尔白”方向（麦加在兰州正西偏南 16 度 25 分的方向）。二层大殿与跑马廊为一连通空间，三、四层为一连通空间，四层之间可垂直连通，每个空间各有一“米哈拉布”标志朝向。四层外围设一回廊平台，供观光用，大殿周围设拱门 20 个，门高 17 米，殿中心上方有一扁圆壳，直

径 25 米。大殿宽敞明亮，窑殿顶部饰以浮雕阿文《古兰经》，有典雅的“米哈拉布”（凹壁），外观球形穹顶配以圆拱形立柱，在寺院四周四座高耸的唤醒楼衬托下尤为壮观。大殿前矗立的一株国槐有 500 多年树龄，见证着西关清真寺的历史。

如今，西关清真大寺成为现代兰州的一大景观，也是在兰州居住、经商、旅游的广大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目前，大寺中所藏经书已达 2000 多册，其中还有一部一百多年前的手抄本《古兰经》，弥足珍贵。作为兰州地区的中心寺，每周主麻日前来礼拜者达 2000 多人，开放十多年来已多次接待伊斯兰国家元首和海外游客，为促进我国对外关系发挥了清真寺特有的作用。清真寺不但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文化教育的大学校，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伊斯兰经学学者。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提高穆斯林整体素质，西关大寺增设“伊斯兰文化教育中心”，兴办各类学习班。已开办的有满拉进修班（男校），中阿女子学校、兰州西关中阿幼儿园、中老年学习班，每年寒暑假还开办少儿假期学习班等。通过学习，坚定了广大穆斯林的信仰意识，提高了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另外，还有一座历史悠久坐落在兰州市中山桥以南的回民聚居区桥门巷内的桥门清真寺。据传，早在明代桥门巷（街）即有一座简陋的清真寺。清康熙年间（1662—1722 年），由当地穆斯林名人刘伯阳捐宅地 8 亩，并由寺坊穆斯林群众集资，经其父子两代苦心经营，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扩建而成。桥门寺坐西向东，全寺由卷棚、大殿，后窑殿及跨院、沐浴室等建筑物组成，其中大殿、后窑殿及前卷棚均使用



重檐，且高大华丽，为国内古建筑中所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寺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现已重建。新设计的桥门寺以阿拉伯圆顶建筑为主体，两面配楼为中国古典式，前面有一装钟的唤醒楼，中阿合璧，别具一格。



桥门清真寺

欧美风格

——山字石礼拜堂

基督教有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国内的基督教）。天主教于光绪初年传入兰州。光绪八年（1882年），天主教会在皋兰县（今兰州市）通远门外畅家巷，由教徒张子厚奉献院落一处，修建为教堂，是为兰州设天主堂之始。

起初进入甘肃省的传教士，主要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基督的存在，从而对基督教感兴趣，以便发展教徒、建立传教区域，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在这样一种目的的驱使下，传教士们跋山涉水，遍游全省各重要地区，甚至一度远至新疆的伊犁。除了对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地理情况摸索、了解外，还随处分发六种语言的经书，以期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与当地民众互动了解，希望尽快地融入这个社会圈子。



1865年，英国人戴德生创立中华内地会，总会设于上海。英国传教士巴格道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兰州水北门租张姓房屋25间首建内地会福音堂，是为基督教传入兰州之始。巴格道后来成为甘、宁、青基督教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1913年，美国妇女捐款8万元，由内地会于次年在



山字石礼拜堂

兰州黄河北新建博德恩医院，为兰州最早的西医医院。1918年，基督教在兰州召开宣教师联合会，将兰州到河西的广大地区划为内地会的传教区域。1923年，内地会英籍教士安献今在南稍门外建华英中学。1926年，随着大革命的推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高涨，在兰州的外籍传教士撤出中国，全国基督教信徒发起建立本色教会，实行“自立自养自传”，于1943年12月倡议将内地会福音堂改为“兰州中华基督教会”，组织了堂议会，决定教会行政事务，但实际上与外国差会并未完全脱离关系，以后仍由外籍教士掌权。1944年，兰州又成立了兰州基督教会，强调“以圣经真理为原则”的基要信仰。自抗日战争开

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该教会甚为兴盛，到礼拜堂内参加礼拜的人很多，星期天有时多达六七百人。

1951年，兰州基督教会参加全市基督教界“三自”革新运动。1958年，该教会教堂成为各教会联合礼拜的教堂。1958年以后，兰州市的一切基督教信仰活动均处在停滞的状态。1966年至1976年，基督教会遭受冲击，教会机构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完全瘫痪，教堂被封闭，房屋被占用、拆除或挪作他用，宗教典籍和资料被焚毁，教会财产被冻结，宗教人士多遭批斗，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冤案得以平反

昭雪，教会重新恢复。1980年以后，兰州市又重新拥有了基督教活动的正规、公开场所。在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下，目前兰州市较大的基督教教堂在城关区有两处，分别是山字石礼拜堂和红山根礼拜堂。

山字石礼拜堂位于兰州市中央广场东北角，毗邻甘肃省人民政府。1885年，内地会直接设立兰州



山字石礼拜堂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山字石礼拜堂石碑

基督教会，其前身即内地福音堂，在皋兰县（今兰州市）拱兰门外五泉山麓，租用民房为堂址。自此兰州基督徒有了聚会点的信教活动。民国十年（1921年）英籍牧师任守谦以4000银圆购得城内山字石民宅地皮，占地985平方米，在今兰州箭道巷南口修建山字石基督教堂，1923年完工。修建教堂和房舍共19间，面积793平方米，成为当时甘肃最大的基督教堂。教堂用西式建筑风格，又融入中式建筑工艺，坐北朝南，为砖木结构的二进式四合院。一进院是典型的四合院，正对大门的礼拜堂，连同钟楼共三层，其他均为两层；二进院为平房。教堂内铺木地板，在当时的兰州极具特色。因其坐落于山字石街，故取名“山字石礼拜堂”。教会在城区外西柳沟等处设分堂，在沿途设有布道站，并在宁夏、青海设有分堂。“文化大革命”中该教堂被取缔，房屋为兰州市图书馆所占用。落实宗教政策后，山字石教堂、房屋于1981年全部归还兰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甘肃宗教局拨款

3.5 万元重新修缮一新。

1997 年 6 月，在原址上翻建，并于 2000 年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该堂采用西式教堂风格，造型美观，气势雄伟，是目前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礼拜堂。前楼高 6 层，在一楼裙边式门檐上竖立“兰州市基督教山字石礼拜堂”12 个大字。二楼以上安装高达 10 米左右的券形窗户 5 扇，其上为直径 1.5 米的圆形时钟一座。在攒尖式楼顶之上安装高 4 米多的红色金属十字架。与前楼连为一体的后楼为经堂，高 3 层，内部为阶梯式大堂，一次礼拜可容纳 2000 多人；其北端设讲台，后壁悬十字架，台前摆放条形桌，供牧师讲经之用。教堂有一支水平较高的咏恩诗歌团，以诵唱《弥赛亚》而闻名。另有姊妹诗班、青年诗班、儿童诗班，有三个年龄段的成长班，还有信仰班、栽培班、查经班（中文、英文）等。

关于山字石礼拜堂的修建时间，另一说是，1876 年，英国人义士敦、巴格道来兰州传教，并于 1880 年和另一位来兰州传教的女教士魏伊莉一起兴建了兰州市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山字石礼拜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文化的接触面越来越广，基督教信仰人群在兰州市呈直线上升趋势，目前，兰州市基督教信仰人数已达两万人。山字石礼拜堂自 1951 年以来一直是甘肃省和兰州市基督教两会的会址所在地，它独特的建筑风格给城市建筑的多样性增加了一抹亮色，基督教会在普世爱人的思想主导下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书法奇珍

——肃府本《淳化阁帖》刻石

兰州历史悠久，文物遗存丰富，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统计，单兰州碑刻就多达 1000 多通，为陇右碑刻之大观，现存古今碑刻（包括革命纪念碑）总数逾 500 块。在兰州的各类石刻中，目前已知最早的石刻是卫觐撰写的《汉金城太守殷君碑》，东汉光和元年（178 年）刊刻，碑石和碑文都已无存。现存纪年最早的石刻为唐代《故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铭》。

兰州现存的古今石刻，大体有以下几个类型：第一类是崖刻，也就是直接刊刻在悬崖峭壁上的石刻。这类作品存量极少，目前发现的只有 3 件，其中城关区有刘尔折刊刻在五泉山东龙口峭壁上的“玄崖吐液”四字。第二类是碑刻，数量极大，种类繁多。按碑文内容的不同，可大



宋拓淳化閣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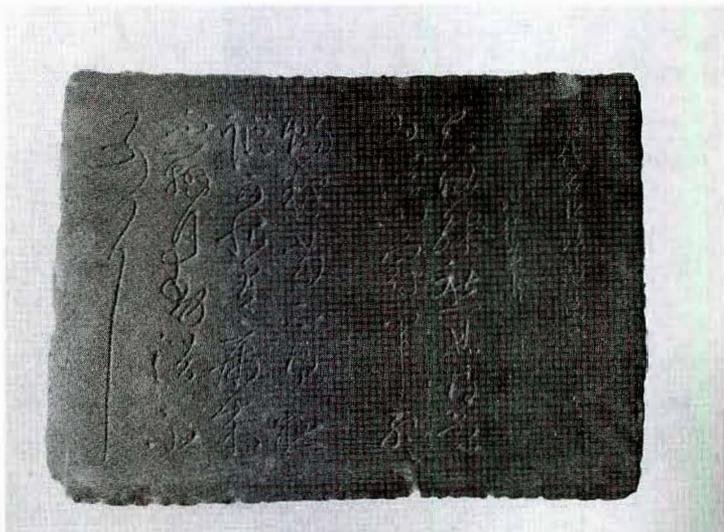
致分为以下几种。陵墓碑，如《彭泽墓志》；记事碑，如黄谏撰写的《金城关记》；纪念碑，如张维撰文、于右任书丹的《国民政府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公云亭纪念碑》；题咏碑，如原拂云楼上的“碧血碑”；书法碑，如兰州碑林所刻碑石。第三类是帖刻。所谓帖，就是学习写字或绘画时临摹用的样本。兰州现存的书法帖刻，只有肃府本《淳化阁帖》一部。鉴于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着重对《淳化阁帖》进行介绍。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时，后蜀、吴越和南唐宫廷收藏之富，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遂诏谕搜访，得到了大量珍品，将各地方小王朝的文物书画集中于汴京。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



代墨迹，命大臣王著精选后摹刻于枣木板上，并用当时名贵的歙墨和“轻似蝉翼白如雪”的澄心堂纸精心拓印，编辑成册，名《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淳化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至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至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共收入 105 人的墨迹 422 帖。《淳化阁帖》是一部专门整理出来供皇家研究用的书帖，其雕版一直深藏在皇宫内府。皇帝仅仅给一些重要大臣赐过拓本。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摹勒逼真，使前人书法赖以流传，故有“法帖之祖”之誉。它是我国法帖中的珍宝，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失火，原版全部焚毁，拓印本也罕有存世，极为珍贵。

明初，肃庄王朱模受封时，太祖朱元璋赐其一部宋刻《淳化阁帖》。朱模将其珍藏于肃王内府，秘不外传，代代交接。肃恭王曾将它取到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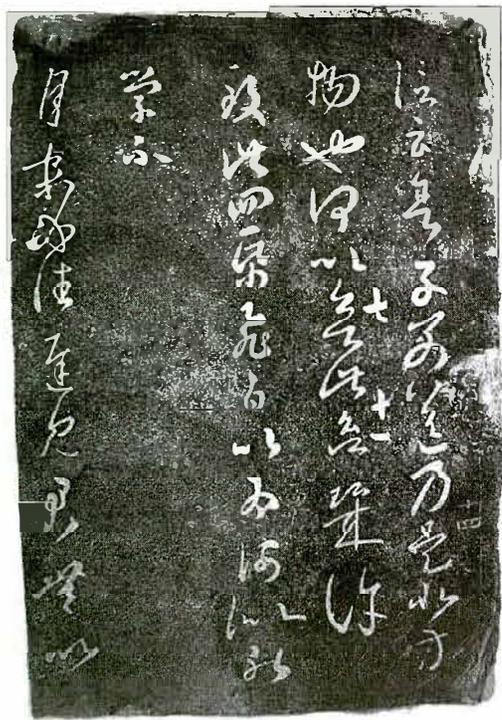


肃府本帖石

官习书，并题云：“勉夫小子云，不许与人。”足见其珍贵。

万历十九年（1591年）朱绅尧袭封，即肃宪王。万历年间，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张鹤鸣得到其友人李子崇所藏的一些枣木板阁帖，前来拜谒肃宪王朱绅尧，并恳请将所带阁帖与肃府所藏两相比照勘校。朱绅尧拿出所藏，李子崇与之相比，称其“媯遒劲，神采泛溢，大不类世所传本，如古法帖数段久已欠缺，兹本独全，的为宋拓无疑”。相对于以前历代肃王的秘不示人，宪王朱绅尧要有胸襟和眼光得多，他在临写之际，认为“恐我子孙与各王府不遍及，且无以公海内”，遂有了公诸

天下、让阁帖为海内共享的义举。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朱绅尧命温如玉、张应召将阁帖摹刻上石。温如玉，字伯坚，苏州人，工书法，习真草隶篆各体。曾游学吴越、荆楚、燕赵、秦陇，致力于金石文字的搜集与整理，对勾勒碑帖有高深的造诣。张应召，字用之，山东胶州人，善书画，师事温如玉，习金石镌



拓片



文博精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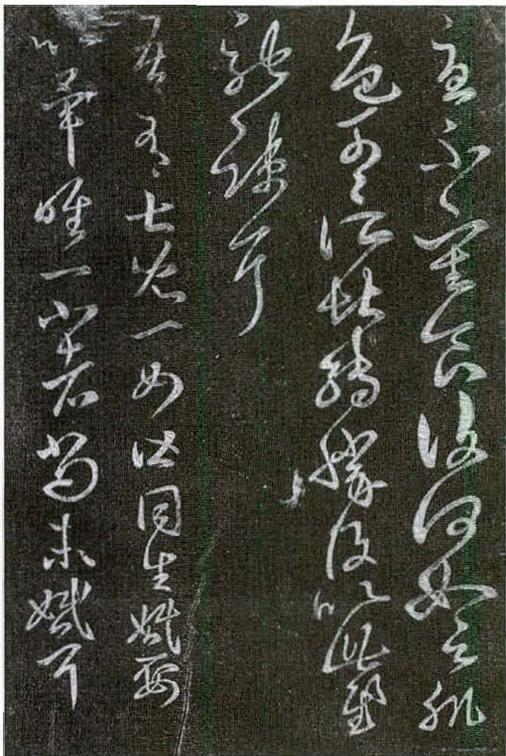
城关文物

古迹

胜览

镂之术。要通过雕刻惟妙惟肖地表现古代书法大家的运笔、书风确非易事，他们师徒二人“朝暮作对，若面壁达摩，雪没胫而弗退也”“纸凡数易，石必再更”。据说，温、张二人闭上眼睛的时候，面前出现的都是阁帖。

但书碑尚未刻成，肃宪王朱绅尧却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去世。朱绅尧之子识铉



拓片

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袭封。识铉继承乃父遗志，先后历时七年乃成。肃府本《淳化阁帖》用144块富平石刻成。富平石一名“铜磬石”，产于陕西富平县，石质坚润，击之铿锵有声，用以镌刻碑帖，楔口平齐，历久弥新。该帖刻成后，收藏于肃王府东书院遵训阁内，被视为珍宝，称《肃王府本》，又称《遵训阁本》。各卷末除照刻宋本款识外，新镌“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隶书三行。由于雕刻者为书画名家，故笔势洞清，摹勒俱精，得宋拓本的妙意，在明代翻刻阁帖中居于首位。

倪苏门《古今书论》评论道：“淳化帖在明朝，惟陕西（当时陕甘尚未分省）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上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拓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郑学孚在《夔帖举要》中也说：“明翻刻阁帖，以肃府本为最佳，跋语亦最多。”今存肃府帖初拓本，笔力遒劲，纸好墨匀，清新悦目，人称“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

尽管明肃本声称是宋刻元拓本，其实并不是原本，它乃采取各家之长补缀而成。只有前八卷摹自宋拓《淳化阁帖》原本，其他有些摹自南宋《淳化阁帖》别本。可见，肃府本《淳化阁帖》是宋元以来淳化阁帖的综合，因此成为明朝重摹《淳化阁帖》中最具盛名、流传最广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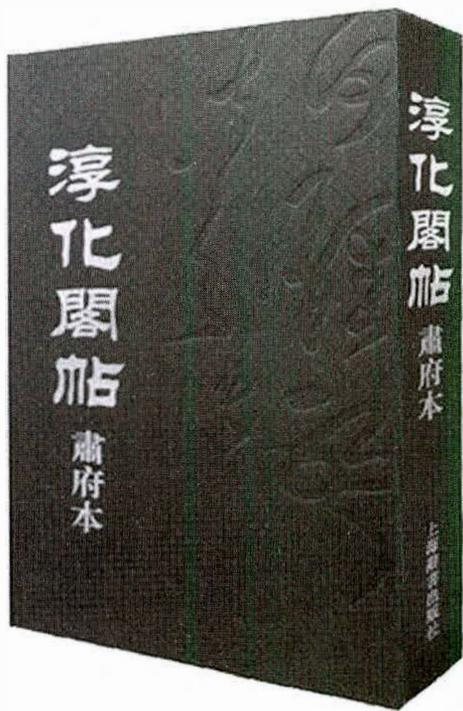
此后，以刻石为本明肃府本拓写日多，流传甚广，成为现存时代较早、摹刻较精，而又保存完好的一部法帖原石。由于帖石的完残程度形成了几种不同时期的拓本，大致可分为明拓本、清早期（顺治十一年补刻后）拓本、清中期（乾隆至道光年间）拓本、清晚期（咸丰至清末）拓本、民国拓本等五种，明拓本完好无损，仅几处有细纹。清代重摹肃府本成帖的有三家（另据秦明智文）：一是现存于西安碑林的《费甲铸重刻本》，就是依照肃府初拓本摹刻的一种版本。二是江苏溧阳县保存一部阁帖的《溧阳虞氏重刻本》，镶嵌在该县别镇虞氏宗祠的壁间，是按肃府早期拓本重摹上石，每卷末照刻肃府本款识。三是南京博物馆藏《清拓重刻本》，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肃府帖重摹本，是肃府



本经补刻后的拓本。肃府本发现的三种子本，有两种是帖石，它从兰州扩展到了全国，足见肃府本的摹刻水平和艺术价值及深远影响。肃府本《淳化阁帖》为文人临写与馈赠文友的上品。1925年4月9日，陈万里在游兰州时看见明肃藩所刻《淳化阁帖》，每部三两，遂购买数部，分赠太原、西安诸友（《西行日记》）。

肃府本《淳化阁帖》刻成后，曾多次遭到破坏，历经磨难。明、清之际，帖石佚失，损坏多块。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部将贺锦攻破兰州，冲入肃王府，纵火焚烧，府中大乱，肃府本《淳化阁帖》数方碑石被毁，还有部分散落民间。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官陈倬到任之初，目睹阁帖残破之惨状，即组织人工财力，聘请陈曼仙、毛香林补摹40余块，将残损阁帖竭力补刻整齐。康熙十三年（1674年），陕西提督王辅臣举兵叛清，十四年二月攻陷兰州，将阁帖碑石做马槽，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之说。三月，清军征伐叛军进取兰



淳化阁帖肃府本

州，叛军欲将阁帖碑刻当作炮架，移置城防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这时兰州知州徐某获悉，急忙赶到王府，冒死力救，叛军才未作军用，然而部分刻石仍难逃厄运而遭遇破坏。

左宗棠督甘时，将此肃王遗物交文庙保管。光绪末年，兰州籍翰林刘尔忻将王府阁帖移至兰州府文庙尊经阁保存，并新刻木板释文 40 块，以臻完备。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日机轰炸，保护阁帖，又移碑帖藏于官园丰黎仓内的地窖之中。日本投降后又移出，重新安置在文庙尊经阁下（今兰州市第二中学内），此后，受到甘肃教育家、留学美国并荣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的赵元贞的长期保护。一次赵元贞出差宁夏，《淳化阁帖》被全陇希社挖出后收藏在丰黎义仓，一时要求肃府本《淳化阁帖》归属的单位很多。他回兰后，向执政当局据理力争，将其要回归志果中学保管，安装在尊经阁深檐下。

1966 年，碑帖原石被移至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现存 141 块，石高 27.4~34.5 厘米，宽 36.5~40.7 厘米，厚 5~8.9 厘米，大都为两面刻字，也有仅刻一面的。据了解，阁帖肃府本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全的阁帖，目前有记载的全套国内只有两套，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收藏。1996 年 9 月，阁帖碑刻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确认为国家级文物。

1965 年，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后任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王毅在北京荣宝斋发现明代肃王府拓本《淳化阁帖》（10 本），因为知道碑拓出自甘肃，所以出资购买后，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明代肃府拓本存世罕见，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5年，庄浪县博物馆在整理馆藏古籍善本时发现一套明代肃府本《淳化阁帖》拓本，全套共10册，每册均用桐木板制作封皮。该拓本长31厘米，宽20.5厘米，拓印精细，精裱工整，保存完好。卷首有“历代帝王法帖第一”“汉章帝书”字样，第十卷后有明代肃世子、张鹤鸣等人的题跋。经考证，该拓本属兰州肃府本，为研究兰州肃府本《淳化阁帖》提供了又一珍贵的实物资料。

明肃王府在兰州由宋刻本摹成的版本，是现存时代较早，摹刻较精和保存最好的一部法帖原石。甘肃现有三套《淳化阁帖》碑刻，一套是省博物馆保存的明肃版《淳化阁帖》；另一套是2000年建兰州碑林时镌刻的；还有一套是兰州二中重刻的《淳化阁帖》。兰州碑林所刻《淳化阁帖》在肃府本原石的基础上，进行改动，其中把肃府本的双面刻，改成了单面，这样便于展览。

《淳化阁帖》在1000多年前以最高规格面世，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一，其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明肃府本《淳化阁帖》作为祖本各种翻刻本中的最善本，无疑是甘肃的、也是全国的文化瑰宝。祖本的残缺，使得这一瑰宝的价值陡然上升，无可估量。

2009年12月，限量1000套的《明肃府本淳化阁帖》正式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开发、宣传明肃府本《淳化阁帖》是增强兰州乃至甘肃文化软实力的又一张内涵极为丰富的特殊“名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

都市古韵

明代古刹白衣寺

人们从庆阳路走过时，在沿街一处古朴典雅的院落里会看到一座白色的古塔力压围墙巍然耸立，它便是白衣寺塔，是白衣寺仅存的建筑。在这个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林立蔽日的都市中心区，白衣寺塔像一曲高山流水的古乐掺杂在此起彼伏的现代流行音乐大潮中，但却卓尔不群，混而不乱，意蕴空旷悠远，为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抹上一笔淡雅、古朴的文化色彩。

白衣寺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因寺内大殿绘有白衣大士像而得名，尊奉白衣菩萨。据寺内清咸丰十年立《重修白衣寺塔记碑》载：“白衣寺为前明肃藩王所建。相传乃王妃之功德。”原寺院由北向南开，寺内建筑物有：白衣菩萨大殿，多子塔（又名白衣寺塔），塔后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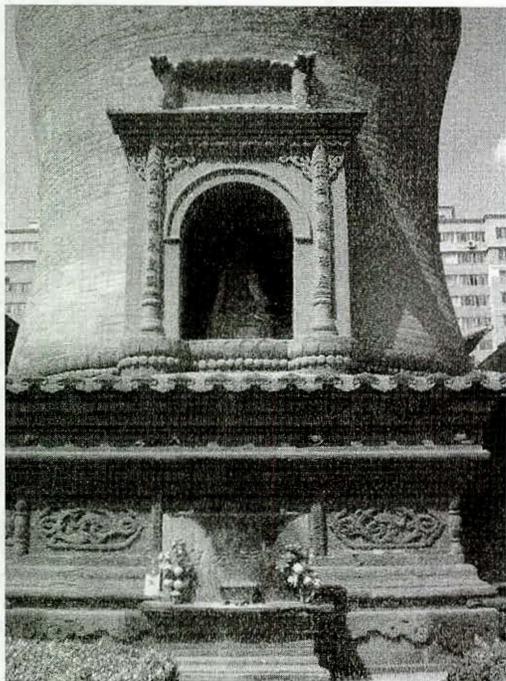


是二层楼的观音阁（一楼）、文昌宫（二楼）。东侧由南向北依次是伽蓝祠、送子将军祠、送子催生子孙三慈母宫。西侧由南向北依次是土地祠、厕所，旃檀神王庙、眼光痘疹庙、三慈母宫。后经多次战乱，致使僧去寺毁，只有白衣寺塔幸存至今。

白衣寺塔是一座 30 米高的实心砖塔，塔基为错牙式方形，长、宽各约 7 米，高约 2.8 米，四面均为砖雕传统吉祥图案，以把莲纹、暗八仙、吉祥动物为主，在塔座上下缘雕有半露满子的石榴、垂累的葡萄枝等图案。把莲、石榴、葡萄等这些题材均象征着多子，即白衣寺多子塔是为明肃王家族祈子而建。塔身下部呈覆钵状，高约 8 米，最膨大处直径约 6 米，正面与塔基联结处开有一个佛龛。龛内原供佛像三尊，“文化大革命”时被毁掉。塔身上半部为八角形锥体，高 18.5 米，共有 12 层，每层每面各开佛龛 1 个，内各塑佛像 1 尊，共计 96 尊；每层每角悬挂风铃 1 个，共计 96 个；塔刹高约 1 米，形若宝瓶，以外镀铜的金



白衣寺



白衣寺塔局部

属做成。龕外两侧有砖雕对联一副，原文是“玉柱玲珑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图”，横批是“耸瞻震旦”，题款“太华道人崇祯辛未夏之吉”。“太华道人”是末代肃王朱识铤的别号。对联明白地表明了祈子关系明朝皇权永固，宗教信仰的功利性很强。

传统的中国佛塔建

筑为单数，一般多为7级、9级、11级、13级。但白衣寺塔为何建了12级，至今令人费解，成为一个谜团。中国塔的形制很多，有喇嘛式塔、金刚宝座式塔、阁楼式塔、密檐式塔，后两者中国化色彩明显，一般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而白衣寺塔则由塔基、覆钵、塔身和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下部为覆钵，为早期印度佛塔的特征，覆钵以上则为中国化的楼阁式。白衣寺塔，属于喇嘛式塔和楼阁式塔相糅合的产物，是藏传佛教与中原建筑风格的典型结合体，可以说是中印合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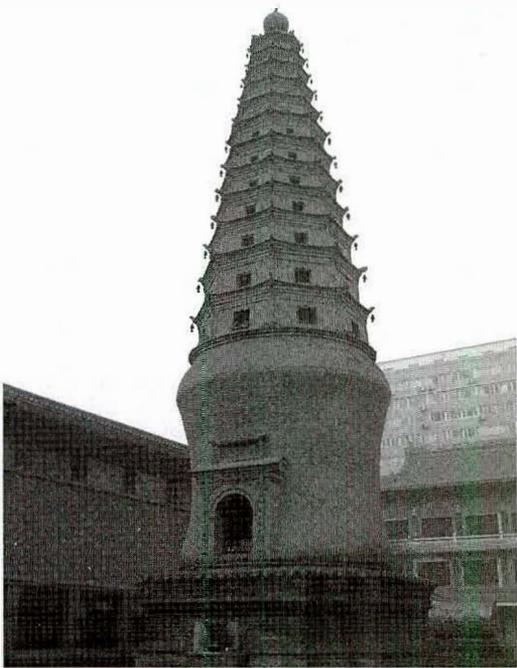
可惜的是，塔建成没有多久，李自成的部将贺锦就攻入了兰州城，末代肃王也自身难保，在逃亡途中被抓回而遭农民起义军所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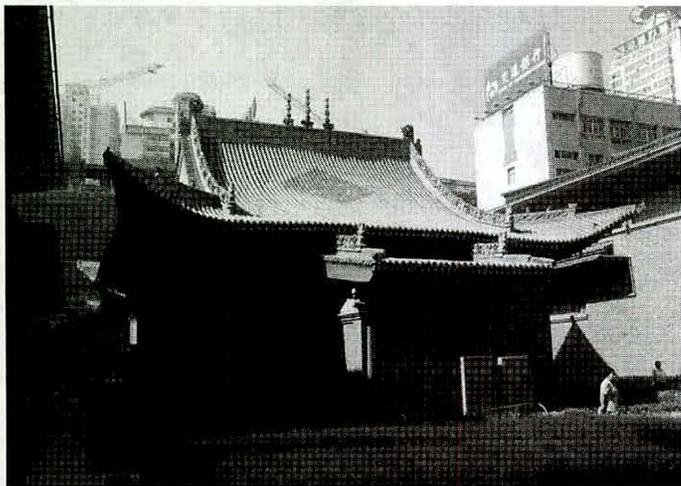
自明朝灭亡后，经多次变乱，寺院被毁，只有寺塔保存到了今天，可谓是硕果仅存。这座塔从建成至今，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在历次地震中，这座塔安然无恙。1939年，兰州东关发生火药库大爆炸，火药库周围的部分房屋被炸毁，而距离爆炸地点不远的白衣寺塔却依然屹立，可见当时工匠的高超技术。

清代黄璟撰白衣寺观音阁联：“指普天之青云，两只佛手；视众生如赤子，一片婆心。”同治年间（1862—1874年），有位署名“江南游子”的诗人，曾在白衣寺塔的塔墩上题写五言律诗一首：“大士白衣旧，空庭彩壁残。万家罗战火，一塔插云寒。风动铃声远，霞披龕影丹。梵门开八面，何济众生难。”据此推断，当时白衣寺因为兵荒马乱等原因，香火已不旺盛，已是佛像陈旧、殿空壁残、一塔幸存的凄凉景象了。

白衣寺塔并非全为“实心”，其间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秘密，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宝藏。1986年2月，兰州市博物馆对白衣寺塔进行



白衣寺塔



菩萨殿

维修，当人们揭开塔顶天宫时，发现里面藏有佛经、鎏金铜佛像、白瓷人物造像、提花丝巾、金质“永远之宝”供养钱、两件观音造像簪、董其昌亲笔书写荷包等 20 余件（套），多为明代稀世之宝。

董其昌亲笔书写荷包即玄宰款香包，呈长方形，长 7.1 厘米，宽 4.7 厘米，由淡黄色丝绢缝制而成，内部填充有香料，可以辟邪防病，上端置花结形系扣，以便佩戴，下接流苏。一面为二句五言“怜君有丰节，不为岁寒催”的咏梅诗，字体秀润柔动，飘逸自然，题款为“玄宰”；一面为玄宰款的疏枝淡梅图，仅寥寥数笔，就生动地表现了梅花侧转出枝之势和梅瓣圆润傲寒的气节。“玄宰”为明末书法家、画家董其昌的字，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其作品素有“画落玄宰，书落其昌”之说。董其昌除书法造诣精深外，还以画梅名冠当时，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据传，董其昌与肃王交情深厚，故赠此诗文香包，肃王又将香包与其他物品一起供奉于白衣寺塔刹之内，以示虔诚。



两件观音造像簪工艺复杂精美，簪挺上镌刻有明确纪年“崇祯伍年”（1632年）铭文以及肃藩王妃的姓和身份，明确了多子塔是肃藩王家族为祈子而建，极为重要。1996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专家组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定名为“金螺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及“金螺丝嵌宝石白玉观音簪”。

两件发簪以明代发达的金嵌珠玉工艺制成，其用材主要有金、玉、银、珍珠、红宝石等。造像均为质地上乘的白玉，边饰则用了大量的细金丝，并使用了宝石和珍珠。从制造工艺上看，观音造像以切割、雕刻、琢磨、抛光成形，装饰部分则主要使用累丝工艺，即用极细的金丝编成把莲题材，镶以珍珠、宝石，还使用了锤揲、焊接、镶嵌、施珐琅彩等技术，尽显其华贵富丽，完美再现了明代发达的细金工之高超技术。

这两件簪其实际功用无疑是簪发，然而作为施入塔内之物，则为专用供施物而非实用簪。两件观音造像簪表达了祈子内涵，而祈子与终明一代，肃藩王家族的子嗣不旺，影响了王位的世代承袭有关。在两件簪的装饰上，除了寓意连生贵子的把莲题材外，还有造像背后用细金丝编成的网，回纹连续不断，“由于回纹形状绵延，故而被民间称为‘富贵不断头’，被作为象征神、禄、寿、世代、国运等深远、绵长的吉祥物”。在把莲莲叶的处理上也多具缠枝意味，以寓生生不息，绵长不绝之意。

关于簪子的主人肃王妃熊氏在景泰有一段民间故事广为流传。在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年），一天肃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在

王府上空盘旋三圈后，向北飞去。肃王的术士说，梦的意思是王妃要在北方寻找。于是，肃王派出太监护卫，拿着一面宝镜，一路向北寻找王妃。他们通过龙沙古道，来到了永泰城，永泰城的官员得知消息后，决定在城内的隍庙里唱三天大戏，吸引周围的女子前来，以便王府人员挑选。唱戏这天，永泰城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王府的人拿着宝镜四处查探，结果大失所望。宝镜中没有显示哪位姑娘是未来的王妃。到了第三天，王府的太监发现一位满脸疮疤的女子躲在柱子背后看戏。他无意中拿出宝镜一看，大吃一惊，发现一只凤凰盘旋在柱子上。太监认为，这位满脸疮疤的女子就是他们要找的王妃。肃王府的太监没有办法，只好冒着危险将这位姑娘请上车，准备返回兰州交差。车队走到半路上，轿车中的熊姑娘说，她浑身发烧要到路边的水池中洗一下，谁知这一洗，脸上的疮疤、身上的皮痂全部脱落了，熊姑娘变成了聪明美丽的姑娘。演绎了中国版灰姑娘的故事，给这座多子塔又平添了几分浪漫与美丽的色彩。

1981年9月10日，白衣寺塔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3月，省、市政府拨款10万元对白衣寺进行修复，重修了白衣寺大殿，采取不落架施工，拆除旧土坯墙，改砌青砖墙；清除破瓦脊，新挂筒瓦顶；木装修去新复古，彩画依旧复绘。1986年8月，市政府拨款20万元修缮白衣寺塔。采用钢筋混凝土薄壳结构加固塔基后，重新镌刻须弥座砖雕，给覆钵塔身加钢箍三道，修复大小佛龕，补铸纪年风铃，修复塔刹。文物工作者们经过修缮后，在塔顶内存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数本，以及五谷、维修白衣寺塔记等。



1991年，兰州市博物馆迁入白衣寺。经过多年的如旧修复，恢复了寺院大门（原江西会馆铁柱宫大门原样迁此）和白衣大殿（现市博物馆展览大殿），以及展览厅、办公室、文物库房等四层综合仿古大楼一栋（原观音阁、文昌宫二层楼旧址）。这个本身就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又肩负着文物收藏的使命，且经常举办各种书画展览，诠释着兰州市浓厚的文化气息、深厚的历史沉淀。



肃王旧邸

督署省政府



明肃王府建于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迄今六百多年，历经明、清、民国，直至今天，一直是甘肃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和中心所在地。六百余年，这里走过天潢贵胄养尊处优的历代肃王，权管陕甘宁青新顶戴花翎的总督，以及民国时走马灯式变换的都督、将军、督军、省长、省主席们，多少风云往事，尤其是朝代更替时的天翻地覆，刀光剑影，是非成败，皆化为烟云。肃王府故址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所在地，虽然旧时建筑已寥若晨星，但依然肃穆、庄严、神圣。

明初，太祖朱元璋大封诸子以拱卫朝廷，以期江山永固。第一代肃王朱模，为朱元璋庶十四子，洪武九年（1376年）九月二十七日生，母妃邸氏。洪武十一年正月封汉王，洪武二十五年改封肃王，就藩甘州



(今张掖)。明惠帝建文元年，朱模请求内徙，得到允准后遂移藩兰州。朱模和其他诸王一样地位崇高，其“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西拜谒，不敢钧礼”。

朱模将兰县县治迁往城西南 150 步（原永昌路大众市场），而将原来在城北的兰县衙府改建为肃王府。把今隍庙以东至会馆巷以西，张掖路以北、滨河东路以南的大片地区圈为王府用地，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室，扩建王城。对于王府的建设规模，历代王朝都有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以防僭越。明朝时在《皇明祖训录》中规定诸王不许有离宫别殿，所以在构建肃王府时力求将园林与府宅融为一体。府邸墙高 1 丈，周垣 3 里。中部为府署，东、西、南三面均有府门，正南为三座仪门，进中仪门为棂星门，后有端礼门，再后有承运殿、存心殿，再后即肃王府宫，分东、西二宫。府署东、西、北三面为王府宫苑。东苑花园称凝熙，是肃王及妃嫔游憩之地，园内“垒石为山，因泉为池，山下洞壑幽远，逶迤数里”，亭台水榭，树木葱郁，北滨黄河，景色优美，俗称大、小“山字石”。假山下有洞，洞有塑像。据说洞下可通至城西雷坛，窥之黝然而深黑，莫敢入者。洞北有斗母宫，层楼高耸，可以远眺。府署后北就城墙建拂云楼，与北山对峙。城下立有肃庄王的诗碑，城墙上嵌有“古长城遗址”五字。拂云楼为歇山顶二层木阁楼，通柱造结构，各层均明柱回廊，上有“拂云楼”与“江山耸翠”匾额。遥想当年，文人墨客登临此楼，举一杯清酒，俯瞰滔滔黄河，抬望巍巍白塔，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何其畅快！

肃王们养尊处优，地位尊崇，但是经过靖难之役后朱棣登上了皇帝

宝座，这位不是嫡长本来没有资格和机会合法继承皇位的永乐皇帝，因自己是藩王身份，并通过武力夺取皇权，所以对藩王们戒惧心理很重，便开始了对他们的严密监控与束缚。历代肃王虽然生活优渥，但免不了郁郁不得志之情，苦闷之余，大多喜欢书法，而且都颇有造诣。在肃王府北城墙拂云楼的西侧竖有一块石碑，上刻主持刻制了著名肃府本《淳化阁帖》的肃宪王朱绅尧的一首诗，《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州》：“边城春柳解娑娑，别殿香风舞彩罗。白简暂违双凤阙，丹衷直上五云阿。平戎漫讶龙堆远，策马频从鸟道过。最是识荆离乱后，不堪回首阻关河。”字体为狂草，笔力劲逸，龙蛇竞走，铭有“肃藩翰墨”“磐石之宗”两印。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闯王李自成派贺锦率部队西进甘肃，攻陷兰州。于是肃王府大乱，肃王朱识鋹逃至半路被生擒遭到处决。肃王妃颜氏、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仓促率宫人二百余，由花园奔上北城墙，欲投河自尽，由于闯王部队追了上来，颜氏当即以头触肃宪王诗碑而死，其余妃嫔人等尽皆自尽。据说，此碑天阴雨湿时，肃妃血渍隐然可见，遂称为“碧血碑”。其后，封疆大吏、文人墨客凡游览拂云楼者，必观碧血碑，吟诗作赋，题写对联，给这位以身殉礼的弱女子以同情与赞扬。

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督署后园建烈妃庙，并为文记之，曰：“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困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加明。精诚所至，金石亦开，曷足异也。”左宗棠亲书对联



云：“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光绪元年（1875年）曾任乌鲁木齐都统的景廉被朝廷调往京畿赴任，途经兰州时游览了节园，看到碧血碑后，写下了《碧血碑》一诗：“殉夫兼殉国，生气凛然存。一代红颜节，千秋碧血痕。乾坤留短碣，风雨泣贞魂。凭吊曾悲感，楼头日色昏。”清代进士王烜曾赋有《碧血碑词》一首：“拂云楼，矗城北。下有碑，号碧血。碧不风吹尽，血不雨淋灭。缕缕留殷血，天阴乃赫赫。嗟乎颜与顾，千秋犹芳烈。”1976年，此碑与左宗棠书写的《正气歌碑》，一同移至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供游人观赏。

明肃王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封藩以来，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破兰州，历经252年，共9世，11王。在兰州历史上，作为皇室宗亲，他们与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兰州生活繁衍，几乎与有明一代相终始，对兰州的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几乎每个角落都曾留有他们的足迹。在明代的大力建设下，兰州终于呈现出大城市的风范。而肃王府便是记录他们荣辱哀乐、生活点点滴滴的场所。

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狄道进士张晋在游览了肃王府后，写下了《过故肃邸》：“直北王宫天与齐，寒烟深锁大荒西。斜阳尘掩红棂闭，古木云封苍叶低。帝子渚光花漠漠，王孙阶上草萋萋。可怜歌舞当年地，几树残杨鸦乱啼。”这时距肃王府废弃尚不足十年，昔日享受荣华富贵的天潢贵胄们已是烟消云散，肃王府也是物是人非换了人间，只有碧血碑掩映在荒草萋萋之中，颇有黍离之悲。

清初肃王府改为巡抚府，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改为总督府。后经甘肃巡抚刘斗、陕甘总督那彦成等人的迭次改建，将旧址扩建为后

苑、四堂、三堂、二堂、大堂。据《甘肃新通志》载：“总督府方广二里，中为大堂，堂前东西为官厅，为巡捕厅，后为二堂，堂东为大书院，为‘集益轩’，又后三堂，最后为内宅，为花园。大堂为宜门，门外为立中居正坊，坊东为土地祠，西为集房，东为大门，又南辕门，辕门外旗杆各二，署东为箭道（新设督练公所于内），署西为笔帖式二署。”晚清衙门前有三个牌坊，正面牌坊高大，上书“宪纲文武”。东西两牌坊稍低，东曰“控制三边”，西曰“威震西域”。门前立14丈高的方斗旗杆两根，悬挂的杏黄旗上书陕甘总督官衔，严整威武，气派非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赴新疆伊犁，途经兰州，在日记中写道：“其署中后园甚宽整，连及北城，之上有楼曰‘拂云楼’，登楼望北岸诸山，俯瞰黄河，眼界颇佳。其下有小碑林，镌刻（怀）素、米（芾）、董（其昌）诸帖于壁，皆那文毅公（那彦成）所留物也。”

督署有后花园，称节园，因巡抚总督有节制军队之职掌故名节园。光绪年间（1875—1908年），总督左宗棠重修节园。园北有阁曰“澄清”，引黄河水经其前汇为二池，东行北折。砌外垣如雉堞状，曰：三受降城。河水复南引绕“瑞谷亭”之东，以东南出园。有巨石矗立，左宗棠题之曰“砥柱”。出园外南复为池，名曰“饮和”。砥柱之西有土山，左宗棠题曰“太华夜月”。山之西有亭曰“一去”。其南为贞烈遗阡，阡上有亭。澄清阁西有烈妃祠，旧为“延禄亭”。“太华夜月”之前旧有屋，曰“环碧山庄”，左宗棠改为忠义祠，祀肃藩、僚属及总督杨岳斌从之死难者。其东有碑洞，原为那彦成所修。园西墙外亦有池，



名曰“挹清”。挹清、饮和池之水，与民共之，汲取者时属于途。园北，登则至拂云楼。左宗棠在节园，曾留有不少楹联、诗文。澄清阁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拂云楼联：“积石导流归大海；崆峒倚剑上重霄。”节园榭亭联：“八月榭横天上落；连畦菜长故园春。”饮和池联：“空潭泻春，若其天成；明漪绝底，饮之太和。”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府作为督军署；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改为甘肃省政府。甘肃省都督、将军、督军、主席的办公所在地仍为明肃王府故址。府内其他建筑基本保持原貌。1911年3月，三堂后大楼7间失火被毁。抗日战争中二堂5间遭敌机炸毁，大堂改为中山堂。中山堂的楹联为“惟公揭平等自由独立解放之旗，唤起四百兆同胞，有如春风来临，瞻仰遗容思报国；此地乃金城王塞古杰时贤所在，继承五千年历史，好挟黄河东下，誓除倭寇出重洋。”节园民国时期为省府后花园。民国八年（1919年），督军张广建于澄清阁西烈女祠东建一亭，曰“来鹤”，据说民国四年（1915年）曾见有鹤来栖园中，遂建亭以志。

民国十二年（1923年），督军陆洪涛凿池船亭之南，遍植以莲芡；又筑室园西北隅名曰“柳庄”。民国十五年（1926年），改为中山东园。陆洪涛为柳庄作楹联：“躬耕乐道追莘野，抱膝长吟忆草庐。”

1936年4月，庄泽宣《西北视察记》记载：“省府后花园原为节园，面积甚大，有亭榭花木之胜，余初至时梨花盛开，自青（海）归来，则牡丹已含苞欲放。”“园之中央有榭亭，高形阜上，其形如榭，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所建，现为省府会议厅宴会宾客处。榭亭前后牡丹颇多，盛开时每株开花一二百朵，每朵大可三四寸，丰腴



民国时期的甘肃省政府

艳丽，为各地所无。东数步为贞烈遗阡及忠义冢，东北隅长廊曲折，旁有翎毛鸡、狗熊等奇禽异兽数种，围以铁丝；再北有碑洞，壁间嵌怀素、米海岳、董香光诸先贤手迹。过北山一门，古长城也，相传为秦蒙恬督军所筑。城上有楼，旧称源远流楼，创建时代已不可考，今称拂云楼。朱绍良在任时，加以修葺，窗扇栋宇，面貌一新。楼高二层，北临黄河，铁桥横亘于上，翻水车轮远挂城边，南望兰垣了如指掌。”

从1912年3月到1949年8月，将近38年，甘肃省督军、将军、民政长、都督、主席共20任（不含马鸿逵、王治岐）在此办公，发号施令。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旧政权，标志着国民党在甘肃统治的结束。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省政府仍设在明肃王府所在地——中央广场1号。民国时期省政府后花园（中山公园）为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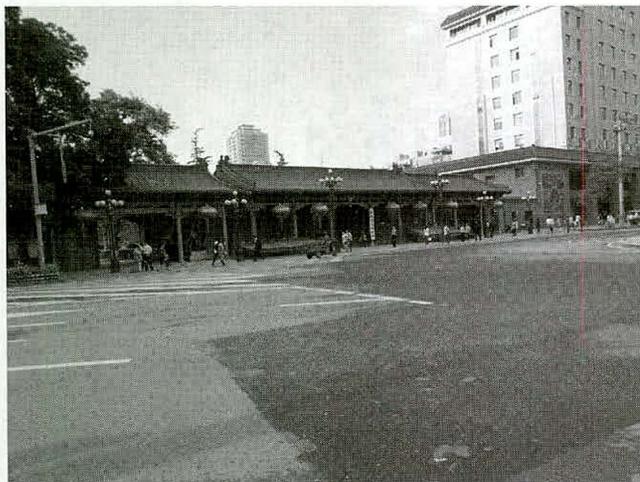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央广场

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后市人民政府他迁）。原后花园的一切建筑设施，包括古城墙、拂云楼、望河楼等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皆已拆除。1953 年 8 月，开工建设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1954 年 6 月建成，为三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 4849 平方米，绿色琉璃瓦大屋顶，具有鲜明的民族建筑风格。2004 年，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又拆掉重建，有地下室，地面建筑为框架式四层，8000 多平方米，也是琉璃瓦大屋顶，更加高大宏伟。

历经明、清、民国时期的肃王府，现保存的只有省人民政府的大门、中山堂（原大堂）。大门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初为明肃王府“朝房午门”，清代为陕甘总督署辕门。占地面积 200 平方米。该门坐北朝南，为五架梁双坡悬山顶结构，琉璃筒瓦屋面，饰雕花正脊一条，垂脊四条，脊端饰正吻、垂兽；明、次间前檐明柱，安装三楹六扇全板大门，前檐饰雀替、荷叶隔架墩等木雕饰件。



今日甘肃省人民政府

2004年，对原省人民政府大门进行了新的设计修建，将原大门作为一座正门，增建了东西两座偏门，东门为进口，西门为出口，中间正门一般不行车、行人。三座大门建筑风格一致，浑然一体，都是民族式的大屋顶，雕梁画栋，再现昔日肃王府的辉煌。从门中可以直接看到洁净、幽雅政府大院。远远望去办公楼、中山堂、大门，古典建筑宏伟华丽，现代建筑高大气派，相得益彰，和谐唯美，实为兰州一大景色。

中山堂始建于清代，原为陕甘总督衙门正堂。1953年，改建为省政府中山堂。占地面积438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为七架梁双坡悬山顶套前厅四檩卷棚顶结构，正殿七间，前厅五间。屋顶绿瓦、垂、脊饰以仙人走兽，窗户透雕。檐下椽檩，有装饰彩绘、四时风景、人物花卉，以红色、深黄色（俗称酱色）为基本色调，八根红柱，耀眼夺目。经过修缮，更加金碧辉煌。中山堂正门原为喷泉，2005年，从江南购运了一座高大的整体太湖磷石，显得古朴清秀，傲然屹立。中山



堂面对大门，道路两旁植有国槐、青松、鲜花、柏树。

肃王府迁至兰州，极大地改变了兰州在西北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兰州由军事重镇向大都市发展，促进了兰州市的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兴盛，使兰州特有的民情风俗开始形成并传承至今，对明代及其以后的兰州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昔日的王府及拂云楼已成记忆，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古建宝库

—
五泉山

五泉山公园位于兰州市城南的皋兰山北麓，海拔 1600 米左右，因山中有甘露、掬月、摸子、惠、蒙五眼泉而得名。相传霍去病征西，曾驻兵于此，士卒疲渴，霍去病手持马鞭，连击五下，鞭响泉涌，遂成五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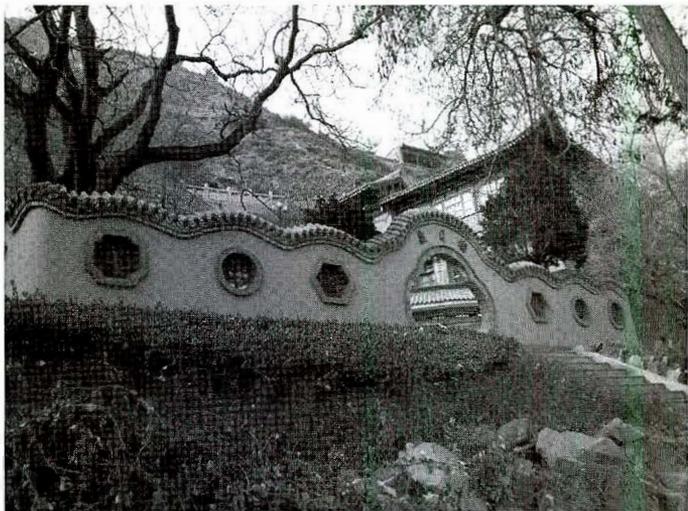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 年），五泉山建皇庆寺。明建文元年（1399 年），肃王朱模由张掖移驻兰州，大兴土木整修寺庙道观，修葺、增建寺观殿阁多达 30 余幢，使五泉山初具规模。五泉山现存建筑大多重建于清末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由文化名人刘尔炘（1864—1931 年）奔波于士绅官商之间，共募捐 4.8 万两白银，自 1919 年开始，按“补其旧毁，增其本无”的原则，历时 5 年，恢复了一批被毁寺庙，新建了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掬月泉

太昊宫、三子祠、万源阁、层碧山庄等殿堂 10 余处，并撰写了 135 幅白话楹联。后经历次维修、迁移隋唐明清建筑形成了现在的格局。五眼清泉、古树、飞瀑、25 组古建筑与历代人文积淀共同构成了真山真水，儒、释、道、民俗文化融合的大型园林名胜。

五泉山地貌为三坡两涧，园林建筑群呈“一轴两翼”的整体布局。25 组建筑依山就势，对山地空间关系进行艺术分割，形成竖向分层、多维多向的景观空间。殿宇楼阁层叠，廊坊桥榭参错，布局谨严，相互贯连，并通过暮鼓晨钟、袅袅梵音、潺潺溪流、对联题额、诗词歌赋和寺观廊桥融汇与点缀，形成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同时，还广植树木，栽花育草，使五泉山风景变得更加秀丽，成为兰州著名的游憩园地。

五泉山现存文物可分为中麓、西涧、东涧三景区。进入公园木牌

楼，首先是霍去病雕塑广场，接着是山门，山门正中为舒同所书“乐到名山”巨匾，门口立有原位于明肃王府（今省政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往上由中麓，依次有蝴蝶亭、浚源寺、万源阁、青云梯、泰和铁钟、大悲殿、武侯祠、清虚府、文昌宫、地藏寺、卧佛殿、千佛阁和三教洞等。西涧文物区，有酒仙祠、嘛呢寺、西长廊，往上有半月亭和企桥。东涧文物区，主要有中山纪念堂、子午亭和东长廊。



霍去病雕像

浚源寺，始建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原名皇庆寺。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按元代遗址重建，易名为“崇庆寺”。清乾隆、同治年间两历战火，光绪时又重加修补。清末民初刘尔忻再次募银整修，并更名为“浚源寺”。浚源寺是一座一进三院的建筑群。寺门是一轩敞的五开间砖砌牌坊。中门上方有刘尔忻手书的“浚源寺”三字砖雕门额，古朴而端庄。中门有联云：“大地山河造成乐土；满林风月来叩





浚源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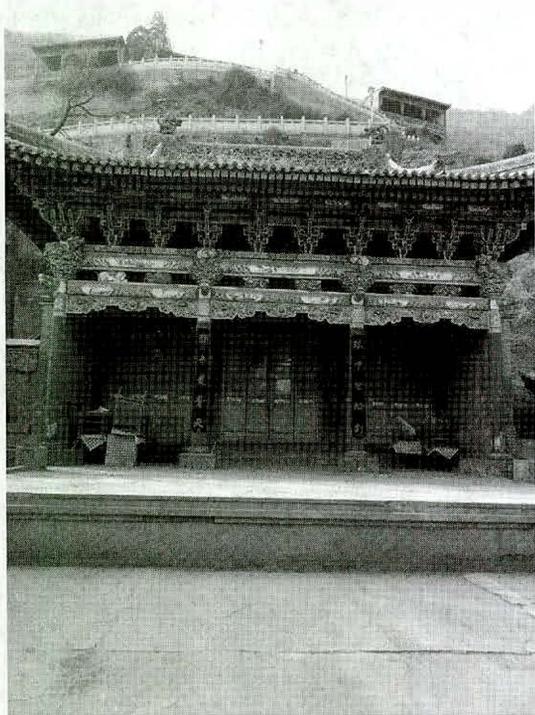
禅关。”寺右门题额曰：“流水今日”，联云：“笑指河山，问释迦，不知我千王百圣继志传心之地，种什么因，结这般果；别开世界，生盘古，好度那五洲万国，圆颅方趾之俦，悟无为法，登自在天。”寺左门题额曰：“明月前身”，联云：“花即是禅，鸟即是禅，山耶云耶亦即是禅，钟磬声中，随你自寻禅意去；男可成佛，女可成佛，老者少者都可成佛，松杉影里，何人不抱佛心来。”

金刚殿，系浚源寺内第一重殿宇。始建于元代，明洪武五年（1372年）重修，虽经清乾隆、同治年间两次兵燹，但金刚殿完好无损，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全寺也是五泉山至今保存完好的最古老的建筑物。金刚殿建在高基之上，前后回廊环绕，斗拱飞檐，彩绘斑斓，庄严雄伟。殿内原塑有四大天王，“文革”期间被毁。现供的四大天王铜像为2003年铸造，像高为3.85米。殿中所供“铜接引佛”，原供奉在东关接引寺中，1954年由兰州市庆阳路“接引寺”迁移于此，是甘肃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像系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所铸，身高5.33米，身围2.65米，重约万斤。佛像造型优美，衣褶显晰，面部神态敦厚丰腴，怡静凝重，极富神韵，是甘肃省唯一的一尊铜接引佛。金刚殿有二联曰：“卅八愿普被群机，决定乃修万人去；廿五有同生正信，合当一念一如来。”“因愁生死难逃，每对金容而涕泪；为怖人身易失，常祈宝手以提携。”1966年6月，红卫兵砸掉其左手，因铜佛太硬，无法全部砸烂，只得先回去找铁锤，准备次日再砸。园林工人连夜用三合板将铜佛围起来并书写毛主席语录，红卫兵才未敢再动手，这样，铜佛成了五泉山中唯一幸存的佛像。金刚殿院内，有国槐一株，又名“状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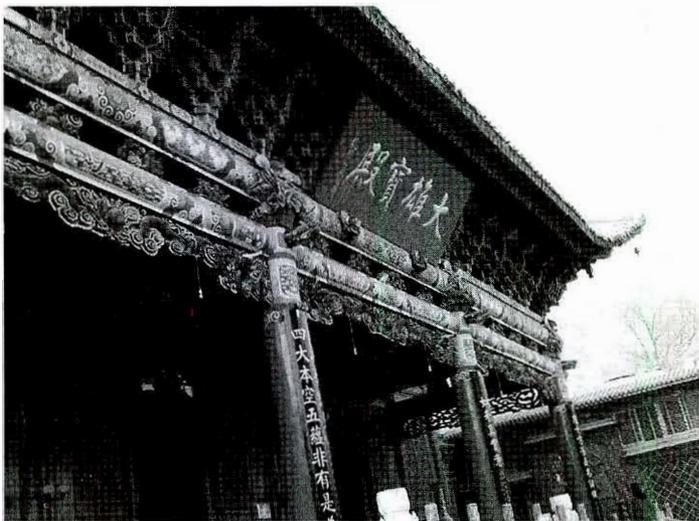
树”，树高30米，冠幅27米，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市级重点保护古树。

大雄宝殿是浚源寺的主体建筑，始建于元代，明洪武、永乐年间重修，后因战乱，焚毁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民国初年，在刘尔忻的倡导下再次修复。“文革”期间，佛像被毁。1988年，在已



清虚府





浚源寺大雄宝殿

故五泉山寺院方丈融开大和尚和广大僧众，以及信教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浚源寺归还兰州市佛教协会管理使用，并请甘肃省工艺美术研究院工艺师何鄂等于1989年重塑了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迦叶、阿难、韦驮菩萨、十八罗汉等像。

大雄宝殿东西两侧为观音殿和地藏殿。观音殿内供有一尊汉白玉释迦牟尼佛像，高1.8米，重约2吨，是1989年旅居缅甸的爱国华侨付凤英居士捐赠。佛像雕琢精细，线条流畅，披金袈裟，端坐莲台，为我省少有。地藏殿内供有铜铸的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为2003年铸造，该雕像衣饰纹褶简洁流畅，丰颊修目，面带慈容。

大雄宝殿后为浚源寺的第三院，是一座三层楼阁——万源阁，雄踞于全寺的中轴线上，与金刚殿、大雄宝殿自然和谐地组成一个建筑群体。万源阁原是兰州萃英门内甘肃贡院的明远楼。1923年，刘尔忻重

修五泉山时将它移建于藏经楼的废址上，并更名万源阁，为全木质结构，36根木柱支撑起楼体，层层飞檐伸向四方，悬山顶的殿脊中央琉璃花宝顶高高耸立，远望犹如宝塔。上面两层供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邵雍、程颐、周敦颐、朱熹等四圣四贤八座雕塑，刘尔忻认为所供圣贤“是我中华学术之导源也”，并题万源阁思源楼：“你出来要人爱看；他夸着说我会听。”下层望来堂作学术交流之用，刘尔忻题联：“高吟树蕙滋兰句；环顾栽桃种李人。”目前正在重建四圣四贤雕塑，彩绘塑像，塑像造型高3米。

青云梯始建于清光绪初年，自万源阁修建72级台阶，至青云梯牌坊。从该处下则至万源阁，上则至文昌宫，寓意青云直上。刘尔忻以额为联，题曰：“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现挂青云梯匾额为1983年舒同重新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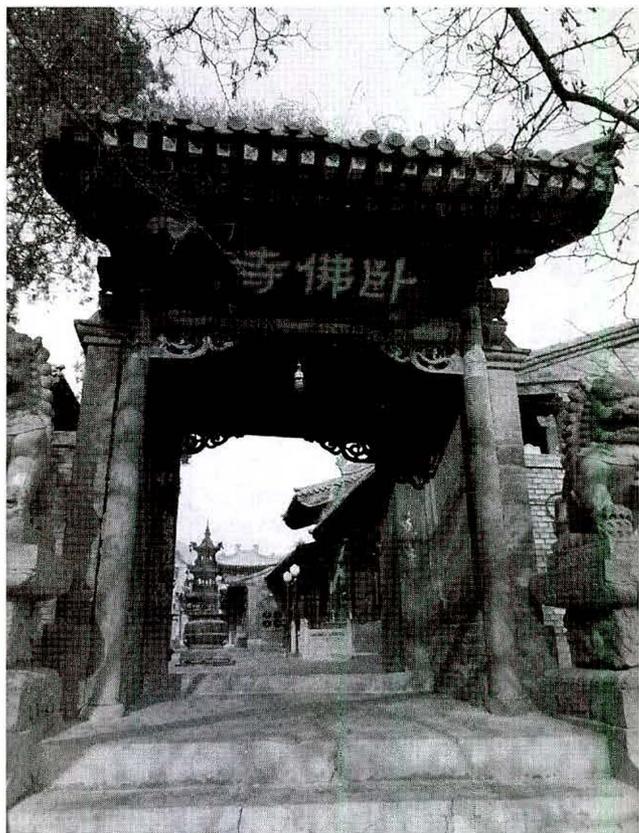
青云梯东侧的猛醒亭里悬有泰和铁钟。泰和铁钟铸于金章宗泰和二



青云梯

年（1202年），钟高3米，口径2米，重5000公斤，有铭文150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兰州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金石文物。

卧佛寺，建于明建文元年（1399年），清同治六年（1867年）焚毁，现有建筑为1923年重修。依山而建的三座大殿正中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塑像，俗称卧佛，卧佛长8.7米，侧身而卧，右手垫在头下，左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一侧，他双目微闭，恬然若睡，面部表情似喜似悲，一副登极乐天的模样。刘尔炘撰联：“还不起来么？此等功夫，怕是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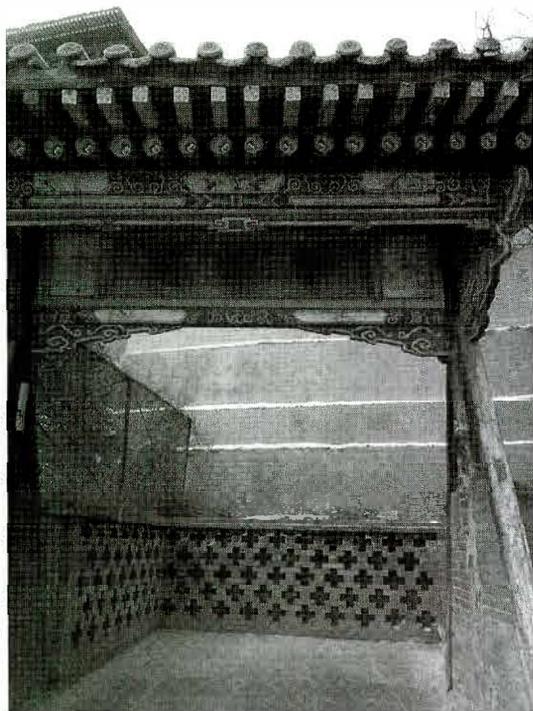


卧佛寺

都借口；何妨睡着了，这般时代，倘成好梦亦欢心。”卧佛两旁塑十八罗汉。西殿供观世音，东殿供关圣帝君。大殿里陈列着 300 余尊木雕佛像，是一个木雕佛像艺术品的荟萃之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寺院所藏的三尊明代释迦牟尼、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木雕像，是该寺的镇寺之宝，也是珍贵的佛教文物。

千佛阁位于卧佛殿东南的山岩上，出卧佛殿东门南上，进千佛阁牌坊后西转，首先经过的是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的先登桥，继续东行就是千佛阁长廊。长廊为依山而建的七间敞廊，廊中石窟内存

有明代遗碑 3 块。长廊东头木梯题额“更上一层楼”，扶梯而上到二层长廊。二层长廊共 10 间，西端有送子菩萨殿，东端一殿亦为菩萨殿。沿二层长廊拾级而上就到了千佛阁，阁南 3 孔石窟，均深约 3 米，供三世佛，两侧是十八罗汉，洞窟壁间塑有千余尊彩佛，故称千佛阁。千佛阁建于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 年），



千佛阁牌坊



嘉靖十四年（1535年）重修，毁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兵燹，现存建筑为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刘尔炘题千佛阁联：“登斯楼危乎危哉，敢存妄想焉有妄为，能这般面壁十年，入定便成尊者相；到此处高则高矣，切莫自矜也休自喜，忘不得悬崖万丈，临深长抱惕然心。”

太昊宫位于西涧景区与中麓景区的过渡带，是刘尔炘于1919年为纪念上古以来甘肃籍圣贤，在已毁的燃灯寺、瑶源阁遗址上所修建的，其实质是甘肃乡贤祠。太昊宫建殿4座，第一台建有3座大门，中门额题“高山仰止”，西门是“奋上兴下”，东门是“继往开来”，门北廊壁间原嵌刘尔炘书《兰州五泉山太昊宫修建记》。第二台为秦子祠，主祀孔子弟子秦祖，配祀景清等13人。第三台为壤驷子祠、石作子祠，主祀孔子弟子壤驷赤、石作蜀，配祀赵充国等11人及张轨等11人。第四台为伏羲殿，题额“文明鼻祖”，主祀伏羲，配祀女娲、轩辕。可惜塑像已毁，至今空置。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修复工作。

出太昊宫西门为西长廊，登49级台阶即到半月亭。半月亭为半月形7间亭，亭后壁是兰州画家曹蓉江绘制的《松风秋月图》，画面上18棵青松，各呈异姿，疏密有致。1984年，尹建鼎将刘尔炘撰书《太昊宫记》石碑移嵌于后壁，它是重修五泉山的重要历史见证。

企桥为石拱单孔桥，位于嘛呢寺东侧山涧中。1922年，刘尔炘为桥题额“企桥”并撰楹联，西门上的是：“想过去么，过去便能通碧落；休下来了，下来难免入红尘。”东门上的是：“问来来往往人，今日之游，水意山情都乐否；到活活泼泼地，任天而动，花光草色亦欣然。”

文昌宫位于中轴线最上层，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同治间两次被

焚，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建，1955年重修。宫内分两台，下台为宫院，建屋两层，上层为三面廊式敞楼，北面为魁星楼，下层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五泉书院。宫院南砖石砌峭壁两侧可直上大殿，大殿供文昌帝君，为主宰文运的天神。



文昌宫

酒仙祠位于浚源寺西侧。同治六年（1867年）的大火之后，五泉山的建筑只有金刚殿和酒仙殿幸存。院中建两流水式陪殿三间，将一院隔为东西两进。西院为酒仙殿，正殿供吕洞宾、刘伶；东院为三圣殿，正殿供刘备、关羽、张飞。

嘛呢寺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后毁于火灾，光绪年间（1875—1908年）在原址重建，占地面积4637.75平方米，属藏传佛教寺院。因惠泉众流汇合处有嘛呢转轮而得名。嘛呢寺坐落在西麓边缘，坐南朝北，入山门登32级台阶为一进10米的院落，东有仄仄





嘛呢寺

门、依依径，可通曲曲厅，有一株重点保护古树侧柏。西有重重院、叠叠园，院中有 24 级台阶为过厅，两侧有悬楼，东为瞰霞楼，西为延月楼，过厅两侧有四大天王画像，正中有铜铸弥勒佛、韦驮菩萨像。寺院正南为三间观音殿，观音殿内有唐卡 8 幅、甘珠尔经卷 108 卷，院内有嘛呢转轮。主要宗教活动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的法会等。

地藏寺位于五泉山景区山腰处，始建于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 年），现存建筑为光绪十一年（1885 年）重修；柱间枋间饰有木雀替、荷叶等精美图案，前廊两侧砌精致砖雕槛墙，垂柱海棠芯，屋面为青筒瓦五脊悬山顶，脊中设宝顶。其建筑群由正殿、东配殿、西配殿、旷观楼和北厢房组成，建筑面积约为 734 平方米。民国年间，刘尔忻曾筹资修缮地藏寺。1955 年，修葺寺门，加修百级长廊，傍东龙口蜿蜒至山下。1992 年，有关单位曾对地藏寺的正殿、东配殿、西配殿及地藏寺

长廊、围墙进行过简单的维修加固。2011年3月，投资91万元进行地藏寺的维修改造，按照以旧修旧的原则进行修缮，让古老的文物焕发新颜。

三教洞位于五泉山西岩上，为全山最高处，海拔1650米。三教洞又叫老君洞，大殿依山而建，殿内是石砌洞窟，明代供儒道释三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年间重修，将孔子移供于皋兰县文庙。其北崖前，东西各建房3间，东为住持住处，西为散福厅，1955年全部改为敞厅，成为观景处。

1984年，五泉山园林古建筑群被兰州市政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2011年12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成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具体包括园林古建筑24处：木牌楼、山门、蝴蝶亭、浚源寺、万源阁、青云梯、文昌宫、清虚府、武侯祠、大悲殿、酒仙祠、嘛呢寺、太昊宫、地藏寺、卧佛殿、千佛



武侯祠



阁、三教洞、二郎庙、中山纪念堂（秦公祠）、子午亭、半月亭、企桥、澄碧滴翠水榭、漪澜亭。2013年4月，东长廊和西长廊被城关区政府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有古树名木56棵。目前，只有八卦台未列入文物保护范围。

五泉山园林建筑群规模宏丽而严整，建筑结构类型多样，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是兰州历代建筑的博物馆，又是研究兰州地方史、城建史、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历史遗存，是十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为我们研究明清至近代中国西北传统景观建筑和造园艺术留下了最好的实物例证。

五泉山园林建筑群晋升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有利于发挥古建筑及文化资源优势，凸显历史风貌，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延续历史文脉，突出文化特色，为打造建筑风格独特、历史文化悠久、地方特色鲜明的都市风景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甘肃近代文化 之「根」

——甘肃贡院

清光绪初年，在今兰大二院址（海家滩）修建了全国最大也是最后一座贡院——甘肃贡院，它大大方便了甘、青、宁、新四省（区）晚清学子的科举之路；其后又成为甘肃法政学堂、甘肃工艺学校、国立兰州大学等众学府所在地。其间，英才俊杰辈出，是西北人文荟萃的摇篮，也是甘肃近代文化、教育、农业、工业、金融、科技、气象、医学的见证地和发祥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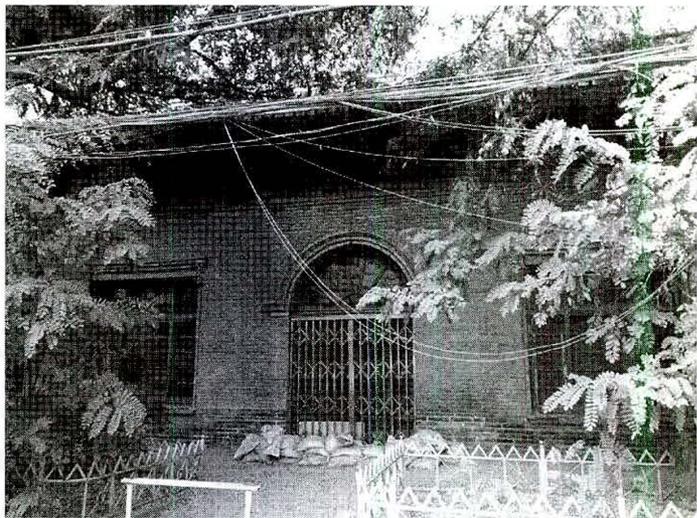
明代，甘肃是陕西的一部分（明时，甘肃属陕西布政司管辖），甘肃士子应举的闹场也在西安。后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自成一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全境、青海省的东部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及新疆的部分地区。与陕甘同时分省的还有湖广、江南两省。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甘肃贡院至公堂

清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施分省取士政策，故分省便伴随着分闱。雍正元年（1723年），由原湖广析治的湖北、湖南分闱；乾隆元年（1736年），由原江南析治的江苏、安徽分闱。但其后200余年，甘肃乡试依旧与陕西合闱。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学子们要想参加乡试必须长途跋涉，到陕西三原陕甘学政驻地进行考试。甘肃离西安最近的也有几百里路程，新疆到西安最远有几千里路程。在交通条件不便的当时，仅到达考场，就要花费三四个月，甚至更多时间。不仅路途花费大，而且常常被雨雪所阻，一些考生没有到达考场就已病卧途中了。一般情况抵陕考试不到3000人，而甘肃籍（包括宁夏、青海两省）学子最多不过600人。古人“学而优则仕”，自古没有场外的举子，进不了考场何谈功名与事业？这严重地制约了甘肃学子的仕进之途，抑制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反过来也影响了地方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后，听说了不少科考合格的甘肃士子常常因家境贫寒，难以筹措到前往陕西参加乡试的路费而不得已放弃乡试的情况，深为惋惜，遂上《奏请甘肃分闱疏》，请朝廷允许将陕甘两地分别乡试取士，并分设学政。据说，当时皇帝阅读左宗棠的这份奏章时，也被奏折中透露的情真意切所感动，当即朱批准予。是年冬，清政府同意陕甘分试，但苦无贡院。其时，甘肃兵气缠绕，民生凋敝，财力枯竭，地方财政无力兴建贡院。创建贡院时，左宗棠礼聘被贬回乡的吴可读任兰山书院山长，吴可读欣然从命，发动甘肃各界募集资金，穿梭于各州县衙门，托钵于富绅商贾之家，受人白眼，承受了巨大的浮议压力，终于劝捐到白银50万两，在兰州城西北郊，今兰大二院处建成甘肃贡院。光绪十一年（1885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增修后，其规模在当时各省贡院中，首屈一指。吴可读（1812—1879年），字柳堂，清代甘肃皋兰（今兰州市）人。他曾任甘谷朱圉书院、



甘肃贡院至公堂

兰州兰山书院山长，培养人才众多。任都察院河南道御史时，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滥杀无辜，1879年，以死谏慈禧皇太后废垂帘听政，被称为以死谏言的“陇上男儿”，为时人所敬仰。著有《携雪堂诗文集》传世，《清史稿》有传。

贡院院址选在今临夏北路至黄河南岸纵140丈、横90丈的地基上。外筑城垣，内建棘闱（试院）；中为至公堂，前为明远楼，左右为南北号房。以楼为轴心，西为龙门，为连三门，为大门，均有穿廊，大门左右有雨廊，有点名厅，有搜检厅，左廊尽处有土地祠，前为闱墙，有南文场门、北文场门，门内俱有点名厅，门外迤南为外官厅，为外供给所；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北为授卷所，后为观成堂，堂前有水池，池有桥，左右有公字过厅，南为监临部堂署，为提调道署；监临署后为内供给所，署东为对读所，北为监视道所署，署东为各房科，为誊录所，为收掌所，堂左右为走廊，中为穿廊接内廉门，门左右为官厅，门内左为监试署，右为内收掌署，中为衡鉴堂，堂左为南衡文署，右为北衡文署，后为雍门，门内左为南五房，右为北五房，东为录榜所。至公堂是纠察官防总摄闱场事务的大员（称临监）和在考场提调监试的官员（称外帘官）办公的地方。四周建起堂、署、厅、所、廊、场、池、桥等数十处，可容士子7000余人。在城西开门，上书“为国求贤”四字。

光绪元年（1875年），贡院落成，左宗棠为甘肃贡院至公堂题门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攀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表达了他要求认真批阅试卷，为国家挑选有用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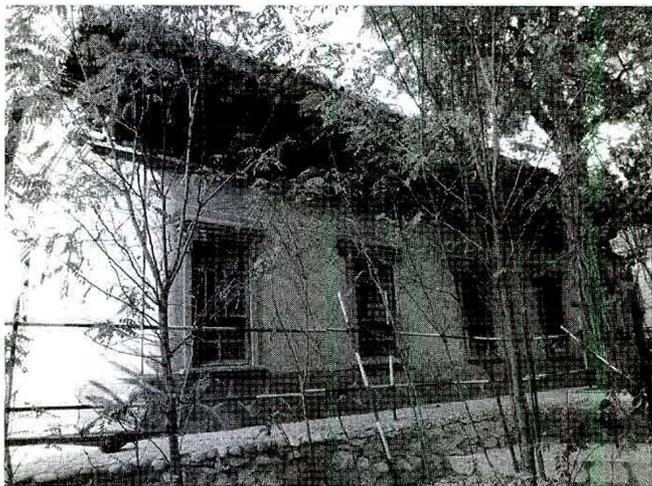
不使之埋没的思想，又回顾了他坎坷不平的科举之路，勉励兰州学子要奋力进取。这一对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左宗棠致力于为国求才的政治抱负和当时的思想感情。

吴可读应左宗棠之请，撰写了长达 192 字的楹联：“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关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楨干，内勿遗八郡榷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上联写自甘肃从陕西划出建省 200 多年来，到同治间陕甘分闈，这是继滇黔和湘鄂分闈后的第三次分闈，对于广阔的甘肃来说，实属破天荒之举。接写甘肃贡院宏大的规模，希望当局公平选拔人才，勿使遗漏。末写左宗棠创设贡院的惠政。下联写甘肃的星野、雄奇的形胜及兰州秀丽的河山，这一切将汇集考生笔下，做出气势不凡的文章，以备国家选拔。这副长联典雅丰赡，高度概括了甘肃贡院的设立，对甘肃文教事业发展的巨大意义，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观成堂为外帘官办公处所，悬陕甘总督谭钟麟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监临贡院撰书的匾联：“秦陇分闈以后，坐聚教授，倏指十年，几番星使搜罗，得士期为天下用；国家吁俊之方，经策诗文，扃门三试，休道风檐辛苦，吾曹亦自个中来。”上联回顾甘肃设立贡院十年来，为



国家选拔了许多人才的过程。下联从乡试的考试程序（考三场，考“四书五经”，即八股文，策论，试帖诗），写到自己，也是通过乡试考中举人，进而会试考中进士的，用以激励考生。



甘肃贡院观成堂

观成堂东为衡鉴堂，为考官校阅试卷与各官办事之所。光绪元年，左宗棠书“衡鉴堂”匾，考试官、湖广道监察御史刘瑞祺撰书楹联曰：“丹綵新承，文治启千秋运会；朱衣默鉴，辛勤念三载功夫。”上联写皇帝下诏同意陕甘分闈，意在长期实行文治。下联写考官要秉公阅卷，因为试子苦读多年，才能参加一次乡试。

举行甘肃首次乡试时，士子竟达 3000 人，较以往赴西安者多出两三倍。左宗棠奏请简派考官，自己也以陕甘总督资格入闈监临。金榜第一名解元是兰州书院高才生安维峻，后官至监察御史，演出“陇上铁汉”载誉千秋的一段英雄历史。

左宗棠在创建贡院的同时多次下令整顿学政，修葺书院，增办义

学，刊印书籍。下令全省军旅不得占驻书院，不断增加府州贡院岁式、科式学额和乡试取士名额。据资料显示，左宗棠当年在西北共开办书院31所，开办义学共294所。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改为师范学堂，附属书院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改为小学堂。遂使三陇文风蔚起，为推进甘肃教育事业建立了功绩。可以说左宗棠的到来，为兰州带来一股新风，使兰州沉重缓慢的历史进程突然加快了脚步，把兰州带到了世界近代发展的门槛前。

从甘肃贡院落成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共选取了646名举人赴京会试，考中进士116名，超过了分闈前200余年甘肃中举人中进士人数之总和，为甘肃文化教育的进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们或热心文教事业，创办新学；或大义凛然，忠贞爱国；或兴办实业、抵御经济侵略；或著作等身，劳心公益事业。其中著名进士除安维峻外，尚有编纂《重修皋兰县志》的张国常、求古书院山长天水人刘光祖、重修五泉山的刘尔炘、兴办实业的河州人邓隆等。

由于甘肃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从隋代实施科举制到清末的1300多年间，甘肃出的武将多，文人少。从汉代的赵充国到清代的张勇、王进宝，书之于史册的甘肃将领达千余人。但是甘肃进士却没有多少，据《甘肃全省新通志》《甘肃通志稿》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自唐代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甘肃考中进士者总计775人。文进士中，唐18人，五代2人，宋38人，金7人，元11人，明218人，清348人。明清考中举人者总计4777人，武举人



1707人。而清代考中者较明代激增与甘肃贡院的创设密不可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诏，于丙午（1906年）科起，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持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完结，存在了30多年的甘肃贡院也和那些饱读诗书的秀才一样面临新的抉择。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兰州道彭英甲在贡院西部设立甘肃农业实验场，分南北两场，引种甜菜，种植蔬菜新品种，向全省推广。五月，在东部设立甘肃劝工厂，分设织布、栽绒、绸缎、玻璃四科。

1907年，在东北部设立农林学堂、矿务学堂，在西北部设立甘肃官书报局。

1908年，在东南部设立甘肃督垦总局。

1909年3月，在督垦总局稍西设立甘肃农工商矿务总局，大体在南号舍一带。

1910年，在矿务学堂稍西设立甘肃高级巡警学堂。

进入民国时期，贡院原有堂舍几乎全部被公所、学校占据。

1913年，校长蔡大愚将甘肃法政专门学校迁入贡院。

1914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将他在甘肃的亲信、时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封为“子爵”。于是，张广建打着修建甘肃机器局的旗号，为他修建了一座“子爵府”，老百姓称之为张大帅官邸。袁世凯下台，这里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机器制造局。20世纪30年代，于学忠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还派人在此铸造了孙中山铜像，并实验制造大炮。

1917年，这里变成了甘肃制造局所在地，开始大规模生产各种枪

弹、炸弹、炸药，同时进行军械修配。在衡鉴堂及其南北设立甘肃公立甲种农业学校，由甘肃大林区署（相当于省林业厅）专员罗经权任校长。

1928年，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兰州中山大学，后改为甘肃大学、甘肃学院，在校长（院长）邓春膏的努力下，成为甘宁青最早的一所高等学院。

1946年，甘肃学院改为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大力扩建，几乎占据整个贡院的空间。同时，聘请名教授，购置图书、仪器，为新中国的兰州大学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成了兰医二院，几年前，改名为兰大二院。在这里还设立兰州劳动技校、化工机械厂。

从甘肃贡院到机器制造局，从机器制造局再到化工机械厂，从兰州大学到兰医二院，真可谓沧桑巨变。洋务运动、平定阿古柏叛军、建立新军、袁世凯复辟、雷马事件、兰州事变、日本人轰炸兰州等事件，我们都能从这里看到它们的影子，找到它们的踪迹。甘肃的大部分院校、众多医院都能在这里找到它们的根。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甘肃近现代文化的根。只可惜曾经人声鼎沸的甘肃贡院只剩下了至公堂等两座建筑了。

至公堂与观成堂相毗邻，均坐东朝西，坐落在兰大二院院内，都是贡院遗存。至公堂占地600平方米，面阔七间21.7米，进深三间12米，16檩四步廊悬山式，高15米，青瓦顶，前檐用一翘一升斗拱，不用座斗，门楣悬挂巨匾一块，宽3.15米，高1.15米，青底金字，上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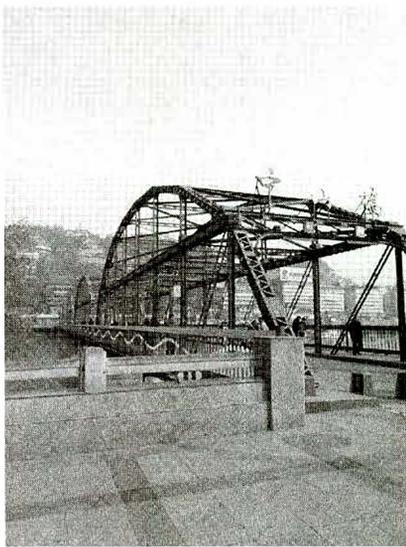
左宗棠行楷“至公堂”。该建筑已于200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简单修缮。2010年，兰州市文物局将观成堂纳入第七批省级文物申报单位。观成堂占地323平方米，面阔三间19米，进深三间12.5米，灰瓦歇山顶，十七架梁，高14米。因缺少资金长期得不到修缮和保护，被搁置多年导致濒临坍塌。由于这座老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如今观成堂看上去岌岌可危，前墙靠窗户位置已经裂开了一条四五厘米宽的缝隙，门窗被木板、纸板等各种东西遮挡封闭起来，屋顶的古老瓦片大多已破碎散乱，房脊已经有些扭曲，屋顶杂草丛生，苔痕斑斑。前墙已经倾斜，为防止坍塌，工人用临时焊接的铁架子将其支撑起来。

2013年7月，兰州市政府出台《兰州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方案》，计划修缮甘肃贡院，重新设计符合古建筑特色的屋顶，重新铺装青砖地面，并恢复甘肃制造局。2015年年初，展开修缮工作，6月开始对至公堂、观成堂进行抬升。待修缮工作完工后，两座百余年的古建筑将重现当年的神采。

百年钢构

——
中山桥

今日的兰州中山桥苍劲挺拔恢宏典雅，令人很难相信它已是百岁高龄，100多年河水的冲刷丝毫不能改变它的稳健，100多年的风吹雨打丝毫不能改变它的本色。它是风雨飘摇的晚清留给兰州的一份价值连城的礼物。同时代修建的郑州黄河铁桥和济南黄河铁桥已先后被拆除，中山桥这座长234米、宽7.5米、有6墩5孔、桥上飞架5



今日中山桥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

古迹
胜览



今日中山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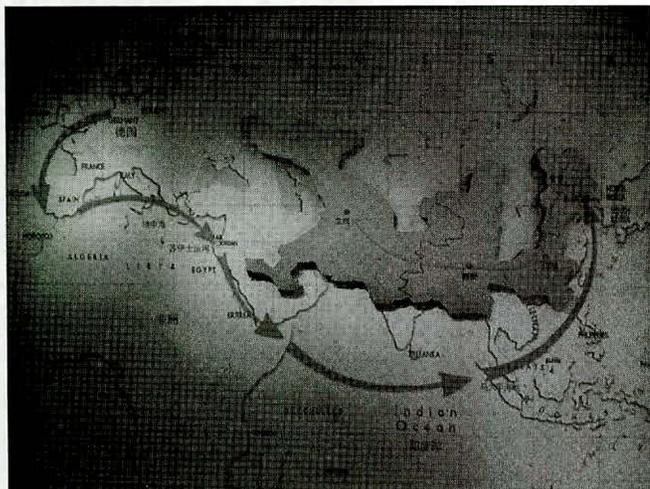
座弧形钢架拱梁的铁桥成为黄河上唯一留存的近代桥梁，“黄河第一桥”更加名副其实。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在如今的中山桥的位置上兴建了著名的镇远浮桥。此后500多年间，用以构筑浮桥的船数和用以固定的铁柱与木柱数虽有变化，但镇远浮桥却以其扼守要津的重要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桥”。但是镇远浮桥并非坚固安全，遇到大洪水或冰凌，常常会发生桥毁人亡的惨剧。而且冬季黄河封冻，浮桥必须拆除，车马均由冰上通行。冬春之交冰将消未消之时，经常有人畜因

冰裂落水而亡。春天冰融之后，又需重建浮桥，所费甚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光绪初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就有过修建铁桥之议，但因为洋人出价太高而作罢。

进入 20 世纪，夕阳西下的清廷开始实行新政，鼓励洋务。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设立了甘肃洋务总局，由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总局总办。正是洋务运动的兴起，为建设黄河铁桥提供了历史契机。升允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他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计划。

光绪三十二年春，彭英甲率地方众官到黄河岸边议政，以期解决黄河“无一桥永久贯通两岸”的千年难题。众官以为：“左文襄公在任时，尚不能成建桥事宜，我辈又能若何？”彭英甲道：“左文襄公也曾告诫：天下事总是要干，要干最是要一片实心。”遂请赖恩培派差测量水力、冰力，选择桥址，预算费用，做好修桥准备。并开始同外国领事



桥料转运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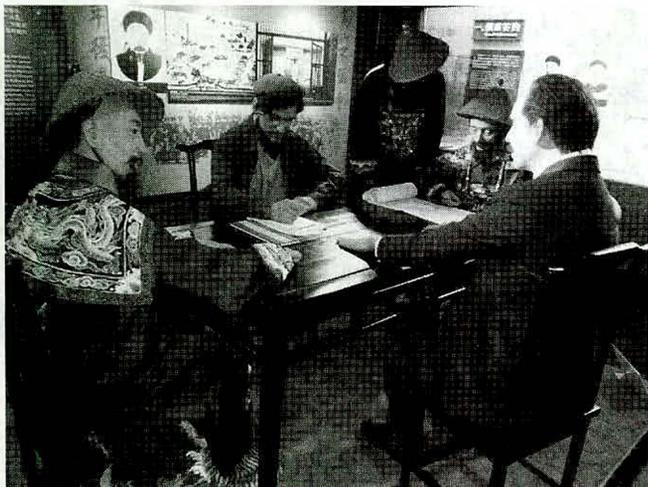


画家笔下的桥料转运场景

馆联络。

同年五月，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正好游历至甘肃，双方一经接触，立即达成了合作意向，就包修兰州黄河铁桥一事拟定了初步的合作合同，桥价十六万五千两，不足左宗棠时的三分之一。代理兰州府傅秉鉴随即给升允上了一道条陈，请求对包修合同中的一些地方进行“考究”。升允看了条陈后，为慎重起见，同意与洋商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但同时他也强调，“不宜偏执己见，故破成议”，并指示由洋务局会同各司、道讨论研究建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再与喀佑斯妥善商议修建办法，提出具体意见。各司、道官僚分两派，旧派以按察使白遇道为首以修铁桥无成例可循加以反对，支持新政的布政使丰伸泰认为新政本无成例可循，也无须开会讨论研究，同意修桥，并责成彭英甲全权办理。修桥的事便决定了下来。随后，升允表示将直禀皇上，尽快得到“皇帝恩准”。

为了解除傅秉鉴等人和中方的疑虑，喀佑斯决定请工程师进行实际勘测，合同因此暂缓订立。很快，工程师的勘测结果出来了，德方认为



签订合同（桥梁博物馆蜡像）

“黄河水性，虽云湍急，若如所议章程架修铁桥，甘愿保固八十年”。

1906年10月28日，甘肃洋务局、按察使司、布政使司、德国泰来行等在中英文合同上签字。章程规定：“除起蛟水神力外，无论河水涨发，或河冰开冻，八十年保固期内桥有损伤，泰来行一定全数赔偿。”桥价仍以十六万五千两银为准。

11月，升允给甘肃省诸司道的详文：“所拟合同甚属固妥，应准照此畿押行使……桥价银两由朝廷认缴，运费、船只、木杆、麻绳等项，则由甘省自筹……咨立案查，兰州道彭英甲人颇开通，讲究新政，甘肃农工商矿诸政委其专责。现责成该道将铁桥事务一手经理，以竟全工。”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来自朝廷的朱批传达到了甘肃：“该部知道。钦此。”至此，黄河铁桥的建设工程正式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从签订合同到光绪皇帝恩准建桥，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但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停止。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





修桥用的沉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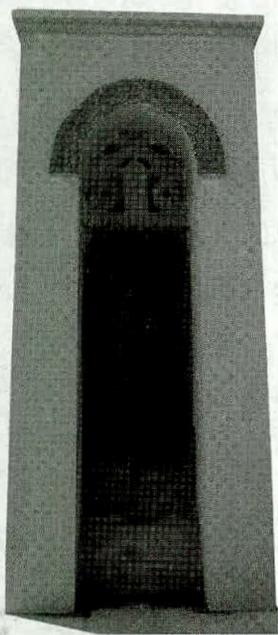
二，庄浪县举人牛猷珠致稟彭英甲，请求停修黄河铁桥。他还列举了修建黄河铁桥在发生战争时的六大弊端。彭英甲对牛猷珠的观点予以坚决回击，认为建桥正当时宜，刻不容缓。

黄河铁桥建造之不易不仅仅表现在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和资金的困难上，桥料和施工器械的运输上尤其艰难。桥料从天津装上火车，运往新乡，困难不大。从新乡到兰州，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运输，其中艰难险阻，难以想象。当时采用分段承包运输的办法：郑州到西安由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大车户联合承包运输；西安到兰州由兰州大车户单独承包运输。这段山高路远，行路更难。1907年年底，一批车帮在甘肃、宁夏交界处的六盘山攀行。行至山顶，纷飞的大雪已封死前路，车夫们只好在山上过年，被困三昼夜。幸好车帮出发前，平凉府特拨水酒、干粮、熟肉作为160余名兵民的年礼，使他们渡过了难关。凭着骡车等简

陋的运输工具，历时10个月，途经数省，前辈们硬是把起重机、搅拌机、打桩机、铁桥钢梁、挖泥机、洋灰（水泥）等约400万斤的筑桥器械及材料从天津搬运到兰州。这次旷日持久、规模空前而又艰苦卓绝的运输耗费银两12.4万多两，这与铁桥本身的造价已相差无多。

为使中国人掌握筑桥技术，“以便日后维修铁桥，管理桥务”，彭英甲还加派两位候补知县为德国工程师助理，“令其通晓全数技艺”。在与外商合作期间多有摩擦，但甘肃官员均能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合同规定大工程师德克必赴甘修桥。但泰来洋行仅招收一名20岁出头的小工程师满包本赴甘。在彭英甲的数次严词催请下，工程技术人员德克等方赴兰州。

经过华洋工匠共同努力，铁桥建设进展顺利。铁桥施工接近尾声时，护督毛庆蕃决定，在铁桥南北两端各添建一座中华传统式古建筑——牌厦。1909年6月18日，两座牌厦竣工。每座牌厦均为三开间，雕梁画栋，蔚为壮观。牌厦前后共悬名人匾额4块，其中由升允题写“第一桥”匾2块，分置南北桥头；另有“九曲安澜”“三边利济”匾各1块。为永久纪念这一伟大工程，在铁桥两头立了两块石碑，由升允撰文记述铁桥修建始末。铁桥建成后，洋务总局还花了52两银子，请人拍摄了54张铁桥全景照



升允撰黄河第一桥碑



片，分送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有关部门阅存。

宣统元年七月初四（1909年8月19日），铁桥竣工通行。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二十五日，陕甘总督长庚就铁桥工程用款上奏宣统皇帝称，包括包修价、运输价及各项支出费用，铁桥“实用库平银三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一两八钱九分八厘四毫九丝八忽”。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先生在回忆录中称赞：建黄河铁桥是清朝覆亡前最振奋国民的壮举、最节俭的工程。中国近代史上，甘肃人自主、自愿与西方人进行的此次纯经济的合作，创造了一个奇迹。百年以来，中山桥经历了无数次冰凌冲击、洪水冲刷、地震摇撼、风雨剥蚀、车船碰撞，以及两次大规模战争的洗礼。历经沧桑之后，依然如一名坚强的战士，用自己钢铁的脊梁，担负起通达黄河两岸的重任。

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由当时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手书的“中山桥”匾额，被悬挂于铁桥南面的牌厦上，“第一桥”从此改名中山桥，沿用至今。

抗战期间，兰州不仅是抗战大后方、国际援华物资中转站，而且是中国空军的训练中心之一。为此，1937年11月至1943年6月，日寇对兰州进行了长达6年的疯狂轰炸。中山桥就是他们轰炸的重要目标。为了减小敌机轰炸的概率，铁桥由原来的橘红色改为银灰色。其间，中山桥不仅是我国军民抗击日寇的重要战线，而且是兰州人民不屈精神的象征。在这座桥上，络绎不绝的驼队和汽车将无数军粮、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战前线。这座原为车马通行设计的铁桥，为我国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8月26日，在解放兰州战役中，炮弹击中了过桥的两辆国民党军车，车上弹药爆炸，大火烧毁了桥南端18节木桥面和部分纵梁。解放军以夺得黄河铁桥作为解放兰州的标志。随后，兰州军管会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兵经过十天十夜的抢修，于9月6日修竣通车。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炮车顺利通过中山桥，继续西进。此后，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后勤给养，通过中山桥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军手中。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山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4年，国家拨款60万元对铁桥进行全面维修加固，在原平行弦杆上端置拱式钢梁，使铁桥更加美观坚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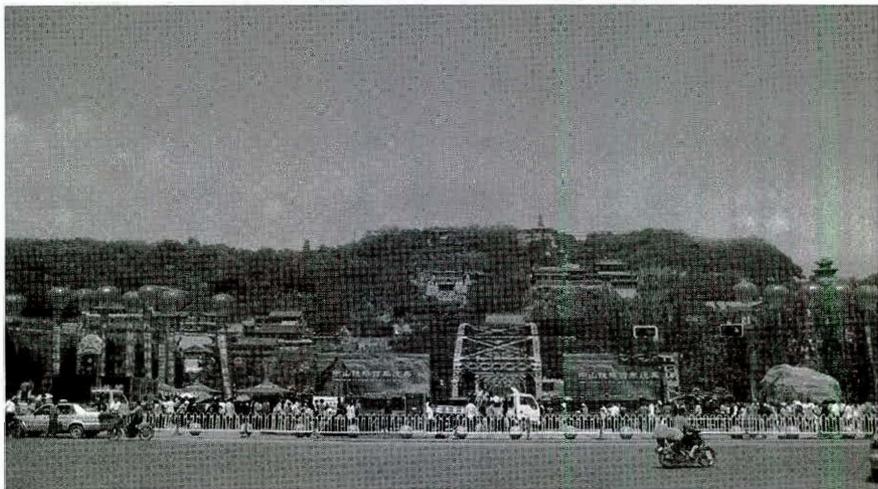
1989年，铁桥保固期满后德国有关方面曾致函兰州市政府，在询问铁桥状况的同时，申明合同到期。8月9日，一艘自重260吨供水船失控撞到了桥墩上，铁桥遭受重创，兰州市当即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抢修，使铁桥转危为安。同时，加宽了人行道，装饰了桥身，铁桥焕然一新。黄河铁桥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在首届丝绸之路艺术节期间，兰州市政府在桥头竖碑，第一次将铁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

2004年，兰州市政府投资500万元，对黄河铁桥开始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彻底最大规模的维修加固。中山桥将结束近百年的通车历史，变成永久性步行桥。

2006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山桥定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河铁桥之所以能历时百年而雄姿依旧，离不开兰州人民对铁桥一





中山桥百年庆典

以贯之的珍爱与保护。长达百年的相依相伴，黄河铁桥已经深烙在兰州人的心上，成了抹不去的记忆底片。2009年8月26日，中山桥迎来百年华诞，虽然庆典活动上午已经结束，但中山桥上热闹、欢快的气氛直到下午依然非常浓烈。中山桥100周年庆典图片展前人头攒动，抢购兰州黄河铁桥百年纪念邮折的市民激情高涨，百年庆典纪念碑前留影的市民、游客排起长队，游人流连忘返于中山桥，在喜庆中细细品味着中山桥那沧桑的百年历史。

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兰州市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对中山桥再次维修加固，并将桥体抬升了1.2米，不但进一步增强了抗震泄洪能力，而且恢复通车，缓解了兰州交通的压力。为了保障行人、游客通行的安全，保护国家重点文物，该桥从2013年3月30日起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兰州市区已架起了多座造型美观、结构新颖、工

艺先进、气势不凡的铁路、公路桥，这座古老的黄河铁桥已不是沟通黄河南北的唯一通道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敬仰它、观赏它，因为它是兰州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它就像一位老人讲述着兰州古往今来的变迁，憧憬着兰州美好的未来。

2009年，值黄河铁桥百年华诞之际，兰州向全国征集《铁桥百年赋》，最终马建勋拔得头筹，其赋被勒石立于桥南端东侧，赋曰：

白塔耸峙，黄河东逝；古关静穆，楼映半空。一桥彩虹临波，百年流云飞渡。今逢盛事，毋忘尘忆，唯吾兰州，矢志创新，兹镌铭为念。

昔陇府金城重镇，缩丝路而通三秦，唯一河而成南北之堑。年及洪武，浮桥颤渡。然夏汛漫卷，冬凌凝寒。迨至清末之岁，始行建桥议案。遂集中西合璧以成，聚各方之力赴艰。柱砥中流，铁梁横空；终成勋业，蔚然景观。三边利济，商旅荣繁；通衢信步，九曲安澜，诚以“天下黄河第一桥”之隆誉，易名中山之佳话；谱写兰州解放之新篇，见证中华民族复兴之沧桑巨变。

噫嘻哉，百年古桥，风流永瞻；大河雄奔，虹影如幻。人文标志，独秀新天。带风情百里，襟绿涛两山；历史名胜，风光无限。夫若无祥风以润，金瓯之磐；铁石纵固，斯桥何延？是以国之发展，和谐为先；市之富强，稳定乃安。炎黄族裔，永承天眷；祺我兰州，康乐尽闾。



陇墨丛林

——兰州碑林

在兰州黄河北岸的白塔山西峰，青山环抱之间，兰州碑林的标志性建筑——30米高的草圣阁高耸入云，登阁凭栏，仰望茫茫碧空，白云悠悠，群山巍峨，郁郁苍苍；俯瞰滔滔黄河，绿树如茵，黄河如带，高楼林立，车流穿梭。碑林诠释着兰州的文化底蕴，也为这如画山河平添了几分魅力。

高大古朴的牌坊，正上方镌刻着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赵朴初题写的“兰州碑林”匾额。两边巨大的摩崖上镌刻着赵朴初题写的“塔影河声”和当今著名书法家朱乃正题写的“翰墨流芳”。山顶上建的仿古重檐六角亭盘空直插云霄，更以它们的玲珑与宏伟、高远与巨大、斑斓与素雅组成了碑林最为雄浑的一组障景，

“草圣阁”三个大字，是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墨宝，其遒劲有力、呼之欲出。稍低一些的“黄河第一阁”匾额则是著名书法家黎泉书写的。

走进牌坊 10 米左右，影壁正面刻着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写的“万里金汤”隶书大字。“万里金汤”匾原先高悬在南关十字的城楼之上，它既道出了兰州军事重镇的显要的地理位置，也诉说着兰州人民历经卫国戍边的自豪。影壁的背面镌刻着明代甘肃天水著名文人胡瓚宗书写的“海不扬波”四个大字，意为圣人治世，天下太平。

兰州碑林是由流萤发起创建的。流萤本名刘瀛，甘肃会宁人，曾任甘肃日报社总编辑、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甘肃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3 年，退休后的流萤联络同道，制定计划，开始了碑林建设，得到了当时省、市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原甘肃省书协主席、甘肃画院院长赵正也为碑林出了大力。流萤曾说：“‘问汝平生功业’，做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做官，‘为他人当敲门砖’；老矣，下山‘化缘’，上山刻碑，与塔影河声相伴，以习字读书为乐。”1998 年，兰州碑林正式动工，在碑林建设上要求达到“四好”：诗文好、书法好、石料好、镌刻好，给世人留下赏心悦目的精品。经两年多建设，2000 年 6 月 14 日举行了落成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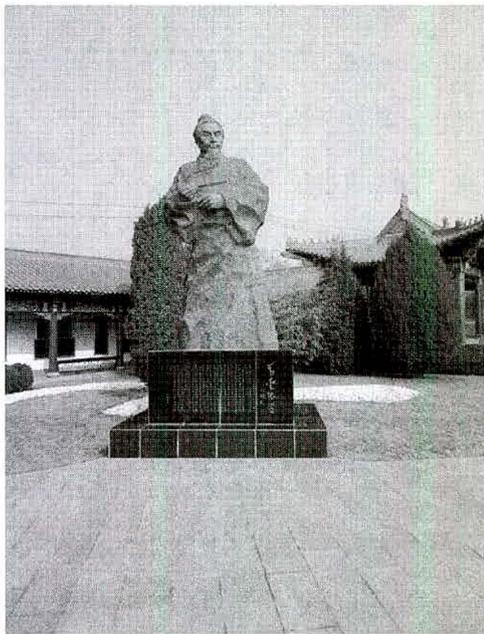
碑林共占地 35 亩，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除了草圣阁三楼用以存放碑林的拓片和相关资料外，一、二、四、五楼和大院东西两廊共有各种碑刻和书法刻石近 1000 通。

兰州碑林从甘肃的地域文化特色出发，选择了本土书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被誉为“草圣”的张芝为“旗帜”。张芝是东汉大书法家，



擅长草书中的章草，他敢于创新，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字之体势，一笔而成”，省略章草的繁难之处，创造了“今草”。张芝书法的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只有宋刻《淳化阁帖》卷二载了五帖，兰州碑林将五帖悉数翻刻，并把《冠军帖》放大上石，作为甘肃历代书法名家的第一块碑，镶嵌在西廊，同时将碑林主体建筑命名为“草圣阁”，还请著名雕塑家何鄂在廊前用万年青花岗岩雕刻了高 3.6 米、重 11 吨的张芝立像。张芝雕像右手握笔略略抬起，左手捏住右手衣袖，头部略略向左偏转，表现他学识渊博，艺术精湛，构思成熟，欲下笔而未下的一刹那。雕像底座上，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的“草圣张芝”四个大字。一代书法大师的风采，被映衬得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雕像底座上有一段 400 字的张芝简介，系流萤之作。最后一段为：“时人曰张芝乃旷世奇才，光耀千秋，影响所及，遍于寰中。值兰州碑林肇建之日，雕张芝像立于黄河之滨、白塔山之巅，借以缅怀先贤，激励来者。”

一楼陈列着从陇原大地上出土或发现的书法珍品，



张芝雕像



兰州碑林

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古篆，庆阳发现的秦诏版，以及怀素《自叙帖》丙辰本。

二楼陈列着碑林的三大精品：《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秦汉简牍，尤其是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是第一次被刻成碑供游人观赏。

敦煌遗书用书法的形式保存了丰富的佛教、儒家和道家经典，绝大部分为古代写本，尤以写经为主，最早的写于305年，最晚的写于1002年，前后跨度近700年，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两晋到宋代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情况。兰州碑林镌刻了66块，加上郑汝中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敦煌写经”四字和前言，共计68块。

甘肃有“简牍之乡”美誉。甘肃的简牍以出土时间早、数量多、保存好、史料价值高，备受全世界关注。秦汉简牍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之一。兰州碑林的简牍刻有天水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武威汉简、玉门汉简、甘谷汉简等7个部分，另有



赵正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和前言2块。丰富多样的简牍书法，以勒石形式展示出来，是兰州碑林的首创。

肃府本《淳化阁帖》因最得宋拓本的原貌，保存完好，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淳化阁帖》刻石，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三楼陈列着兰州碑林的拓片、资料。四楼陈列着陶渊明、林则徐、左宗棠、于右任、张大千、梅兰芳、丰子恺、郭沫若等人的各类作品。

五楼陈列着孙中山的2件作品、毛泽东的9件书法作品。

孙中山的第一件作品是写给临洮人黄文中译著《日本民权发达史》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另一件作品是写给邓宝珊将军的书信，在信中鼓励邓宝珊坚持国民革命斗争。

毛泽东的9件作品中，有自作诗2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抄录古诗5首：王翰的《凉州词》、王昌龄的《从军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2首。另有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给邓宝珊将军的两封亲笔信。其中《七律·长征》用鲜红的颜色被镌刻在正门对面气魄浩大的汉白玉摩崖石刻上，显得大气磅礴。



左宗棠书法

东西长廊内镶嵌着甘肃历代著名书法家刻石和当代名家恭录的咏陇诗词百余首，正、草、隶、篆相映争辉，流派风格迥然不同。

西廊里陈列着甘肃历代书法家东汉张芝，三国梁鹄，西晋索靖，唐代李世民、李白，明清的胡纘宗、邹应龙及“陇上铁汉”安维峻等人的传世之作。最显著位置上的是草圣张芝的《冠军帖》。还选刻了米芾的《蜀素帖》。

唐太宗李世民，陇西狄道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他所书的《温泉铭节录》等两通碑也树在西廊中。《温泉铭》和山西晋祠的《晋祠之铭》，这在国内是颇为罕见的。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李白诗名太盛，掩盖了他的“书名”，1999年年底碑林管理处从市民手中意外得到李白的手迹拓片《送贺八归越帖》，成了兰州碑林的一大瑰宝。

邹应龙，字云卿，号兰谷，是地地道道的兰州人。明世宗嘉靖丙辰科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嘉靖年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抓住时机奏劾并最终扳倒了为相20多年的权奸严嵩。兰州过去建有邹应龙的祠堂，原东稍门外有“邹兰谷御史故居”，可惜都已不复存在。邹应龙昔日的书稿极其难觅，兰州碑林经多方寻访，找到了他中进士前的一副对联：“张公笔致点染春山；谢女风流赓吟片雪。”将其墨迹勒石铭记，对这位兰州的先贤以志不忘。

安维峻，因在《请诛李鸿章疏》中有“皇太后遇事牵制”等语，矛头直指慈禧等当权者，犹如晴天霹雳，朝野震动，时人称其“直言震



天，肝胆照日”，被称为“陇上铁汉”。碑林所刻《请诛李鸿章疏》草稿，为碑林一大骄傲，也是甘肃人民的骄傲。

东廊里陈列着岑参、张澍、刘墉、包世臣、启功等 26 位历代名士手札和周而复、孙轶青等当今大家的咏陇诗作。

唐著名诗人岑参有诗：“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国流。”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文徵明诗赞：“三月韶花过月浓，暖蒸花气日溶溶。菜畦麦垄青黄接，云岫烟峦紫翠重。一片垂杨春水渡，两岸啼鸟夕阳松。晚水吹酒蓝舆倦，忽听太平寺里钟。”古代著名诗人张澍诗赞：“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鸾幢影出冈峦……”

兰州碑林还陈列着翻刻或收集到的甘肃著名碑刻作品，如《西狭颂》《碧血碑》《白塔寺碑》《免粮恩碑》《重修兰州城记碑》，以及有汉和西夏两种文字的《西夏碑》、汉藏两种文字的《大崇教寺碑》、汉蒙两种文字的《西宁王碑》、汉和八思巴两种文字的《镇海寺碑》，王仁裕神道碑、弘化公主墓碑、岫嵎碑等，黄庭坚、赵孟頫、文徵明、黄自元等人的诗碑，极具历史价值。

碑林还收录了部分当代陇上书法家的墨宝。顾子惠写的一副对联：“老鹤分巢长荫；高松旧植成鳞。”何裕写的一首赞誉李广的自作诗：“休怜李广不封侯，飞将功勋孰与侔。试问当年赫赫者，几人姓氏至今留。”陈伯希书写马来西亚华侨黄玉奎的《过兰州黄河铁桥》诗：“远播声名上九霄，引来游子自天遥。今朝且教偿心愿，跨越黄河第一桥。”

学界泰斗季羨林先生 1998 年 12 月 12 日也以“兰州碑林”为题写

了一首四言古体诗（80字），镌刻在碑林东轩：“丝绸之路，历史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敦煌巍然，东方枢纽。石窟众宝，彪炳千秋。辉煌璀璨，世无其俦。张皇发扬，子孙共守。智慧之都，古城兰州。莫高麦积，与天同寿。碑林筹建，光被六洲。新纪莅临，辉映全球。”

兰州碑林在筹建过程中，对散布在全省的古代碑刻进行了“打捞”和“抢救”，拓制和收购了大量的古碑拓片，对于保护、整理、研究甘肃古代石刻，保存文献，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近年来，兰州碑林出版发行了《古今咏陇诗词选》《兰州碑林碑刻资料选编》《塔影河声》《墨之韵》等书籍，开发了10多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庭坚《松风阁》拓本、梁启超等名士手札。兰州碑林还成功举办了兰州碑林藏甘肃古代碑刻拓片菁华展，并出版了《兰州碑林藏甘肃古代碑刻拓片菁华》，填补了甘肃碑刻研究空白。

兰州碑林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展示中华民族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西部文化的辉煌历史和当代成就，使其成为人们了解甘肃地域文化的一个窗口，可谓陇墨丛林。它所展示的从大地湾陶器的刻画符号到先秦古篆、秦小篆，再到汉隶、东汉“草圣”张芝的章草以及当今书法大家的作品，展示了汉文字在陇原大地上从最初实用的萌芽状态，到发展为光彩夺目的光辉历程。

凝望那一通通石碑，一通石碑后伫立着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一幅书法演绎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如饮醇酪，回味无穷。



商帮缩影

——兰州的会馆

兰州是古丝绸之路重要商衢，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商业活动繁盛，由旅兰商人集资建设的会馆便应运而生。会馆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尤其把商界中同乡人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与异地商人进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会馆的建立凝聚着外地商人们的创业艰辛。在明清之际，如何对大规模流动人口进行管理，开发和利用流寓人力资源，是封建社会人口管理体制遇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在此期间，以乡土关系为纽带所产生的会馆，在约束同乡、安排就业、扶危济贫、调解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官方行政管理系统之外的商人自治组织。

会馆的兴起，各地商人为争强斗胜，展示特色，在会馆建筑上互相

攀比，成为兰州建筑中的一大景观。会馆的建造受庙宇影响较大，整个建筑多坐南朝北，布局上类似庙宇，建有山门、大殿、左右配殿、廊房及厢房等。兰州各个会馆在建造中，都有戏楼的建筑，这是因为来兰经商的商人或在兰为官的人士，他们在商海、官场中体会到世事无常，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便相信神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便在会馆中建起了戏楼，逢年过节唱上几天戏，以求神灵保佑。另外，在同乡聚会中，大家同在戏楼前坐定，琴音声中，“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荡然”。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慰藉。因此，建会馆必建戏楼，戏楼也和整个会馆建造融为一体。

会馆的数量，显示一个地方经济是否繁荣；会馆的大小，则是一地商帮实力的展现。兰州的一座座会馆，折射出来的是金城商业沧桑兴衰。会馆是漂泊者的暂栖之地，一座座会馆见证了商帮的兴衰，记录着一段段让人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昔日兰州经贸往来和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程度。清代，兰州地区商贸发达，客商云集，成为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枢纽，先后建成的会馆有十四五处之多。会馆全修建在兰州市城关区商业繁华地带，至今城关区还保留有会馆巷的地名。由于历史原因，曾经名盛一时的山西、陕西、浙江、山东、两湖等8大会馆已被拆毁一空，人们只能通过几张模糊的照片看到它们昔日的风采。

陕西会馆，因陕西距兰州较近，交通便利，在兰州的陕西商人人多势众，财力雄厚，几乎垄断了兰州的各行各业。当时的辕门街（今日从省政府到南关十字一段）、西大街（从现在大众饭店门前的什字到省政





陕西会馆戏楼

府门口一段)和东大街(从现在贡元巷北口到省政府门口一段)为兰州最繁华的三条街道,有三合公、致南斋、德顺和、义兴公、致远合、安泰堂等陕西商号,他们在兰州的食品、餐饮、绸缎布匹、印刷、药材、建材行业均执牛耳,行业遍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便于联络友谊,聚会或业务经营,也为了接济初次来兰的“乡党”,做些善举等,于是由多个商家牵头,联络在甘肃供职的仕宦,加上其他来兰州的陕西籍人士,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购地皮聚资金,修建了以会馆为实体的聚会场所。它是异地秦川、汉中游子们聚会的场所,寄托了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在兰州会馆中最大、最气派、数量最多的属陕西会馆,加上山陕会馆,兰州的陕西会馆有三处:第一处在位于省政府东侧山字石旁的会馆巷,俗称山陕大会馆,建于清朝康熙初年,山西、陕西两省商人购置山字石凝熙观地址而建。原建有关帝、药王、火祖、文昌阁等神庙,还有钟楼、鼓楼、戏楼等相关建筑,为兰州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会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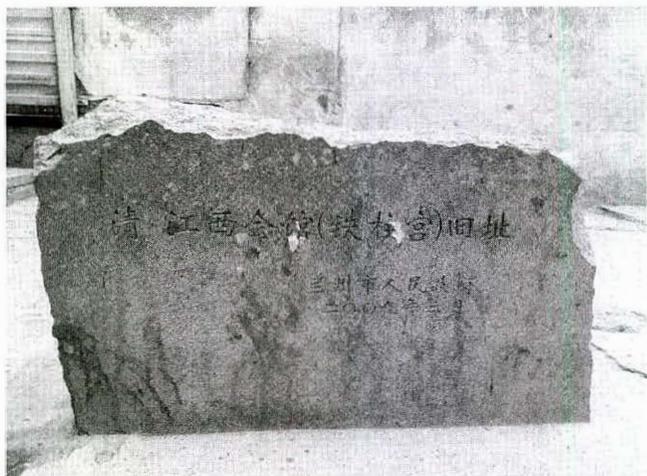
一。也由于规模宏大，所以当局把它所在的街道命名为会馆巷。20世纪70年代因城建规划，古建筑群全部被拆除。第二处是位于贡元巷北口，与现在的城关区医院隔街相望的陕西会馆。原有戏楼、大殿等古建筑，现已不存。第三处，是位于曹家厅中部的陕西新会馆，建于1918年，坐北朝南，结构很特殊，融入了兰州“一进两院”的习俗。只有一个大门和两个边门。正门是类似于砖木结构的牌楼。“陕西会馆”四个厚实的正楷大字，是青砖雕刻而成的匾额，四周镂空的花鸟，也是用砖雕成。门呈拱形，格外醒目。

皖江会馆（安徽、江苏两省会馆），位于城关区山字石中街12号，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代为左营守备署，故称“左营庙”。民国五年（1916年），甘肃省巡按使张广建变卖清衙署、坛庙，安徽籍官员购左营庙，改建为皖江会馆。1918年秋，甘肃武威的一位商人在山字石皖江会馆放映无声纪录片，从此电影进入了甘肃。

该馆坐北朝南，现存过殿、大殿各一座，称禅院或关帝庙。过殿面阔三间，六檩卷棚大木结构，四周檐下施双桃木出檐，大小额枋间饰荷叶纹隔架墩，歇山卷棚青瓦屋面，两条垂脊，四条戗脊，水磨方砖山花，玻璃透风花脊筒，五花山墙，正面全木装修。大殿面阔三楹，九架梁歇山顶，前出檐，额枋粗大，装饰精美华丽。屋面为琉璃九脊歇山顶，西番莲纹雕花透风脊，盘龙正吻，三把鬃、五把鬃垂兽、戗兽，正脊中树狮象座宝瓶三座，宝瓶两侧为鳌鱼脊饰。整座大殿制式严谨，具有兰州地方风格。皖江会馆于2005年由省佛教协会翻修，彩绘、建筑物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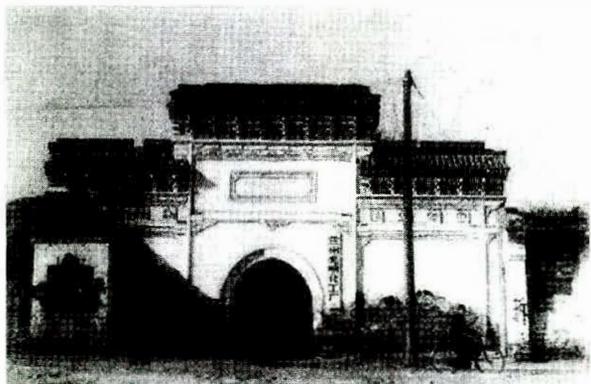
江西会馆原址位于今兰州市城关区金塔巷。道光丁亥年（1827年）程裔采观察使购地建祠，移奉祀事于金塔巷，后赵宜暄于丙申年（1836年）修葺告竣，并以“铁柱宫”名之。会馆原建有大门、前庭、正殿、钟鼓楼、戏楼等相关的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因城建规划用地，将铁柱宫大殿及门庭迁建在现兰州市博物馆（今庆阳路110号）院内及大门庭。



江西会馆旧址

四川会馆旧址位于今城关区贤后街28号，会馆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民国初年重修，尚存砖砌大门、过殿、大殿及东西厢房等相应的配套建筑。共和国成立以后，拆前由兰州光明化工厂占用。1994年政府划拨给国家农垦部西北绿色食品监测中心使用，同年5月古建筑群被全部拆除改用。四川新会馆旧址位于城关区五泉山公园园内东龙口小台地上，始建于1922年。会馆原建筑有正堂、戏楼等配套设施，现已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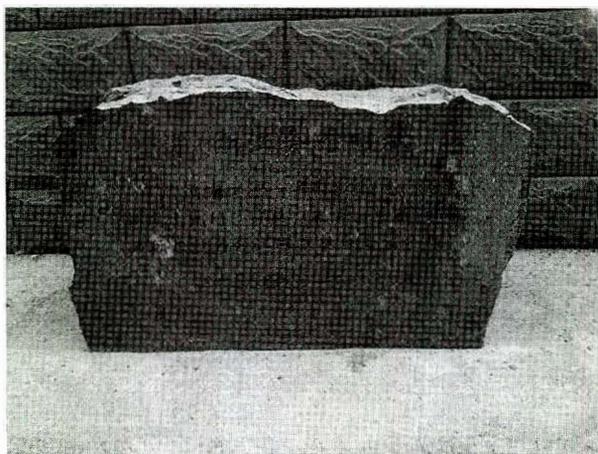
四川会馆（1997年
4月拆除）



两湖会馆（湖南、湖北两省会馆），旧址位于今城关区贤后街东端北侧，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会馆原有正堂、中庭、戏楼等相关的配套建筑，早年已不存。

山东会馆旧址位于城关区木塔巷，始建于1923年，会馆原建正堂等建筑全部拆除。1989年文物普查时，仅存砖砌大门，有蓬莱蔡镇西题“山东公馆”楷书砖镌笔迹，不久即毁之。

浙江会馆旧址位于今城关区金塔巷，始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



浙江会馆旧址



年)，会馆原建有大门、前庭、正堂等相关的配套建筑，早已无存。

天水会馆旧址位于城关区下沟巷，当时为了方便天水来兰考生所设，故又称为试馆，始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为天水同乡出资兴建。会馆原建有前庭、正堂、花园等相比邻东西共三院。二层木结构楼已于1991年拆除。

八旗会馆（八旗直鲁豫奉吉五省会馆），旧址位于今城关区水北门北侧，始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会馆原建有前庭、戏楼、正堂、大门等相应的配套建筑。古建筑群早已不存。

三晋会馆（山西会馆），旧址位于今城关区永昌路227号，原与八旗会馆相比邻，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会馆原建有大门、前庭、正殿等配套建筑，因城建规划用地，古建筑群已全部被拆除改用。

广东会馆坐落于金塔巷78号（原共和路），始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占地1.995亩。广东会馆旧址是目前西北地区唯一的粤商会馆，是兰州市区内留存至今唯一的明清会馆遗址，也是市区保存比较好的一座清代四合院落。广东会馆保存着一块石碑，碑高49厘米，宽31厘米，厚8厘米，碑文和落款清晰可辨，碑文有16个字：“禀官存案不卖不典私相授受作为无效”，落款：“广东同仁公启”。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四合院，厚重的两扇木门保存完好，门右侧的石鼓保存尚好，现院内南北两座房屋属于会馆的原建筑，虽然里面又搭建了许多小房屋，显得杂乱，但比起那些已经拆除的会馆来说是极其幸运的了。经100多年风雨侵蚀，其古建筑面貌仍依稀可循。



广东会馆

会馆是旧时代兰州地方文化、商业文化的遗留，显得特别珍贵，它是反映兰州商业重镇作用和历史的缩影。会馆建筑不仅是保护兰州历史文化的內容，也凝聚着兰州包容外乡人来兰建设发展地方经济的太多情结和精神。但由于会馆被拆除殆尽，兰州旧时代盛极一时的会馆文化、商业文化失去了载体，使之仅仅成为写在纸上的一段段文字。

会馆对于外地客商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近些年来，兰州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外地客商来兰创业的热情不断升温，会馆这一曾凝聚着客商更多情结的载体逐渐在兰州得以恢复。山西商人异地恢复的晋商会馆，河南商人异地恢复的豫商会馆先后在九州台山腰重建，陕西会馆也在雁滩得以恢复。

会馆经济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延续到现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兰州也有几百年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底蕴，才使得



会馆经济一发而不可收。在我国的南方城市，会馆经济不单是以其文化价值、历史底蕴、独特建筑风格的形式存在，而且是逐渐上升到一个高度，并在壮大旅游产业、为地方经济吸金等方面体现其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客商投资的热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对于先前会馆林立的兰州来说，没有抓住这一地方优势显得很是遗憾。有专家建言，相关部门应给予兰州的会馆经济更多政策支持，同时，招募会馆传人，想办法复原会馆，修旧如旧，让后代知道祖先的业绩。研究定位会馆的地位和作用，从法律法规上赋予其保护的内涵。

吕仙洞府

—
白云观

道教形成于东汉，魏晋时期传到甘肃陇东地区，后渐西传。唐代，道教被官方定为正统宗教，陇东、陇南等地道教已显兴盛。宋代，统治者以崇道著称，道教在兰州已有所发展，建有玄妙观（后改名东华观）、城隍祠，兴隆山已是道教名山。

宋元之际，道教派别分化繁衍，新派纷纷出现。元代，全真道龙门派和崑山派在陇东、陇南最为兴盛，时兰州盛行正一道。

明代，执政者崇信道教，兰州道教有较大发展。全真道支派著名道士张三丰见重于朱元璋父子。肃王在兰州城西华林山麓修建金天观。全真派在兰州，以金天观为中心，有较大发展。有明一代，驻兰州的几位藩王均为道教信徒，在当政者的倡导下，兰州修缮宫观之风蔚起，玄妙



观、城隍庙分别在宣德、嘉靖、万历年间修葺一新，兰州道教极一时之盛。

清代提倡佛教，兰州道教虽一度衰微，后又兴盛。清末民初，受全国民主革命潮流的冲击，道教有日渐衰落之势。民国前期，兰州一些道观仍获得修葺。民国中期以后，宫观大都为军阀政府和国民党驻军所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依法管理，兰州道教发生重大变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兰州道教宫观，迭经兴废，至1982年后陆续开放宫观庙殿25处，完整道观所存无几，白云观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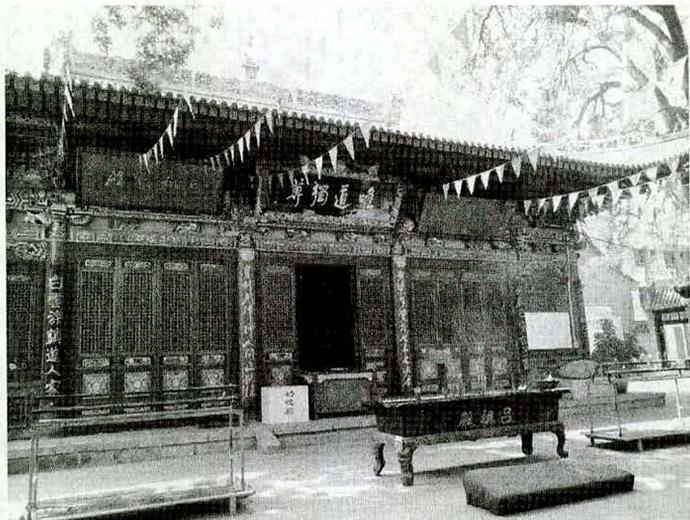


崔家崖白云观（1933年摄）

兰州白云观，又称吕祖庙。原有上下两处，上观位于今七里河区崔家崖的极寿山，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规模宏大、风格迥异，是一座道观与佛殿结合、以道观为主的宗教建筑群；主体建筑由7座正院、6座跨院和一座13层的八角形砖塔组成，从正门到最高的神殿有好几百石级；在旁边的走廊上远望曲折的黄河和对面蜿蜒的群

山，极目千里，颇为雄伟壮观。观内供奉的塑像和壁画，既有神仙又有佛陀。民国九年（1920年）发生大地震，包括砖塔在内的部分建筑被震毁；20世纪50年代修建兰新铁路时拆除了崖麓的建筑；其余建筑均在“文革”中被毁，从此上观不复存在。下观位于雷坛河入黄河口之东，滨河东路西端南侧，北临黄河白马浪，与河对面的金城关遥相呼应。现在人们所说的白云观，即指下观，它是清代陕甘总督瑚松额捐俸所建。白云观系西北地区道教十方丛林，也是古代兰州三观之一。现为省、市道教协会所在地，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满洲正黄旗人瑚松额就任陕甘总督。次年，兰州乡绅纷纷请求为“吕翁”修建一座祠堂，以“栖仰”吕仙之“灵”。瑚松额遂让风水先生择地建祠，选中“城西北隅，大河之浒，辟地树宫”，即今白云观所在地。宫成，命名“白云观”，专事奉祀吕洞



吕祖殿





吕祖殿

宾。白云观因此又名吕祖庙，正式列入国家祀典，成为清代兰州地区规模宏大、建筑完整的道教十方丛林。

据史料记述，白云观坐南向北，是一座呈中轴对称的古建筑群。由大门、戏楼、牌坊、大殿、启圣殿及东西云水堂、东西道院构成。正门共有三个大门，中门拱上题有“升云得路”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入门后，为一进三院的古式院落。院内古槐遮天蔽日，松柏挺拔秀丽，令人肃然起敬。启圣殿后，建有一座结构精巧，匠心独具的三层八仙阁，四周由潇湘轩、鹤鹿亭、聚仙亭、四照亭等古建筑烘托其外。这一组建筑，错落有致，相互呼应，游人至此，心旷神怡，犹入仙境。八仙阁后，便是群仙楼。在聚仙亭畔架有一桥，回廊曲折，名曰“飞仙桥”，

连接南仙轩与西道院。过桥，便是来仙轩。建筑宏伟壮观，共占地面积30亩。由于历史变迁，仅存三座大殿、钟鼓楼、戏楼、东西配殿及东西厢房，其他建筑都已经在如烟岁月中湮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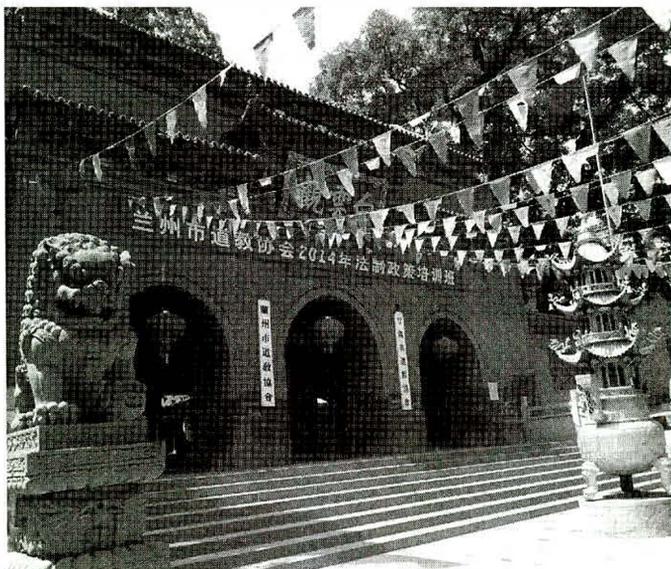
白云观供有吕洞宾塑像，供桌上摆有抽签筒，供桌前设有事签、药签等各类签方。一年四季，尤其是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前来抽签问卜的人络绎不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白云观破坏严重。1982年，兰州市人民政府拨款维修，院内仅剩的三座大殿、两座亭、一座戏楼被修葺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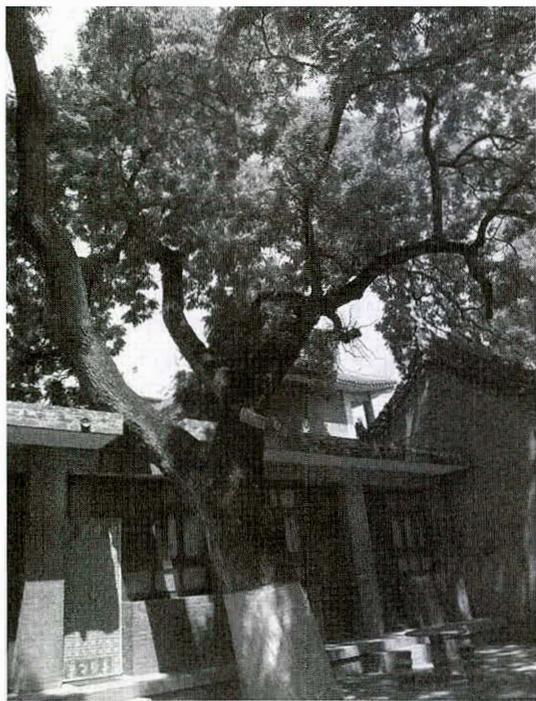
1986年11月，白云观归还兰州市道教协会，经兰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开放并确定为市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兰州市道教协会和白云观多方筹资先后维修了前殿、中殿、后殿、钟鼓楼、古戏楼（山门），



白云观山门



维修面积 900 平方米。另外，重建仿古式三层综合楼、东西配殿、禅房、斋堂、洗手间、焚纸炉、东西厢房，建筑面积共 1746 平方米。同时，重塑神像 29 尊、铜铸神像 7 尊、购置石狮 1 对；铸造大香炉 6 个、醮炉（鼎）2 个；保存石碑 2 块、新刻石碑 2 块、雕刻制作供桌 21 张、铸大钟 1 口、购置大鼓 1 面，以及配备殿内钟、鼓、铙、钹、鱼、铃、铛、鐃、磬等法器用品。观内现存古树国槐 7 棵，参天挺拔，枝繁叶茂，似北斗之星错落有序，1997 年，兰州市人民政府将这 7 棵国槐作为重点古树名木挂牌保护，白云观成为全城仅有的一处名胜道观与古树名木融为一体的景点。



白云观古槐

前殿（吕祖殿）是清代建筑物，飞檐卷顶，四角高翘，悬梁起斗，明柱殿堂，造型雄伟，迄今已有 160 多年的历史。此殿原为白云观过殿，建筑面积 280 平方米。1986 年 10 月被归还，经道俗共同募捐集资，维修了塑像和殿堂。1988 年，吕祖殿的 16 尊神像重塑竣工后，于九皇会举行了

1949年以来白云观的首次迎神开光活动。重修后的吕祖殿，殿内祀奉很多神仙高道，有吕纯阳、王重阳及其度化的七位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

中殿与后殿经维修后，于2000年举行了神像开光仪式。中殿（玉皇殿），供奉神灵为玉皇大帝、天皇大帝、紫微大帝、长生大帝、后土大帝及传言金童、侍香玉女、倒坐药王孙真人。后殿（三清殿）建筑面积240平方米，殿堂彩绘雕塑庄重古朴，同时供奉铜铸神像大小6尊，其中中殿3尊、后殿3尊。

观内东西两侧是配殿三官殿、三法殿，均系清代建筑，建筑面积各120平方米。东配殿为三法殿，塑像7尊：雷祖、天师、真武大帝、关圣帝君、二郎真君以及两位仙童；西配殿为三官殿，塑像7尊：天官、地官、水官、文昌、紫阳真人以及两位仙童。

观内的戏楼也是清代建筑，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清代谭钟麟曾题白云观戏楼联：“为子当孝，为臣当忠，千百载豪杰英雄，皆抱定这性中根本；何日无炊，何人无梦，四十年得失荣辱，谁悟彻了枕上因缘。”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部在全省调查，白云观戏楼是兰州市城关区仅存的一座古戏楼。其建筑飞檐翘角，脊兽卷顶，雕梁画栋，蔚为壮观。戏台口朝南，松木地板结构，与山门联结一体，明柱悬梁，山门在下，戏台在上，建筑造型别致，有较高的文物观赏价值。钟楼、鼓楼为十方丛林道观早晚或初一、十五开静、止静所用。十方常住钟鼓击打有一套传统的规范节奏与念诵经文，不允许随便乱击乱打。观内钟、鼓楼的原建筑保存完好，上为木质结构，下由青砖砌成。





白云观戏楼

如今，白云观已修葺一新，殿堂耸立、金碧辉煌，国槐参天、浓荫蔽日，甘肃名人邓宝珊所题“白云观”三个大字匾额高悬山门之上，门额“升云得路”砖刻大字苍劲有力，两侧砖雕龙鹤栩栩如生，观内环境静谧幽雅。每逢农历正月初九玉皇圣诞、二月十五老君圣诞、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

十月初一庙会，观内设道场举行隆重的诵经祈福、超度活动。每逢初一、十五，进香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白云观是兰州市百里黄河风情线上古典建筑与仙道文化融为一体的名胜古迹，每年来这里敬神参观的香客游人达 20 余万人次，近年曾先后接待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参观团和港澳台同胞的参访朝拜及文化交流团，已成为开展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和海内外道教信徒及游人观光朝拜交流的著名道观。

古城写照

——金城揽胜图

在中国有一幅画《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实际描绘的是秋季景色，“清明”二字意为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此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而兰州也有一幅描绘整个城市的画卷——《金城揽胜图》，长 150 厘米，宽 83 厘米，是一幅设色山水画，描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兰州的城池及山川形胜，既是写意抒情的艺术品，又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图，被视为珍贵的图画档案资料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按照画面的角度分析，一百多年前，画家当是站在白塔山侧后偏东位置，向南纵目远眺，用写实手法，描绘了依山带河的兰州形胜，因其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金城揽胜图

地汉魏时属金城郡金城县地，故名《金城揽胜图》。画家当为兰州人或是久居兰州之人，熟悉兰州历史与文化，明了兰州地理特征与山川城池概貌，作起画来自是胸有成竹，信手拈来，因此能够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反映出当时兰州古城的风貌与神韵。兰州的地形特点是两山夹一河，而自身处于白塔山，所以画家的重点也就放在了黄河、城郭、南山上。又由于当时兰州已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传统城市建设已相当完备，可谓市井繁华，街巷纵横，在如何表达方面，画家对一些次要景物予以虚化处理，避免了喧宾夺主使画面过于烦琐零碎。尤其是对城郭内的景物的处理上，突出街署、城楼、寺院等主要建筑物，而虚化了街巷和一些次要建筑。这样处理，既便于技艺操作，又能给观赏者以鲜明的印象。画家取法于黄子久，皴笔不多，苍茫简远，气势雄秀。

《金城揽胜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整个画面可分为近、

中、远三部分。近景是横贯城区的滔滔黄河，占全图面积的四分之一，依次描绘了耸立在白塔山巅的白塔，一塔独立，更显凌厉之势，清代秦维岳《白塔寺》诗云“擎天一柱俯黄河”；河面开阔，水波粼粼，横卧在黄河之上的已有近五百年历史的镇远浮桥，舟楫相连，渡河如履平地；河面上自上游劈波斩浪顺流而下回归闸门的两舟，上面的红色旗子迎风飘扬；南岸悠悠旋转的两轮高大的水车，仿佛能听到水流激荡与水车吱吱呀呀转动的声音，显现出大河之上独有的动态画面与地方风貌。

中景是位于黄河南岸的市容，占整个画面的四分之一，着重描绘了当时兰州城郭概貌及其雄姿，整个城池外形近似一个“凸”字，东关、南关、西关由内城分别向三个方向延展，“关比城大”的特点一览无遗。但见城垣规整，城墙高大，门楼巍峨，街市纵横，屋宇栉比鳞次。尤其表现了一些重要建筑，总督署辕门直插云霄的四根旗杆最为显要，宣扬着“总督陕甘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茶马兼巡抚事”封疆大吏的威严；气势森严、甘肃数百年权力中枢的肃王府；斗拱凌空，令无数文人墨客及官绅凭吊古迹、把酒临风、高吟低唱、观景抒怀的拂云楼；榆中“老乡”高昌国王鞠文泰唐初捐资始建的“巍巍一柱，八面玲珑，上应乾天，前迎巽位”的木塔巍然屹立，与明肃藩王为求多子所建的中印合璧的白衣寺塔，一个西北，一个东南，遥相呼应；建筑规模宏大，“为国求贤”的甘肃贡院；林木葱茏、庭院深深的凝熙园。此外，城东流水欢歌的水车园，树木葱郁成林；城西规模宏大的白云观，绿中吐白的梨花园，急流奔腾的雷坛河，如月似虹的握桥，古木参天的金天观，碧波荡漾的小西湖，也历历如在目前。



远景是峰峦起伏的群山及高峻险要的皋兰山，占整个画面的二分之一，由肃庄王朱模为兴兰州地方文脉所建的三台阁高耸于崇山之巅，宛如天上宫殿；古刹错落、晨钟暮鼓、树木环绕的五泉山上千佛阁、三教洞、卧佛殿、西龙口及崇庆寺等殿宇历历在目；伏龙坪上传说为斩龙脉（实为军事设施）而依次修筑的雄伟高大的四个墩台，以及上西园长眠的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彭泽之墓，等等。

整个画面构图严谨，内容丰富，详略互见，层次分明，笔致墨韵，清润明秀，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

《金城揽胜图》上有行书跋语 18 行：“二十年前感旧游，夜深有梦到兰州。五泉顶上重题句，借问山灵许我不？秉丞世讲农部出图索题，漫成一诗，采尘郢正。回忆前游，不胜今昔之感也。光绪丙午夏四月。紫帆成昌并识。”并镌“成昌”“紫帆”小印两枚，跋语左镌收藏印一枚：“煦园”。

因画面上高耸入云的木塔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毁于火，而画跋题于光绪丙午（1906 年），两者相去三十多年，其题“二十年前感旧游”，据此推理，画作为同治或光绪初年所作，后来画的持有者又找画家题跋，并且此时画家不在兰州，所以有“梦到兰州”之语并充满了怀念与依恋之情。《金城揽胜图》后为民国时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水梓收藏，“煦园”即其收藏印。1956 年，水梓将此图捐赠给政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1992 年，甘肃省博物馆布置丝绸之路展的时候，《金城揽胜图》还曾经是其中一环。只是后来重新布展，因为宋以后陆上丝路逐渐被海路

取代，为了突出重点，明清时期就少有涉及，此图也就收入了文物库。

同为描述一个城市的风貌，《金城揽胜图》与《清明上河图》各有千秋，前者选取远景，描述城市山川概貌，后者以中景为主，更趋向于描写社会各界及市井生活百态细节，对人物的表现比较清晰，对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及城市的风貌都有极高的价值。然而两者的影响却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前者所描述为西北政治经济中心、军事重镇的古金城，画作历时百年，画家没有署名；后者描述的是北宋首都汴京，画家张择端赫赫有名，历代收藏者更是大家云集，且画作已历经千年，其价值不可估量。由此可以说，《金城揽胜图》是兰州版的《清明上河图》，它在有限的空间里留驻了当年的兰州，留驻了当年兰州城的状态，它为挖掘整理兰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资料，是研究晚清兰州城的实证资料，近年来被各种有关兰州历史文化的书籍或资料引用，足见其重要性，其珍贵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更加凸显。

在反映兰州古城风貌方面，与《金城揽胜图》相关的是《兰州八景图》，清人王晓霞、温晓舟等画家均有作品传世。其中民国时期临夏



今日兰州

籍画家何海楼创作的《兰州八景》册页，高 29 厘米，横 16 厘米，纸本设色，分别描绘了五泉飞瀑、兰山烟雨、白塔层峦、梨园花光、河楼远眺、古刹晨钟、虹桥春涨、莲池夜月，整个画面构图严谨，内容丰富，详略互见，层次分明，笔致墨韵，且每幅画题诗一首，图文并茂，格调高古，意境深远。杨思、水梓、裴建准、范振绪、张建、贵薰等诸多书画名家为其八景题跋赋诗。现珍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兰州八景图》是对古金城风景的高度概括与浓缩，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山川人文风光，可惜时过境迁，当年八景多已不存。曾经蔚为壮观的五泉飞瀑风光不再；上沟下沟一代的梨园随着城区的拓展被拔地而起的楼群所取代；肃王家族寄托思乡情怀的“望河楼”于 1959 年在拓展滨河路时被拆除；始建于唐代，被茅以升称为“伸臂木梁桥代表”的“虹桥”——兰州握桥于 1952 年被拆除。同时，由于城市改造与建设，小西湖已非旧时模样，市区几大古寺也几乎消失殆尽，所以“莲池月夜”和“古刹晨钟”也已不复存在。曾经的兰州八景，唯“兰山烟雨”和“白塔层峦”两景尚存，且风貌更胜往昔。如今，在张掖路步行街上有“兰州八景”浮雕地灯，金城关景区内以剪纸作品制作成的合金浮雕《兰州古八景》，诠释着这座城市的古老文化底蕴。

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州的现代化气息越来越浓，高层建筑林立，一些旧城墙及古迹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失，号称“金城汤池”的古兰州什么模样，今天已经了无踪迹。在《金城揽胜图》和《兰州八景图》中留存了一个古老城市的记忆，尤其是诞生于 100 多年前的《金城揽胜图》，给这座古老的城池留下了写照，一幅画展现了一座城。这是迄

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也能最完整地反映出当时金城形象的画作。由于它的存在，使得我们今天仍能领略到清同治、光绪年间兰州城的风貌，这可以说是令人惊喜的，弥足珍贵的。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攻坚之战

——营盘岭遗址



营盘岭位于皋兰山东南约5公里处，海拔2171米，东邻红沟，南背三营子，西傍花寨子、侯家岭之间山崖，北面二营子，面积约1平方公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兰州东南天然屏障。明代以来屡为设防驻兵之地，故名营盘岭。这块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也见证了解放兰州时鏖战的壮烈史篇，留下的营盘岭战斗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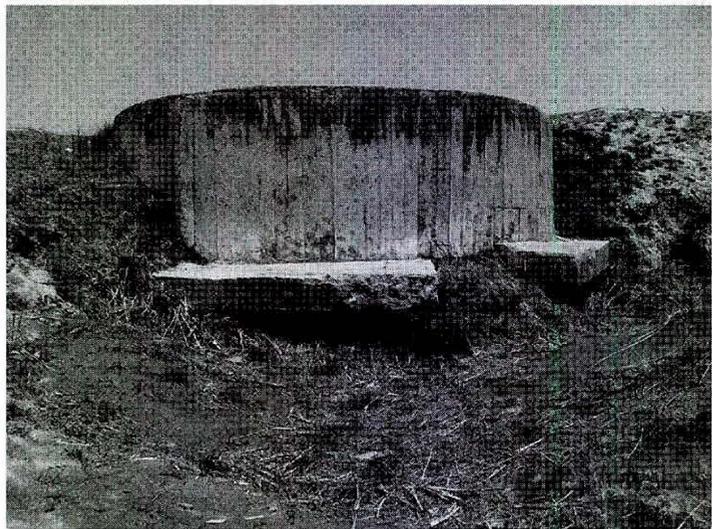
在营盘岭遗址，如今留有敌人的战壕和三个碉堡，三座碉堡呈品字形布局，一个碉堡至今还很完整，两个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毁了。碉堡周围有战壕，战壕呈U字形拱卫碉堡，宽约5米，深5~8米，长约100多米，当年上面有遮盖，敌人在里面活动，如今成为庄稼地。在战壕沟的旁边，是一座完整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坐落于一道凹陷的土坑里，并

不像电影里那样高大突兀，看上去很隐蔽。碉堡呈半圆形，约 1.9 米×1.9 米，有两个方形的射孔，正对准前方的沟壑。碉堡分前、后两室，门宽约 70 厘米。前室是射手射击的地方；后室面积约 2.3 米×2.1 米不等，是装子弹的地方，墙壁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是用来放煤油灯的。整个碉堡里面比较狭小，仅能容下四五个人。在这座完整碉堡的跟前，堆放着几大块废弃的混凝土，也是一座碉堡的遗址，当年在战斗中被炸掉了。还有一座碉堡的遗址已变成了土堆，长满了荒草。所有这些都无声地讲述着 60 多年前发生在营盘岭的鏖战。

兰州的南山是必守的阵地。南山自东向西依次为十里山、古城岭、窰家山、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狗娃山。其中营盘岭是皋兰山的主峰，兰州的南面屏障，从兰州内城有公路直通峰顶。各种火炮、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均可由汽车直接送到阵地。时任国民党兰州防守总指挥的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在给营盘岭守敌电话指示中说：“营盘岭不失，兰州



兰州战役营盘岭遗址



营盘岭碉堡

有望；营盘岭不保，兰州危矣。”

国民党在“三大战役”失败后，将军事战略重点放在西北，加紧建设兰州防御体系，妄图扭转败局。据曾亲历和目睹了解放兰州营盘岭战役的康明德老人回忆，当时皋兰山万余亩土地，就有 2700 多亩挖成了战壕，占全部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还要多。山上的工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以 1 个工兵团，外加 3000 民工，整整修筑了半年多。尔后，用了 1 年多的时间修筑一条从伏龙坪至营盘岭的备战公路，马步芳又派了 1 个工兵营，还有数千民工，又加修了 3 个多月。这些永固性工事总耗资数百万元之多。主阵地以钢筋水泥建造的明堡与暗堡，构成核心的集群工事。围绕主阵地三营子这个山梁，自上而下有环形峭壁 3 道，每道高 2~3 丈，峭壁外挖有 2 丈多宽的外壕，外壕内外两面均设有铁丝网，并布满了小型航空炸弹，每枚炸弹重 30 磅。炸弹与不同型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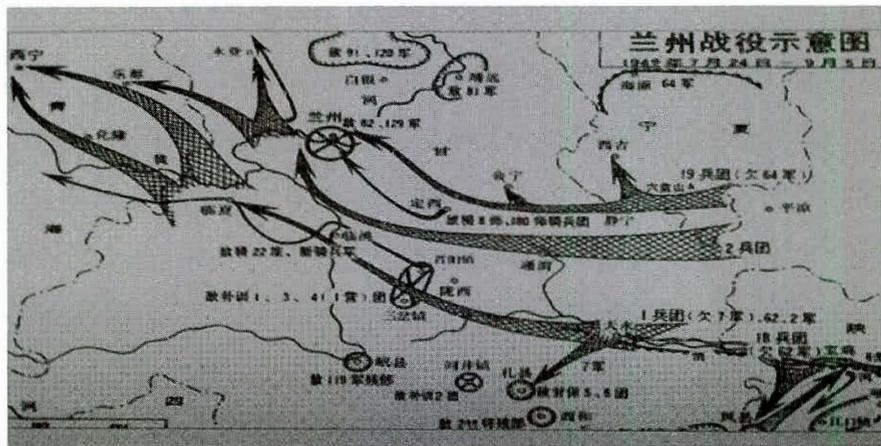
的地雷连接成梅花或连环雷，踏响一个，连响一串，号称为“王八雷”。整个阵地上，明堡暗堡火力组成交叉火网，并与可容纳2个营兵力的地道相互串通，既能打又能藏。因此，成为兰州防御体系中的主要阵地之一，被视为“兰州锁钥”。营盘岭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架山守敌的火力支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力体系。如果解放军攻占营盘岭，就可以居高临下，轻重火器能直接控制兰州整个市区和敌人唯一的退路——黄河铁桥。

1949年8月20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汇集兰州外围。马步芳凭借固若金汤的兰州防御体系严阵以待。扼守营盘岭的是马步芳的精锐主力第248师，负责攻打营盘岭的是解放军二兵团第六军第十六师和第十七师。8月21日拂晓，第十七师主攻，第十六师配合，炮火齐鸣，解放军向兰州守敌发起进攻，逼近前沿阵地。但战斗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伤亡较大，遂停止进攻，进行研究与精心再准备。

面对敌人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的态势，总司令彭德怀到营盘岭阵地视察时，了解部队存在的困难，进行了战前动员，指示主攻部队：根据地形和敌人设防的重点，很好地组织侦查弄清敌人火力，再好好研究一下，如何从正面突破。并要求“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消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

二兵团六军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做了具体分析与研究，决定主攻部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正面攻击，以少数兵力从侧翼助攻，吸引敌人火力，待正面得手后再从两翼投入兵力。具体作战部署：十七师五十团为突击队，主攻营盘岭正南阵地；十六师四十六团主攻，四十八团为预备





兰州战役示意图

队，攻击营盘岭东南阵地；由 53 门野炮、山炮和榴弹炮等组成两个炮兵群配置在九条路口、梁家山、郭家寺一线，集中火力摧毁敌人主阵地，压制敌人反击，掩护突击队的进攻。

8 月 25 日清晨 6 时 30 分，开始总攻，抢夺营盘岭的战斗就此打响。炮声惊天动地，硝烟滚滚，火光冲天，西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上少有的一场恶战开始了。

第六军的战士们与敌人反复争夺着三营子第一道阵地。在崖坎前和崖坎上面的开阔地，敌我双方来回拼搏，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打得难解难分。解放军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冲击，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折了赤手空拳和敌人格斗。有的连队仅剩下十多人，依然奋勇前进。部队寸寸逼近，终于接近了敌人的营盘岭主阵地，但是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难以炸开突破口。前沿部队一时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指导员曹德荣舍身炸峭壁，把敌人防

线炸开了一道血口子，战士们乘势向敌军发起冲击。下午1时，开始夺取营盘岭最后一个顽固堡垒的战斗。在强大火炮的掩护下，解放军全线进攻，三面红旗先后在敌阵地上树起，但刚一树起就被敌人打断旗杆，红旗落下来了，再树起，再落下；再树起，再落下。战士的血浸透了红旗。就这样，红旗反复起落七次，第八次，同时有十几面鲜艳的红旗在营盘岭主阵地上飘扬起来。经过激烈反复的搏斗，当晚，营盘岭被解放军胜利攻克。红旗高高飘扬在皋兰山上。

战前，马继援信誓旦旦放言：“营盘岭是牢不可破的铁城，是固守兰州的南大门，如共产党能攻破了它，我便自动撤出兰州。”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击下马继援的防线终于土崩瓦解，仓皇撤离。

营盘岭攻坚战，解放军共毙伤、俘敌 1725 人，但也付出了伤亡



解放军在作战中



1235 人的巨大代价。

经过马架山激战，沈家岭血拼，飞夺黄河铁桥，兰州宣告解放。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激战 6 天 6 夜，共歼灭马步芳主力 2.7 万人，为西北野战军西进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进军新疆，解放西北全境扫清了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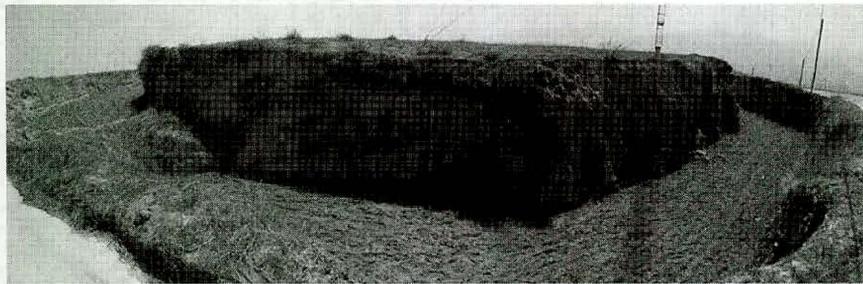


碉堡内部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那段不朽的历史，缅怀为兰州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1955 年，兰州市在兰州烈士陵园布展了兰州战役纪念馆。2008 年，兰州市委、市政府投资 520 万元整修纪念馆。2009 年 9 月，整修一新的兰州战役纪念馆正式开馆。纪念馆精选了 295 幅历史图片，22 张作战形势图，征集了部分历史文物，是兰州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主要场所。2014 年，“8·26”兰州解放 65 周年当天，重新设计布展的兰州战役纪念馆和新布展的一个国家级“红星照耀中国”主题展馆正式对外开放。兰州战役纪念馆展览分为奏响西进序曲、实施千里追击、浴血南山之巅、聚歼青马主力、欢庆西北解放

五个单元，展示了兰州战役始末。“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主题展馆位于兰州战役纪念馆园区中部，整个展览由六个单元组成，分别是探寻红色中国、镜头里的中国革命、伟人风采、人民军队、群众武装、延安生活。9月，经过文物鉴定组专家的鉴定，兰州战役纪念馆的文物中，一级文物5件套14件，三级文物4件套12件。提升改造后的兰州战役纪念馆，将成为在西北具有较高水平和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宣传阵地、国防教育实践基地。

如今，营盘岭这块当年无数烈士与敌人拼死搏斗、壮烈牺牲、鲜血染过的土地上，山色青青、梯田层层、条条水泥路通向村民院落，一院院农家乐休闲庄园喜迎八方客，兰山公园高耸山巅，一派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这也许就是当年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目标。



兰州战役营盘岭遗址



外交产物

——西北大厦

明清至民国初年，兰州民居基本为平房，其中绝大多数是土坯墙、泥屋顶的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官署、商店铺面的平房建筑，大部分为砖石木混合结构。至抗日战争前，兰州城内的房屋建筑——无论是官府建筑、公共建筑，还是宗教建筑，全都是传统样式。至于私家宅寓，则多为清一色的低矮平房，间或有几处小型阁楼，也都是土木结构。城内没有专业的建筑队伍和建筑师。

抗日战争爆发，东南沦陷区民众、企业不断迁往兰州，促进了兰州建筑业的发展。当时有正大、中华、金城、三盛、陶馥记等 20 多家营造商，组成建筑业同业公会，承揽商业、民用、公用等各式建筑工程，兰州城内这才出现了一些新式建筑。

1941年，兰州人口17.2万，面积16平方公里。设市后，大搞市政建设，修建马路，栽行道树，并要求沿马路经过区域的商铺门面一律改建两层楼房，无力改建者可向市区贷款委员会贷款，否则不发执照。由此可见，当时的建筑主要是平房，市政府才有必须建两层楼房的规定。由此市容大为改观，1941年下半年蒋介石来兰视察时给予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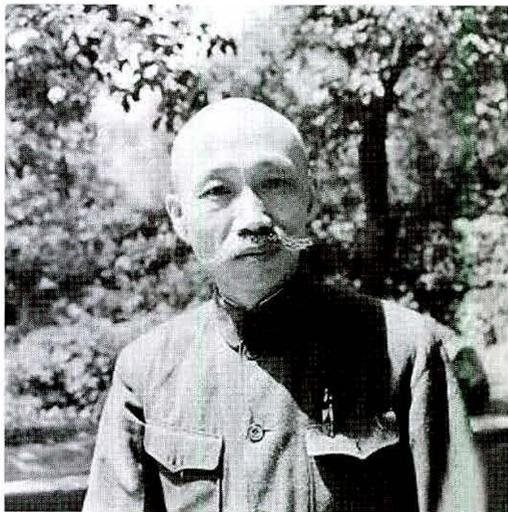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美联合抗日，兰州成为后方军事交通重镇和援华物资转运中心，东南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国际友人来往也渐次频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经兰访重庆时，兰州却没有一座像样的来宾下榻处，招待成了问题，只好安排在



蔡孟坚

励志社（地址在今中共兰州市委后院，为砖木结构的两层建筑）住宿一晚。此事使兰州市市长蔡孟坚颇感尴尬。为了解决接待外国宾客的问题，1943年，蔡孟坚、西北公路局局长何兢武共同和上海陶馥记营造厂陶桂林协议，建一个现代化的大饭店，并由蔡孟坚向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提议。谷正伦当即应允，由省政府出资，由市政府监督建造，在兰州市自由路南山坡上，建两层





谷正伦

楼房。在省主席的大力支持下，蔡孟坚很快便组织力量，开展了建造工作。要建设西北大厦的消息一经传出，社会各界拍手叫好，奔走相告，充满了期待。

西北大厦选定的地址离市区很近，适合建造一处有活动场所的大宾馆。但是，所在原是一个公共坟场，其中除一处为援华苏军烈士墓外，大都是回民的古坟茔，处理不好会伤及民族感情。市政府先择地迁葬了苏军烈士的尸骨，又择地开辟了一片新墓地，将少数可以移动的无主坟妥善迁入总坟，又动员墓主将其所属坟茔迁到新墓地。数月后，迁坟结束，立即请时在重庆的上海陶馥记营造厂专程来到兰州，承建大厦等项工程，并定名为西北大厦，还决定新辟林森路（今永昌路，当时为了纪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而命名）。林森路直贯南北，可由黄河边直达西北大厦。

西北大厦是由当时建筑界闻名的基泰工程公司设计的，设计者李惠

伯。当时修建的西北大厦是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3000 多平方米，门庭三层，主楼两层，内设餐厅、客房、宴会厅等，有 80 多间房子，房间地面是马赛克和水磨石的，有取暖用的壁炉，还布置了灯光。由于当时双城门还在，永昌路没有拓通，所以大厦的门是朝西开的，由安定门（今胜利宾馆）出城向东直达大厦。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西北大厦建成投入运营，在当时来讲可算是兰州市的一流建筑，也是兰州最高的建筑，官方的大型集会、宴会及周末舞会均在此举行。蔡、何二人还特邀上海中国旅行社曹某来兰担任该大厦经理负责营业事宜，由外交特派员黄朝琴负责接待外宾。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经苏联访华，途径兰州，下榻西北大厦，甚为满意。魏德迈将军为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因美军在兰州设置军用气象观测设施，曾来兰州两三次，均由蔡孟坚市长在西北大厦接待。平时旅居西北大厦的主要宾客，则是美国空军陈纳德航空队（飞虎队）的队员。美国客人对大厦的设施与服务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1944 年，在重庆举行全国公路展览会，何兢武特意制成大厦模型运往重庆参展，以示宣传。

张治中主持西北行辕工作时，提倡艺术活动，于 1949 年 2 月邀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来兰献演。张治中在西北大厦设宴洗尘，请兰州市戏剧界名人作陪，参加者一百多人，成为当时兰州戏剧界人士的盛大宴会。张治中携带家眷参加宴会，艺术家们或清唱，或朗诵，相互切磋，气氛热烈轻松。宴会后，随即成立了兰州戏剧协会。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2日晚，为庆祝兰州胜利解放，在西北大厦举行文艺晚会，演出话剧《雷雨》，彭德怀参加了晚会。会后的当晚夜间，由于布置舞台时电线短路引起大火，虽极力抢救，但还是将二楼烧得精光。人们感到非常痛心，彭德怀也十分重视此事，指示有关人员短时间内恢复原样。当时大厦属于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管理，联络部部长范明立即召请兰州有名的建筑师柴应龙，负责西北大厦设计与组织施工等重建任务。于是在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琪的领导下，成立了共和建筑公司，柴应龙任公司工程科科长兼设计室主任，参加设计的还有许岷生、徐则劲、邱毓珩、娄文画等人。

从1949年10月开始设计并做施工准备，1951年元旦正式落成。由于刚刚解放，兰州百废待兴，连建筑用的砖都没有生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请示领导批准后拆城墙砖块和龙尾山四墩坪的城砖，用以大厦的重建。重修时将砖木结构改成了砖混，最高依然是三层，但规模比以前大得多，建筑面积达3500平方米，共设客房80多间、套房10间，



大火后重修的西北大厦

均在二楼；一楼有营业厅、会客厅、会议室、中西餐厅和礼堂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实施的第一个大工程，也是兰州第一个钢筋混凝土建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颁奖大会在新落成的西北大厦召开，会上将负责设计和施工修建大厦的柴应龙评为特等英雄模范。

在兰州饭店建成之前，省、市党政机关的大型集会、宴会及外事活动都在此举行。大厦重建之初归共和建筑公司管理。1952年元月成立了甘肃省建筑工程局，共和建筑公司划归省建工局系统，大厦改为独立经营。1956年3月，铁道部兰州铁路管理局（后改称兰州铁路局）建局，不久，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厦改为铁路招待所，交由铁路局管理使用。后又改作中共兰州铁路局党校办公楼。2004年，该校斥资300万元，对大厦进行了全面修葺，使之焕然一新。

2013年7月，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将兰州铁路局党校使用的办公楼——西北大厦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北大厦现状为，位于兰州市城关区西北新村2号，东邻自由路，南临陇海铁路线，西临市人防，北为白银路。该建筑由办公楼、会议室、礼堂、车库、餐厅等百余间房屋组成。整体为现代砖混结构双层办公楼（局部为三层），平面呈H形，砌砖墙，沙灰抹面，木质门窗，木质地板。屋面为人字形木屋架，板上挂青瓦。一层建筑面积为5125.22平方米，占地面积为6614.76平方米。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年煊赫一时的西北大厦显得不再风光，甚至逐渐不为人所知，在



数株高大的梧桐树的遮掩下，它默默无闻地矗立在自由路，正应了那句“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古词意境。但它诞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建于新中国创建之际，是兰州市的第一个钢筋混凝土建筑，是兰州市近现代较有影响的建筑之一，是兰州市建筑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研究兰州地区近代史有一定的价值，其历史意义不容小觑。

遗踪何处

——兰州名人故居

兰州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城市建设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历史人物。明代以前，由于军事地位突出而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滞后，所以产生的历史人物数量相对较少。自明清以来，历史人物经历了四个节点的几何增长式发展：一是明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明王朝的藩都。大批士人随肃王来兰，加之肃王本身对文化十分重视，这就对兰州人物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二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甘肃布政使迁驻兰州，兰州成为省会，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甘肃士子大都要来兰州寻求仕途，给兰州人物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由西安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总督、布政使、府、县驻地，成为西北地区政治、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吸引西北地区大批士子来兰，进一步促进了兰州人物的发展。四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奏准陕甘分闱，兰州士子直接在兰州参加乡试，激发了兰州士子的勤学上进之心，也促进了人物的发展。

明清后涌现的历史人物有黄谏、彭泽、邹应龙、段坚、段续、朱克敬、吴可读、卢政、周士俊、安维峻、王树中、王世相、张国常、刘尔炘、曹蓉江、杨思、水梓、邓隆、张维等，这些历史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留下了大量的故居、宅院等有纪念性的历史建筑。至20世纪初，兰州市城关区尚留存有一批历史人物故居，如彭泽故居、吴可读故居、曹蓉江宅院、刘尔炘故居、张维故居、水梓故居、邓隆宅院、邓宝珊旧居、马鸿宾故居、马麟公馆、田昆山故居、王学泰宅院、王松山宅院、董玉峰宅院、鲁大昌宅院、杨思宅院、马孝宅院、徐锡祺宅院、马步青故宅等。可惜的是，自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的古建筑被直接拆除，名人故居除了邓宝珊故居翻建外，如今只能说是寥若晨星，基本上消失殆尽了。

彭泽故居位于今天的庆阳路东端南侧，原门牌为庆阳路85号。这一带明代称为兰州东关。在今市博物馆对面，东距迎恩门300多米，



彭泽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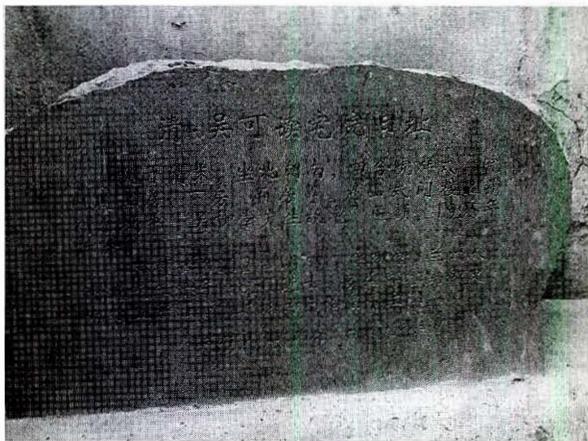
是一座典型的明代四合院建筑。双扇大门开在街南西侧，砖雕门楼高且宽敞，呈现出高官显贵家庭之气派。入门正南为砖雕影壁，东折入四合院，院内铺方砖。上房 5 间，长 18.44 米，进深 10.12 米。硬山顶，梁檩粗壮，出檐深长，格扇门，铺地板。后院有罩房 3 间，其后为兰州东关南侧城墙。抗战期间为邓宝珊寓所，后为庆阳路公安派出所驻地。20 世纪 50 年代初保存尚完整。1995 年 2 月，因拓宽庆阳路，彭泽故居全部被拆。彭泽（1459—1530 年），原名郦，改名泽，字济物，早年号敬修子，晚年号幸庵，兰州西园人。曾历任工部主事、刑部郎中、浙江副使、河南按察使、总督川陕都御使、兵部尚书等职，是明代一位把握过朝廷兵权、颇有影响的重臣，为明清以来兰州乃至甘肃本地人中从罕有。当时声名显赫于朝野，《明史》及地方志都有记载。彭泽作为兰州历史名人，不仅是彪炳史册的一代功臣，更是甘肃乃至西北罕见的文武

双全的奇才。

吴可读故居位于城关区金塔巷 91 号。坐南朝北，为典型清代兰州民居。大门高深，出檐悬山卷棚筒瓦顶，门额双钩镌刻“吴柳堂先生故宅”七个隶书大字，下款镌“民国十年岁次辛酉，皋兰兴文社赎回”，均为刘尔忻手笔。天井呈长方形，上房及东西厢房窗大门小。上房五间出檐，青瓦悬山顶，明檐廊，明、次间



吴可读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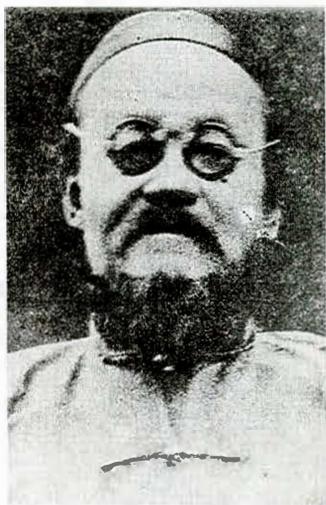


吴可读故居旧址(金塔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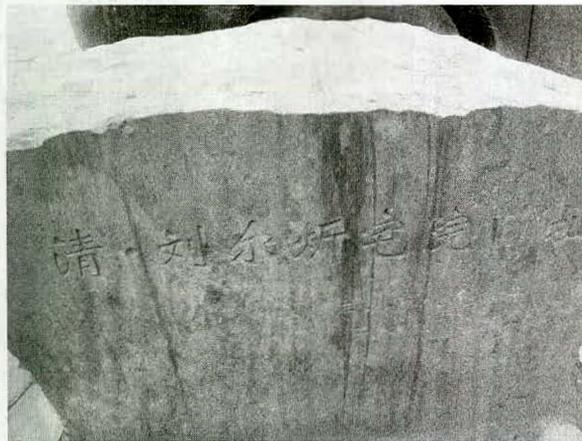
板装修，均为兰州典型的直棂棋盘心窗心，两梢间下砌槛墙，安支摘窗。东西各五间厢房，幔砖顶，槛墙板装修。下房五间，其中一间辟为门廊。1921年，吴可读族人出售此宅，由皋兰县兴文社赎回，补修后归兴文八社财产管理处经营。它是20世纪90年代唯一保存完好的兰州古代名人故居，但已于十年前被拆除了，只有一通石碑立于高楼的墙基处。吴可读（1812—1879年），字柳堂，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曾任甘谷朱圉书院、兰州兰山书院山长，培养人才众多。任都察院河南道御史时，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滥杀无辜，为时人所敬仰。筹建了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有《携雪堂诗文集》传世，《清史稿》有传。

刘尔忻故宅之一位于城关区永昌路157号。民国十七年（1928年）购置。宅院坐西向东，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四合院样式，院内有二层转木结构上房一座，南、北厢房各五间，倒座门廊（下房）一座，其中上、下房青筒瓦盖顶，两侧厢房幔砖覆顶。门窗均为棋盘心桶扇门，

支摘窗。每座建筑台基均条石压沿。除正院之外，北侧还有平房数间，南、北院以磨砖镶砌，院门相通。如今在永昌路与武都路十字西北角路旁树有刘尔忻故居石碑。刘尔忻（1864—1931年），甘肃兰州人，字又宽、晓岚，号果斋，又号五泉山人。清末翰林，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曾在五泉书院主讲，任甘肃省高等学堂（今兰州市第一中学前身）总教习多年；主持修建五泉山古建筑；擅作楹联，善书画。多年治经史，有《果斋前集》《果斋续集》《果斋别集》《果斋日记》以及《劝学迩言》等。



刘尔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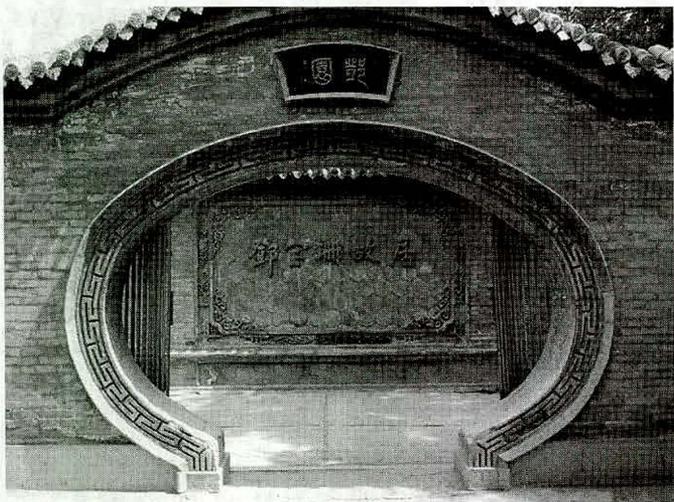
刘尔忻故居旧址（武都路永昌路十字西北）

张维宅院建于民国初年，位于城关区贤后街西口路北一侧，坐北朝南，一院三进四合院，后院两层三楹木楼是张维书房“还读我书楼”，



为典型兰州民居。据说木楼的装饰极讲究，中院楼门悬有名书画家范振绪所题“还读我书楼”书斋小匾，一侧墙悬刘尔忻隶书数百字的大屏，配于右任魏书大对联：“慷慨重天下；精诚继古人。”书斋里有章太炎撰书的一幅中堂，内容为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上房还有林则徐的一首中堂诗，近代大家王镇书联：“一生修得至此；万事听其自然。”蕴含着极高极深的文化蕴涵。张维（1889—1950年），字鸿汀，甘肃临洮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拔贡，西北方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所著《兰州古今注》，均为亲历勘察，仔细录证，是对甘肃历史、文化研究的显著成果。

邓宝珊故居位于城关区广武门后街4号，占地1.8万平方米。该址最早为清代甘肃兰州的“先农坛”，民国八年（1919年），为甘肃督军张广建副官韩仰鲁所购，建花园，名为“仰园”，俗称“韩副官花园”。1933年，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购置了仰园。1941年，邓夫人崔锦琴及子女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罹难，葬于园内，于右任改题“慈爱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办公兼居住的地方。邓小平、贺龙、陈毅曾在邓园与邓宝珊聚谈过。邓小平看到邓园的土木建筑后还对邓宝珊开玩笑说：“你住的是‘茅屋草舍’啊！”1958年，邓宝珊将园子交公。19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后，邓小平指示一定要把园子退还给邓宝珊，经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婉劝，邓宝珊才收回园地。“文革”中慈爱园被没收。1978年，国家又将慈爱园退还给邓宝珊子女。1982年，邓宝珊子女又将慈爱园捐献给国家。1985年，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投资修缮后，改为邓家花园。其南部为仿古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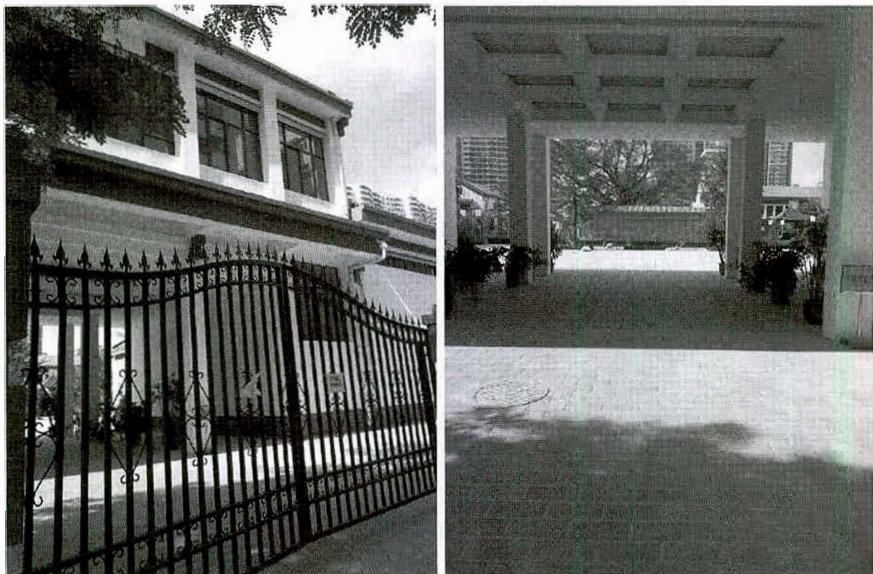


邓园旧貌

群，最南面是饰有砖雕的青砖门墙，形似牌楼，气势雄伟。园中部置一大型假山，山石重叠，池里荷叶间喷泉泻珠，游鱼戏水。东南曲折回廊通向一座小院，小院东南侧有一排出檐木结构厢房，木雕的窗棂使平房显得清秀古雅，房内置茶几、沙发，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西部有一排平房。向北一堵漏窗短墙中间开着一道月亮门，题额“邓园”。2006年，兰州市提出邓园重修的基本规划，以邓宝珊事迹展馆为重点，再把此处1.8万平方米的土地改造成基础设施完善的新园林。但因拆迁难题困扰未有大的进展，直到2013年7月，城关区又启动项目集中拆迁，邓园改造步伐加快，一座城市“新园林”即将面世。

邓宝珊（1894—1968年），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毛泽东曾致信邓宝珊：“八年抗战，先生





重建后的邓园

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省长等职。

名人故居作为历史文化遗存中珍贵的人文资源，是城市的文脉和灵魂，它记录与见证了前人的生平事迹，甚至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承的纽带，集中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兰州人民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是对人文历史、地域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综合反映，是城市历史发展和文化延续的重要的物质载体和实物例证，是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和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还是开辟文化、旅游项目的潜在资源。所以说是弥足珍贵、不可再生的历史遗产。有人认为，名人故居在历史文化名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失去老房子的城市只能是一具苍白的躯壳。

一座城市多元的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个城市绵延的历史“记忆”和外显的文化标志，是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一个城市的物质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是丰富完整，就愈能凸现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愈能彰显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城市最大的物质遗产便是建筑、街区、遗址、老字号、名人故居等，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魁星

武《日知录·魁》载：魁星神像头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一手捧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文人的姓名。也许是巧合，兰州本土文化厚积薄发，在关陇文化日益衰微、文化中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兰州文人却奇迹般地崛起。明代，据不完全统计，兰州学子中进士者 32 人，涌现

出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文人，如在明正统七年壬戌科（1442 年）殿试中夺得一甲第三名的黄谏、理学大师段坚、引进和改制水车的段续、兵部尚书彭泽、弹劾严嵩的邹应龙、力谏嘉靖皇帝的殷承叙等，皆是科举时代的宠儿，或颇有政绩，或铁骨铮铮，或著作等身，兰州由此改变了仅为军事要塞的面貌。那么魁星阁起了什么作用？也许有些心理诱导吧，根本上当然是政治、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修什么阁就能使文化昌盛起来简直是无稽之谈，不如多盖几间教室。然而，在自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古代，祭祀神祇是帝王的重大事务，蜀汉阿斗皇帝就曾说过“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因此，我们不应拿今天的价值观去随意臧否古代人物，更不应该“虚骄”，对于朱模这样在兰州发展历史上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人，建议



大家应毫不吝啬地拿出一些敬意来献给他。

由于人们将魁星阁俗称为三台阁，年深日久，遂忘其本名。然而，这样一座“维系”兰州文人命脉的建筑却命运多舛，屡建屡毁。在几百年无情风雨的冲洗下，明初所建的三台阁黯然倾颓。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兰州知府勒尔谨主持重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毁于兵火；道光十二年（1832年），陕甘总督杨遇春捐养廉银，官绅各自捐银，建高阁三级，并在阁左右筑墩，高三丈余。数年后，阁被风雨剥蚀，兰州士绅重加修饰，上层装为板门，中层围以砖墙，添修厢房三间，挖窖蓄水，栽树成荫，招农人居住，早晚侍香火。同治五年（1866年）又在战乱中被付之一炬，人文景观屡次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延至民国初，张广建凭借袁世凯的一纸委任状，带领装备精良的军队强行进入兰州，主政甘肃。扎稳脚跟后，这位有“早上学会安徽话，



三台阁



三台阁远景

晚上就把洋刀挂”任人唯亲“口碑”的督军也关心起文脉问题，命人重建三台阁，规模居然超越前代，成为当时兰州一大景观，以至于有人误认为三台阁就是张广建创修的。不料在 1920 年的海原大地震中三台阁被震坏，以致后来完全坍塌。今天所看到的三台阁为 1984 年重修。

三台阁建在青砖包土上的

三级高台之上，阁高 26 米，故名“三台阁”。这三级高台从下到上，一级比一级收分，每一台四周都有露天观景环廊，环廊外为起防护作用的漏花墙，每台之间南北两侧有踏步拾级而上。阁为两层砖木结构，方正四角，青瓦歇山，每层都设户牖，门窗雕花简洁，青绿旋子彩绘朴素雅致，与青砖台基和周围环境浑然一体。入夜，阁四周轮廓灯和射灯开启，从城区仰望，蓝色天幕中，飞阁凌空，如梦如幻，具有邈远高旷的无尽画意。

自明代以来，三台阁吸引许多文人墨客登临观光，并留下了他们的高吟低唱。宋廓《三台阁记》云：“盖此山海拔两千一百米以上，又去城甚近，是以日新月异之肇建，物阜民丰之盛况，均可于指顾间得之。



固知三台阁之快游，不独在于山川风物之间也。后之来者，目睹兰山风物日益繁阜，赏心悦目之际，或有感于尽心尽力之用而激励振兴中华之志。如是，则斯台之建，可以继百世而不朽矣。”并撰联曰：“高处不胜寒，飞玉兔清辉，映马衔积雪，顿觉人间炎热去；兹山何峻秀，登皋兰绝顶，掉龙尾行空，更迎天外紫云来。”

站在三台阁之上，你也许会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境界，你也许还会深切地感受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你也会欣赏到真实的“金城揽胜图”：远山苍苍，明暗相间，如水墨画般空灵深邃，令人遐想；黄河在楼群与山脚间蜿蜒而过，从容自若，波澜不惊；烟波浩渺的大河之上座座桥梁如彩虹卧波，似蛟龙出海，若隐若现；街道如星罗棋布，高楼参差容纳百万人家。真不愧为西北重镇，山水名城，令人慨叹与震撼。

如果古时有王勃那样的大家来到兰山之巅，他也许会写下《肃王阁序》：“金城故郡，兰州新府……”凭借壮美的山河，三台阁也许比滕王阁还要有名得多。可惜没有有名的大家吟诗作赋以壮行色，虽然“兰山烟雨”旧时为兰州八景之一，但远不可与因诗文而名扬四海的醉翁亭、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古建筑同日而语，殊为遗憾。

近年来，对三台阁周边进行了维修与扩建，其四周开辟了广场，东侧建起了生态绿地和石雕牌坊，东北侧有观景长廊和观景亭，东南侧为塑石瀑布园，西北侧为兰山钟院，西南侧为生态休闲园，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性风景区已经建成，成为一座“天上”的街市。

不管你是春风得意还是郁郁不得志，你都来皋兰山之巅吧，登上三台阁，迎接八面来风，吐纳天地灵气，俯仰千古历史，饱览金城美景，你会神清气爽，物我两忘，浮躁与郁闷之气全消，豁达与豪情壮志顿生。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与收获。



文博精藏

城关文物古迹胜览



文物收藏

——
博物馆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

兰州市现有各类博物馆 23 家，包括兰州市博物馆、榆中县博物馆、永登县博物馆等 10 家市县博物馆，甘肃省钱币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等 9 家行业、高校博物馆，兰州彩陶艺术博物馆等 4 家民办博物馆。另外，兰州市辖区内较有规模的文物监管品市场有 4 个，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的零散经营商约 240 户。本文就位于城关区的博物馆予以介绍。

兰州市博物馆

兰州市博物馆位于庆阳路 240 号白衣寺院内，为地方性综合博物馆。1984 年正式建馆。占地面积 4700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4000 余平方米。其主体建筑为仿古风格的宫殿式建筑，主楼高四层（含地下室），两侧东西陪楼高两层，巍峨庄严，气度典雅。馆内白衣寺塔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馆门为清代建筑，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兰州市博物馆藏品种类齐全，精品纷呈，是丝绸之路之上重要的文博单位。馆藏 1.2 万余件藏品，分陶器、瓷器、铜器、字画、钱币、玉器、石器等七大类，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 52 件，国家二级文物 78 件，国家三级文物 682 件。特别是半山彩陶鼓、西周菱纹青铜簋、西周青铜盃、东汉墨迹纸、明代印花丝绸等属文物精品，这些文物几乎都是在兰州市陆续发现的，从实物方面反映出中国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些文



兰州市博物馆

物的出土和发现也说明丝绸之路开通对西北乃至兰州市的重要影响。

该馆的基本陈列是“兰州历史文物陈列”。该陈列以“弘扬兰州文物精华，展示百年兰州风情”为宗旨，以单元陈列方式为框架，分两部分展出：第一部分为序厅，主要展出兰州百年老照片40余幅，反映兰州老城风貌；第二部分为二楼的文物陈列，共展出馆藏历史文物189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8件，陈列主要有马家窑文化，铜石并用时期的齐家、辛店文化，白衣寺塔塔藏文物，佛教造像，铜器及历代明器六个单元。基本陈列常年展出，年接待中外游客多达10万人。通过大量历史文物和资料，反映了兰州与中原和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突出了兰州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兰州市博物馆设施齐全，陈展力量雄厚，有先进的安全防范系统。此外，近千平方米的展厅，具有接待各种科普、书画、商业性等临时性展览的功能。别具一格的古代人文景观和现代建筑的和谐统一，衬以绿化草地，院内环境优雅，空气宜人，是都市里不可多得的一处怀古怡情的所在。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1978年，在互助巷2号的旧址上筹建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并于1981年1月正式开放。设有原状陈列、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甘肃抗战、兰州空战和红西路军事迹展四个展厅。

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对该馆进行了拆除重建。新展馆整

体由两部分组成，南面是旧式的四合院，北面则是一座两层的现代化展览馆。整体建筑面积达 2893 平方米，并开辟出地下展厅。展览采用实物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手段，再现当年革命前辈生活过的痕迹。展馆设两个基本展览，分别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甘肃抗日救亡展”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原状陈列展”，共有历史图片 500 余张，历史文物百余件，如伍修权用过的勃朗宁手枪、高金城的名片、丛德滋的毛毯、玉门油矿初建的珍贵史料、抗日流血纪念章等一批珍贵的文物。新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年设计接待能力 50 万人次。

2014 年 8 月 26 日，西路军事迹主题展馆正式开馆，该馆位于“八办”旧址。其亮点之一，就是对“八办”旧址原状及甘工委成立场景的生动再现。同时，将馆内现有的凉亭命名为“追思亭”。而在“西征将士纪念墙”上，铭刻着西路军将士们的名录，两侧运用线雕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讲述着“营救西路军动人故事”。展览分图片展览和旧址陈列两大部分。图片展览部分分为挥师西渡、策应河东、血战临高、风雪祁连、多方营救、永恒纪念等部分，旧址陈列部分分为故事墙、名录墙、营救原状、甘工委成立原状、接应与转送组雕等部分。展览全景式地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征战河西走廊期间，为打通国际路线、策应河东红军、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写下的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兰州黄河桥梁博物馆

兰州黄河桥梁博物馆坐落于金城关文化风情区原金城关古玩城内。



兰州的桥非常多，有公路桥，也有铁路桥；有高速公路的跨河大桥，也有各村镇修建的简易吊桥；有专门用来输送各种灰渣的跨河管道桥，也有为燃气过黄河架设的吊桥。兰州黄河桥梁博物馆便是一个集中展示。

该馆展览以黄河桥梁为主线索，通过沙盘、模型、文物、档案、图片、多媒体演示等多种手段，全面展现黄河干流的地形地貌、黄河桥梁的概貌、交通地位和发展历史。同时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桥”为核心，突出展示“黄河之都”——兰州的桥梁历史和当代桥梁风貌。

展览还在黄河文化、中外古今名桥等方面作适当延伸。形式设计上，采用了中山桥的结构和构件作为构建桥梁馆的基本元素，构建出展馆的各个部分，从而使整个展馆凸显出沧桑的历史感和厚重的力量感。色彩的选择上，主要依据兰州的地域和人文文化，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采用了灰色和黄色。灰色象征当地人民的淳朴，当地文化的深厚；黄色象征着养育



兰州黄河桥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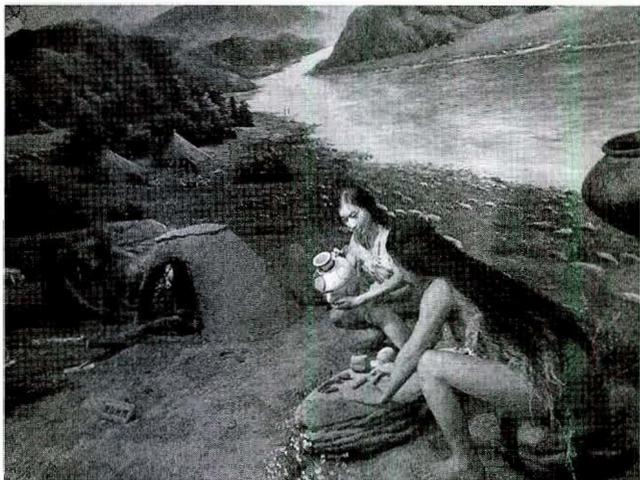
了兰州人民的黄河。形式和色彩的选择，生动地烘托出整个展馆的氛围，更加有力地彰显出展馆的展览内容，从而使得整个展馆能够充分传达黄河桥梁的相关信息，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传播黄河文化、展示黄河桥梁建设成果，宣传黄河城市——兰州的历史、城市建设的成就。

兰州彩陶博物馆

位于金城关文化风情园，建设面积 1300 多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000 多万元。2011 年 11 月正式对外免费开放。主要由序厅、展示厅、体验厅三部分组成，通过声、光、电相结合的高科技数字化技术手段，模拟复原展现古人类制陶工艺流程，集中展示兰州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彩陶及各时期、各种类型的彩陶。距今 8000 年前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出现的彩陶，为甘肃较早的彩陶之一。

走进博物馆的一楼大厅，仿佛走进了远古时代，身着兽皮的先族们，正在火塘边忙着烧制各种陶罐……通过 3D 技术合成，对先民们烧制陶器和渔猎生活的场景复原，生动展示了先民将土、水、火结合起来生产出陶器的情景，详尽地介绍彩陶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二楼是彩陶精品展示厅，集中展出了兰州市出土及兰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各种文化类型的彩陶共 91 件，其中不乏一些马家窑时期的文物精品。这些集中展示的彩陶，从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再到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分别代表了甘肃彩陶发展的初始期、繁荣期、鼎盛期和衰落期。三楼是一个互动交流厅，设置休闲茶座区和陶艺制作体验区。在这





兰州彩陶博物馆原始场景

个古色古香的现代“陶吧”里，人们可以现场了解手制、模制和轮制等各种陶器制作方法，亲身体会古老彩陶工艺的无穷乐趣，感受彩陶文化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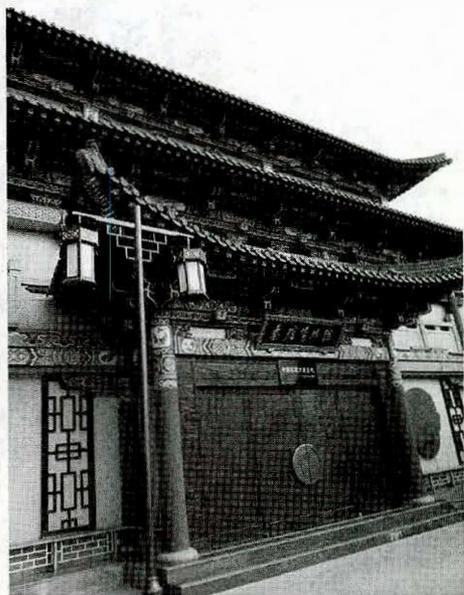
兰州秦腔博物馆

兰州秦腔博物馆，坐落在金城关风情区二台阁。2010年1月21日正式开馆迎客。以“秦腔文化，源远流长”为基本主题，展馆分秦腔表演区、历代秦腔名人蜡像区、小型皮影戏区。

展馆有13个部分，有民国戏曲与秦腔，秦腔的音乐、艺术特点，秦腔的传承及教育机构，班社与剧团，秦腔的剧目，从戏楼、戏园到现代剧场，秦腔的名人，秦腔在发展中的鼎盛时期，西秦腔，陇剧，秦腔木偶戏，秦腔皮影戏，各种演出交流、秦腔艺术节会演活动。

该馆藏有秦腔唱本、钢印本唱本、脸谱、老杂志、老戏票、演出

说明书、人工手画戏服、整套的木偶戏箱、唐代戏俑，到戏曲题材的剪纸、邮票、工艺品，以及一张张记载着戏曲发展重要历史事件的老照片；从戏楼、戏园到现代剧场；从秦腔的名角，到秦腔在发展中的鼎盛时期；从西秦腔、陇剧、秦腔木偶戏、秦腔皮影戏，到各种演出交流、秦腔艺术节会演活动等，应有尽有。



兰州秦腔博物馆

在秦腔博物馆，观众进馆后可以在参观的同时参与互动，馆内提供有特别意义的展示，并特别设计了一系列互动场景，如电子触摸屏、移动沙盘、动漫场景、幻影成像等，在引导观众参与的同时，赋予观众愉快参观的体验。



兰州秦腔博物馆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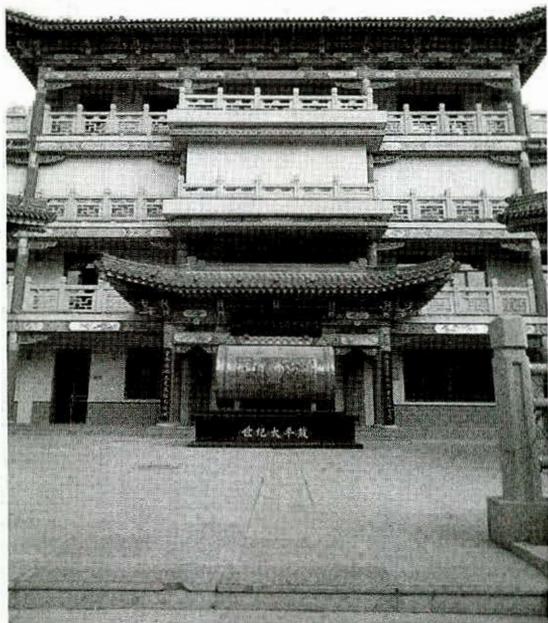
秦腔博物馆的建立，是对秦腔文物的保存与保护，是对民族地域性文化和秦腔艺术活态的保护，为广大群众从纵深层面认识秦腔，探讨研究秦腔，更为全面、深入了解秦腔文化，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位于金城关文化风情园区，2010年7月8日开馆。该馆历经3年时间精心筹划，陈展投资1000多万，场馆面积2000多平方米，集展示、展演、传承保护、研究发展等功能为一体，采用了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全方位地呈现多姿多彩的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包括序厅、展示厅、国家级项目兰州鼓子保护基地、茶园演艺厅、古金城民俗一条街等。在序厅和展示厅，采用全息数字化环形银幕技术、新型材料上镂空图谱、微型浓缩景观模型、实物展示等形式，集中了兰州一批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如兰州太平鼓、黄河水车、旱田压砂技术、兰州鼓子、永登高高跷、微缩古建模型兰州四合院、兰州剪纸、兰州刻葫芦、兰州泥塑等。在“非遗馆”二楼是国家级项目兰州鼓子的保护基地，游客可坐在古香古色的茶园演艺厅里，一边品茶，一边通过180度的环幕电影，欣赏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精彩镜头。在“非遗馆”三楼是古金城民俗一条街，走进城门牌楼，一条充满生气的兰州老街映入眼帘，按照1:1原大复制的“老字号”茶楼酒肆、商铺店面，用硅胶制作得惟妙惟肖的“老兰州人”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马保子牛肉面馆里“一清二白三绿四红五黄”的兰

州牛肉面，兰亭饭庄里猜拳行令的“酒场子”，茶馆里揪牛九、吹拉弹唱，街边大树下所卖的酸辣可口、令人垂涎欲滴的兰州酿皮，以及润兴钱铺、天增成皮货铺等，展现了明清时期古金城“茶马互市”兴盛一时的商业景象，还展示了洮砚砚雕工艺、绘制唐卡、



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

打造保安腰刀、刺绣等多个场景，无不惟妙惟肖，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甘肃省钱币博物馆

建于2003年12月。几年来，接待钱币爱好者、学者、社会各界观众及中小学生5万余人次；鉴定各类货币350余次，计6300余枚(张)；举办钱币类学术研讨会7次，编辑出版杂志2期；举办甘肃省首届民间钱币展销会和甘肃省民间钱币精品展，并通过长期开展反假货币实物展，宣传人民币知识，有效履行了“秉承钱币历史，追溯丝路文明；展



示中外货币，弘扬先进文化”的职责。

为搭建更好的钱币精品展示平台，营造钱币爱好者收藏研究家园，大力弘扬中华钱币文化，甘肃省钱币博物馆于2007年5月进行了改扩建工程，历时8个月，建成了这座崭新的甘肃省钱币博物馆新馆。新馆展馆面积增大，展示的钱币品种更为丰富，钱币展示的方式更为先进，设施更为完善，功能更为齐全，环境更为优雅，为公众提供一流的钱币文化服务，展示品质精良的钱币文化产品，推出精美的钱币文化展览，并不断推进钱币文化创新活动。



甘肃省钱币博物馆

甘肃地质博物馆

甘肃地质博物馆坐落于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团结路6号，设有地球

厅、生命演化厅、4D穹幕影厅等，收藏有地质矿产、古生物、矿物和岩石标本3万多件。其中有大夏巨龙、兰州龙等一大批精品，还陈列有温家宝总理当年采集的地质矿产标本。展厅内还会循环播放富有陇原特色和原创性的《甘肃概况》《甘肃地质公园》《甘肃土地资源》和《遨游甘肃》等20多部影视片，以及《宝石趣闻》《地震体验》等寓教于乐的一系列互动项目，让人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我们这个星球。

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

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创建于2000年9月，是浓缩展示西北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是该校教学科研的重要辅助参与部门。该馆现有馆藏文物15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25件、三级文物88件。馆藏的阿巴斯王朝银制印章，清道光同治年刊刻《天方性理》，1258年波斯文手写体教法经，清光绪景泰蓝马镫、马鞍等均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和学术研究价值。开馆至今，已接待国内外来宾3.5万余人次，全国人大常委图道多吉，国家民委副主任牟本理等领导曾亲临参观指导。2001年，接待外交部组织的40个国家驻华武官团，得到外宾的高度评价。同年，与北京民族文化宫合作，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功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艺术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亲临参观。

近年来，兰州市的博物馆建设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向专业化发展，分类更细，设施更完善，管理更科学，像桥梁博物馆、秦腔博物馆等；另一个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由过去的政府单一投资创办扩大



到民办等领域，拓宽了博物馆建设的渠道，像彩陶博物馆等，使得一些民间收藏得到专业性保护和利用。这两方面的发展，对兰州市可移动文物的整理、保护、研究、利用以及地方文化的发掘与传承等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在建设文化兰州，发展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培养市民的自豪感与认同感等方面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 [1]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兰州市志·文物志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 [2] 关振兴.兰州历史文化·士子名流 [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 [3] 王文远.兰州历史文化·文物名胜 [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 [4] 邓明.兰州史话 [M].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
- [5] 千同和主编.兰州城关史话 [M].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8.
- [6] 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 [7] 张克复编注.甘肃名胜楹联 [M].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 [8] 程兆生.兰州杂碎 [M].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 [9] 杨重琦, 余贤杰, 关振兴.百年中山桥 [M].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
- [10] 胡大浚主编.西北行记丛萃 (第一辑) [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胡大浚主编.西北行记丛萃 (第二辑) [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马啸.左宗棠在甘肃 [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林健.明代肃王研究 [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 [14]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 [15]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兰州市志·军事志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 [16]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兰州市志·人物志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 [17]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兰州市志·民族宗教志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 [18]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兰州市志·城建综合志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 [19]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兰州市志·地方文献志 [M].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1.
- [20] 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总十三辑) [M].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2.
- [21] 《走近兰州》编辑部.走近兰州 [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
- [22] 林鹏侠.西北行 [M].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 [23] 彭清深.兰州道教的历史面貌及现状概述.

后 记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是城关区重点出版项目，旨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区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激发热爱城关、建设城关的情怀。

2013年3月，丛书编撰工作正式启动。在城关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城关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紧密结合城关地情实际，在充分研讨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编撰大纲，确定了文体及篇目，发动、组织兰州地区有一定文学造诣、熟悉城关区情、热衷弘扬传统文化的学者、作家成立编辑部，并根据各作家、学者的研究志趣、学术专长和写作特点，逐项分解落实编写任务。经过搜集、挖掘、筛选、整理、加工、审定等一系列浩繁工作，历时四年，数易其稿，终于顺利出版。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不仅对城关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和盘点，同时也补充了地方史志的不足，为全区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当然，由于思想高度、认识水平、专业能力有限，同时，由于各个时期的人物、文化遗存、风土人情等历史跨度大，时间久远，难免错漏，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教正。

作为城关区文化建设中一项浩繁艰巨的工程，丛书从筹划立项，到编撰刊印，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区委、区政府领导坚定的文化清醒和积极的文化创新，得益于所有参编者的精诚团结与埋头工作。这套丛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着兰州市特别是城关区社会各方人士的辛劳和才智，承载着保存、传承、开拓城关悠久历史文化的美好愿景。值此丛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本书编纂出版的各位领导、文史专家、学者、参编者和有关单位及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与一块地域悠久丰富的历史和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相比较，任何图片的展示、文字的表述都是苍白的，都如同在大海里撷取了几朵浪花。本丛书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寻访城关历史文化蕴藏的线索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以本书为向导，顺藤摸瓜，寻幽探隐，以您的新发现，来填补本丛书之缺陷，共同推动优秀文化遗产服务于当代，惠泽于未来。

本书所用图片部分来自网络，署名者谁？故未敢掠人之美，尚请相关作者告知，以付薄酬。

《兰州市城关区历史文化丛书》编委

主 编 韩春梅

编 审 姜洪源

学术顾问 邓 明

策划指导 张卫东

编 务 高 峰 孙 霞 赵文娟

杨重来 聂 民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街巷旧事》

《良风美俗》

《土木之功》

《艺苑经典》

《工商辐辏》

《人物春秋》

《名札集束》

《文博精藏》

《千载芸香》

《杏坛遗泽》

《太平鼓韵》

《金声玉振》

责任编辑：周乾隆
封面设计：李中安